李爽的名字让中国当代艺术界的许多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却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等一样，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风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先锋之一。

1981年11月，24岁的李爽由于和未婚夫、法国外交官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白天祥回法国后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督促释放李爽。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及此事。很快，在会谈之后，李爽获释，并获准去巴黎。

1983年李爽奔赴法国，次年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他们波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被法国电视台报导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上架建议：回忆录 · 畅销

ISBN 978-7-5133-1091

9 787513 310918 >

SH U ANG

爽

七十年代私人札记

李爽——著

SH U ANG

爽

七十年代私人札记

K825.72
172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爽/李爽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3-1091-8

Ⅰ、①爽… Ⅱ、①李… Ⅲ、①李爽－自传 Ⅳ.①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75号

爽

李 爽 著

选题策划：刘丽华
统筹编辑：高 磊
责任编辑：程 鹊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660mm × 970mm　1/32
印　　张：11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091-8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说文》：“爽，明也。”

1957 年 李爽和母亲俞天玫

加入红小兵后当夜毁了袖章，与同学毕业合影时只好请摄影师适当遮住左臂。

在中山公园和姥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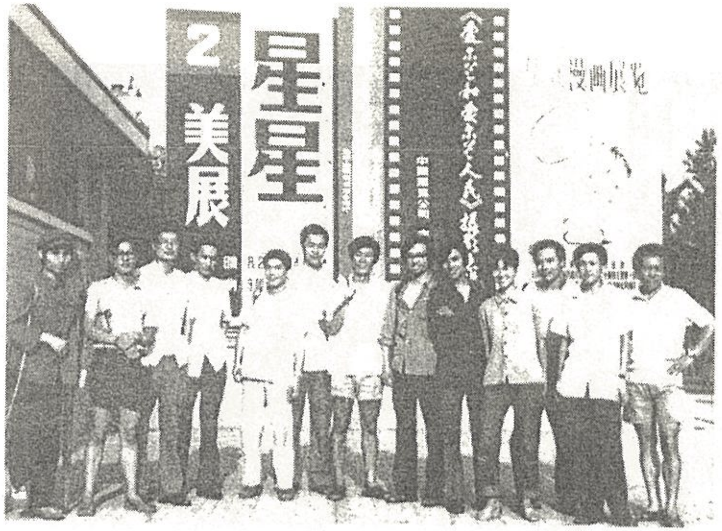
父亲解除关押后在玉渊潭给家人拍的合影

1979 年 李爽在创作

1980 年 星星露天美展，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左起：刘迅 李爽 王克平

前排左起：曲磊磊　李　爽　钟阿城　马德升
后排左起：王克平　严　力　黄　锐　陈延生

1980 年星星部分成员在北海画舫斋合影
后排左起：严　力　马德升　曲磊磊
前排左起：李　爽　黄　锐　李永存　钟阿城　袁运生



1980 年 "星星画会" 成员在中国美术馆（星星第二届美展）广告前合影
左起：马德升 肖大元 钟阿城 杨益平 姜 云 李永存 曲磊磊
黄 锐 严 力 李 爽 王克平 陈延生 张世琪

1976 年 刚到中国的白天祥（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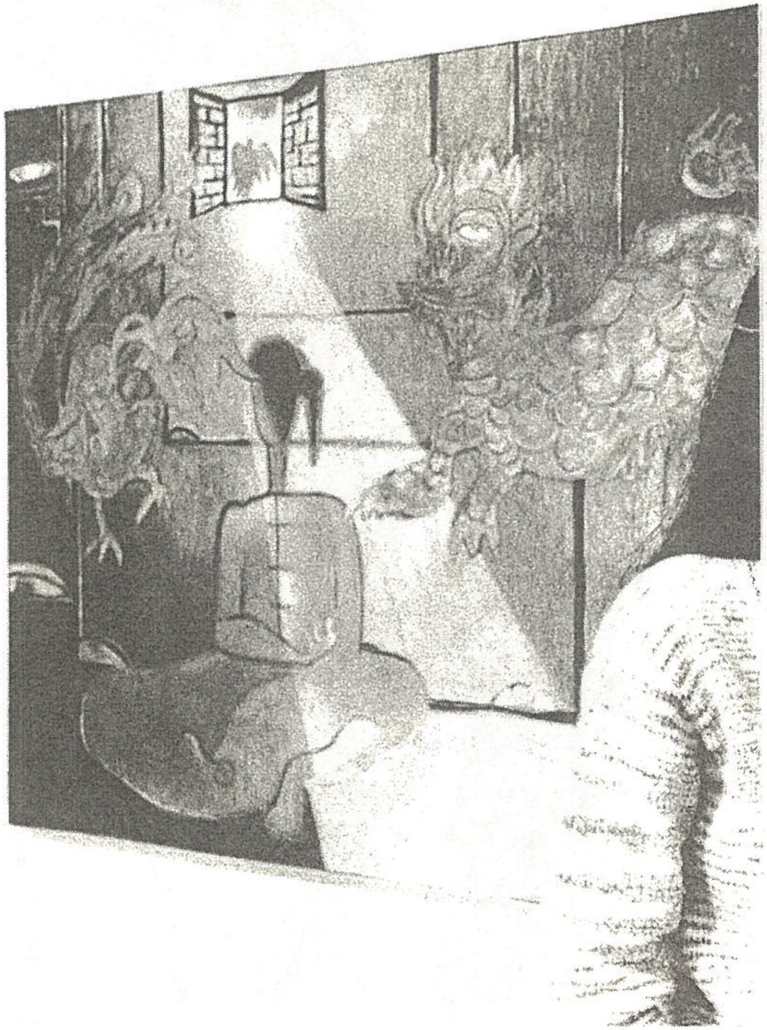
左起：舒婷 李爽 北岛

1980 年 "星星画会" 部分成员与美国著名艺术史专家科恩夫人合影
左起：马德升 严力 李爽 黄锐 科恩（Joan .Cohen）李永存　曲磊磊

左一：英国影星莎赫罗特、偌普琳（Charlotte Rampling）左二：法国电子音乐家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右一：李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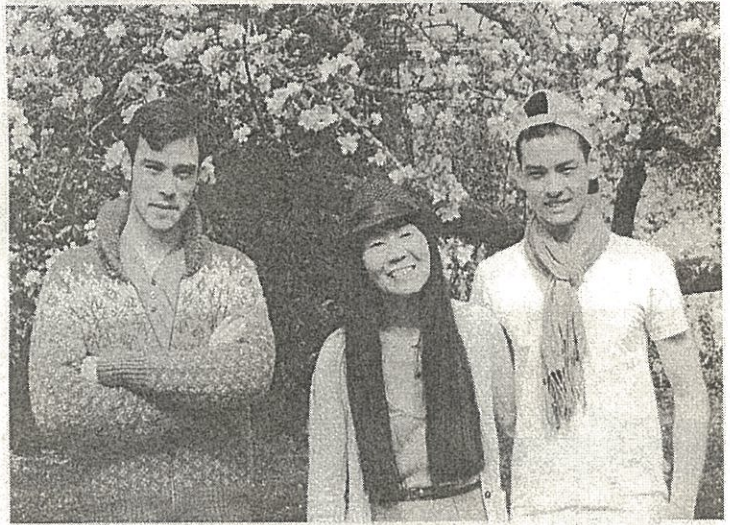
释放那天在良乡劳教所大门口稍远处

离开中国前和家人在机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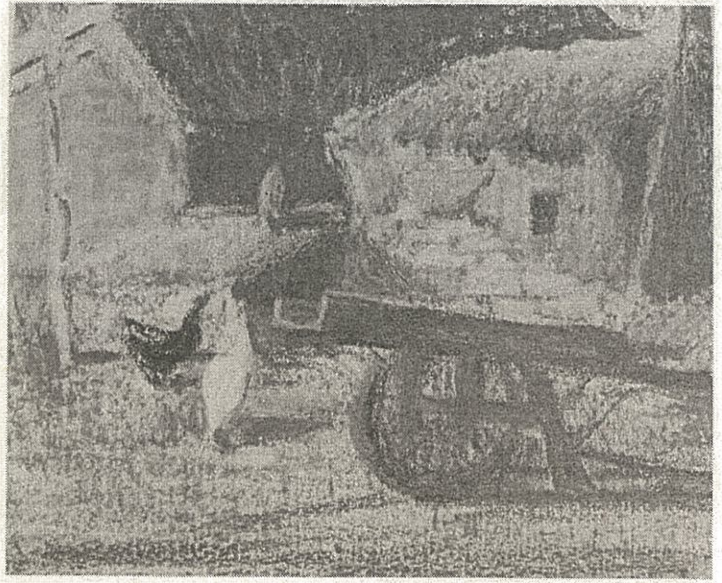
在法国第一次画展

1995 年在巴黎画展。左一：北岛　左四：王广义　右一：李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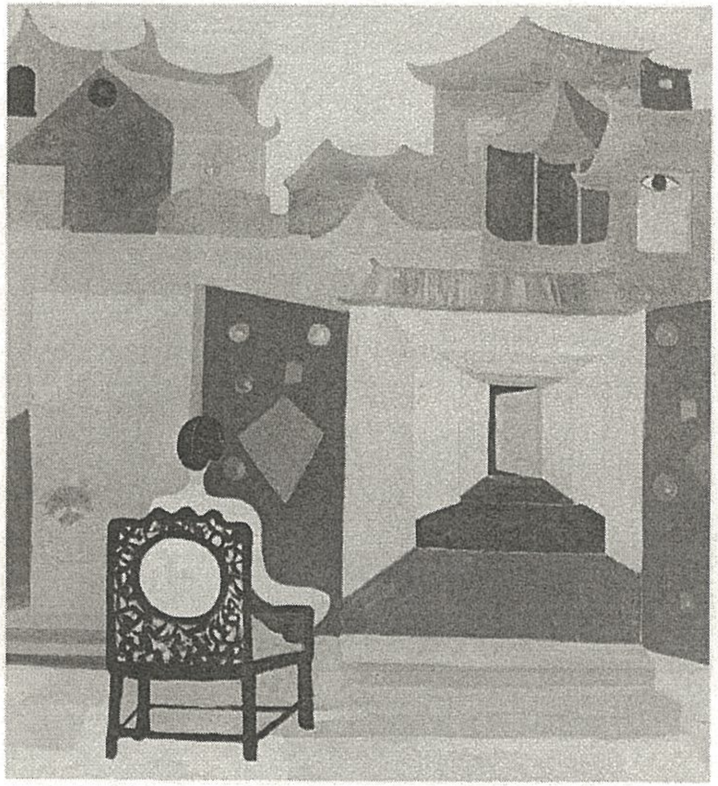
左起：大儿子李爱盟（Edemon.Bellefroid）李爽 二儿子李爱德（Armand.Bellefeoid）2012 年

插队时画的高奶奶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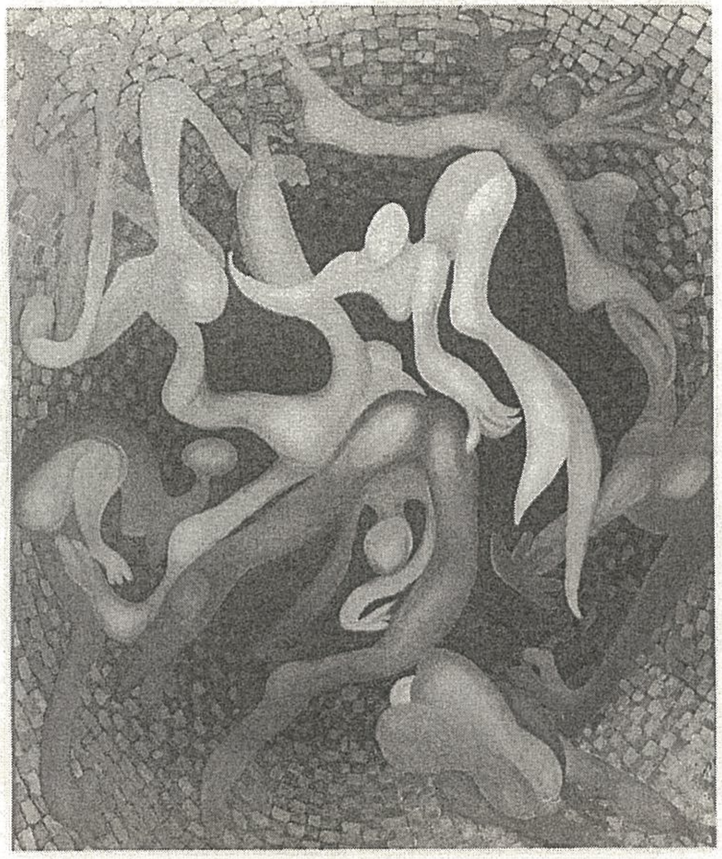


插队时画的小风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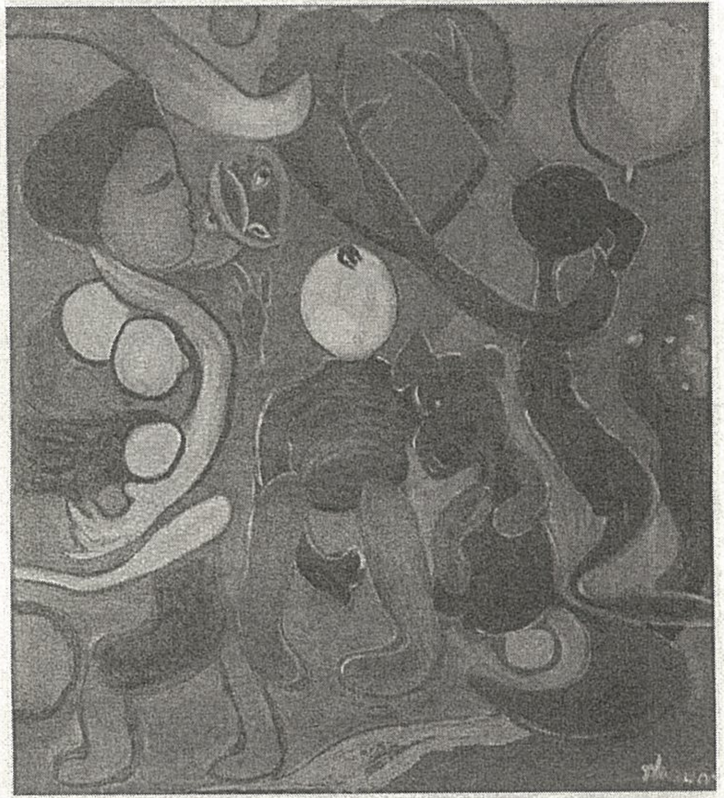
《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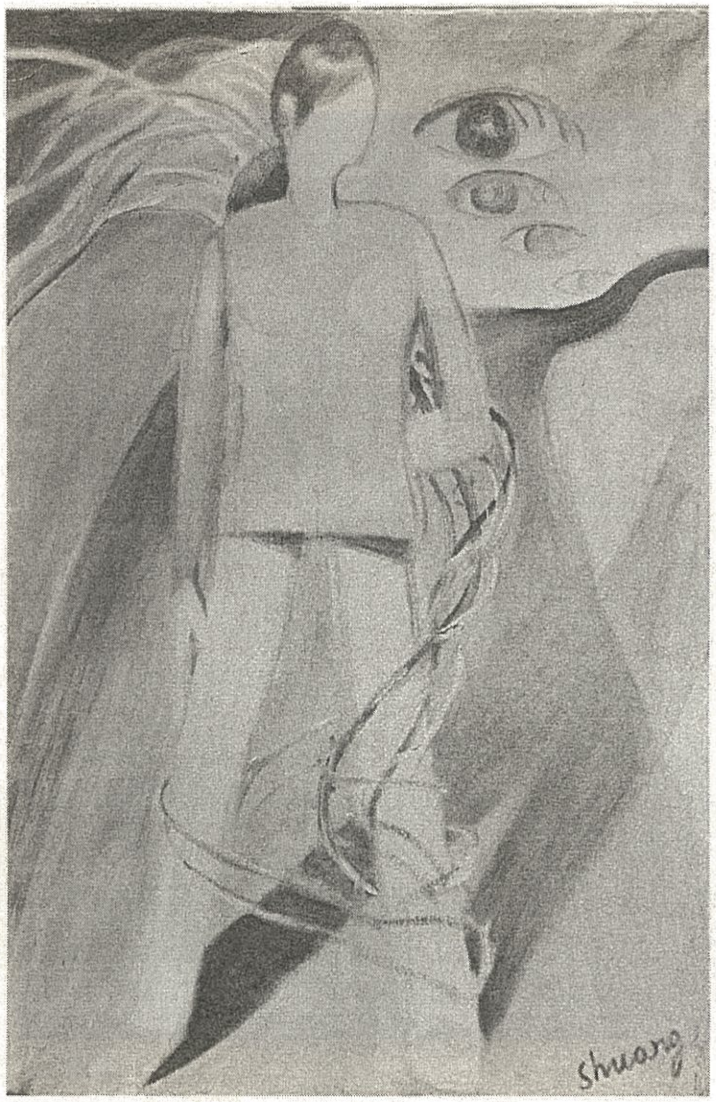
《黄昏的审视》


《欲望之井》

《红白与黑》　第一届“星星美展”（画舫斋）参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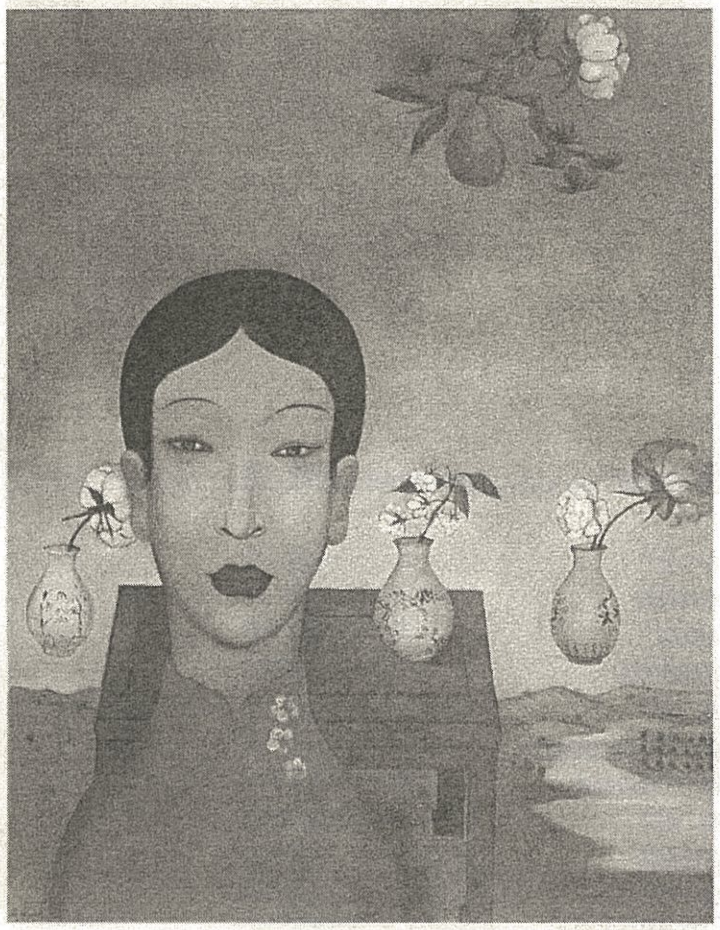


《神台下的红孩》 第二届“星星美展”参展作品



《希望之光》 第二届“星星美展”参展作品

《自画像》



《日临仙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 The first part

引　子	002
家　族	003
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011
大革命	016
抄　家	020
血　亲	025
天塌了人还得存活	029
孤独只是感觉却令人恐惧	031
寻找爱	034
改名儿	036
偷着闲情逸致	037
眼睛艺术什么都艺术	039
孤儿寡母	040
红小兵	045
纠结的心萌动的身	048
猫变成了过街老鼠	050

第二部分 | The second part

中学生	054
看样板戏	055
赶时髦	057
初恋的冲动	060
童　真	063
孩子是从哪儿跑来的	067
第一堂性启蒙课	070
堕　胎	072
本性难移	075
禁　书	081
跟着感觉走	083
天安门	087
天摇地动	089

目 录

CONTENTS

第三部分 | The third part

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 094
人挪活，树挪死 097
馋 101
想　家 102
在男女界限外偷情 107
三角恋 111
相信未来 113
迷　茫 124
善恶同堂 129
梦青春 135
姥　姥 141
画神附身 144

第四部分 | The fourth part

无业游民 154
艺术的荒林中找果子充饥 159
高　考 162
地下文艺沙龙 169
北京胡同的法国印象画派 173
生活不是如意算盘 176
一村的男人女人 179

目 录

CONTENTS

第五部分 | The fifth part

回到北京	188
卧虎藏龙的文艺界	193
“星星”开始发光	201
我们的圆明园	204
进入最高艺术殿堂	212
吃 醋	220

第六部分 | The sixth part

洋鬼子并不可怕	228
中外恋情不是天方夜谭	232
女 人	239
卖 画	243
不测风云	248

目　录

CONTENTS

第七部分 | The seventh part

宿　命　256

炮　局　259

情　杀　266

囚井里的蝉蜕　272

刑事犯　277

狱中琐碎　288

探亲日　292

第八部分 | The eighth part

谢　幕　298

飞　翔　305

1

The first part | 第一部分

引 子

现在，我已很少谈论恍如隔世的往事，那个曾经感到纠结与受害的我与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没变，只是我从原来的视角挪了一步，奇迹就发生了，我的心态变了。现在我可以这样感觉：谢谢在我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那些经历过的甜酸苦辣。没有这些"礼物"，我不仅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不是。

我是我母亲的第二个女儿。

有名的不好看，这对我的生活特别有影响。

那还是一九八三年的事，坐完了两年牢，我二十六岁，晕头转向地——第一次见到巨大的外国飞机，坐上飞机，到了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用"傻瓜灯"扫射我，需要十几个警察挽起臂膀保护我。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从一个笼子转到另一个笼子里的猴儿。

第一次有人，有电视，有报刊说：我是美丽的女人，带着神秘而纯粹的东方艺术家仪态。报纸头版声称："李爽死里逃生，是'东方稀有贵族'……"花里胡哨的报纸、杂志铺满了我的照片，不懂法文的我，像丈二"猴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拿自己的事儿当别

人的戏来看。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在中国，即便是一九七九年和"星星画会"的朋友在一起时，哥们儿里也没人说过我好看。大概不是审美观的问题，而是怕沾"作风问题"的嫌疑。

"星星"那一段儿时光我进入了敢作敢为也敢当的年龄。最脆弱的回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从一个女孩到少女。那是人心如同抹布、被拧了再拧的时代，许多人为了生存得好些，从苟且偷生中学会了冷漠，另一些人学会了接受，还有一些人通过接受变得有意识。

我也一直很讨厌想起那个时代，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放了"讨厌"的情绪。人事儿，大家都经历过，只是每个人对自己经历的认同不大一样；所以人抓住三年前，十年中，百年里，千年后的新梦、老事、旧伤不放，却忘记停下来，静静地看一眼自己正在干什么。

家 族

我的家庭，怎么说呢？母亲家和父亲家是完全两样儿的家庭。只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喜爱西方文化，不同之处是，父亲家是一个中国望族之家，他们媚宠西洋却封建。母亲家是一个少数民族之家，他们欣赏西洋文化却崇尚中国文化。

外祖父，我姥爷，姓“俞”，俞培新，祖籍西藏，从祖上就迁移到山东一带。

传说，曾外祖父自幼被一个北欧传教士收养，信仰基督教，并做了长老会的长老。我姥爷俞培新相貌特殊：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不过没有人知道曾外祖父与那个传教士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将是一个永远一目了然的谜。

俞培新在济南上学时，已经结婚，娶的是童养媳。童养媳的祖上也是云南一带的藏人，她就是我姥姥江文秀。在我的生活里，姥姥像一个保护神一样重要，老太太实在平凡无奇却非常了不起。

姥姥听自己父亲说，他们曾经姓朗顿旺吉，是西藏的贵族，不知何故招来灭门九族之灾。全家族决定逃往内地，路有天险金沙江为阻，因老天保佑他们安然渡过金沙江，从此全家族就改姓为江。

姥爷在济南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做东方古董生意，需要找个小伙计缝邮包儿，把收藏的中国东西寄到美国。我姥爷就做了这个伙计，之后成了那个美国人的可靠合伙人。

美国那边儿收到一个邮包儿，我姥爷就得到一些钱。

二十多岁的俞培新靠这个养家，同时给济南大学当会计。他说那时家计窘迫，有两个幼小的儿子，姥姥每天去缝邮包时，只好把孩子拴在床栏杆上，孩子总是揪着绳子到处够东西玩。

她讲述两个舅舅：“你二舅大舅到现在背还有点儿驼。”

姥姥细小的眼睛，看着我时，里面丰盈的爱可以填满世界。

姥爷跟着美国人学做古董生意，渐渐开始自己做，后来决定迁移到北京，哪一年迁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到了北京，古董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算是专家。他手里有特别宝贵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

中几乎全被砸碎，毁了。剩下一些没被抄走毁坏的，我相信有一天它们可以住进博物馆安心了。

当时他在美国的名声特别大，因为信用好，美国人叫他“诚实俞”(HonestYu)。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成功的生意就得诚实”，他说，“我成功因为我诚实”。

老头子信基督教，流利的英文全是自学成材，学完英文又学日文。

抗日的时候抵制日货，他特别生气，说自己“干什么要学日文！”并且把准备送往日本留学的大儿子转送天津工商学院。二儿子送到了美国留学。我母亲是老四，最小的女儿，叫俞天玫。姥爷说：“你妈出生的时候像太阳出来了，我突然发家了。”他一点儿一点儿积累经验给美国朋友坐庄，收集好东西，但是日子一直不宽裕，而且那个美国人非常精打细算。

他喜欢这个带来了好运势的女儿。

然而我母亲有一种跟我一样的心理，也觉得自己不够美丽。

实际上我母亲是一个蕙心纨质的女人，越老越好看。中国人不觉得好看，外国人觉得好看。“李爽事件”以后，我的家人接触了很多欧洲人，见过她的洋人都说：“你的母亲很有风度。”可能东西方的审美观不同，西方人更器重女子的气质，中国人要求女子顺从。

这对我父亲来说也是新鲜事儿，外国人都说他的妻子美丽。虽然父亲很乐，但还是不甘示弱地说：“你妈当年有几个同学嫁给了中央级的大干部，那才是彩凤随鸦，而我俩是自由恋爱！”

我的小名叫“柿饼子”，后来又从“柿饼子”变成“铁饼子”。

那是一次春节聚会，十好几口子在客厅听《白蛇传》。表兄弟悄悄和我说：“唱得真难听。”

我说："就是，像哭死耗子。"我们溜出去玩"跳房子"，见到姥姥家院子里的大窗台上摆了些柿子。表兄弟拿下一个柿子想看看冻得是否够硬，用脚一踩，糟糕！柿子被踩瘪了。表兄弟吓得哭了起来，我赶紧说："你就说是我踩的！"正好戏唱完了，大人们出来送戏子……好家伙，大人开始七嘴八舌地"逼供"，结果我给表兄弟"死扛"，说："是我踩的！"

"干吗要踩柿子？"

"好玩。"

"还没吃年夜饭你就撑得慌！"

"我没看见。"

"爽子，'好玩'和'没看见'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姥姥赶来说："爽子，抬起脚来……"

结果旁边的表兄弟吓哭了，因为他新鞋上全是黄浆儿，而我的新鞋干干净净。我母亲接岔儿了，"傻丫头！"但从那天起"柿饼子"的外号还是归我了。加上无数调皮捣蛋的典故，我就成了"铁饼子"。

我和爷爷不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再也听不到父亲讲爷爷祖籍的事情了，好像有什么忌讳，只知道祖上有很多姨太太，爷爷是海关总署的税务司。

奶奶叫单桂珍，她的父母都是高丽人，但她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籍，大概因为中国人歧视高丽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可我奶奶太像高丽人了。

爷爷住在天津租界，有十一个孩子，五男六女。第一个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个小官儿，据说只喜欢玩狗、弄枪、

骑马，一九四九年后被关进劳改营……后来病死在里面。大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个平凡又没钱的男人，被爷爷锁起来不许他们恋爱。大女儿在那间屋子里自杀了，死时二十二岁。

爷爷晚年又娶了个姨太太。她在天津一家酒楼做舞女，嫁过来之后，没有生育。除了爷爷，所有的人都和这个女人作对。

但爷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做客和看戏。一大家子人都背后叫她"妖精"，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

记得一次去天津给老爷爷祝寿，我吃惊地见到如此众多的"亲戚"，吃饭需要一个点名册。有个小堂兄悄悄对我说："你还不快上前去叫一声儿'瑶静'奶奶，爷爷听见准会高兴！"我赶快进去大声叫她："'瑶静'奶奶好！"爷爷生气了，纠正我，"头一次见姨奶奶就这么没礼貌！叫姨奶奶！"我发现，在场的人都暗地里偷着乐，上当的沮丧使我面对山珍海味没一点儿胃口。

我父亲李献文行三，自幼聪颖，英俊，喜欢学习，希望到外国去念书。当时我父亲身边很多姑娘追求他，都漂亮能干。当然，这话我是从长辈儿那听来的。

我母亲的二哥与我父亲在天津英属租界的姐姐，我应该叫大二姑的认识了，俩人谈起恋爱来。我母亲去天津找二哥玩儿，认识了我父亲。后来我二舅没有娶我的姑姑，他说，因为见到大二姑和别的男人很亲热地手拉手儿滑冰，而且那男人是袁世凯的孙子。

父亲认识母亲后，开始追求她。

母亲有时候喝几杯啤酒，话就多一点儿，变得更可爱。我记得她有一次说："啊，你父亲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爱你'。"中国男人确实不大会说"我爱你"这句话，我用中文也说不顺溜，用法文就轻松自如，可以一天儿说无数次。我在中国的时候如果

有人对我说“我爱你”，我会觉得肉麻，而且“我爱你”意味着有“越轨”或“犯错误”的嫌疑。

我受母亲家的影响很多，因为他们住在北京。

我父亲当时念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和母亲相爱后，爷爷家觉得不错。但姥爷家不同意，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而且非常看不惯爷爷家娶小老婆。

姥爷家与爷爷家有仇恨，因为我爷爷是天津海关的税务司。姥爷说：“海关的官儿全是贪官。”

姥爷在天津经常有运往美国的货物，如果要保证满箱子明代、清代的瓷器平安无恙，需要给大大小小海关上的官员送礼。文化大革命时我姥爷瘫在床上，我一来就陪他说话，聊起往事，他说：“你要是不送，或送得不够，海关他们给你的古董摔一半儿，你不是叫‘诚实俞’吗？通知你，货已运走啦，其实货物还压在码头上，让你不能按期抵达……‘诚实俞’就诚实不了了吧……这都是你爷爷干的。你母亲当时很坚决，非要和你父亲结婚，我收到洋人的验货电报：‘俞先生：收到明代古董，每箱货里有半箱是残品……’唉！结果我同意了这桩婚事。”姥爷与我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显得很难受。我纳闷姥爷瘫在床上已经很不幸，干吗还去追忆更多的痛苦往事？

姥爷有钱，他给儿子们办结婚喜事都办得很排场。但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结婚，他什么都没有做，连客都没请自己去杭州了……

父亲告诉我：“我和你妈结婚那天，你姥爷没影了，你姥姥说，‘我去王府井买些冰淇淋大家吃吧。’”

听母亲讲，一九四九年姥爷的弟弟来找他，“哥哥我去南洋，你也得走，否则我敢保证你长不了。”

姥爷犹豫了，说：“孩子老婆和家产呢？”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那就试试吧。”姥爷拿了一只箱子……姥姥急了，“你有四个孩子，还有这么多财产。”

姥姥这么一闹，他想：北京朝阳门南小街有近百间房产，在西郊海淀还有别墅……

回头劝弟弟说：“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可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多了？”那是他们兄弟最后一次谈话，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一九五一年，根据中央发布的一系列企业清理条例，没收了姥爷的房地产和古董，生意被封。给了他一个职务——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料室主任。

我小时候经常住在姥爷家。

姥爷爱讲故事，我坐在他膝盖上，觉得他很巨大。他不仅高大，还有很多胸毛儿，我老揪他的胸毛儿，还有很多痦子，红的，棕的。

老头子在孩子心中可爱慈祥，不过在父母、舅舅、姨妈眼中姥爷是个威严的人，聪敏过人说话算话，却也有不少锱铢必较、度量小的故事。奇怪的是，姥爷只冲亲近的人发火儿，而不冲外人和孩子辈儿发火儿。

看来外表坦荡的君子也免不了内心戚戚小人的煎熬。这可能就是人性中真正的瑕疵，与软弱、爱面子一样的。

我的卧室和姥爷的卧室很近。我睡的房间有一面是方格窗户，玻璃上面画着圣经故事，我天天想尽办法不进去睡觉。叫耶稣的人脑袋上有一个圆圈儿，使我联想到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耶稣给麻风病人洗脚，耶稣走在漆黑的海浪上，一个妓女半裸着身子，紧紧地托着耶稣的脚。那些图画给我一种压抑感，感觉活在世上是为了与罪恶搏

斗。所以我睡觉时总是面朝墙，早上起来歪着头出去，不敢看。可能对我来说生活是绚丽的图画，所以我最喜欢《神笔马良》的故事。

第二可怕的是我床头有一幅巨型景泰蓝的画儿，一只金毛儿虎，吼着往山下冲。我老觉得它马上要冲到我的床上来！

有一夜我睡不着觉，就跑去找老头儿，“姥爷我不敢睡觉，听到有老虎叫……可不可以钻你被窝儿？”他掀开被子让我钻进去，把一粒安眠药掰成四瓣儿，给了我一点儿。迷迷糊糊中听见他说：“别害怕，那是一只假老虎，不过这只假老虎可值海了。”第二天晚上，那古董老虎不见了，墙上只留下挂过画儿的痕迹。

姥爷有山东口音，“关灯”叫“嘎灯”，或者是他故意开玩笑。他床头上有一盏精美的绿色景泰蓝小灯儿。六十多岁时，他忽然心血来潮要学德文，晚上背德文单词儿，一只手半握拳，另一只手的指头在被子上写单词儿，眉毛很长很重，大大的鼻子，大约要聚精会神地学一个小时。他想睡觉了，就大喊一声“嘎灯”，所有的人睡着睡不着的都得睡。

他不跟姥姥睡。姥姥和姥爷是从小儿订的亲，曾祖家要求媳妇有文化，就送她上教会学校。姥姥以后又自学英文，差不多学到小学水平。我的姥姥为人公正又坚强。

姥姥也很喜欢我，为什么我并不知道。

姥爷信仰基督教，出于文化道德价值的束缚，表面上他痛斥爷爷娶小老婆的封建习俗，但他却暗养情人。我母亲说他的情人是个蒙古公主，姥爷很爱她，但始终没能离弃原配，公主很快就离开了他，使他一生痛苦，说自己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尝过爱情滋味。

道德观把偷偷瞥了情感一眼却道貌岸然的男人钉死在“形像”的图画上，然而没有一个有爱的女人喜欢偷偷摸摸活在图画的影子后面。

姥爷睡的卧室是最小的一间，没有窗户，屋子里有一个厚厚的天鹅绒帘子，颜色紫红，绒帘子遮盖了一面墙，对我来说那儿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是禁区。一次我跟着姥姥溜进去，里面满满当当的古董架子……一股股臭香臭香的旧东西味儿。那是一个巨大的库房，每一件古董都很珍贵。姥爷有时候在里面待很长时间，厨子招呼“吃饭喽！”他都不出来。

母亲说库房里面还有一个库房，她年轻时也对这个库房很好奇，结婚以后才进去过几次，为了看看古代的春宫画儿。

姥爷如何收购古董呢？

原来家里的院子挺大，现在这院子里已住进少说四十来户人家，连搭带盖的已无法辨认出原来的结构。每到星期六，农民和城里的古董小商贩用驴拉着货，等在胡同口，到时间，进院子里坐一圈儿，摆摊儿，姥爷从楼上下来选购。

后来我问过姥爷：“有假货吗？”他说：“太有了！假货一般骗不了我，原因是我上了无数次当，才被训练成专家，呵呵！”他谈论古董时的笑声总是很开心。

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

生我时，住在天津的爷爷奶奶来北京，下火车后从车站打了个电话问生了吗？是男孩女孩？听说是女孩，马上买了回天津的票。

小时候儿，我特别喜欢姥爷的书房。姥爷每天早起要“站桩”，往那儿一站，张着嘴，半天不动！这时孩子们一点声儿不许出。十一点半以后可以进他的书房看书，有中国的外国的，小孩儿的大人的书。他有几位美国的好朋友，常送他东西，也送他外国儿童图书，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书，急着翻页，免不了撕书，听到撕书的声音，他坐的皮转椅“嗖”地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我就得过去自己说打几下儿。我小时候儿特笨，别人使眼色也没有用。我姐姐撕了书，总是说：“打两下儿吧！保证没有下次！”我总是说十下儿。我母亲说：“你下次别说十下儿就说三下儿。”可我还是老说十下儿，不知是吓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我受惩罚还因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饭说话，吃饭吧唧嘴。小孩儿有小圆饭桌，年纪小的先动筷子要受惩罚，饭再好吃，一边儿罚站吧。吃完饭扫地，好多个孙子孙女儿，轮流扫地，扫不干净要受罚。

从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了一点点他们的青年时代——母亲怀我的时候，仅二十几岁，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父亲在清华时，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教书。划成右派后，因为他很能干，就以“劳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实际上他是设计师，因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劳工待遇。母亲便作为父亲的替罪羊，被下放到东北长春吉林画报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国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大家一再嘱咐你爸‘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也不要发表意见！你爸守口如瓶，最风火的时期躲过了，没被划成右派。运动结束时、上级嫌清华大学右派名额不够指标。瞧！就发了一次言也给打成‘后补右派’了，

害得你妈被下放东北，北京正在大兴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发挥才能。”

母亲说：“可你爸还真心为了祖国更好。”

母亲被下放、我三岁，去东北还太小，母亲就带上了五岁的姐姐。母亲本想把我托付给姥姥，但姥姥家已经有一个孙子，一家之主是姥爷，收养孙子比收养外孙女顺理成章，在姥爷眼里，小女儿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亲。父母就把我送进离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一家四口从此拆到东西南北。

那几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不大愿意说，“别老问我这些越说越难受的事儿，好不好！”

她谈过一点点饥荒的事儿：“没有东西吃，大家都浮肿，全装病去医务室拿大药丸子充饥。那还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孙老庄时……山坡上的树皮被吃光，冬天，因为所有的树都扒光了，树冻死了，来年连吃树叶的可能都没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画报社幼儿园。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着睡衣、沿着铁路走，冻得不成人样儿被大兵拾回来。她说梦见姥姥，想回姥姥家。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出了另一件事儿，一位阿姨惩罚一个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儿，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后来给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来接，她才想起来，到幼儿园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儿浑身是血，头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亲吓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特别不好。那年我三岁半，还不太会料理自己。冬天阿姨惩罚我站在外面，“什么时候你学会自己穿鞋，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进来！资产阶级也要自力更生，懂吗？”我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我两只脚冻得肿大，穿不进棉鞋，

手也红肿得像五根胡萝卜，烂了。

星期六没有晚饭，孩子们在走廊里，面对面坐在矮长凳儿上，等着家长来接。我眼巴巴地盼呀，盼着父亲早点来接我。父亲每天在工地劳动以后，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上晚自习，所以他星期六来接我常常迟到。一般五六点钟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了。有一次都晚上十点了，我还坐在长凳儿上等他，我想去厕所。刚进厕所，就听到阿姨大喊："李爽，你爸来了！"平时我很恨这个阿姨，她常常罚我的站，我只记得她姓雷。我连屁股也没擦，俩手提着裤子冲出厕所，走廊显得如此漫长，我拼命地跑跑跑……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使劲儿抱着父亲脖子不放，听着雷阿姨像往常一样数落爸爸来晚了。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勇敢些，大骂她！可父亲从不回嘴，还笑着赔礼道歉。

我依然记得雷阿姨的样儿：中等个儿，不胖，短头发很黑很齐，大眼睛，面唇边一颗带毛的痣。她把我推到墙根儿，弯下腰脸离我很近，用指头一下又一下戳我的额头，说我，我学会了"听不见"，居然可以数出她的黑痣上有四根毛，一根长三根短。以后在街上甚至在生活中，遇到长得像雷阿姨的女人我都反感。

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会不自觉地加倍宠爱我的孩子，仿佛把他们当作某种替身，看见他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我会想："如果我当年能有这些爱该多好呀。"真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童年时代受到任何心理上的伤虐。那种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幼年的心理阴影是拖累，使人混淆在心理时光中不能自信，童年的负面记忆是很难疗愈的，甚至可以污染所有未来的美好时光。

只要有时间父亲都会给我讲故事，听《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伤心地为小女孩儿哭，听《皇帝的新衣》我笑破肚子，听《拇指姑娘》我浮想联翩，听《西游记》我到处练翻跟头，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吓得我往被垛子里钻，做了一夜噩梦。

星期天父亲会偶尔带我到外面吃饭，这是幸福的时刻。

有一次我们俩吃完晚饭，顺着街往家走。父亲忽然说："哎呀！我把书包忘餐厅了，你在这儿别动！等着，我跑回去拿。你和我一起跑太慢，书包会丢了。"他迈开大步往回跑。等他的时候我扬头看天，几个星星串在一起很像一把大勺子。父亲拿了书包回来，我问他，他就给我讲那是北斗七星，最亮的那颗是北极星。

我至今常常在夏夜看这个星座，每回都好像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带我出去玩儿，晚上回来，正赶上姥爷姥姥要去看《白蛇传》。我父亲说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就让他进了院儿，之后就走了，可实际上院儿里的门都锁着，进不了屋。当时已深秋，父亲说他等到很晚了，第二天还得去工地，孩子总冻着也不行，就从厨房往客厅送饭的窗口爬了进去。把我放在小床上，又钻出来在外面坐着等。

老头儿回来大怒，"我们是什么人家！还有会钻窗户的！"

我父亲虽然骨子里非常中国，却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听唱片，老外的唱片他都有，还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我们最大的享受是听他拉《蓝色多瑙河》。到现在每次我走过巴黎街头，一听到卖艺人拉手风琴，就想起父亲，心也马上既收又放，荡漾着无名的甜，但是那个甜中也有许多酸涩。

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带着右派的帽子调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母亲一九六一年从东北调回，也进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英文。一家人团聚了。

我母亲年轻时喜欢打扮，这时又从箱子里翻出来几件好衣服穿上。这是一段难忘的幸福日子——我们姐儿俩，快乐地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父亲，在颐和园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怎么起来的，我始终没弄清楚。

学院完全变了样子，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漫天的传单。

我与同院儿的一个小男孩儿亚明很要好，平时我们在一起玩儿。

红卫兵在主楼散传单、唱歌儿，打人，人山人海地，看大戏似的。学校以前挺漂亮的，现在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花花绿绿。这天，亚明跟我说："贴了好多你爸的大字报，说你爸是右派是国民党特务。"我反问他："你爸呢？"

"我爸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用骄傲的眼神瞥了我一眼，透出为我担心的神情。我马上跑回去问父亲，他表面显得很平静，说："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在台湾上过七个月中学，我怎么够当特务的资格呢？我已经申报过。放心！"

当时我特别担心出身问题，知道工人、农民、解放军家庭是好出身，我们家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解放军，就问母亲"有没有一种别的出身呢？"母亲说"职员"，我觉得踏实了点儿，有救儿。因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一点不想交换出身，我常见到邻居中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家，不分街头巷尾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孩子，还

抽大嘴巴。

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每一天，学院里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在外国留洋的学术权威、校长、出身不好的，都要写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己的履历"交代书"，并且号召大家放下人情互相揭发。

批斗会一天一场，我挤在人群中看，发现开始还有对人性最起码的尊重。后来，大学校园里来了许多外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势态突变。他们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学院的路上游行，连续唱着一首歌："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批斗会上，外地的红卫兵叫着："北京的大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太温良恭俭让了！……对于阶级敌人就是要打，打——打呀！"他们脸上放出要杀人的凶光，是活人都能觉出来的。一个很美丽的苗条少女，穿着一身绿军装，刘海整齐而漆黑，她大概是文工团的吧。她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用有铁头儿的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可以听出他作为男人和以往有权威的人的抑制。我闭上眼，这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暴力。我从人堆里玩命挤出去，往回跑。我看见，张张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人们把自己的弱小汇总成集体的亢奋。"那打人一定有'道理'了。牛鬼蛇神这些'坏人'的惨叫已不是人声儿，与理直气壮'好人'的叫好声儿上下辉映。"我的恐惧远远比不上听到惨叫声而悲哀的感受来得强烈。我不懂为什么别人挨打我会"疼"得逃跑，惨叫声追着我的耳朵，我跑回家，把着阳台栏杆远远地望去，心中惊悸而且彻底糊涂了。

红卫兵把这些人打得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让他们头顶着别

人的屁股在校园里排队爬行。学校很大，他们爬遍大路小道。红卫兵强迫他们唱歌儿：“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最后“我该死”的高音提不上去，铁头儿皮带便雨点般落下。

突然，从阳台栏杆儿缝里，我看见一个秃头，那是我同班好朋友亚明的父亲，难道出身好的共产党员也是“牛鬼蛇神”吗？世界已经神经错乱。

第二天我又去了，伤心地关注着好友亚明的命运，我蹲在一棵树下，他和姐姐蜷曲着身体紧紧挨在一起，把头夹在腿中间儿，他们仿佛小罪人。他姐姐的辫子蓬乱，两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面对毫无同情心的空气，等着被批斗的父母。树梢上挂着条条横幅——“遣返地富反坏郭××”……批斗会在一片口号中结束。一辆卡车来了，他的父母被乱七八糟的手胡乱揪着扔上卡车，亚明的母亲大声喊叫：“我从新加坡回来是为了找毛主席找共产党闹革命的！我无罪！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无罪！我的孩子是无辜的……”话没喊完，“哔啪”打人的声音山响！她的党员丈夫没有护着妻子，恐惧地躲藏在车的角落里，亚明和姐姐是自己爬上卡车的。车“轰轰”启动，亚明一家被遣送原籍，合肥的什么村，让农民监督改造去了。

亚明的母亲是几天来我见到的第一个敢反抗的人，是女人。

我惊恐伤心，我喜欢亚明，如果在卡车上他肯看我一眼，说一句“跟我来”，我真的会爬上车去。

全家人话越来越少——父亲担心，要求我们也紧跟革命形势。全家破四旧，连夜做了一次大清理，线装书、英文小说、好看的玻璃器皿、水晶艺术品、古董都翻出来，堆在地上准备砸碎后扔掉。母亲把自己以前最喜欢的衣服、首饰翻出来。高跟鞋的后跟儿，连

锤子带锯子地往下薅。我偷偷在五颜六色的“四旧”堆儿里拿起一块心形海蓝宝石，握在手心里，真好看呀！我又拿了一颗象牙的内绘珠，拇指大的珠子上有一片小小的放大镜，里面绘有精美的观音像。虐待它们真是太可惜了，我把它们藏在枕头套里。

我九岁了，又一个俗话秋老虎的季节来了。一天，我和姐姐准备去玉渊潭游泳，本来父亲说他也准备去游泳，姐姐十二岁了，跟父亲玩儿已经没意思，就没有等他，我们自己玩去了。母亲给我们每个人两毛钱，正好够来回的车票，加一根冰棍儿和一包米花儿的钱。

还没游泳，我就已经忍不住把两根冰棍儿买了，吃完，馋虫被勾出肚子，下水之前，坐在岸边儿稀里哗啦吃光了米花儿。那时一包米花儿三分钱，糖米花儿四分。姐姐问：“你还馋吗？”我使劲儿点点头。“哎，待会儿咱们混车，不买票，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包糖米花吃，你个子小，用不着买票，长得也不起眼儿，人家不会注意你。”我不够漂亮又被姐姐拐着弯儿地强调出来，可糖米花太诱人了，我答应了一声：“行”！站起来冲进水里，游呀游，水太神奇了，水可以洗掉我“不漂亮”的自卑感。我蛙泳时望着远处的绿树，狗刨时感受着深水浅水凉热翻滚交替在肢体上的刺激，仰泳时，我望着北京的蓝天白云，幻想在现实之外有一个人爱人的世界。

游完泳在公共汽车这段路上，我紧张得不行，甜米花儿也突然不甜了，人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吸引到什么，下车就被抓住了。我永远记得这种由道德而来的耻辱感，我脸红红的，不敢抬头，到售票站。几个售票员七嘴八舌把我们狠狠说了一大顿，过后也就把我们放了。有时你不得不迷信，好像冥冥中真有一种祸不单行的运势。

天都塌到自己身上了，更可怕的还在后边儿。

抄　家

父亲骑的车是辆破车，最好的那辆，也不过是辆骑了快十年的德国生产的老名牌车，留给母亲骑。父亲车上有一个人造革黑包。我们姐仨都特别喜欢父亲的包儿，因为父亲的包里时不时就有点儿好吃的。翻大人的包绝对是犯忌，但我知道他绝对会给，他是个“馋”爸爸但绝不是“独食”爸爸。

那天游泳回来，混车被抓的焦虑紧张还在心头没散，刚进路口就看见我们家楼道的窗口、门口有很多人头晃来晃去，住宅区十几栋楼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看热闹。

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直觉已经感到“我们遭难了”。我俩走过去，孩子们立刻喊道：“狗崽子回来了！狗崽子你们家被抄啦！”抄家的是大学的红卫兵。

孩子的无知往往残忍——我见过自己的儿子捉到一只蚂蚱，专心地把它的腿慢慢揪下来，要看到它微妙的反应，并且把缺腿的蚂蚱放回去，观察它是如何继续爬行的。

我和姐姐互相紧紧地拉着手，试探着前行。孩子们的围攻开始了，声音尖锐：“打倒狗崽子！打倒狗崽子！”这个地区就我们一家挨抄，孩子们肯定是要宰我们啊！

我觉得可怕极了，无依无靠地忍着。从小我就学会了忍，多痛也要忍，仿佛是一种依靠自我内在天性的无形祈祷。

早已打碎了的四楼破窗户上，吊着我家的缎子被面、床单，母亲珍惜的洋布旗袍搭在破窗口上，母亲最后的一次生日礼物——那件艳黄色华丽的布拉吉（连衫裙）和一条粉色长长的纱巾拧成绳

子，被孩子们拉来扯去地拴在树上……自己家的东西太熟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把它们撕成碎布头你也会认出，那是带着记忆和故事的隐私。小孩们把我母亲的高跟鞋踢来踢去，唱片满地，书页如雪片散落。红色雕金花儿的箱子、古董花瓶……曾经美好而被珍惜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人忌讳的粪土，随便被孩子践踏的破玩意儿。生命会不会也是个戏法儿？时而颠三倒四、时而真假难辨。

我们姐儿俩就这么挤在一起往前蹭，心已变成快要被吓死的小兔子，“怦怦！”狂乱地超负荷跳动着，我们只剩下一线希望：回家，赶快回家！但那个叫“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家里站满了红卫兵，个个红袖章，绿帽子，十几个人，有的还拿着棒子。

父亲游泳去了。幸好不在，他要是没去游泳，准给打死。红卫兵中有些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儿的姓常，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个子很矮，也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也是暗中的竞争对头。九十年代，我父亲担任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院长，一九九八年我父亲去世，环科院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八宝山联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整个葬礼都是他忙着组织、筹备，并且亲手布置了灵堂。

父亲曾经聪明过人，在学问上是一流的，却因为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免在研究业务上太精益求精，有些吹毛求疵，招致嫉恨。这十几个人拿着棒子就是冲我父亲来的，母亲在学院里人缘儿很好，这些人下不去手。

大门敞开——只能看见母亲的背影，此刻的我，多么需要扑到母亲怀中，寻求保护啊，却见她几乎站都站不住，马上要晕倒的母

亲脆弱得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害怕她“摔倒”的情绪使我突然强壮起来，是，当心中的恐惧已无处宣泄，在一堵坚硬的墙面前，人或退或进就听天由命吧。

我不懂，父母干了什么，招来众人如此讨伐，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感情上我坚信他们是好人，因为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母亲嗅到了自己的孩子，她转过身，目光多么无助而且内疚。在见到我时，她坚强起来……我想扑到她怀里，想哭，想埋怨，想问为什么！但我都没有做。对命运的一种接受降临了，我意识到只有接受并且扛起它。人总是能继续活下去，人是有弹性的。

母亲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她歪着身体靠在门框上，看着别人随意在自己的家里乱翻，所有的隐私和珍惜，被陌生的人们以最最野蛮的方式玩弄、唾弃、践踏、砸得粉碎。几个学生头目和矮个子教师把我家所有的椅子都占满了，他们抄累了。

过了多久事儿才完，怎么完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走的？一切都掉进了黑暗里。

天快黑了，我知道父亲回来了，因为外面孩子们一片喊声：“打倒大右派，打倒李献文。”

这天我并没有同情父亲，“家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他是右派。”明天、后天、大后天被侮辱的日子怎么过，我的心理世界没有了支撑点，已从里到外塌陷了。可是我坚信父亲不是电影里和教科书里所描写的那种坏蛋。

我问：“咱们家到底是什么出身？以前你们说是职员。”母亲说：“资产阶级。”父亲说：“资产阶级算什么出身啊！”母亲说：“你爸是右派，那时你爸年轻太轻信——”

“信谁？”我问，母亲觉得失口，停住。

“右派是什么？”“有左派就有右派，你爸反正是好人。”被翻烂了的家在骚动的寂静中，像没魂的鬼屋儿。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解释，所有的话都驴唇不对马嘴。

父亲定定神儿坚持说：“你填表不要填右派……”其实他对了，我就永远没有填过“右派”。在这件事上他很坚决，让孩子们精神上有种支持。有的人家是当着孩子们的面抽自己嘴巴，说自己是王八蛋，走资派，要改邪归正。到处传来子女殴打长辈的故事。有人唾弃，有人赞誉，似乎好坏的界线是模糊、可以随意玩捏的橡皮泥。

我们旁边儿的楼门儿，校长的女儿带着全班同学和红卫兵抄自己的家。这个女孩儿是他父亲最不喜欢的一个女儿，不光是因为她眼睛很斜，一只眼睛差不多全是白眼。她是校长前妻的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就像灰姑娘。这个校长很有名，是个大人物。但关上门儿以后的故事谁也猜不着……

我们旁边还有另一户邻居，孩子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出身职员，一时外地的红卫兵抄家上了瘾，见屋门就闯，到他家时，一家人已经熄灯，正赶上他的父母亲在黑处吵架……男人爬起来给红卫兵磕头，说：“红卫兵爷爷，我不就和老婆拌几句嘴怎么惊动了您大人？”红卫兵见弄错门牌号，就说：“没什么，看看你们家有没有四旧。”他老婆当时就跳起来给了他四个大嘴巴，说：“你这个混蛋，红卫兵来家，你肯定有什么罪过！把你的手枪给我拿出来！”他说：“我哪儿来的手枪？”她非说丈夫有把手枪。后来他被隔离审查了很久，也没有逼出什么手枪来。被放出后，老婆已经和另一个解放军小干部在一起了，无家可归的他失踪了。不久八一湖里打捞出来一具尸体，已经快被鱼吃光，只剩下骨头。通过一颗金牙家人说认出来是

他。现实，使许多时代的英雄一夜间变成了狗熊。英雄和狗熊的故事常常被成倍夸张，添枝加叶胡乱传开，总之，人很难活在真实中，往往想从历史中学习或借鉴点什么，却发现历史是早已被加减了的历史。

通过这个同学，我发现自己是幸运的；没有人再理她了，只有我与她同病相怜。她悄悄告诉我："我妈因为看那个八一湖里的死人有金牙才认领。"

"你爸有金牙么？"

"没有。"

抄我家那天早上，我母亲说："别人家都开始挂主席像，咱们家也挂吧。"我就把以前放照片的框子拆了，在动物园商店里选了半天，又要美观还要不贵，我们选了一幅黑白绢织的主席像。我非常仔细，绝对认真地装好毛主席像，可是我把主席像装反了，又急着忙着去游泳，说："晚上回来再换吧。"

回来就晚了。人间有些事情无法合理地找到解释，霉运当头时，刮来的风里都带着倒霉的腥气，倒霉的怪风再把你吹进更加恐惧的危险中。那貌似偶然性的东西，并不偶然。

我们家新添的罪名儿是：倒挂毛主席像，而且是挂在墙壁的正中央，有好儿个证人都看见了。

我喜欢草啊，花啊，可花草已被打上四旧的符号，爱花的人家哭着用开水烫死祖传的古盆景。没得可种，我在阳台上埋了两个土豆儿，捡来几颗被当四旧扔了的"死不了"花梗种在阳台上一个破脸盆儿里，它们疯长起来，土豆秧下面结了好多小土豆儿。这是我的私人花园。

血　亲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姥爷家被抄。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把瑰宝国粹砸得稀巴烂，明式家具、字画儿什么的在院子里烧到清晨，在砸碎了的古董碎渣上殴打姥爷和姥姥，把他们打得半死。我的大舅俞天恩，平时不大说话，蔫吧哧溜的，见谁都点头鞠躬，举止极其礼貌，像个日本人（不知是否与留学日本有关）。在批判会上，他和红卫兵站在一起，昂首挺胸很勇敢的样子，长长的分头耷拉在额头上，显然今天他的头发上没有了昔日亮亮的梳头油。他走过去抽了自己的父亲一记耳光。

从这天起，姥姥就有些精神错乱，清醒时默默不语，糊涂时在街上到处找自己的孙子、孙女，见小孩就问："你是爽子吗？"

姥爷、姥姥被赶出家门，南小街八十六号青灰色的围墙上写满标语、口号。

家门是两扇漆成黑色、包了铁皮、厚实又气派的大门，上面用钉子整齐地镶嵌着精制而吉祥的花纹，据说那是姥爷花了不少心思和钱，找在天津租界给德国建使馆的外国工人定做的。这座曾经在我心中象征着"永远安全"的庄严大门右上方，现在挂了一个醒目的牌子——"南小街街道革命委员会"。

姥爷带着姥姥投奔到旁边内务部街大儿子的家，大儿子带着全家人堵住大门，不许进。两个老人去海淀魏公村，想在外语学院教书的二儿子俞天民家，二儿子婉言推出父母。二儿子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外语学院留洋的人太多，他也不是右派。

姥爷拉着精神错乱的姥姥，来到住在海淀区的三姨姥姥（姥姥

的妹妹）家。三姨姥姥不肯收留他们，拿起他们的包抛得老远，跺着脚喊道："我没有你这个臭资本家的姐姐！我家老头是贫苦人家出身，我早就和你们划清界限了……滚！"三姨姥姥自一九三九年从乡下投奔北京的姐姐，一直负责给我姥爷看管海淀的别墅，他丈夫管理花园和菜地。

父亲常常提起岳父对他的不是，但是今天姥姥、姥爷就站在门口……我插在大人之间扑上去，死死揪着姥姥肮脏的袖筒，"进——来，爸，妈，让我姥姥进来，进——来！"我的父母让出了大门口，收留了他们。我充满感激抬头仰望父母，一股钦佩，我像看神一般看着父母，仿佛在他们犹豫是否准许两个老人入室的瞬间——世界在我心中眩晕了一下，当姥爷、姥姥迈进我家门的一刻——世界没有崩溃，保存了一份大美。

姥姥、姥爷在我们家住下。姥爷当时还行，姥姥神智时清时迷，看不住就往街上跑，见了小孩儿就叫"爽子"。姥爷后来就不行了，一拐一拐的，母亲找附近中药店的一个老中医，老头儿说："给资本家治病我害怕。"母亲求了半天，他同意了，说："毛主席也倡导救死扶伤。"老头儿就偷偷在他自己家给姥爷扎针。

一天，我母亲急急忙忙冲回家，门弄得叮当直响，这很不像我那一向动作轻柔的妈妈，她说："有人打小报告了，刚贴出大字报——大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岳父和丈母娘。"红卫兵后脚跟上来，看了看老人们，到门口命令道："赶快轰走他们！"母亲不情愿，"老人有重病，已经无法对党和国家制造什么危险了。"红卫兵就拿出扩音喇叭在街上喊，要对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的行为，采取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当下父母把姥爷、姥姥送回内务部街二号，哭着求他哥哥收下老爹老娘，日后安全了一定接走……

大舅竟然收下了他们，把老爹老妈安排在小院儿里一间六平方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这座小院子是内务部街二号里面大院看守住的地方。一九五〇年"公私合营"运动时，姥爷被迫交出了近百间房产，政府开恩给姥爷保留了内务部街二号的产权和这个看守的房子。大舅就住在这儿，房依然还属于老两口。

没有多久，姥爷半身不遂了。

原来，他们天天被儿媳妇和三个孙子欺负，嫌姥姥疯，嫌他们吃得太多，往姥姥饭碗里吐吐沫。姥爷理辩着反抗，结果孙子把爷爷奶奶捆起来打，拿菜刀对着他们俩的脖子晃来晃去。姥爷瘫了。姥爷一瘫，姥姥倒奇迹般地突然清醒过来。后来，姥姥在那间小屋儿里自己伺候着姥爷。与对面大舅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如同陌生的路人，只有大舅见了爹妈偷偷点下头。

人真是最怪的物种，相信面相。我姥爷长了一副世上最有福分的面相，却命如纸薄。

后来我常常去看他们，小屋儿里除了两张床，也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姥爷瘫在床上叨叨，天南地北他什么都懂，因为我爱听，他就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给一个小观众，他讲过去的事情，讲老北京的生活，讲天文、历史，绘声绘色，我最爱听他讲什么是真古董，什么是假的。"爽子，玉器要用舌头尝……琥珀要用干净的手掌恭恭敬敬地轻揉，它高兴了会发出暗暗的香味儿。"

"琥珀懂什么？"

"太懂了，它们经历过万万年天地的洗礼呀！"

"它们不会说话，不会反抗。"

"哎呀，爽子，你们这一辈人本来就没吃过没见过的，还赶上个'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字画儿在院儿里烧了好几个小时，火里有

一块好的琥珀……”他的话好像被痰噎住。

“琥珀说话了？”我急问。

“比说话强多了，它发出的香味满院子都能闻到！”姥爷眼睛亮了一下，立刻又黯淡于痛苦的记忆中。

“火里还有什么好东西？”

“嘿！好东西多了去了！”

“值钱吗？”

“海了去了！有郑板桥的、张大千的、吴昌硕的，连康熙、乾隆、慈禧的字画儿，加上唐伯虎，一把火……我想下辈子当穷光蛋吧，没啥惦着的——省心。”闭上眼睛他歇了。一个念头闯来，他已经没劲儿再活了。

不久，姥爷濒死，捯气儿的声音好吓人，脸色灰黄，腿特别瘦，眼珠子黄绿黄绿的快速地翻了几下。两只手显得特别大，胳膊也特别长。姥姥就坐在床头儿，我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姥爷的大女儿是医生，说：“不行了，不行了，爸爸不行了。”屋子太小，站外头的人轮流过去看看他。

姥爷的四个孩子都是按基督教起的名字，大儿子叫天恩，二儿子叫天民，大女儿叫天琛，我母亲叫天玫，所有的孙子辈儿都是按圣经里的名字排队，彼得、大卫、保罗，等等。

大儿子天恩突然进来了，喊：“爸爸，爸爸我对不起你！”我猜姥爷已经听不见什么了。我一直很恨这家人，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大舅叫唤、祈求原谅的那一刻，我原谅了他。那之后我埋怨过自己，“干吗那么没立场！”没办法，人有深处的情感立场，不由自主，比

我摸着老头儿的手，摸的时候特舒服，像小绒布儿，温凉温凉的，看着上面那些老人斑，我一点都不悲伤，一种莫名其妙为他庆幸的感觉，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想——那是庆幸他获得了解脱吧。

当时没有一个儿女哭泣，在院子里呆站着。当医生的大女儿宣布：“爸爸走了。”姥姥把脸捂上了，她在流泪，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坚强的老太太哭泣。那也是我第一次向生命提问——人间有没有几十年的夫妻是为了爱而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俩五十多年的夫妻，早已没有男女的爱情，姥姥年轻时常常挨丈夫打。我想姥姥的泪水里一定还有更多当女人的苦涩。

后来姥姥一直住在这小屋儿里，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人给她做饭，洗衣服，与对门的亲人各过各的。她曾经这样说：“爽子，除了可以独立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美貌而被男人尊重。”

天塌了人还得存活

抄家不管是不是“四旧”，是东西都抄光。抄家以后的冬天我觉得比每年都冷，连天气都与倒霉的人作对，我们没有棉衣。那是我第一次理解——透心儿凉说的是什么。

抄家后，父母没有工资，一个月三十块钱生活费。那是我第一

次理解——馋的力量，小时候在姥姥家吃的奶油西点？现在应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爱跑，爱跳，爱动，我父亲说："你太费鞋，补鞋要花不少钱。"街上补一个洞三角钱，太贵，我父亲就自己学补鞋，弄来一个鞋匠淘汰下来的铁脚儿，晚上大家都睡了以后，他补鞋。我们的布鞋补了又补，若打上油快成皮鞋了，今天穿出来一定很"潮"。裤子的屁股和膝盖上补了又补，裤腿接了又接，并不是满街人都穿补丁衣服，但出身不好的人家多数如此。爱美且细腻的我很害羞，我母亲说："别这么想，不是说要艰苦朴素吗？"

母亲还常叮嘱："爽子，挤牙膏要省，别掉在池子里。"牙膏用完了，父亲用剪子把牙膏皮剪开，用牙刷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母亲准备带着我们姐仨去王府井。好几天之前我就开始盼望，因为母亲告诉我们要给姐仨买布添衣服。幸福的三姐妹，高高兴兴挤上三路公共汽车，一路上欢声笑语，街景儿也格外漂亮。

到王府井刚下车，母亲大喊："抓小偷啊！有人偷了我的钱包！"下车的地方正是长安街和王府井的交叉口，有一个大公厕，女厕右边，男厕左边，如今已变成了麦当劳。母亲从未有过极端的行动，她大喊大叫冲进了厕所，我们羞愧地喊她："妈！妈！那是男厕所！"她不管不顾往男厕所里冲。街上的人开始起哄，母亲脸色苍白地回来了。声音发颤，说："一路上我紧紧用手抓住钱包，生怕丢了。"

孤独只是感觉却令人恐惧

我当时在院子里很活跃，是孩子里的大将，特别能折腾，一大堆怎么玩的好主意。常常我还没吃完饭，楼上楼下的小孩们就来催，"李爽李爽还没吃完啊？快点儿，没你就不好玩了……"可能是属猴的缘故，我玩什么都特灵。

自从我家被抄，朋友像惊弓之鸟一下子都没影儿了，要好的朋友见到我装不认识。对我这个既快乐又大大咧咧，性格很直接的人来说，那份孤单感令我恐惧。

公寓对面首都汽车公司宿舍楼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很让我害怕。我在出门之前，每次都在门缝里侦察一番，看看公寓楼可供玩耍的空场上，是否有一帮孩子，因为一旦我被他们围住，一定会遭到辱骂，还会往我身上扔脏东西。

我班上的一个同学叫刘鹏，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死了，据说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里有地位的军官，一九四九年因为家庭的缘故没有离开大陆，他母亲与我母亲是同事，教德文。刘鹏家因父亲去世，逃过了一场大灾难，没有遭到抄家。

按理说他们应该更有同情心，但是刘鹏折磨我们非常积极，经常用石子打我们。他家和我们家隔着四个楼门，他不辞辛苦，端着自家的垃圾，叫上一帮人把垃圾倒在我家客厅地上。楼里住着一个学院烧锅炉的员工，这天正好赶上他下班儿，碰上乌泱泱一群孩子跟在刘鹏后面往四楼我家跑时，他急了，大骂："我操你大爷！小兔崽子，你们比狗崽子还他妈黑！"

"我们要革狗崽子的命。"

“这叫他妈什么革命啊？他妈的，我们的楼道变成垃圾站不说，还他妈成了少年疯人院了！”他冲上四楼抢过刘鹏手上盛满垃圾的破脸盆，一下子扣在他头上。“赵大爷，我不了！不了……”刘鹏突然怂起来，锈破的盆儿掉下来，赵大爷上前用脚“嘭！嘭！”几下踩瘪了，喝道：“等他妈你妈挨斗那天，看你丫尿裤子的！你丫也是国民党小杂种！别以为我们工人阶级不知道！”赵大爷一挥手冲一帮孩子喊着：“你们丫小崽子都给我滚！”叽哩咕咚，孩子们全跟着刘鹏跑了。

我以前并不知道楼下的大爷姓赵。我心里有一丝喜悦，想：“还是有好人的！”可赵大爷并没有给我好脸色，反而瞪了我一眼，说：“还不快回家打扫房子去。谁家爹妈都不容易。”

从这天起，刘鹏停止往我家倒垃圾，更奇怪的是追随他的小孩儿，也翻脸骂他是国民党的狗崽子了。

我和姐姐都特别脏，头发上长满虱子。听说用醋泡头发可以去虱子，我们就用醋泡，然后拿毛巾把头发包起来，再用洗衣粉洗，折腾得满屋子醋和洗衣粉味儿。虱子没了，头发也变黄了。

父亲、母亲显得招架不住了，铺天盖地的反省、检查、检举、揭发，随后是交代罪行、挨批判，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好像被猎人围剿的活物。然而猎人的目的不是吃肉，而是乐于目睹垂死挣扎的人们是如何放低“人格”的底线。严酷的现实使所有假的都能成真。学校里大小知识分子，都成了寒风里的墙头草，软软地耷拉着脑袋，别管有风没风个个哆哆嗦嗦神经过敏。

找不到任何人家肯看管我三岁的小妹妹。好不容易有个同类，一个也在挨斗的教师，他的老娘收了我妹妹。父亲送完妹妹回来，抱怨道：“别人家看孩子通常收六块，她可要了十块一个月的伙食钱。”

“献文，有人收，已经是万幸啦。”母亲回答。

“一个三岁小孩能吃多少！”

“献文，你别再给自己增加不痛快了。”母亲坚定的声音传来，“这不是非常时期嘛！整人的人也有被整的时候。世上没见过看不完的戏。可现在不要面子的人满地爬！但是我们有孩子，不能把命折进去……不就几块钱么！今儿有人收了小东，这是咱们的福气。”父亲因为过去大家族的封建，是个有些迷信的人，妻子一番话安慰了他。

现在想想，我的母亲太有力量了，那是难得的悟性。她完全可以借势埋怨丈夫，比如“还不都因为你是右派！我们才如何如何……我们为你吃了多少苦……”以此倾诉一个女人跟着男人所吃的苦头儿。母亲这样的心态应该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这个福分。有人即便有了也可能会看不见，后悔时已太晚。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谁都学舌过这句话——但爱不是照猫画虎模仿出来的东西。你有就是你的，你没有，怎么装也装不像，怎么挤也挤不出来，它是人性里边更深的自然。

我要负担家里买菜的工作，那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得走到合作社，那大约短短几百米的路程上，我受尽辱骂，歧视和侮辱压在幼小的心灵上，何止千百吨重。

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我家的境况，谁都可以欺负我。连售货员也一样，我刚付完钱，她假装不留神瓶子翻了，剩半瓶酱油了，还要数落我手笨！我连哭都不敢哭。“怎么就剩一半了呢？”见到这种情况，母亲眼中流露出悲伤。买鸡蛋，一个月全家就一市斤鸡蛋，给我们的全是“搁窝”的。拿破脸盆去买西红柿，在孩子“枪林弹雨”的石子儿围攻下，既要保护西红柿又要拼命逃跑，眼看快到楼门口了，一个大孩子伸脚下个绊儿，我摔倒，孩子们一拥而上把西红柿踩烂，我闻着香甜新鲜的西红柿的味道，想拣回几个，可是，西红

柿像一片血浆摊在尘土里。

嘴馋——过春节每人半斤花生，三两葵花子。坏了的花生都舍不得扔，一口气吃到长口疮。

寻找爱

我听说煤气中毒，会死，决定死一次。我到厨房把蜂窝儿煤炉子压上煤，封得很小，据说这样会有煤气。

我坐在炉子旁边抱头，期待着自己能中煤气。脑子里像看电影一样想象着后果，如此一来母亲会伤心，会来照管我，可能因为我的死而有人哭？我使劲儿呼吸，一直坐到傍晚。

母亲下班回来了，看我坐在炉子边儿，问："爽子，傻了巴叽的坐炉子边儿上干吗？会煤气中毒的。"她推开窗户，叨叨："天呀，看看全是煤气味儿！多危险。"我不说话，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再也不会说话。幻想着母亲会惊呼一声，抱着我亲我，痛哭……幻想着我爱过的所有人和小朋友们都在为我痛哭……是的，我需要父亲母亲的亲抚、关怀，我需要亲爱之情！然而事与愿违，我的命如此顽强。我不仅没死成，还挨了母亲一顿说。

我很感谢一个真正土八路出身的家庭，那家人住在二楼。这个男人有五个女儿，总觉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只有闺女没有儿子，我听过他笑着对别人谈到他老婆"没本事，净生点子闺女"。他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出身，共产党员，从小儿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立

过战功，因为没文化，所以当不了什么太大的官儿。在离这儿不远的瓷器厂当党支部书记，工厂给他优越的待遇，即分配到这儿来住，这栋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比较宽大。学校的人背后叫他"土八路"。

有天，一些孩子又围着我们喊叫，吐唾沫。终于有一块砖头打在我头上，当时我没感到疼痛，只觉得眼前的世界轻晃了一下儿，头后热乎乎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父母不在家。我躺在地上，一头血，隐隐听见二楼那家女孩子的喊声飘近："杀人啦！妈——四楼右派家的女孩儿流血了……"有个人坐在地上抱着我的头，拿草纸，擦我头上的血，那人是土八路的老婆秦伯母，她大骂开来："怂B丫挺的，你们整天游手好闲，就会鼓捣点儿嘎七码八的事儿出来！你们他妈有本事整治真正的阶级敌人去，跟他妈人家女孩子家过不去！哪天奶奶的，你们遇上个浑不吝的，给你丫一板儿砖，你他妈就尝着什么叫肝儿颤了！告儿你，谁家老爷子都怪不容易的，这儿要死了人，可让你们家老爷子吃瓜落儿，你丫这辈子全吃不了兜着走！"

我从小不会骂人，说话不许带脏字儿，秦伯母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有死之可能的那一刻，我渴望生还。因为土八路家的秦伯母在关键时刻给我的帮助，使我恢复了对"爱"的信任。

从此我跟二楼的姐妹们成了朋友，但跟她们在一起玩儿时我谨小慎微，带着一种感激，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秦伯母有时来我家帮我们做饭，我也去她家做些洗碗刷锅的活儿。她家的饭好吃极了，猫耳朵、片儿汤、棒渣儿粥、大菜团子、酸菜炖宽粉条子……嗯，香死了！为了和她们更近，我说话时，刻意加点儿脏字儿，但是却被父母坚决禁止。

改名儿

二楼姐妹说，“你们这么倒霉，有什么办法改变吗？”其中一个女孩儿叫玉萍，说：“咦，这么着吧，你们出身不好改不了，把名字改了吧，改革命一点儿。”大家兴奋起来，翻出纸笔。姐姐表示每回上课一点名报到就有同学起哄叫她“赫秃子”（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贬称），还说因为父亲修正主义才起名时用赫鲁晓夫的赫。

我们七嘴八舌达成协议——就叫‘反苏’吧！李反苏——我们试着叫了半天，还是绕舌头变调儿，一时蹦出了许多革命的名字：向东、卫民、永红、爱党，叽叽喳喳，最后，决定了！我姐姐叫李反苏，我叫李志红。玉平叫跃进，燕平叫建军。我说：“咱们的名字太男性化了吧？”姐儿俩笑了，说：“我爹正愁没男孩呢！”

“真的！我爸也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回到家，我和姐姐把本子、书、书包，所有的私人用品，都用圆珠笔写上新的革命的名字。到处是李反苏、李志红。

晚上母亲回来，我们特别高兴地向母亲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母亲当时差点哽咽，愣了，转身忍住。父亲说：“改名字不是这么改法的，要去派出所管户口的地方，有好多手续呐。中央领导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首长，也有封建时代的名字，名字不会改变未来。”

结果，取新名字只是一次儿童的游戏罢了。但在玩改名的游戏中，我似乎有种模糊的察觉：改变表面的标记，可能对暗示“安全”是有帮助的。

提起名字，我从小就不喜欢李爽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名字不好，是因为不喜欢自己。孩子不懂政治，别人对孩子的态度使孩子误认

为自己不完美。不喜欢自己存在的阴影跟了我很多很多年。比如报到，报名，我差不多每次都像嘴里含着热茄子，希望吞掉自己的名字。有老朋友到画廊看到我早期的作品，偶然说了一句：“你以前的画儿怎么没有签名”。

从少女蜕变成女人，那是一个从失去自己再做回自己的旅行，那是一个为了向外界证实自己的价值走上拼搏之路的女孩，在路上她挖掘到了一个深邃的内在自我，而成熟为美丽女人的旅行。

偷着闲情逸致

我有一个自己的游戏，取名“埋宝贝”。我在学校的花园中拾些碎玻璃、彩色纸片儿、带均匀纹路的石子、花儿、叶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上的秘密地方，刨坑，把捡来的东西组成美丽的图案，盖上一块玻璃，埋好，标上记号。只要我可以从家里逃出，不被别的孩子捉住追打，就在花园里玩儿“埋宝贝”。通过记号找到以前的“宝贝”后，小心拨开土，满怀尊重和惊喜看它们变成什么样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件新艺术品一样幸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或看着那些枯萎了的花瓣儿，浮想联翩。

冬天的早晨，我一个人溜出去捡树枝，为生炉子备些柴。

天是白色的，有时也会抹上淡黄，太阳升起后天空微微发出淡淡的蓝色。我知道别人开始起床走动了，赶紧慌慌张张跑回家。那时一看见人心里就紧张，就像一只见人就逃的松鼠。

幸福忧伤都应该是人内心的一种特权。生活在自己饱满的幸福和忧伤里，最终你会把握它们而成为主人。

我还练翻跟头，倒立，劈叉，弯腰，越练越棒。年纪小，身体也软，两只手向前一按，把腰折过去，两脚着地。来回翻，空翻，翻到嗓子眼儿都有血腥味儿了，才停下来。我把这种游戏变成一种自我磨炼，观察自己能坚持的极限。

我有时候从四楼往下看，所有女孩子都练这些。我翻起来是水滴状的，脚可以碰到手，我看她们像硬竹板儿，一头儿戳在地上，另一头儿弯过来也戳在地上，像座桥。我觉得她们没有我棒，偷看别人发现自己并不笨，开始自信了一些。

那虽然是个压制艺术的时代，我们照样用力所能及的独特方式享受艺术。父亲说要跟上形势，不能再给自家找麻烦，全家人一起用红纸剪了一个半圆的太阳贴在西面儿的墙上。小妹妹叫起来："爸，我的名字是东呀，太阳得从东边儿升起对吗？"

"哎哟！我们差点又犯错误了！"父亲玩笑着说，大家都笑了。一家人七手八脚你呼我惊，好不容易把红太阳移到东墙。"哎呀！不行，还有一扇门儿当着。"需要把太阳的尺寸缩小。太阳被剪小了一圈儿，我把黄色的皱纹纸拧起来，订在太阳四周做光芒，下面用蓝色儿的皱纹纸拧起来做大海，再用红纸剪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字儿，弧形粘在太阳的光芒上方。西面儿的墙上放了一个用红纸剪的巨型"忠"字。全家人折腾到大半夜——熬红了眼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艺术指挥官我爸，他问大家："感觉如何？"

"好、好极了！"我很高兴，所有与艺术沾边儿的事都能引起我的兴致。

父亲认真地说："校领导要求各家各户儿每天早上要一齐起床，

手捧红宝书，向伟大领袖做早请示的仪式。"第二天一大早儿我被推醒，不刷牙，不洗脸，全家对着红太阳站成一排，父亲走过去把大门敞开，回来，轻声告诉我们说："邻居也开门儿了。"

父亲尽量控制，用一种不高不低的声音开头儿："祝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一齐举起右手挥着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全家人又举起右手挥着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声音在四壁间回荡！我觉得太好笑了，扑哧一下笑出声儿来，说："傻不傻呀？""呵呵！"妹妹捂着嘴在笑，接下来母亲没忍住也笑了，父亲赶紧跑去关好门儿。回来大眼儿瞪小眼儿，一家子笑成一团。第三天自然停止了早请示。

我问二楼的姑娘们："你爸妈都是党员，你们家是不是每天都做请示的仪式？"她说："不，在单位和学校里已经没完没了的祝福，干吗回家还要祝福。毛主席不是也得睡觉吗？"她略带警觉地调皮一笑，"你可别告我说反动话啊。"我梗着脖子使劲儿点头，庄严发誓："我向毛主席保证！"之后我眼圈红了，她搂了我一下，"又怎么了？"她问。"没事儿！"我声音都变了。是的，一个出身好的"红后代"如何可以理解，她给我信任时，是在给我爱。

眼睛艺术什么都艺术

后来我父亲决定做一件艺术品，在一块六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的泡沫塑料片儿上，创作一幅镶嵌画。母亲从报纸上拓下一个毛主

席头像。父亲设想头像在天空中放光芒，地平线上红太阳升起，下面是大海，大海的波浪上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舵手”。

我怀着百分之百的兴致希望参与，但父亲说：“你还小，别插手。”

“让小孩动动手有好处，玩嘛。”母亲表示。

“做主席像，哪儿是什么好玩的。”父亲说。

“你那不叫玩儿？是什么？外边满街筒子的主席像，买几幅又便宜又省事儿，干吗花钱、费牛劲自己做？还不是好玩呗！”母亲一语双雕，白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哎，爽子、赫子你们来帮帮忙儿好吗？”“来啦！来啦！”我们乐坏了。

我可以插手艺术了，觉得特别有意思，又染，又画，又剪，简直太好玩了。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家人以无限耐心仔细剪下来的，剪下的泡沫塑料片儿被分类、编号，分别泡在不同的染色里——阳光、主席像、海浪、字、绿军帽、红领章、红帽徽、眼睛、主席的脸、光芒……一个巨大的工程。

每天看着这张画逐渐完美起来，直至精品终于完成，放进一个镜框挂在墙上。

孤儿寡母

一天晚饭时，父亲没回来，母亲要求我们等他一会儿。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母亲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父亲失踪了。一

夜、两天、一周过去了，家里出奇地安静，焦虑填满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当那个说出晦气话的人！任何动静都被仔细注意到，也都被幻想成一线希望。放学后，我惦记着快跑回家，幻想着他正坐在桌子旁喝茶呢！

又一个焦虑的晚上，有人敲门了，我们的耳朵全都竖得老高。学校的人来了，母亲让我们回避到厨房里，并且随手把厨房门关好。等呀等……我母亲终于送他们出去，他们在门口的话被我听到：“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孩子们的前途。”

“我已经表过态了，请你们如实向组织汇报吧。”

“你铁心了？”

“是！”砰，大门山响着关上了。听得出双方有争议。

“妈！妈！”我们叫着冲过来，母亲的脸色豁然放光了，几乎叫起来：“你爸还活着！”

“怎么了？怎么了？”

“如果他没活着，为什么他们非要逼我离婚？嘿！”母亲手舞足蹈跟小姑娘似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我心头落地，我的妈呀！整整一个月的恐惧感，全家人天天肝颤！谁都不敢提及“死”字。我问：“爸被关在哪儿？我们能给他带点吃的吗？”

“他们没告诉我你爸被关在哪儿。”

“还是因为右派的事儿关他吗？”

“美其名曰‘隔离再审查审查’。”母亲使劲“嗤！”了一下儿。

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被关在学校后面一座两层的灰楼里，灰楼正好面对我玩“埋宝贝”的大花园。那是学校自制的土监狱。

孤儿寡母，日子还是要过的。

学校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儿，有松树柏树什么的，还有丁

香树、榆叶梅、樱花、月季、芍药。历届建筑园林系学生种的奇花异草被红卫兵当四旧拔了，尤其是从国外来的植物就更惨了。

一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姐姐知道别的孩子都在家躲雨，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了。母亲说：“你们看到蘑菇就捡回来，可以给你们增加些营养。”

这个花园是我的“避风港”，我总是喜欢泡在里面。姐姐在捡蘑菇，我没有雨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面孔上，蹲在矮树丛下呆呆看着一扇钉着木板儿的窗户，久久不愿离去。姐姐大叫：“快来看，巨大的蘑菇！”

“姐，你猜我想什么？”

“什么？快说！”

“爸没准儿关在灰楼里！”

“不可能！讲话要有事实根据，你就爱瞎犯神经。”

我母亲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也从来不解释政治是怎么回事儿，也许她和我一样始终没懂政治的机理。有一天母亲说：“爸爸被准许回家看看。”中国人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儿，但听得出母亲的声调里隐约凄凉。是，她能和同甘共苦的丈夫见上一面了，她作为一个一向被丈夫钟爱的女人，独自负担着三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她知道他俩是无法当着看守人，以及孩子的面儿拥有半寸私密天地的，更别说倾诉他们九个月的别离，各自心灵上的点滴。预期的会面，做妻子的心当然会凉。

“他从哪儿回来？”

“其实他就关在学校的灰楼里。”我的心一动，母亲的话证实了我的预想。

晚上，楼道里传来杂乱的上楼声、三个人押着父亲回来了。其中还有那个姓常的教师，看来，对整李献文这件事，他很上心。父亲穿的那件蓝棉袄已经开花儿了，戴一顶棉帽子，在黄色的灯光下，他的脸浮肿而且灰白，我几乎认不出是父亲。我想扑上去，我的血好像沸腾的开水。我抑制着狂跳的心。他微笑着拍拍我的头，“爽子长高啦！”妹妹尖叫着：“爸—爸—！”扑了上去，他伸出大手抱起小妹妹。亲情是那么庞大，房间是那么窄小，我扭身儿跑到阳台上，忍无可忍地哭了……我尽量缩成一团，渴望从这个世界里消失。待我出来后，他们已经把父亲带走了。跑回阳台在漆黑的夜色中，我望眼欲穿，想找到他的身影，再多看一眼。匆匆见了一面的父亲，又跟西北风儿似的没消息了。我看着他的办公桌，找到一只钢笔，画了我一生中第一幅画，想着他给我们讲过的故事《神笔马良》，幻想着把父亲用画笔画回家来。

第二年夏天，一个中午我放学回家——糟蹋得不成样儿了的大学后门儿那儿，墙塌了，我经常抄近路儿，从破墙穿过。发现有好多大学的“牛鬼蛇神”来修墙！我抬头一看，正好撞到一双熟悉的眼睛，他像个非洲人，戴个破草帽子，破背心儿像几条绳子绑在背后，这个又脏又黑的人就是我父亲！我们父女俩的眼睛碰到了一起。我想撒腿就跑。这时放学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喧闹着过来，一见“劳改队”就起哄：“打倒牛鬼蛇神！”一路嬉笑着。我佯装没事儿人，强忍着慢慢走过去。

中午，饭桌上，我无法吞咽什么，母亲坐我对面儿，“爽子，吃啊！”我忍着，不吭声。

“爽子又怎么了，谁又欺负你了？”我已经眼泪汪汪，说：“在大操场上看……看见……爸了……”

到我中学毕业，我一直不走这条路。一条普通的路竟然可以把

时间里的痛苦记忆绑在此地，好像万物都有记忆功能，又好像时间是毫无确定性的弹性伸缩物。

冬天来了，父亲解放了。从此以后，父亲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他抽起了烟斗，也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制作小收音机之类的娱乐，却很少提及被监禁的日夜。

好多年以后，我也被关进了监狱。有一次父亲来探监，他小声地说了一个故事：“爽子，一九六九年，记得我被监禁吗？”我点点头。

“那时我常常挨饿，想吃口肉。六九年的年三十，快下午了，还没人给我送饭，我在打扫厕所时见到看守在倒剩菜——半碗红烧肉，虽然只剩下肥的了，我扒拉出来那半碗红烧肉用脏手托着狼吞虎咽，忽然我见桶里有一小块瘦肉，伸手去捡，小肉块掉到垃圾桶的深处，再伸手进去搜索，找到了，放在嘴里嚼得稀烂，那股肉的味道我终生难忘。吃完后我掉下眼泪。饥饿的人，没有尊严。”

“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曾经想到自杀，天天琢磨着怎么个死法。一天，阴雨下个不停，我偶然从封着的窗户板儿缝儿里看了看，一下子死的念头没有了，因为我看见你和赫子正在花园采蘑菇，你死盯着窗户缝儿后面的我。我不敢叫，怕看守听见。我相信是上天安排你们俩到花园里来，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支持了我生的念头。”

父亲的脸上充满感激。我告诉他：“爸，那天我只不过觉得那扇窗户好奇怪，钉得这么严实，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您在！”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感觉上天。”

“您还那么迷信。”我不屑一顾地说。

红小兵

红小兵的袖章是一个红色的菱形塑料片。文化大革命时，郝家湾小学改名为文星街小学。几百个学生都戴着红色菱形塑料片，上下学时，红一片街。寥寥几个没有光荣标志的人中，就有我一个！是的，小小塑料片象征着太多的东西。我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我天生要强如金人缄口，又厌恶舔痔吮痈。人“红小兵”当然没我的份儿。好多出身不好的都用溜须拍马屁的法子挣得了红色菱形塑料片。

为了得到红色菱形塑料片，我非常努力，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三天两头儿放学晚走，擦地，擦桌子，擦玻璃，玻璃破了把剩下的半块玻璃喳子也擦得铮亮。写思想汇报，写申请书。擦桌子一丝不苟，跟练气功似的。我专注地做好事儿上了瘾，几乎忘记干活的目的是当红小兵。老师同学都特吃惊，追问起来我还不敢张扬。回家偷偷告诉母亲，母亲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她批评我：“别那么傻，用不着太认真。不当红小兵也没犯法。请我入党我都不稀罕呢。”平时学习好，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积极的姐姐，早就当上了红卫兵。姐姐在旁边听见了，搭腔儿道：“妈，您那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要离开郝家湾小学的最后一个星期，最后一次开红小兵发奖大会，我灰溜溜地背好书包准备回家，班主任甘老师过来，问我：“李爽你去哪儿？”

“回家。”

“李爽，我知道是你经常留下来为班里打扫卫生，今天的发奖会

你一定得去参加！”

“好吧，既然甘老师您让我去。”班主任发话了，能不去吗？

我去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赢了，倒觉得手脚没地方放。

这次大会特别隆重，不是在学校里开，是在北京展览馆西边儿的天文馆礼堂开的。学生代表一个个儿上台发言，慷慨激昂。最后校党委肖老师上台了，大家哗哗鼓掌如瓢泼大雨，他清清喉咙，“今年的最优秀积极分子奖状，我们决定发给——六年级毕业生三班的李爽同学，并在此宣布批准她光荣地加入到红小兵的队伍中……”

我耳朵里叽叽嘈嘈的响声……就像断了弦儿的破琴……可能吗？“你还找谁？学校里没有第二个叫李爽的，就是你。台上都等着呢！”旁边的同学杵了我一下，我红着脸诚惶诚恐，软着腿，跌跌撞撞脚踩棉花似的往台上走，恨我自己怎么当着这么多人不会走路了。从下面走到舞台上，三拜九叩就差这么一哆嗦了，不知恨这个世界的台阶儿就上台了，咕咚，我摔了。

人是不是真的有命运？荣誉终于出现了，为什么我一点儿也欢乐不起来？台下一片眼珠闪着……我失落地看着它们，掌声哗哗又如瓢泼大雨。我恨还是爱这个世界？也许我恨那个不识时务的自己？人只能站在自己独特经验的角度体会命运的旋转。

回家，我母亲暗压着喜悦问：“怎么样，入红小兵了吗？”

“入了。”

“给我看一看你的红袖章吧。”我扭在那儿谁也不给看。晚饭有白米饭，大家都为我高兴，姐姐也开始用瞧得起我的好声音对我讲话。父亲把我碗里的饭填得很满。可我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寂，仿佛深层的想法跟谁也说不清。

为什么要如此玩命地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为此要受尽了苦

累、侮辱、压抑和紧张。我疲惫得哪里还像一个孩子。难道我们真的要仰赖这红袖标，才可以保障未来被人尊重？才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凭什么要认可别人说好的东西？十万个为什么在十四岁的小脑袋里狂奔。

这天晚上，我在被窝儿里打开手电仔细端详这个红小兵袖章，一个普普通通的红色塑料片儿，端庄的黄色小楷字“红小兵”四周镶着两道细细的金边儿。我摸黑下床找来剪刀，钻回被窝儿，把红色菱形塑料片剪成两半儿，再把中间那条白色新松紧带儿剪断。

记忆很强大，一旦被印在脑海，便撇下时间掌控你，去认同一个过去的自己。我老记得一次与姐姐的对话：“你没有大奔儿头（额头）。”姐姐拿了一条制衣用的软尺，量了量我的头说：“你的脑容量真小，上数学课时你肯定很吃力。”她又眼神疼爱地咂了咂牙花子，伸手要摸我的脸，我闪开。“你没有高鼻梁儿，没有双眼皮儿，皮肤没我白。哎，你就是手还长得挺巧，活儿做得漂亮。来，帮我把袜子缝上。”我被划进不聪明、不美丽的队伍里，还在心理上贴了封条“永世不得翻身”。

的确，我自卑。姐姐既聪明又漂亮，数学老得一百分儿，有太多的暗示在强调我的不足。即便姐姐无恶意的对话，都可能使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我直不起腰。

父亲发现我把红小兵袖章剪了两半儿，非常吃惊地分析了一番，“我敢保证如果世界上有识时务系学校的话，头一天就会把爽子开除。比如做人啦，躲避危险啦，我们苦口婆心，你也耳朵长了茧子，可是自古有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得出父亲很认真，说完长长地叹了口气，眼里盛满了为我担心的悲哀！这只能增加我对亲人的内疚。

纠结的心萌动的身

要上中学了。

我已经对性非常好奇，十四岁依然懵懂。父母对性很封闭，也谈不到性启蒙。我只好天马行空地左思右想小孩是怎么来的。记得小时候在外国儿童图书里见到，新婚后的杰希夫妇手挽着手幸福地面对一片鲜艳的洋白菜，从最肥大的一颗洋白菜里爬出了一个胖胖的肉粉色娃娃，杰希夫妇抱起娃娃，高高兴兴地说："儿子我们回家吧。"这个信息太不具体了！洋白菜怎么能生孩子？一定还有另一些秘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生理发育方面，我在女孩儿里算晚的。父亲母亲从来不谈论性，姐姐后来也时不时鬼鬼祟祟一上厕所便赶紧锁门。在她鬼鬼祟祟的日子里，还和母亲偷着嘀嘀咕咕。看来性一定是丑陋的！

秋天，那天是个礼拜天，我起床从被窝儿里出来，坐在枕头上，枕头上有血。吓了我一大跳，流血应该疼，可没有疼的感觉啊！再动动腿动动腰，哎呀，这流血的地方太邪门儿了？我一下子就把枕头翻过去。第一个念头儿是"坏了，又出什么倒霉事儿了？"血可是不祥之兆。"我不会是生病了吧？应该告诉母亲？不行，死了怎么办？"决定不说，盼着能出现奇迹。"不就是出点儿血？总会停的。"

心里像有猫抓，夹着双腿往厕所跑。忽然我联想到姐姐在鬼鬼祟祟的日子里不也这样儿吗？我不知道怎么能继续瞒过去。看来只有母亲能帮我。

然后母亲才跟我讲月经是怎么回事儿，"每个月都要有，你成年

了，要小心男人！别老那么幼稚了！"我的妈呀，跟男人有什么关系？仿佛男人对女人是一个威胁，男人坏吗？变成女人难道是件坏事儿？母亲话中"不要那么幼稚"是啥意思？我掉在"性"的迷魂阵里越是绞尽脑汁，便越伸手不见五指。

父亲对我的亲热也有明显收敛。过去我骑在他身上打打闹闹，撒娇，这以后，连父亲的肩膀都不敢摸了。

第二天，我很羡慕地看着妹妹从幼儿园回来，黏在父亲的背上。他背着妹妹颠来荡去跑小圈儿，嘴里唱"背背驼驼卖大萝卜"。还一个劲儿地咯吱她，"嘎嘎"笑个没完没了。平时这个节目我和妹妹俩平分秋色。因为我身体每个月要有经血，而失去了与父亲的亲近，我多么不情愿变成女人。

仿佛一只从窝里被轰出去的半成年的狼，我只好开始向窝外的世界张望，但那个世界是不会对我的成年敲锣打鼓欢迎的。未知数——我强烈地希望自己好看，但是那段时期我自认为是一生里最丑的，丑得我躲着镜子走。女人天性如火如荼地衍生，我无法正面拥抱自己含苞欲放的女人之身，因为没有一个健全人格的心理立足点。

相反，我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因为父亲母亲捂得很严实，所有成年的男人女人都捂得很严实。比如，夏天无论多热我父亲从不光膀子，母亲的短袖衬衫里也一定有一件小背心。

这种社会教育方式的潜移默化，让我视身体为羞耻。

没有任何书籍可以学习，学校的卫生课什么都讲，唯独对"性"躲躲闪闪，讲也是拐弯抹角。我从来不好意思开口问，也没有女朋友可以探讨。

猫变成了过街老鼠

姐姐从工作的地方带回来了一个小猫仔儿，我们很爱惜它。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猫爪子抓过的细小伤痕。它叫大咪，我家成了猫收容所。

我喜欢它，喂它，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它。它长成一只巨大的公猫，特别大。开始闹猫，天天“嗷——嗷——”地叫，想交配。我们知道这一带的孩子经常折磨小动物，就千方百计阻止大咪出去。终于有天，趁我们回家开门的机会，大咪跑了。

我像丢了自己儿子似的，到处找它。把它尿盆儿里的沙子，从家门口用勺儿一点儿一点儿撒，撒到一楼，再撒到院子里，再往外撒，希望它能闻到味儿找回家。我每天晚上瞌睡着等到很晚，可是它始终没有回来。

一天，晚饭后，外面喧闹的喊打声又从院子传来，越来越近，进我们楼了。我们猜测又是一帮孩子打活物儿呢，但这次一定与我们有关。这声音越来越近，我从楼梯口往下看，果然一群男孩子正在追打大咪，我感到自己心头鼓胀起可以叫做愤怒也可以叫做勇气的东西，冲回家抓起一根铁通条说：“楼下的孩子打咱们的大咪呢！”不管母亲怎么叫，我铁了心。

我冲下去见大咪血淋淋的已经无路可逃，摇摇欲坠地扒在三楼的纱窗上，七八个男孩子里有个十来岁的大男孩拿着一把刀。我握紧通条，看着拥挤在楼梯下的一帮人，忘记害怕，一股不知道是由心里还是外界来的力量包围着我。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大喝：“住手！你们谁敢再往前挪一寸我就敲折了他的腿！”是父亲洪亮的嗓

音，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居然声吼如狮，他威武地站在我后面，手上握着一根他上大学时用的棒球杆。

我总以为父亲窝囊，今天为了救女儿的猫，他亮出了一腔铁汉的柔情！刚才像个屠宰场的楼道里鸦雀无声，这一家“窝囊兔子”要咬人了，谁也没敢再往前挪半步！我趁机一下子把猫抱起来，猫像人一样全明白了，它瘫软在我的胳膊里，我的手感觉到它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猛跳。

大咪的左腿断了，耳朵被割了一半，尾巴剩下一半儿。母亲拿出宝贵的云南白药和纱布把大咪缠了起来，它像个伤兵在家养伤，一个多月后居然长好了。

我们以为大咪这回该老老实实不出去了吧，结果它又生机勃勃地开始天天“嗷——嗷——”地叫，想交配。稍一疏忽它又抽空儿走了。我担心地问：“大咪又跑了，怎么办？”母亲说：“自然的力量拦是拦不住的。”

我继续丢了魂儿似的惦记着大咪，发现它常常出没在学院附近的施工棚。我每天就往工棚送吃的，送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咪就再也没有踪影儿了，我琢磨着，大咪彻底变成野猫了。

有一天我去车公庄买粮食，半路上看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墙头上扔着一只死猫。心想：又是一只被王八蛋虐待狂杀的不知谁家的猫？那猫一定死了好久，干巴巴的血都变成黑色的了。平时我会恐怖地绕道躲开这种场面，这次不知何故有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我，直觉到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这猫的尸体已被踩扁了，牙齿全翻在外头，一撮我曾经非常欣赏的淡黄色虎纹标记，清晰可见，一阵微风吹过，那撮淡黄色绒毛轻轻动了几下，好像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大咪那断尾巴已被压长。我眼前出现了它为了活下去拼命顽强奔跑的样子！那时的

成年人天天人整人已经成瘾，孩子们耳濡目染，学着整治狗崽子，但猫怎么也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杀一只猫动用牛刀，猫就是有三十条命也无济于事呀！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人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强悍的人要追杀弱小？

我再也没有力气穿过马路去买粮食，站在街上，我希望所有杀死大咪的人都被汽车轧死！我也想死——去遥远的天上抱起大咪，安慰它受了惊吓的小小的心！突然，街上破旧的红色二十六路公共汽车来了，冲着路中央失魂的我玩命地“嘀——嘀嘀——”

回家的路，我好像不是用脚走回去的，趴在床上像死了人一样痛哭。大咪的惨相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姐姐有话了：“不就一只猫吗？姥爷死时你都没这么哭过。”我急了，头一次敢对姐姐凶狠抵抗，还用了脏话：“王八蛋！大……大咪不是猫！”

“呵，真新鲜，大咪不是猫是人吗？你脑子有病。”

我脑子可能就是有病，大咪的确不是猫！大咪是我心中的小英雄。我望着另一个世界在心里默默地怀念它。

2

The second part | 第二部分

中学生

十四岁，该上中学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正在发育的身体，又渴望美丽，就让二楼的姑娘玉平帮自己把满头乌润的长发给剪了。玉平哪里会剪头发，越剪越难看，为了找齐，我们拿着一个小圆镜子举上举下，看也看不全。玉平越来越不自信地问我："短点儿？再短点儿？"短来短去，好家伙，一个奇形怪状的发式出来了，今天这发式可以叫做"潮"或者"酷"，在当年可就是"流氓头"啦。

我看过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觉得舞蹈演员特漂亮，都挺胸抬头，用八字儿脚走来走去。我就学，可又不敢挺胸，怕把乳房显出来，觉得羞耻。就撇着八字儿脚，含着胸。发型太怪，只好刚九月的天气就戴上毛线帽子。

中学第一天，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偷偷地笑，"她是不是秃子呀？"我痛苦之极，怎么办呢？头发短得像个男的，我想漂亮却物极必反，成了个怪人，制造了新闻，本来出身就不好，在那一带就够有名儿的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头发长起来。

母亲的话："你傻了巴叽的，看不见这个世道是不能我行我素的。干什么事之前要和有经验的人商量商量！怎么想一出儿来一出儿的。"

父亲的话："你太感情用事儿了！古时候的诗人都这样，但现在时代不同啦！"

剪头那天晚上在二楼秦伯母家，秦伯母说："爽丫头，你可真行，哪壶不开提哪壶呀？"秦伯母转向女儿："玉平你这丫头也真够德行的，一头黄毛，你看人家这么好的头发吃醋啦，拿人家练手儿来着吧！李爽她们家本来就底儿潮，瞧，给她剪成个秃鸡！明儿怎么上学呀？"一个嘴巴扇了过去，玉平哭了。

人太奇怪，太复杂了，永远在跟自己过不去，总是渴望没有的东西，一个概念就可以把已经拥有了的本然的美丽误认为丑！然而我内心热爱生活，渴望被爱的行动总是不合时宜，在严格的概念世界里，我像一匹野马乱跑，有时又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乱飞。

我不喜欢学校。课文大部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八路军怎么打败蒋介石的故事。"算数"升级为"数学"，数儿越来越多。姐姐的话说对了一半儿，我就是不喜欢数学、物理，不是因为费劲，是因为太不浪漫。对付功课，每十天八天我突击一次，考试保证能得八十分儿，可以得九十或一百都不再争取，只要把握住不下八十分，在父母面前说得过去就行。

看样板戏

小时候我很熟悉北京展览馆，每个月不是跟着姥姥姥爷就是跟

着父母去“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当苏联芭蕾舞团访华演出时，父亲带着全家每场不落。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胡桃夹子》的主旋律使我终生不忘。

后来因为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北京展览馆剧场一时寂静得如闹鬼的宫殿。

忽然，北京展览馆剧场又热闹起来了，要上演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哪里懂得父母谈论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后……江青又如何如何了，谁谁谁借助样板戏为自己谋得政治利益，工农兵要占领文艺舞台什么什么。政治对我来说就是之乎者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们只要能看大戏就好！

我发誓要看《红色娘子军》，父母就同意了，省出钱来给我们买票。我敢保证父母也非常想看戏，但他们总是先紧着孩子。

中国人民可有戏看啦。买票的队伍排了一公里长，想得周到的人家带来了铺盖卷睡在售票处窗口。

我和姐姐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天早上七点开始卖票，打架的，骂人的，揪加塞儿的，抓小偷儿的，哭的闹的，乱成一团。排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个军人，他主动组织起来几个人，维护我们这一段儿队伍的秩序，但还是把他早上才赶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偷偷塞到我们前面。难怪大家抱怨怎么队越排越长呀。没有看不完的戏，可有买不着的票。紧张惊险了两天，我和姐姐买到了最后几张票，怀里揣着，别提有多高兴了。姐儿俩看着渐渐散去、一脸失望的人群，伸手捏捏怀里揣着的票，仿佛在确认票的真实。

舞台、灯光、大幕使我入迷，可老觉得不够完美，缺少味道。是缺少爱情？看《沙家浜》，希望阿庆嫂最后可以和郭连长相爱。看《智取威虎山》我等待杨子荣和小白鸽发生些暧昧，看到最后不了了之！《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参加了解放军，换上灰蓝色的紧身短裤和洪常青在舞台上叉着腿旋转、大跳。剧终时什么爱情故事都没发生。《红灯记》里李铁梅成了老姑娘，没人配得上，总不能配给鸠山吧？只有芭蕾舞《白毛女》结尾皆大欢喜，一团红日从布景上缓缓升起，大合唱激动人心：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喜儿垫着脚尖儿高抬着大腿，一脑袋白白的长毛儿，在人造风下飘呀飘，跟着大春哥朝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走了。

回来没完没了地聊，恨不得替人家改剧本。姐姐批评我：“太小资情调了，你这话，也就是跟我说，要是让班干部听见准给你打小报告去。”

我希望了解男女之间的秘密，如同对阳光雨露的渴望。希望从样板戏的渠道得到爱情方面的启蒙，结果样板戏里的人全不食人间烟火。

赶时髦

我不愿意上学，时不时逃学，和插队、军垦回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瞎跑。就在我家以西，甘家口、三里河一带。

一九六八年血统论横扫大街小巷，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各个翘着屁股车座升得老高，哗哗一大片闪过街头威武地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有典型的标志：一身国防绿，戴军帽，穿双边黑灯芯绒“懒汉鞋”，戴红袖章。这是全套行头，如果有

人戴一顶将校呢的军帽，哇，就大出风头了，说明他一定有后盾。

还不到一年的工夫，许多高干子弟的父母就受冲击了。权势如万花筒，人可以一夜之间从圣贤变成贱货！老百姓跟看走马灯似的，连前戏还来不及弄明白呢，已是时过境迁。喜欢紧跟形势的人则赶紧手忙脚乱地观望，站错了阶级立场麻烦。而我盲人瞎马的早晕了，干脆不睁眼。后来一些自然形成的青年帮派，按地区、管片儿自然而然物以类聚。即便老子被丢盔卸甲拉下了马，那些曾经是共产党大干部的孩子们，还是会受到尊重。同时散落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像我这种臭老九、右派、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孩子。我们也革了“知识”的命，不好好上学在街上瞎逛。

我开始认识百万庄一带的“玩儿闹”，那时男女界限划得清楚极了，女的和男的站在街上说话已经标志着“你是流氓”。

生活空间因评判而显得狭隘，阻碍了当时年轻人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我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及爱，东边找不到，西边儿找，然而，男女之间却布满了地雷。

我父亲喜欢体育运动，五几年的时候曾经得过全国速滑冠军，他还有一双进口的瑞典冰鞋，我还很小他就带我们去什刹海滑冰场教我滑冰。我从无数个“大马趴、仰巴磕、大屁墩儿”和“老头钻被窝儿”里练了出来。

北京什刹海滑冰场重新开放。那几乎是北京仅有的冬季娱乐场所，人多的日子，白花花的冰面上根本滑不开，黑压压的人，仿佛没头的苍蝇你撞我我撞你。男女界限在这儿很难划清，所以也成了北京形形色色大小“玩儿闹”的社交大本营，一个很时髦的地方。

成帮结伙的国防绿色里若有人戴顶将校呢帽子，那趾高气扬的表情跟今天的明星一样。几乎每场都有打架斗殴事件，多是为了抢

别人的帽子。

我喜欢滑冰时的感觉，跑道上迎着刺骨的风，如果下小雪，冰渣凉凉地打在脸上，我感觉美滋滋的，有股炫耀的热情。

我滑得不错，但没钱买冰鞋，只好借我父亲的鞋。父亲的鞋大，我就在鞋前头塞满棉花，鞋大，我脚腕子都磨破了还坚持去。

晚上我跟父母磨破嘴皮子，请求滑冰。出家门，门口有大堆的白菜，白菜上盖着棉套，为了臭美，我把棉裤脱了藏在白菜里。

藏棉裤的事儿我只对姥姥说过，她说：“女孩子家可别耍单儿。将来作下病根儿。”

“姥姥您可不知道，我觉得人的精神力量特大，能把冷吓回去！”

姥姥笑了：“嗨，瞧你还成老天爷了，怎么个吓法儿？”

“只要不怕冷，冷就会怕你。”我得意地吹牛。

“嗨，还不是爱美不穿棉，冻死不可怜。你妈年轻时也这样儿，非跟李献文去颐和园滑冰，滑着滑着把肚子滑大了。”姥姥笑了。我当时没懂我父母一起滑冰与肚子有啥关系，跟着傻笑。姥姥说：“不光是这个，现在你妈的关节炎也找上门儿来了吧。”

我说：“姥姥，滑冰其乐无穷的时候，冷就不打扰你了！”我假装认真地盯着她，“不过，您刚才可是说反动话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姥姥问。

“姥姥您忘了？现在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人能当‘老天爷’。”我们俩呵呵笑成一团直抹眼泪儿，忽然我们捂上嘴，怕对门儿大舅家听见。

初恋的冲动

我又去冰场了，穿着国防绿，严格地讲是自家制造的假国防绿，我生怕弄脏了这件“礼服”。那天脚腕子不想讨好我，连着摔了好儿个“老头儿钻被窝”，我停了下来。一个小伙子滑过来说：“你滑得不错。”我一下一个大红脸，天呀！怎么会在你最不出色的节骨眼儿上有人来夸奖呢！我说：“马马虎虎，瞎滑。”顺便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好一个精神小伙子，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黑脸盘，线条清晰，不高不矮，眼睛细长，鼻梁挺拔宽窄适中，穿着一件正宗绿军装，戴的那顶羊剪绒帽子还是真货。他的方下巴很有男性魅力，一笑两颊现出俩酒窝儿。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

“你——是哪儿的？”他的酒窝使我晕眩。

“百万庄的。”

他问：“你认识谁谁吗？”那时都这么问，先用“名流”来给自己抬份。

我说：“认识。”

其实我哪儿认识啊，那人是大腕儿啊。

他问：“你叫什么？”一个念头闪过，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自己的真名真姓！

心里想撒谎，嘴巴又太急，“李爽”。看来恋爱使人变得透明而智商急剧下降。

他问：“你家住哪儿？”我支吾了一会还是实话实说了。

然后我照猫画虎，问小伙子：“你——是哪儿的？”

“我爸是北京青年报社的副社长。”

“你叫什么？”

“顾成。”

“顾成你有事儿吗？”

“没事，看你滑的不错，教教我行吗？想交个朋友。”

冰场要关了。

“你明天还来吗？”我问。

“你呢？”

“不见不散。”

冰场上乌泱乌泱的人群，一张张脸模糊地被我的眼睛忽略、甩开，视而不见了，只盼望一张英俊的脸——顾成。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第三天他没来，第四天没来。我急了，翻出一张北京交通图，像一个侦探，终于找到青年报社宿舍。进去问看门儿老头儿，老头儿说：“哪儿有这么一个人！你找错了吧。”我特别失望，一厢情愿地幻想，“肯定是老头儿不认识顾成。”我就在附近溜达希望碰上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溜达但毫无结果。

我继续去滑冰。

“李爽你在找谁？”

狂喜的心扑通通……小伙子忽然在我身后，还很幽默。我特高兴，赶紧告诉他我前几天去青年报社宿舍找他。顾成有点吃惊，手伸进帽子抓了抓头皮，说：“我——我不住那儿，那儿是我父亲住的地方。”我其实已经什么都可以相信了，哪怕他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说他是反革命明天就要被枪毙都没事儿……我盼着他约我。

他约我晚上去东单公园，这就是所谓的“幽会”吗？我浑身发热，浪漫的心足以融化掉整个滑冰场。

冬天的北京，晚上好冷啊，我准点到，老远，认出他晃晃当当

的肩膀。他一笑，俩小酒窝，牙齿整齐。我说："公园关门了，你牙真白。"不明白黑灯瞎火的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他说："我认识一个地儿，来。"在拐弯抹角的地方出现了一排铁栏杆，其中一根已经被掰弯，我们钻进去。花园是空的！这座公共花园仿佛私人别墅。我们坐在廊子上聊天儿，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听得见自己心跳不止，特幸福的感觉。

"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希望听到他说一些想要约会我的缘由。似乎我缺少一双旁观的眼睛，需要拿别人的评价当镜子，照见自己。我盼着他说我——漂亮，有气质，或许只是："你冰滑得特棒。"结果他没吭声儿，缓慢地点了根儿烟。我老翻眼睛以为这样自己会显得更优雅，更聪明些。我没听到夸奖，不耐烦地催他："你哑巴了？"顾成吐着烟圈，摆出临危不惧英雄玩主的架子。我对他的镇静打了个问号，因为他急促地吐着烟圈，每回都不够圆。他还呼呼喘息着，暴露了他的慌张。再看看那烟头上的小红亮点儿，在黑冷的空气中发抖。气氛太不自然了……他突然过来生硬地搂着我，用嘴吻我，我瘫软下来，却觉得他肢体僵硬、紧张地用手隔着我的棉衣在"禁区"附近摸巡，搜索到我的小胸脯又触电般缩回冰凉的手。我不了解男人的生理，连自己的生理也稀里糊涂。我把他的举动统统想成是热爱的激情！

这第一次被异性触摸及亲吻使我脑袋空空，陶醉极了。对青少年那依然脆弱、幼稚的识别力来说，第一个吻的慰藉是重要的，在我当狗崽子的经验中——被亲吻意味着对我完整人格的一个肯定。这恐怕只有当过狗崽子的人，才能体会。

他搂着我像在取暖，紧紧搂在怀里，一下下用冻冰的唇吻我，每一个我都小心翼翼，把它看成某种带补偿的恩宠。

"快没车了吧。"他看看表，我用羡慕的口气说："嘿，真狂你还有手表呐！"而且我明知是讨好他。果然他的虚荣心被吊起，得意道："名牌洋表。"他告诉过表名我忘了。

"什么时候再见？"这才是我的心愿。

"明天你来北京站？"

"好。"我问都不问到北京站去干吗，约我上月亮都行。

顾成追上末班车，拍打着车门儿让车等待，催我，"李爽快点！快点儿！"我跳上车坐在后面的长座位上，回头恋恋不舍。空车在颠簸，我兴奋，快乐，世界变得很小，小到只剩下他和我，即便他是一个陌生人。爱是永恒的东西，具体爱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爱就好了。

童　真

约好在北京火车站三路无轨电车站。顾成照旧一身儿国防绿，第一次白天见他，发现很多细节：他军装的领口和袖口已经有点磨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国防绿的大个子，顾成给我介绍过，我转头就忘了他的姓名，心里只能有一个"白马王子"。

顾成把我介绍给高个儿，还强调："她是百万庄的也认识谁谁谁。"高个子听后放下比较之心，露出尊敬的表情。

"我们去一哥们儿家，行吗？"

我说："好。"那时我很少离开西城区。一般老百姓没有单位介

绍信不能随便旅行。北京站那片不太认识，只知道从我们家坐三路无轨到头儿，就是北京火车站。

在北京站那一片儿胡同儿里转，我吃惊地发现这些胡同是如此破破烂烂。从乱七八糟的大杂院穿进去，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平房里，一屋子人，乌烟瘴气地聊天儿。我只想着顾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任何他的缺点我都准备接受，包括脏话我都准备原谅。

只是我不明白，顾成说他家是一个“干部家庭”，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他那百分之百的魅力被减损了不少。人是世上唯一有复杂等级概念的物种。换一个角度，真正的爱几乎完全可以超越这种等级概念。

第二次他又说：“咱们还去那个人家儿，你早点儿来行吗？”

“没问题。”

老早我醒来，把脸洗了一遍，左看右看，还嫌不干净，再拿起毛巾又洗了一遍。第三次拿起肥皂时，等着洗脸的姐姐说：“快点！你怎么洗也没我白。”我轻轻放回肥皂。

早晨街头还没什么人，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我骑车出发了，眼睛里看什么都觉得美。

顾成在约会地等我，他让我老远跟着他，“咱俩不能一块走，有街道委员会‘小脚儿侦缉队’和维持治安的。”我们装作没事人儿，可心里却像做坏事一样不自在。

这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地砖肮脏不平，墙皮袒露着下面的杂石。我这种见过好东西的人，自然受不了这种粗糙的环境，但被迷惑的心让我欣然接受了。但什么好东西都逃不过我的眼，而且我自红卫兵抄家以来作下了一种怪病：在我的环境中一旦有古董，腿就会微微地发抖。我一下子瞥见一个紫檀木雕花脸盆儿架，这件家具的反

差，使我想到他家会不会也是被赶出门的牛鬼蛇神。

“这是你家？”

“不……是。”

“哎，我怎么不信你说的！”

“你爱信不信。”

我和他单独在一起，他眼睛滴溜溜在我身上飘来扫去。他过来伸出胳膊搂我，和上次一样的吻，依然生硬。很快他急切地解开裤子扣，我说：“你，你要干什么？”我猜这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刻。他躁声闷气地说：“你装什么丫的。”我假装听不懂。因委屈我有点儿挣扎，他很有劲儿地把我顺势推倒并且按住。我嗓子热乎乎地从男人的力量中感到女性天然顺服的温情，大概在爱里的女人是这样喜欢给予和牺牲。我不知道自己的胴体下还有个洞，他对性显然也是道听途说。我看不见什么只能感觉。这时从他身上长出一个热东西，拳头一样有力量，我马上联想到汽车上的“硬枪”不也是这样冷不丁儿就长出来了吗。

稀里糊涂。我没有任何舒服的感觉反倒很疼，而他手忙脚乱中还要连呼哧带喘，我们的表情一定很像有苦难言却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他叫道：“唷——你真骚X。”我无法忍受这种话，但他绝无恶意地陷入绝境。

我们在匆忙中甩去了处男与处女之身！那是必然也是某种如愿以偿。

我躺在床上，看着黑乎乎的陌生天花板，一个歪斜无罩儿的灯泡，上面尽是苍蝇屎，几根线长短不齐地凑凑合合，灯泡好像在说：“看什么，能亮就行。”墙上糊着报纸，老式格子窗儿上还贴了一张红太阳的剪纸。小破屋儿几乎只有一张床的位置。一条在姥姥家见

过的杭州凤凰彩绣缎子被，脏兮兮的已成灰色。我看在眼里却不敢问，恐怕这被子已透露了他的身份。顾成爬起来扣上裤子扣儿。他坐在那儿抽烟，拿暖壶沏了杯茶，不看我。他忽然间的疏远一目了然。我们做了一件联结身体私密的事儿后，男人女人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需要温存，一切对我只是刚刚开始，而顾成茫然看我的那一眼，却是一切的结束。我往他那儿蹭蹭，他赶紧拿喝茶掩护，“你喝不喝？”他的口吻捅了我一“刀”。然后，我试图读懂他的眼神。哪里是男人看女人如一顿美味的佐餐？吃过了，看女人如剩下的残羹冷食男人懒得收拾？“爱”呢，难道“爱”只是身体的仆人，身体吃饱了对仆人说“滚蛋”？

透心凉的我咬住嘴唇直到生疼。顾成面对做爱后突然如陌生人的情绪，毫无对付之策，他绝不可能是“预谋”要伤害女人而是由深层什么东西而来的不由自主。

我特别想跟他在一块儿，他说他还有事儿呢。没有办法，我受了太多的礼仪教育。“什么时候再见？”

“再写信吧。”顾成尴尬得很，仿佛他也正在发现属于男人的一种心理残疾。

我站起来走了。失望使爱情迅速发酵为酸涩，酸涩又迅速分解为受害与委屈……我在哪儿？眼前是完全不认识的胡同，我骑上自行车，到胡同口儿看了一眼牌子：“苏州胡同”。这时体内乎乎地流出一些热的液体来，当时我挺纳闷，不知那液体叫精液。

得了相思病——按自己的记忆回去找他，我找到了苏州胡同。到胡同里那个小破门儿，敲敲门，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探出半张脸，我问：“阿姨，顾成在吗？”她说：“你找谁？是找小溪吗？”我支吾，她刨根问底：“你是谁？叫什么？你怎么认识小溪的？”中

年妇女警惕地盘问，把我吓得往后退，推车逃走。

我坚信被人骗了，前天的委屈一路上已渐渐变成怨恨。

顾成？谁知道也可能叫顾小溪？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顾成不一定是他的真名，但可能他有和我相似的出身。

北京滑冰场上的一个男孩悄悄滑进了我的生活，拿走了我的童贞那天，又悄悄地滑出了我的生活，前后还不到十天的工夫。设想，今天他也在想是我拿走了他的童贞又悄悄滑出了他的生活。

生活啊——组成你所有基本元素的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分给我们更多的苦东西吃呢？

所有从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同代人们，今天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第一次。童贞是什么？是第一次！无论第一次是件乐事儿，还是件苦事儿都是难忘的。生活中无法躲避第一次。只有去做事，才能认识快乐和不快乐，并看见从快乐和不快乐中你收获了什么果实。想越过体验直奔快乐是死亡，但顾虑重重又什么都不会发生，摇摆不定的人，多数儿都选择停下了，通过电视的小窗口去窥探别人丰富多彩的人生。

走向所有的第一次，它使我们在苦和甜中收获智慧。

孩子是从哪儿跑来的

冬天很快过去了。

从我家的阳台可以望见学校的榆叶梅一粒粒深粉色的花蕾，我

的思念也渐渐淡了。我常常坐下来画花，画风景，画静物。画画儿已经像我生活里的一个知己，一根儿救命稻草，一个不会抱怨的第二个自然。我奇怪为什么在我画画儿的时候，一些内和外的噪音都会自动停止——花草、展览馆的建筑、一张椅子和一个西红柿与我没有分离感。一旦停下来，噪音马上就要说三道四。我的心太高，老觉得画得不够好，画稿不是藏起来，就是毁了。偶有满意的画就贴在床头天天看。

四月份，有一天父亲欢天喜地地带回一只鸭子，他精心烹调了整整一下午，我第一口就恶心，想吐。

一连好几天，只要有肉腥就恶心。我以为自己得了肠胃病，去看医生，说是胃不好，医生就当胃病治，开了一大堆药，喝了，没用。

姐姐问我："你月经准不准？"

"哈哈，三个月都没来，省事儿了。"我的确没有在意，因为我本来就恨这个，把这个叫"倒霉"，把月经带叫"倒霉带"。

姐姐说："是不是有妇女病？查查吧。"当时她正在交男朋友，男朋友的母亲是积水潭医院的妇科主任，有名的大夫。姐姐一定拉我去她家查。

张医生有一双亮丽的大眼睛，笑眯眯地说："小爽里屋去。"我进去，她问："怎么了？"

"没什么，老恶心。"她让我躺下，在我小肚子上摸了几下，没说话出去了，一会儿她在外屋叫："爽子你来。"出去，就看见姐姐坐在那儿哭哭啼啼，我问："阿姨她怎么了？"我姐姐一边儿哭一边儿喊："我怎么了！你干吗不看看你怎么了？"

我提高声音不高兴地回答："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你都怀孕了。"我一听吓傻了，脱口就问："孩子是从哪儿跑进

来的？"姐姐气愤地说："你是流氓！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装傻。"张医生的眼神也好像对我的话有点儿不解，我有口难辩。

张医生问："小爽你好好想一想，前几个月是不是有坏男人动过你的身体？"我的头"嗡"地一下想起了顾成，一五一十说了。大家摇头叹气地指责我的没心没肺。

怎么办呢？打胎困难重重。每个医院都有严格的规定——未婚姑娘做人工流产，医生一定要举报，警卫科的一定要通知派出所。虽然我姐姐男朋友的母亲是妇科大夫，她也同样怕给自己找麻烦，跟我姐姐说："你们自己想个办法吧，我们医院是重点医院，我是妇科主任，真是爱莫能助了。"

回去姐姐跟母亲说了，母亲慌了神儿："怎么办？"没有说是我的错，说是她的错，没有给我讲过。

我跟我姐姐不怎么好，两人性格完全不一样。她做事嘀咕又考量，我想做就做不考虑结果。小时候没有别的同伴共患难，两个人力量拧在一起大一点儿。大点儿了她便不再与我分享更多，接触的人通常很正经、实际，但在这件事情上她非常帮忙。

她说："你疯了，跑东单那边儿干吗？那儿全是痞子，串子！我帮你找个医院，实在不成，咱们到乡下把孩子生了送农民。"她说这话时我很难过地想："孩子也不是小狗，我才不送人呢！"

姐姐找到东城区妇产医院，在东直门，离我们家很远，凭她的直觉应该离我们家远。

到了医院，她登了记，回头嘱咐："我给你登记了，做流产。起了个假名字，记住你叫王小妹！千万别说真名儿，说了可了不得，咱们一家子都得跟着倒霉。"她让我闭上眼睛说三遍！我闭上眼睛说了三遍。姐姐又叮嘱说，如果有人盘问就说在延庆县插队，村儿叫

大东庄儿。我非常感激地相信奇迹发生了，但纳闷的是，姐姐怎么如此之老练。

东城妇产医院很小，这儿一定是过去的资本家、地主的房子被没收的。来人工流产我却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被老四合大院儿里满目旧日的雕梁画栋吸引。

病房里一共有十多个床，都是来生孩子的农民。我进去不光捏了一把汗，把眼睛也捏在手心儿里，羞耻得不敢抬眼看。护士没有放弃侮辱我这种人的机会，用判官的脸色问："多大了？"

"十九。"

"不好好学习，才这大点就急着干那种事儿！"

第一堂性启蒙课

一个不合法怀孕的姑娘，凸显出了那些孕妇的合法身份。她们很有兴致地议论纷纷，"大姑娘你要流产吗？你准是插队的，我们村儿也有城里姑娘给怀上了的。"

我缩在自己的床位脸冲墙，她们肆无忌惮地谈论丈夫们的长短！互相传授经验，我耳朵竖起听课似的。

哑沙沙的声音说："俺过门儿的时候，礼送了鼓鼓囊囊儿满铺盖，掀开一看全是鸡蛋、花生、栗子、新布、尿盆儿啥的。公社的小学校老师来晚了，进门点头哈腰，城里人的德性相儿大了，以为他把老家底儿都抖出来了，你们猜他带个啥？"

"啥呀？"异口同声。

"一套'毛选'！"

"城市越大人越抠儿。"旁边的人说。

哑沙沙说："我当家的问他，贾老师结婚了吧？"

"托党和毛主席的福，结了。"

"你娶媳妇儿那天，大家都送点啥？"

他说："新被褥里都是'毛选'。还有校领导送的一包儿糖和水果。"

哑沙沙说："我其实是挤对他呢，问'就一包儿糖？'"

他说："好大一包儿呢，还是牛奶的呢！"一屋子的孕妇哈哈大笑。护士听见动静进来，立刻安静。护士出去，又热闹起来。一个尖脆的女声道："我家那个，他没当兵时俺俩天天盼老炎儿（太阳）下山。一黑俺俩就亲亲摸摸美着呢。三年可熬过来了，他复员回家了，学坏了，喝起酒来、喝完就把俺提溜过去，他三七二十一完事儿了，我这儿刚起心，他蔫蛋了，翻身下来打呼噜去了。再也不管俺的滋味美不美！瞧，又怀上了，这是老四，他盼个小子，预产期都过了，还不出来，准又是个丫头片子不敢钻出来见爹。"

"这回准是个大小子！"好心的人搭腔。

"我怕我没那个福气。他成天絮叨我没本事。"

另一个抽烟嗓儿："没本事？老爷们儿以为生孩子跟拉泡屎那么容易？你奶奶的，疼不说，受死罪了！"

"生闺女？不也是爷们儿那个家伙事决定的吗！"

"你当真？"尖脆女声急忙问。

"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生男生女是爷们流的白浆儿——学名叫精子的东西决定的。"

“叫啥？镜子？”尖脆女声。

“不是照人的镜子，是精气神儿的精！你以为精子那玩意儿和粥一样清白呐？里边学问大了。俺是赤脚医生，计划生育课上听来的，还是大医生的课呢。”

“我不信。”

“你是信当兵的？还是信城里的大医生？”

尖脆女声：“那文化革命，咱们也得革爷们儿的命，爷们儿，可让女人背了八辈子没本事生闺女的黑锅了。你瞧俺回去扯了他的鸡巴蛋去。”哈！妇女们胜利的笑声又把护士招来了……

生活有时就是很诡异的，这简直就是给我安排的第一堂性教育课不说，还是一次难得生动的民间性启蒙大全。在无产阶级专政最严峻的时代，这儿却有一个最别开生面、活泼开放的农村妇女“性生活座谈会”。

堕　胎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姐姐拿来暖壶、脸盆、毛巾，放在旁边的小柜儿里。她说我给你买点儿吃的去。她前脚刚出去，后脚就进来一个穿蓝制服的女的，叫：“王小妹！”这时我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马上起来，跟着她。

进了一个屋子，平滑的地板条很宽，虽然磨损得几乎没有保护漆了，依然看得出它昔日昂贵的质地。老式向阳大玻璃窗上，可以

隐约辨认出彩色的玻璃画儿，看得出曾经有人粗暴地用刀刮过，玻璃上面有用红油漆写的毛主席语录。一个炉子上几个烤馒头，一个饭盒儿。一张大桌子后边，坐着个中年男人，四十多岁，戴了一顶蓝帽子，典型的干部气质。

我进来时男的正在翻东西，他说：“小轩你去忙吧。”女的出去以后，男的转过来了，说：“王小妹，坐吧。”我坐下。

我想坏菜了，怎么应付？说了实话这假流氓就成了真流氓，再传得满城风雨就更糟了。我下决心不说，打死也不说。王小妹，延庆插队，大东庄儿，一一编好记住。结果他根本就没问这些，只说：“男的你认识吗？”我憋着，没吭气。

“你说说吧，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看你不傻不呆的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

“你那么年轻，犯了错误可以改，坚持错误会越陷越深。男的住哪儿？”

“不知道。”桌上的电话响了。

“你先回去，等护士检查完了，待会儿我叫你。今儿说清楚了今儿就打胎。”

我心慌意乱，刚巧姐姐回来了拿着苹果什么的。

我说：“糟糕了……”

姐姐听了，“哎呀！看来不妙，还不快跑！”我问：“那东西呢？”她说：“还要东西干吗？”

我们装着没事儿人儿，往外走。护士在门口儿值班，那么巧护士正好不在，我穿着病房的衣服，抓起自己一件外套儿。

到街上，见东城妇产医院旁边儿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俩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去，当着蹲坑儿的女人把医院的衣服脱了，我里边儿还有条棉毛裤，巧了，我的棉毛裤是深蓝色的。还没等蹲坑儿的女人们醒过闷来，我们已经窜上了无轨电车！下车之前把医院的衣服塞在车座下面。

回家，我妈一看就明白了，“都五个月了，一天都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能看出来了。”只好和姐姐一起去找姐姐未来的婆婆求援，婆婆同意了，“那好，我来给你做，你还用这个假名字，如果谁问什么就说你结婚了，现在有革命任务不能留孩子！”我住进了积水潭医院。

吃了引产药，孩子也不下来。人都说，你不想要这孩子，怎么打也打不掉，你想保胎，躺八个月，一不小心翻个身咳嗽一声都能掉了。张医生怕夜长梦多，加大剂量。

这天夜里我感觉非常冷，梦见好像在喜马拉雅山上，自己是个登山运动员，不知道从哪儿见过这个镜头，横飞的冰雪中，我向山顶挣扎着向前。山顶上有张孩子的脸，孩子冷得快要死了，我想温暖他的身体，急得醒来了，产痛也就此开始。哆哆嗦嗦像在真空里，一切都高高远远的到处是雪，是冰，我说了一句：“我冷。”忽然下身仿佛荡然无存。慢慢地，我下身又渐渐回暖。

张医生不在，只有两个年轻护士。我听到一个护士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哟，生下来啦还活着，是男孩儿。”

另一个护士的声音：“多大的？”

“五个月吧。”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我希望看到从我内部孕育出的这个小孩儿，他是我的一部分，我想对他说声“你好！”再说声“永别！”我还要对他说声“对不起！”然后说，“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依然也还是个孩子，我无法保护你！”我没有力气爬起

来，鼓起勇气问道：“让我看看孩子？”这个要求使护士发现了她们对我有权利，护士厉声道：“看什么看！还有脸看自己的罪证呐！”

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处置这个小孩儿？许多残忍的镜头闪过。我为孩子伤心、担心。我相信他一定具备所有人体的触觉及情感，是一个鲜活的人，但他绝对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还没来得及出生，就被拉出来受尽折磨后，再次被处死。

母爱是意识形态和教条所不能左右的，那是属于天然的爱！这爱与谁喜欢不喜欢无关。母爱伟大得连猫和狗都具备。没准儿，有一天，人类会在树木和水晶也有母爱的事实面前目瞪口呆。

本性难移

我回到五十六中，还不老实。姐姐认识的一个女朋友萍萍，住在广播局宿舍里。萍萍甩掉姐姐把我当作新知己，告诉我：“我们院儿有个复员文艺兵——拉小提琴的，叫晓鸣，他对我很有点意思。”

“多大？”

“比我小两岁，比你大一岁。”萍萍点完自己又指指我。

“部队挺好怎么复员了？”萍萍俩手搓来拧去了半天，道：“院儿里人明处不说，暗地里倒使劲儿说。”

“说什么？”

“好像晓鸣在部队上犯了男女关系方面儿的错误。”我马上想起了自己的错误，大大咧咧地为同病相怜的人开脱道：“现在什么都是

错儿，男女关系就不算错儿了。"

"哟，你可真够开通的，多恶心！"

"恶心你还看上人家干吗？"

萍萍扭扭捏捏地说："院儿里没人理他，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唉，萍萍你应该给他写信。"我出主意。

"我写不好，你帮我写吧？"

"去你的，你又不是文盲！"

"你有艺术细胞，求你了？"

我给萍萍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情书。

通过萍萍我认识了晓鸣。生活有时像阴差阳错的戏台，还背错了台词儿。我帮萍萍搭桥写了一封矫揉造作的情书，他却热情地给我回起信来，约我见面谈萍萍的事儿。我告诉萍萍他约我谈你。我的话中藏了水分，因为我自然没有告诉她，其中的戏已经转场了。萍萍皱了皱眉，说："那你谈完，保证来告诉我结果！"

"当然。"

晓鸣家就一间屋儿，他复员回来，临时支了一个行军床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细细高高的身材，白细面皮，太像个小男娃娃了。梳头油把头发拢在后面，像漆黑的挂面，一只手夹着过滤嘴儿香烟，太帅了。

他问我："想听什么吗？有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我生怕说错了话露怯，用很在行儿的调儿说："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有吗？"

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张唱片，"舒伯特的《小夜曲》行吗？"

我点点头。他在放唱片之前让我帮他拿着烟，我瞧了一眼，烟上有三个五。知道他可以搞到稀有的洋烟，真想吸一口，我那时并不抽烟，只是想用嘴接触他吸过的烟。我承认自己已经快要掉进爱情陷阱里去了。有另一个带着经验和顾虑的我在悄悄警告着我，欲罢不能——因为"情结"是世间最难联结，联结后又最难解开的甜蜜的苦疙瘩！

晓鸣打开钢琴盖儿，随着《小夜曲》叮叮咚咚头一低一扬，上身轻摇慢晃，演奏得跟台上的音乐大师一样。挂面头发掉下来，他头一甩。我已经迷得不知道姓什么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既潇洒又有风度，我爱上了他！大概他也爱上了他自己，都陶醉了！

他回过头来微笑着看我。本来我怕说错话，想奉承可一张口却说："美中不足的是你没有黑色燕尾服，你能不能别跟着唱片，弹一个别的什么歌儿？"他的脸耷拉下来，转过身儿去，提起唱针，坐在琴凳儿上边弹边唱了两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确他的声音很亮堂。"嗨，看不出，你还真才华横溢。"晓鸣这才乐滋滋，"砰"的一声把琴盖儿盖上，坐我面前哆嗦着二郎腿，好像在给我看他又黑又亮的皮鞋。我心里泛起一点厌恶，可他才艺的魅力完全压倒了这一细小的虚荣。我欣然想道："如果我也能买双皮鞋，不也照样会很高兴地哆嗦着显摆吗？"

晓鸣一双细长的小眼睛无遮掩地盯着我看，又点了一支烟，缓缓随烟吐出一句话："我觉得你非常与众不同。"

"我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渴望了解自己在别人眼中形象的我，假谦虚地反问，并且急着想听到下文儿，可他不说了，话捏在嗓子眼儿里，慢慢凑过来。我坐在他的床边儿，他的脸一点儿一点儿接近我，说："我妈中午回来。"

"你还没说完呢？"我问。

"赶明儿时间充裕了，咱们再好好儿聊。"

“什么时候？”

“日夜兼程，我觉得咱俩是天生的知己。”他那样子太语重心长了，我感到喉咙都有点哽咽。

“真的？”

他伸手来摸我的头发，那浑身的烟味都忽然变得很香，他说：“嗯——你真好闻。”简直是一个催情专家。我闭上眼睛，浑身发热把两片嘴唇儿嘬起来等着。

“别急，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嘴唇，线条还美。”他的手指头在我嘴上碰了碰。我像一只送死的猪提前倒在枪口下，请他缴获。这时警觉的经验浮出：“和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和顾成干过的那种事儿！”他把嘴特别轻地放在我的嘴上，手指熟练地解开了一个扣子。我紧张起来，抓住自己的领口，他嘘了一声，“什么危险都没有，我知道怎样不让你出事儿。”又解开了一个扣子。

“你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仓促地，“砰砰砰！”有人敲门儿。他慌了神，对我说：“扣上扣儿快点儿，没准是我妈回来了！”他过去开门，门闩刚一松，推门的人用力过猛，“咚”地一下门撞墙上，晓鸣本能地用手护住脑袋，脱口求饶：“哥们儿别，别——！”

一看来人，把我气坏了，原来是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二毛！

晓鸣吓得两手使劲摇，“哥们儿，我没动她，我没动她！”我完全想不到姐姐的脸可以那么生疏像个警察，她对晓鸣说：“你在部队刚受作风问题的处分还不痛改前非，我告你去！”“大姐别！别！你们要多少钱都行！”姐姐做了一个手势叫我离开，我很吃惊为什么谈钱？更猜不透我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肯定是萍萍，没错！”

我担心姐姐把这事儿告诉父母，只好灰溜溜地遵命。晓鸣让我失望，遇事太没男子汉气概了。我幻想着如果他可以说：“你们别管闲事儿，我喜欢她。”那该多棒。

刚到楼下去，萍萍本来就黯淡的脸色别提多难看了，她站在楼道口，见我下来恶狠狠地翻着白眼儿，“真不要脸！叛徒！”

我回答：“看你黑巴溜秋的难看相儿，掉地上都没人捡的主儿，晓鸣不要你你死缠着人家！你才不要脸呢！”

“谁不要脸？”

“你！”

“你是臭流氓！”萍萍哭着骂起来。

我骄傲地用了一句连自己都不懂的行话道：“你才是驴脸臭圈子呢！”发泄完了，近乎快乐地跑了。

到街上，我后悔了。

我引用了别人骂我的最苛刻的话，来骂萍萍。我曾经尝过这种伤害，在心里搅和结不上疤的苦头。为什么我还用同一把软刀子伤害与我有同样处境、热恋中的女友？我不接受这样的我，好像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我。一个希望给予爱，另一个把爱当作可怜巴巴的匮乏物，要排挤和竞争才能获得。

晓鸣来了一封信，约我，我回了一封信，说，我不想见他。我承认，对内我大大地抑制了真情，对外撒了大大的一个谎，事实上我扳着手指头，号着脉，把能拥有的能量与时间全部投入想念。

他又来了一封信。

我在紫竹院见到他，我们沿着湖边走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停下来，假惺惺地说：“我们吻一下吧。”我太渴望他的吻了，他拖延着，爱成了赏赐或商品，我度秒如时地等待这吝啬的一吻。他

懒洋洋地在我左脸上生硬地给了一小下，然后宣布："我们不合适，跟你吹了。"这宣布使我连明白中国话的智能也失去了，"吹什么了？"

"我跟你吹了。"他用享受的眼神观察我的反应。

我用脚在冬季枯黄的干草上踢来踢去。耳朵嗡嗡鸣响，他微微红润的嘴唇像枪，句句话如子弹，射中我的自信心。强烈的被抛弃感限制了我的表达力，忍住眼泪变成了唯一的目标。

今天回味起晓鸣的话，简直就是小孩子在比较自己的苹果比别人的个儿大。临走的时候他说："你不就是想认识搞艺术的吗？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大哥，特棒，作家，姓贾，叫贾大兴，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你的地址我也给他了，他会来找你的。"说完，以胜利者的姿势骑上凤凰新车，吹着口哨，林阴道上，他给人的感觉几乎是飘在湖上。没有比爱情更奇妙的东西了，一位陌生人会令你感受到突然涌现的爱情。谁催生了无缘无故的情感？

如果太渴求爱情，爱情就成为一种权利而迫使爱廉价，爱一旦失去天然本质，情场上就只能看到你追我赶的闹剧了。

贾大兴大概有二十九岁，刚从内蒙兵团病退回来。二十九岁在我眼中已经是老师加老人了。第一次，他派妹妹贾嘉来约我，贾嘉说："我哥在楼下呢。"女孩冲我挤眉弄眼，怕我家人听见。母亲走来走去的，我们虽然不认识却默契地装成老朋友似的，贾嘉嘴甜又有礼貌地说："阿姨好，我是李爽的同学，阿姨您需要帮忙吗？阿姨您慢走。"我俩这才得以站在四楼往下看一眼，他哥贾大兴站在我家楼梯口，人很精神，一条褪色的军裤，上身罩着一件海军蓝的灰制服，圆脸儿上，一双眼睛炯炯亮亮地。鼻子微尖，鹰钩，给人一种遐想：他有外族血统的祖先。

贾嘉递过她家的地址，百万庄未区十栋四零三号。过了几天我真去了。

禁　书

初次接触很和谐。他说他很喜欢写东西，也偷偷看过很多书。"都是抄家抄来的！"说抄家给他带来了美好回忆，说："别人不是打就是砸，我玩儿命偷书。"好不容易他才停止了滔滔不绝，我的胃也上下翻腾得直恶心。想到自己家所有书被抄的命运，想起姥爷家花园里红卫兵烧书画到凌晨。如今我如饥似渴，要读书只能向老红卫兵低三下四地借！我像看敌人一样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他根本没发现我听他说话时难看的脸色，只顾自己，"我要给你看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拉上窗帘儿，插好门。他兴奋地示意我："小爽，来，来呀！"我揪住自己的衣服扣，可他弯下腰抓住拖地的蓝花床单子，"呼"地一下掀开，哇！好家伙！书，满满的，整齐地码在一张双人床下。我傻眼了，欣喜若狂忘记恨老红卫兵的前科儿。

贾大兴和我同样亢奋，忘我痴迷。我们在书堆里连刨带翻，一下午眨眼就过去了。

中外小说应有尽有，从《青春之歌》、《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到老舍、丁玲。又从《三国》、《水浒》、《红楼梦》下面，翻出了更来劲的《静静的顿河》、《复活》、《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的

《童年》，还有《巴尔扎克全集》，雨果的《悲惨世界》。“哎，小爽你看还有、还有……”我们臭味相投，他真的太衬了！天都快黑了，我才望着被翻腾得和抄家差不多的乱书堆儿，恋恋不舍地说：“哎唷，这么乱我来帮你收拾收拾吧？”“不用，没准儿我还要翻到夜里呢。”我向他借了不少书，他挺痛快，叮嘱：“小爽，你应该从中国作家的作品着手阅读，以后再看外国作家的作品。不过一定要保密！我一般不借书的，对你跟别人儿不一样！”这时他看着我的眼神才像一个男人在看异性，但那是一种要吃掉你的注视，让我感到焦虑。而我看他则像注视着一位老师。

从早到晚只要有空，我就坐在家里的方凳儿上看书、看书、成天看书。后来我再三要求，他给我看外国小说了，《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

那会儿我透过“玩儿闹”的关系读了几首郭路生的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人生舞台》、《疯狗》、《落叶与大地的对话》。一天，我得意地带来了一打手抄诗稿，告诉他：“兴哥这是我最崇拜的诗人。”

“叫什么？”

“郭路生。”

“他呀，江青点名批评的人。”

“你要听江青的，我就再也不来听你的。”我生气地说。

“嗯。”他的“嗯”声酸酸的。

为了看书我经常接触他，越来越尊重他，觉得他懂好多事儿，是在外面闯荡见过世面的人。我那时候还没有出过北京城，听他讲事儿，如同喝桔子汽水既新鲜又刺激，有甜酸的味道。贾大兴有时“侃大山”侃得忘形，唾沫星子乱飞，那种自我陶醉，使他滔滔不绝

地说呀说，无法顾及别人的感受，仿佛他所有的自信，都需要由别人对他崇拜的多少来作为基础。

跟着感觉走

渐渐地他对我谈些私人话题。我问起他父母亲对他在家藏书的态度，他讲了一个自己家的故事。

他父亲是中央党校的干部，一九五〇年《婚姻法》有婚姻自由的规定，他的父亲以革命的名义抛弃了包办婚姻，强迫乡下的老婆也就是他的生母离婚。“听我姨说，我妈死活不干，我才两岁不记得了。据说，我妈抱着我自杀了，又据说我摇着她哭了两天，才被串门的邻居发现。听我姨说，我以前不会说话，我妈死那天，我会叫妈了。”贾大兴眼睛又圆又大望着光秃秃的墙壁，好像在看电影。

“后来，组织上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以组织的名义要求我妹妹小嘉她妈与我爸爸结婚。据说小嘉她妈当时年轻貌美有文化，本来是我爸的文化补习辅导员。小嘉她妈到延安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包办婚姻，她不想嫁给南洋的大商人，来寻求党的保护，才参加革命的。我喜欢书是受我继母的影响。”

“你和继母的关系好么？”

“嗯——怎么说呢？”他一言难尽的复杂表情激起我的好奇与猜测。

他说：“我是她带大的。”

“你爸和她的关系？”我的问题如此粗糙，至今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没骂我，还间接地回答了我："在我还半懂不懂事儿时候小嘉她妈说过一句话，我老记着，她说，我过的是被高喊妇女解放口号的人强奸的日子。"

"你爸现在在哪儿呢？"

"下放了。"

"哪儿？"

"江苏省五七干校。"

"你也写东西？"

"喜欢。"

"小爽，我对你可已经什么都说了！我说的话，如果你去告发，明天就可以判我反革命。"他笑了一下，赴汤蹈火般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晃了晃他的新小说。十六开的作文本上，蓝色的钢笔字非常秀丽——《少女之心》。

隐约觉得他对我有欲望，我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我们"师生关系"的假象，希望我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毛丫头。我对他除了欣赏并没有更多的需求。跟晓鸣的事儿刚完，我完全没缓过来呢，不想男人。男人女人在一起时，微妙敏感，贾大兴总要找机会碰触我的手，或在肩上、头上轻轻拍一拍，装作毫无贪图地多停留一会儿，每回我都敏感地躲避。不否认我对晓鸣与兴哥之间的默契有些较劲，对晓鸣把我转让给兴哥感到自尊心受伤，可是我不希望让这想法破坏了我对兴哥的尊敬。

有一天，他又来我家附近溜达，示意我下楼，我没去。第二天他妹妹送来一张小纸条。

一首宋词和一句话：

剪不断，

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爽，看完了的书，能不能还给我？"

下午，我背上三本书，骑车去贾大兴家。我穿了一件用母亲过去的布拉吉（连衣裙）改制的短袖衫。记得母亲说这是法国进口的上好洋布，图案是白绿相间的方格子，快成古董了却依然鲜艳，是我唯一的时髦衣服。因为母亲在改衣服时，我强烈要求把腰身裁得合身。

到兴哥家，我又开始书长书短地提问题，这回他对书显得三心二意，老把学问扯到古代皇室性生活上去。他故事里的女性一律是些沦为玩偶的女性，眼看着贾大兴在我心目中英俊的脸开始扭来扭去，变得模糊寒碜起来。

贾大兴把手放在我肩上，我把他的手扒拉下去。一扒拉，二扒拉，一双粗暴的铁腕顺势钳住了我的手。僵硬的气氛不好收拾，他用力控制着内火，目光像烧红了的铁杵，说："你干吗今天红唇绿衣地勾搭我？"

"谁勾搭你啦！"

"那你想要我？"

"我只想和你做朋友，不想有那事儿。"我生气地说了大实话。但他已经不能控制地气喘如牛，我讨厌他口中吸烟混浊着臭牙的气味，以及男人像打猎般特有的冲动，我说："放手，你把我弄得特疼！"他反而更使劲儿地控制着我的手，把我面冲床摔倒，熟练地

叠起我的双手，完全失去着力点的我被翻过来，手自然反压在自己背后，像一只被绑住的动物，那一定是他当兵时学来对付敌人的本事。我的脸对着他的脸，一张大嘴在我脸上胡亲乱舔。

绝不顺从强迫！我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儿，他开始撕扯我最美丽的衣裳。我全力反抗，没有思想，一场真正的肉搏战。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帮助我翻滚过来，我的鼻子几乎顶着床栏杆，我一把抓住了救命的床栏杆，用背对着他，死命咬着牙，闭着眼。他也决意死战拼命往回翻我的身体，掰我的手。僵持中，“咔嚓”一声，床栏杆的榫头儿被掰断！他停了下来。我胜利了，短袖衫居然没有被他的牛劲撕烂，只是扣子被揪掉了。法国洋布居然这么结实！站起来我掉头就跑，留下后面满是后悔和悲伤的声音，“小爽小爽！”他使劲儿地叫。我冲下五楼骑上车，外面的阳光灿烂得晃眼，手红肿疼痛。我骑呀骑，觉得身轻如燕，自己依然干净。

贾大兴给我写过一些长信。我撕得粉碎，扔到窗外，看着纷纷扬扬的白色纸片穿过树梢。贾大兴在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在我家附近频频转悠，还让他妹妹找过我，我都没理他。

爱情是生活中最难解的一道算术题——为了找爱，我如飞蛾扑火。当一场冲动的欲火燃烧起来，我又仓皇逃跑。

我又躲进画画儿里，我的精神避难所。一支钢笔、两支铅笔、一盒十二色的油画棒，一个小本子，全部家当就这么简单，它却支撑着我整个的内心世界。

天安门

一九七六年初，滑冰时大屁墩、大马趴以后屁股、膝盖湿漉漉的。说明冰已融化，春天悄悄来到。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教室黑板前的广播喇叭响了，要求所有学生到学校操场上集合，分班站好。哀乐传来，大家赶紧把头低下，脸上也不敢存留笑容。

清明节快到了，忘了是哪个单位挑头去天安门送花圈。顿时，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表达民愿的焦点场所。每天一有机会我就骑着自己刷成乳白色的臭美车去天安门广场。车太破骑不到一里地链子就掉一回。看大字报，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看不懂。看诗歌，觉得那些诗写得有点儿傻：

日夜怀念总理，
时刻警惕妖精。
风吹倍感松挺，
雪打更显柏青。

那段时候，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单位送来许多花圈，身体里的艺术神经使我撇开政治，开始品评花圈：这个好看，那个要加个蓝边儿就好了，兴奋得像过艺术节。人心所向，广场上人群拥挤却竟然连骂街的都听不见，神了！后来有人放火烧了工人民兵指挥部。重病里的毛主席认为这些应该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母亲脸色惊慌摇着报纸说：“爽子，千万不要再去了，看！”《人

民日报》头条——《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爽子，危险！"我虚应着，还是忍不住溜走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已不多，花圈被大卡车一车又一车拉走了。到处是工人民兵，我把车和别人的车锁在一块儿。中午饿了，就去找我的车，远远儿看见工人民兵在查自行车牌子，我的车就在他们眼前，没牌儿，他们对我的车指指点点，我直后悔干吗要打扮那辆破车，油成白色。

老天保佑，工人民兵走了。我取了车去姥姥家，告诉她发生的事，不敢高声又按捺不住就挤眉弄眼儿，姥姥不时地把手指放在嘴上"嘘"，她好高兴，说："你们能有好日子盼了！人霸，霸不过十三年，人穷，穷不过三年！"

傍晚，我又溜到广场，本想学精点儿，把车放在广场西边儿小树林儿里，结果里面早停满了，我只好把车排在路边儿。在广场走了一趟，正巧，快溜达到我放车的地方时，突然看到广场东边的人群拼命往长安街西逃。我撒腿冲锋，白车那么显眼，正在路边，抽出来之后才发现忘记锁车，想，天助我也！骑上就往西长安街窜。大群大群带红袖章穿蓝大衣的工人民兵，手持棍棒，从两头跑过来要封锁长安街。我拼了命往街中央骑，眼看工人民兵就快合拢了，我一咬牙一闭眼冲了过去，后面一阵丁零咣啷撞车的声音。我玩命骑到了西单才缓过来，敢回头儿了，发现这辆破车还挺来劲，居然关键时刻没掉链子，心里直谢谢我的破白车："你挺争气"。

天摇地动

朱德在同一年夏天七月六日去世。一个又一个人间圣贤，像凡人般前脚跟后脚地倒下去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四点。我梦见一颗黄豆粒儿，在大簸箕里被傻颠着……忽然，我真的被颠醒了，天空是乌红色的，颠簸又起，仿佛有个力大无比的人在愤怒地推我的床，"哐——哐哐，哐——哐哐"，我迷迷糊糊地想："谁有这么大劲儿啊？"大家都醒了，二咪，我们收养的第二只猫开始疯狂乱窜。"轰隆"一声，我们家唯一的好家具"宝贝立柜"倒了。那可是我父亲努力学习木工，自己打的。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父亲打的"方凳子"，其实是没靠背儿的小箱子，上面铺着母亲用碎花布做的垫子。父亲做的立柜不够结实，倒在我的床上，变形后歪歪扭扭可怜得像个很要面子硬挺着腰板儿的老人。幸亏我早已跳下床去。

妹妹吓得连喊带叫！我并不是不害怕，只是接受了地震这个事实，我镇静地摇摇摆摆平衡着身体过去给母亲拿上衣服后再帮妹妹穿鞋。妹妹哭叫："二咪！二咪！我要带它走！"父亲大声对她喊："小东，别喊了，猫比你有活命本事！"

整个楼都在跳，无论父亲用多大的力气，门也打不开。父亲镇静地对我们说："楼跳的时候下去，楼梯有脱节的危险。"他双手握住门把，静静地感受着震波，在整座楼停止跳动后的刹那间，所有的人都鬼使神差般地同时拥到院子里。大家在外面安静地站着，敬畏地面对自然的威严。险境后好一会儿，恐惧才降临人们心上。而没有受到那股莫名其妙的"镇静力量"保佑的人家，可惨了——有

人跳楼摔折了腿，有人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把小孩子从二楼扔下去，孩子摔死了。

人们一直站到下午。父亲说："我回去给你拿鞋。"因为他见我还光着脚丫子。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噩耗不断的一年。秋天，九月九日，毛泽东也去世了。

巨星陨落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人。追悼会更是声势浩大，我排在队伍里看着脚尖儿，也想做得和大家一样，怎么也找不出可以催下泪水的激情。心中有点慌，生怕因哭不出来而被歧视。但我太清楚自己的底细了——就恨演戏！不得不演时随大流儿演完了以后还会生自己的气。我把头埋得更低。女生在抽泣，男生也汇合进来，之后是老师，班干部和校领导泣不成声。操场变成泪花和鼻涕的海洋……我的天呀！哭声逼着我找些伤心事儿来想想，想起姥爷、姥姥、父亲、母亲、我和好多狗崽子及牛鬼蛇神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哎，强悍的伟人纷纷去了，我们弱小的庶民……"想到这儿我也眼圈红起来，眼泪掉下，我数着：一滴给姥爷，一滴给姥姥，再给父亲给母亲，给大咪，给我人工流产了的小孩……我成功地哭了起来，非常伤心。

中国人民沉浸在哀悼中。这首歌谁都会唱：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他，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真怪，亿万人高呼万寿无疆也没能使圣人变得长生不老。

学校领导通知，楼不能住了，楼房里的人都住到学校的平板房里。平板房的分配得先紧着干部，很快就住满了，没有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只有自己搭防震棚儿。说起干活盖房子，我父亲来劲了，我们几个给他打下手，他最喜欢和我搭档，我干活很利索，他喜欢。我们一直住在这个自己盖的新家到春节。防震棚儿有一个大木床，寒冬腊月的时候连温度计都被冻"死"了，因为它只能坚持到零下八度。我们睡觉时每个人都带上一顶棉帽子。

3

The third part | 第三部分

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

高中毕业了，我的名字上了插队的榜。

这种插队实际上是分配，是为了解决城市中学生不能升学和失业的问题，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

谁都不愿意去，家长都在想办法找后门儿——独生子女啦，有病啦，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啦。至于拉关系，我们家当然没有任何“关系”可拉。有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已经进行两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因毛主席去世而改变我插队的命运。

该走了，那天好多公共汽车在展览馆广场上，车身挂满了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学校组织了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敲锣打鼓。我的行李特别简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母亲身体不好，有一条狗皮褥子，也给我了。出门前母亲眼圈红了，“一到乡下马上来信，别让我们等，我相信你有能力，过好以后的日子……”她没说完，父亲就背上行李出去了。我留恋这个有温暖的家，现在要离开了，今夜、明晚、后天、大后天……不在这里睡觉

了。“妈，放心吧。”我安慰母亲道。

我坐上车，从窗口见父亲往后退了几步，想从外面看到我的座位。见到我，他过来隔窗说：“注意身体，入境随俗，好好劳动，环境不好将就一下，不要感情用事。一定还能回来的。”车动了，我们相互微微一笑，“爸，您回去吧。”车开了，父亲急步小追了两下，说：“爽子到了赶紧来封信啊！”车下车上亲人们一片哭声。我发现父亲的脸上已布满皱纹，疲惫好像一层灰色涂在刚刚五十几岁的脸上。他停下来向我挥手……

一个一个熟悉的街景，平时我不喜欢这条上学的路，每个角落里都有记忆。现在我正在离开，离开使我吃过苦头又尝到温馨的地方。看着看着心里就觉得别别扭扭。我感到，最后的那一点点心理依托也逐渐随着越来越陌生的景致失去了。眼泪偷偷流下来，我狠狠地擦掉，装作一个勇敢奔向生活的战士。对于长期被排挤在群体生活之外的我来说，用“战士”这个词不如用顾影自怜，眼泪挡不住地决口了，先热后凉地顺着脖子滑进领口。苦和甜是双胞胎，没有苦如何可以分辨那少得可怜的甜。

想起了郭路生的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

排排小杨树模糊不清，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屌。

顺义县和延庆县之间，高丽营公社，有七个村子，我被分配到离北京城几百里远的高丽营一村的四队。

我姐姐甩话来，“二毛他哥在山西插队，住窑洞，回家探亲时不仅没人样儿，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光惦着吃，大个儿的松花蛋一口一个，眨巴眼儿的功夫吃了八个，一个都没给我和二毛留，连盘子里的醋汁儿都舔了。你到北京郊区插队多福气呀！”她的

话没错儿。我姐姐通过男朋友二毛家医院的关系，弄到了一张假的病留证明，还分配到了一个西四同仁堂药房的好工作。我的嫉妒心早被不幸的感觉抓住，根本无法看见她所说的福气，还恨她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挪活，树挪死

来到一排红砖知青宿舍——我的新居，屋子没有天花板，可以看见大木梁粗糙的手艺。赶出来的活儿，一个炉子，一口缸，四个屋角四张铺板。四个女的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从各个不同的学校被“空投”到这里。大眼瞪小眼，互相不认识。

我人到，材料也跟着来了。

村公所，一个精瘦的农民干部，戴顶蓝帽子，帽子上全是土，摇晃一下脑袋都能掉渣儿似的。旁边一个女会计。蓝帽子干部心不在焉地找我谈话，他毫不忌讳地给我念打着机密字样的档案：“李爽，北京第五十六中，最后一批红卫兵，父亲右派，母亲……唉，这上边说你有流氓品行。社会关系复杂。”他说话特直截了当，弄得我挺紧张，可是农民没那么多城里人的猫腻。我突然感到他对我的过去毫无偏见。仿佛看透官场游戏的大师在鼓励我自卫——我操着不在乎的口气，道：“哧！流什么氓呀？男的长什么样儿都没敢睁眼看过！谁流氓谁呀，岂有此理！”我的话把女会计都给逗乐了，她说：“流氓，流氓，城里人真他妈买葱，半点儿不着调，流氓怎么不送监

狱，杵我们乡下来干吗！”说完，冲我友善地一笑，男干部也笑说：“他们以为农村是垃圾站呢。看！”他举着我的资料晃给我看，还说：“写着呢！白纸黑字儿特清楚。”我问：“那怎么办？”男干部从一摞档案纸中抽出一张信纸，边说边递给女会计，“翠芝，这年头儿什么都能信，就别信文化人的白纸黑字儿，我可不希望咱们一村儿来的知青都是坏分子。”翠芝接过来那张关于我的流氓揭发信，她好奇地念道：“……我见到李爽在大家都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在三里河一路无轨电车站与长相流里流气（估计是坏分子）的男人说话……”翠枝吐了下舌头说：“连跟男的说话都成事儿啦！”她把信团巴团巴扔纸篓里了。

刚过十九岁的我，就疲惫地背着自卑的包袱落户到陌生的农村。带着对贫下中农的惧怕，揣着对农民道听途说来的成见。可眼下发生的一切，那么随意而不可预料，沉重而莫须有的坏名声可以瞬间烟消云散。我突然轻松下来，感到福气来了。命运将准许我透一口气了。想起姥姥在我插队前说的话：“出去闯闯没坏处，人挪活树挪死。”

我开始每天下大田。第一次接触大自然，非常兴奋。看着磅礴的云，天深处蔚蓝的无限，那种穹苍伟大使我感到安全。劳累、应酬等生存的烦躁也显得渺小了许多。我在家信中写道：“谁说插队是下地狱，大自然不会算计你，你哭它陪着你，你笑它陪着你，牲口也是看着就喜欢，是一个个活物儿，农民给一棍子它们也不反抗，好像它们有比人更宽广的心胸。爸妈，我很爱大自然，喜欢牲口，尤其是没人的时候，可以胡说八道，它们不会给你告密……”人言对牛弹琴，我倒觉得对牛马驴弹琴是件很舒心的事儿。

大自然激起了我画画的热情，一到田间打歇儿，我就掏出铅笔

头儿勾画天边儿，地平线，远山近坡。后来越画越上瘾，从此养成随时画油画棒的习惯，至今已快四十年了。三年插队期间我画了数百幅小画，身上揣着小本儿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先用颜色记录大关系，收工后一张张仔细重画，画到深夜陶醉在里面。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一个随欲而渲的世界。在这里只有一个国王，就是我，只有一个公民要领导，也是我。

农民纷纷来给我做模特儿，我床铺边上的墙上贴满了一张张农民的画像。每个头像画好几次，画得最好的那张送给人家，选第二好的贴在墙上。村儿里的姑娘一窝蜂拥进来，看着墙上的画儿叽叽喳喳地评论，大家争着为我当模特儿。我发现农民完全与城里人一样有爱美的愿望，看来只要有条件他们一定会很出色。

冬闲，我们到大田里挖渠，队长高震来那个精瘦的队干部，手里拿根竹竿儿，迈步丈量土地，分渠道，一米六宽，一米深，从上往下斜。冬天土已冻硬，给农民给亲朋好友，他缩小量步子，差出一脚就能差出一个小时的活儿，明明看出他步子里有花活儿，大家也不敢说什么。豁出去了，我挖呀挖，手起大泡，破了就用手绢包上，还挖得不好看，农民挖渠整齐见方。

有的知青干脆坐田边儿哭，说：“不是人干的活儿。”队长叫一声：“抽一袋。”知青们赶紧东倒西歪地躺下，农民冲我们知青这边喊：“瞧你们细皮嫩肉的这回让土坷垃给服软了吧。”冷风直往棉袄里钻，烟叶子味道直呛。远远的燕山山脉在冬日的太阳里沉默。我又掏出笔和小本儿，没办法，我抑制不住对美景的臣服，想画画的愿望比想休息的愿望更强烈。

整个春天加夏天，什么活儿我都干过，种棉花、玉米、小麦、施肥、浇水、收割……我在学校吃不开，落户到村儿里农民喜欢我。

我玩儿命干活儿，有多少力就使出多少。用独轮儿小车往大田送粪，拚全力也推不到头儿，我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结果回回推到头儿，心里纳闷："见鬼！语录还真有点邪劲儿。"

农民的锹把儿长短锯得合适，还锋利，发给知青的都是大新锹，涂着红漆，方方的大铁片子。知青不会磨锹，也不知道新锹需要开刃儿。每天收工回来累成烂蒜，锹一扔，倒头就睡，没几天，锹锈了，更难使。

慢慢地，我发现干活的时候旁边老是同一个小伙子，他挖完了自己的又一声不响地挖那段儿与我接壤的渠。当着我的面使劲磨锹，我明白了，这是一种"邀请"，就向他妩媚地笑笑，他快活地拿过我那把大笨锹，"吭哧吭哧"一会儿就磨得飞快。后来这个小伙子慢慢升官儿了，经常暗里给我一些轻松点儿的活计。

麦子熟透的日子，全村人夜里起来趁凉快起早儿割麦子，到九点半收工，下午四点再去割直到天黑，晚饭后，上场脱粒。

第一次割麦子，难得不行。一人一垄割到头儿，到头儿再返回来打捆儿，一个农民旁边儿一个知青。天呀，怎么打捆儿？没干过！农民高兴了给你示范一下，甚至把着手教你，我旁边有个懒大婶，发牢骚，"这还用教吗？比生孩子都容易，看了就会！跟拉泡屎一样。"我只好跟猴儿一样看着她，比划着来吧。割麦子，不会用镰刀，往腿上手上割，麦子本来就刺人，能割到头儿的是"英雄"，但也跟"死英雄"差不多，倒地上恨不得吐血。有的知青连夜逃跑回北京，可是还得回来呀，不回来这辈子都别想回北京了。长痛不如短痛！

馋

我干活儿豁命，慢慢地农民就说我："李爽干活儿不惜力，不错。"

这是过累关，还有馋呢，人馋——不知元凶是嘴，还是肚子、或者是脑袋作祟？可以想象饥饿会使人干出什么事儿来。

农民教我抓田鸡，学会了。趁除草浇地的机会，带一根铁丝系腰带上，抓到了田鸡用小刀一划，剖开肚子，撕下皮后串在铁丝上，挂腰间。如此残忍却毫无意识。衣服挺长的，盖着腰上白花花的死田鸡，别的知青看不见，避免了他们因贪心来和我套近乎。回去用炉子烤着吃，嗯！太好吃了，高兴得不行。我抓青蛙的技术日渐纯熟，果然，有的知青就跟我套近乎，我巴不得呢，只要可以交朋友、何乐不为。我的屋子里只要有吃的马上就热闹起来，田鸡招来了一声声爽姐爽妹。当我一头扎进自己的艺术王国里没吃的了，便形单影只。

农民穷，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菜汤、粥、贴饼、烙饼、饺子、炖肉。挺清楚的。但农民大方，一旦他们发现你尊重他们，他们会把孩子和自己嘴里的留些给你。

一天收工，那个挖渠时帮我忙的小伙子他爹高爷叫我："走啊，今儿家里吃去。"我一进门儿，一家人招呼我："来啦！上炕，上炕。"我想："怎么一来先让人上炕呀？"不好意思地站着犹豫。"吃饺子！"女主人有恨不得把心都吐出来的表情。她两手轰鸡似地轰我上炕，小姑子跑过来往下扒我的鞋。饺子馅虽然只是白菜黄酱和少许腌肉的大油，看着炕桌上冒热气的大碗儿我已经香晕醉死。

我还没吃几个，自幼严格的教育讨厌地跑出来阻拦我的馋嘴，挑剔我的吃相儿。我客气起来，不敢撒开了吃，突然想起，来时应该把自己伙房里领的饭带来，作为交换。

高爷笑我，“瞧，这丫头真让文化给坑害苦了！”

女主人高氏已没有了门牙，说话漏风，道：“闺女，吃啊！下午没人让你写字，还要下地呐，吃那么几个能顶个屁事儿。”

“嫌不好吃？”帮我挖渠的高秃子问。

“好吃死了！”

那一家人笑了。

“哎，这就对了，吃吧，吃他一个肚儿歪。”

我撒开了吃，当我吃的走都走不动了的时候，欣慰的笑容挂在高爷刻满皱纹的黑脸上，使我想哭。

想　家

第一年插队是接受“再教育”之年，所有知青都挣七分，不管干活好坏。农村没有假日，按传统春节有十几天的年假。头一年我差不多是满工，年底分红八十七元。我的天呀！这么多钱，都是自己挣的。我把钱十块、五块、两块的按大小理好卷起来，用皮筋勒上，有种囤积带来的心理成就感。已经休眠的欲望种子开始萌芽。这一夜我睡不着觉，握着一叠印花纸在手上，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算来算去：拿这钱回家先请大家吃一顿老莫（莫斯科餐厅），破衣烂

衫的真寒酸，应该买块新布了，什么布？劳动布最结实，但没卡其布洋气，什么颜色？还缺条换洗的裤子呢。对，我真想画油画！还是买油画颜料吧！一管颜色三四毛钱，要攒齐了也得十几管；不行，我还缺一个体面点儿的书包呢，市面上好看背包不多，皮包显得多阔气呀，就是太贵！如果我能有辆自行车该多来劲呀！算了一下，买辆最好的凤凰牌儿一百二，我还差几十块钱呢。自己干了一年不吃不喝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哎！夜梦中顾影自怜。

已经快春节了，农民家家户户忙着张罗置备过年的东西。发豆芽、买豆制品、蒸糖馒头、烙饼、腌肉腌鸡蛋。磨黄米……

本来，我想趁放假的空闲到队部去找个模特儿画画，会计翠芝见我进来，说：“你怎么还没回家？男知青一拿到钱就屁颠儿屁颠儿跑公社喝酒去了，前天宿舍里已没人影儿了！”

“哪去了？”

“哪去了，奔家儿去了呗！”

“我想趁放假画点儿画儿，翠芝你能给我坐会儿吗？”

“你到底还是改不了文化人的臭德行，小时候你妈错拿墨水儿给你当奶喝的，有病呀，画儿能当饭吃么！”

“画画的，不是文化人。”

“不是文化人是什么？”

“是手艺人！会计才是文化人呢。”翠芝诧异地“嗷”了一下说：“今儿我可没空儿，我娘要我磨黄米去。你和我一块儿去吧，给你妈也磨上几斤做年糕吃，让你妈尝尝咱们这儿新粮的味道！再说大春节的不看你妈，你画什么画儿呀。”她口气火辣却笑得甜。

我拎着翠枝送给我的黄米面儿和大枣儿回了宿舍。知青院儿早就空空的，哪来的哭声？“有人吗？”我问。哭声停了，半天没声

儿，我开门回屋子准备画画。“吱”的一声门开了，一个住前院儿，叫倪倩的女知青进来了，平时她很傲慢，我们见过几面，她有点爱搭不理的。据高爷说倪倩她爸在解放军里当大官儿，长征时是朱德的警卫员。

“李爽，你怎么还没回去？”

“你不是也没走呢，倪倩。”

“我爸不在了我回去干吗？”突然她抽抽搭搭起来。

“你爸死了？”我问。

“你爸才死了呢！”我的话使她破口大骂。我愣了一下，对付这种泼妇我没什么武器，但还是使劲努出了一句：“没死你跟哭丧似的！”

“哇！”她哭起来，整个一个宠坏了的革命泼妇。

我过去把门儿打开，说：“你出去，倪倩我有事儿！”

“求你别赶我走。”

忽冷忽热，倪倩任性的作风，使我可怜不是不可怜也不是，扔她在那儿，自己画起画儿来。天暗了，她把灯开开，说：“让我看看好吗？”

我不理她，自顾自地收拾东西。这时，强烈思念家人的情绪像火苗子燎心，大概想甩掉倪倩，我说：“我要回家了。”

傲慢的倪倩汪汪着大眼睛，好像面对男人，低声下气地说：“我爸被下放‘五七干校’了。”我纳闷人因为老爹下放，下贱自己干吗！

“那你北京还有人吗？”

“我哥。”

“找你哥去！”

“我俩不是一个妈生的。”

“那也是你哥呀，我巴不得有个哥哥呢。”

“求你带我一起回去！”

“那走吧。”我就是这么没出息——心软！

我们拿上东西，幸而今夜有月亮，出村儿的路上，等了半天都没有一辆车。“李爽我快站成冰棍了，回去吧？”倪倩要求着。这时，开来了一辆大解放停在几十米远，有个男的朝我们招招手，我说：“快点儿倪倩，我们交好运了！”

“师傅去北京吗？”我问，车里边有俩男人。我心头犹豫了一下。

“去去，拉你们一段儿。”

“谢谢师傅！”我俩爬了上去，挤着坐下。天冷，司机打不着火儿，车摇了好几下才开。寒冷使我几乎感觉不到手脚。我不停地活动，倪倩有军用的皮手套、皮鞋。我隐约觉得车在拐来拐去的，而印象中去北京的路是大直趟，人烟也开始稀少，我预感不好，使劲推了推迷迷糊糊的倪倩：“我怕咱俩有点麻烦事。”虽然天黑看不清，但倪倩经常回家，认路，她也感到不太对劲儿。我起来用力敲大解放车头的后窗户，喊：“停下！停下！”司机的脸在黑暗中，我们已感到他们的笑很诡异，我和倪倩不顾一切地用脚猛踹后车窗，“停车！”倪倩抬起军用大皮鞋一脚踹破了玻璃，“你妈X知道我爹谁吗？我爹一个签字就能毙了你们，停车！”车更快了，朝着北京相反的方向风驰电掣，看来这辆卡车下决心要拐走我俩。倪倩大声贴着我的耳朵叫：“咱们非跳车不可了！”我不同意，冲她叫道：“腿断了，让他们逮回来更跑不了了！”前边突然有光，“有路灯啦！”的确，只有大村庄才能安装路灯。

我盼着街上有人，果然车开始减速，有好多放炮的人。我们俩

扯开嗓子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卡车猛地刹住，我俩趁机跳下来，倪倩冲向放炮竹的人边跑边喊："师傅，大爷！快拦住这辆流氓车！"大卡车夺路疯狂逃跑。"哎呀啊，黄米，大枣！"我们发现书包忘车上了，我赶紧摸兜儿，一卷钱好好儿的还在，庆幸地想："幸亏我没把钱放书包里。一年的血汗钱。"

放炮的人不是农民，而是驻扎村外的军营大兵，他们证实确有山西拉煤的矿工到外省拐走妇女的事儿，但还没听说过有敢拐骗知青的。"你们俩太冒失了！也太有运气了。"大兵让本村往北京拉白菜的大车捎带我们俩回北京。坐上了马车，车夫准许我们躺在盖白菜的破被套里。

嘿，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家。小时候父亲常常教我认星星，看着冬夜的星空如漆黑绒布上挂的小灯，高悬的北斗，美得能使人以为在广漠中并忘记寒冷，忘记这是中国，忘记还有个世界，忘记被时间掌控。闪烁在前方的太白星悄悄用尾巴指着北，"我们在往北京走吗？"倪倩问我，"嗯，放心吧。"我从来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还做了梦呢，就是没记住内容。

到北京正好已经早上，倪倩说："看你满脸黑。"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笑死了。

"山西的煤车，咱俩死里逃生，哈哈。"路边的人，目光厌恶地打量着浑身黑煤的女人，两个冻僵了还傻笑的女人。

到家见到父母，心里又打仗，又想报答父母，又想买这买那。我揉搓着兜儿里的钱都快烂了，用手捻着一卷钱，留下几张，剩下的全拿出来放父亲桌上了。"爸，我一年的工钱。"

我父亲拿起桌儿上的钱，数了数拿了二十，"谢谢，这是你的劳动果实，自己留着，要学会节省也要学会把钱花在重要的地方。"

父亲平反了。母亲讲，在平反仪式上，那几个老牌右派站在毛主席像前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讲述的口气透出一个受了一生连累，对名利近乎恐惧的妻子的心情，这是唯一一次用嘲笑的口吻说她的丈夫。"'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在大礼堂的台上你爸这么说的，他还说，'党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要重新做人。'"听完，我感到酸涩莫名。

我父亲本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用一腔青春的热血，希望成就自己祖国的同时也成就自己，却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沉重扭曲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的。二十年泰山一样的帽子，被摘掉的那天使他老泪纵横如开闸，在毛主席像前他百感交集，为自己哭也为祖国哭。

在男女界限外偷情

春节期间，我到王府井美术用品商店里东看西瞧，每样东西都想买。墙上有一些风景画，签名是庞均，于是庞均在我心中成了大师。

我买了不少颜料，决心与庞均比个高低。

我一直害怕落伍，被弃，成为离群的孤雁，然而，我并不认识自己。今天我才瞥见自己的冰山一角，我是一只喜欢冒险飞在前头的头雁。头雁会落伍吗？不，头雁的前方永远是惊喜。

我像勤劳的蜜蜂飞到北京的公园，找个旮旯儿画得天昏地暗，冻死都不怕。

春节已过，我迟迟不想回高丽营村。

一天，我去紫竹院写生。忽然见湖边有两个学生也在写生，后面围着人。我伸头看见其中一个高瘦的男生很冷静，画技非常纯熟，就边看边想：“他画时，对风景多有情感，比庞均的画秀丽而且活泼。我也要画这样的画。”等他们关上画箱，我就凑过去说话。那年代男女界限很清楚，“正派”的男人上街目不斜视，撞到女人恨不得把眼睛摘下来藏兜里。“正派”的女人上街衣裳宽大遮掩曲线，撞到男人恨不得闭上眼撒丫子跑，掉沟里都不肯出来。可以想象那个封杀性别的世界里，主动与男人搭讪的女人准是“女圈子”（流氓）。

果然，两个大男孩见有女的追着说话，恨不得把眼睛摘下来藏兜里，目光躲躲闪闪。

我为了学画、找画画的朋友饥不择食，大男孩们想冒险，又害怕被有“革命觉悟”的人盯梢，想和我聊又要假装不认识我，回答问题时脸冲左。我绕道过去希望在左边能与他们面对面地谈话，他们赶紧把脸扭到右边，我们在马路上“Z”字形行走。两男一女高难度的沟通方式，造成了交通不便，后边骑车的人“铃铃、铃铃”不停地抗议。我继续左右围追堵截，直到把他们挤到墙根儿上。我才看清楚其中一个男孩，是多么清秀和标致，他个子高高的，白皙的皮肤不知是被冻的还是羞的反正通红。我吃惊——世上真有男人秀丽得如同美女。他的气质，使我明白为什么他笔触那么优雅。

但是懂美的人很多很多，真正能分享给世界大美的人很少很少，因为亮出你的全部是需要勇气的，而这个世界缺乏的正是勇气，人其实不敢自由。

这位男生叫章宜，快毕业了，小我两岁。他的父亲是中国画院的著名画家。我们约好一起画画，我成了章宜的学生，同时我也热

烈追求他，但我没有成功。

在西城区一带，我执著大胆，独往独来，成天泡在公园写生。我也胆小，只因热爱。

我又认识了一个外号“狼烟儿”的老三届，他在甘家口一带颇有“大流氓”的小名气。

狼烟儿，个头一米八五，两条长长的腿，仿佛没有屁股直接从后腰插出两根棍子，身上、脸上有疤，都是打架留下的光荣印迹。他的容貌吸引了我，那双大而细长的眼睛的确给人剑眉狼目的感觉，灼灼明眸显现着刚毅，后面隐藏着温柔。我当时想拿拿架子，给他一个正派女孩的印象，三回两回的约会，我就彻底被他俘虏了。

他是矛盾的，我们在一起时，他常常给我自由发挥的余地，仿佛他觉得我拥有他精神上所缺乏的资源——对我当“狗崽子”的经历很有兴趣，鼓励我滔滔不绝地侃，他一声不响地听。然而大男人的控制欲又使他心理上不准许女人有超过他的方面，与他相处我应该装作是一只在金笼子里的小麻雀，笼中有一个可以啾啾唱歌的小舞台。

甘家口一带的高干子弟中狼烟儿属出身低贱之流，却被当做有勇有谋的梁山好汉对待。因为在打架斗殴、溜门儿撬锁的事件中他从没被警察抓获过。一旦聚会，有狼烟儿在场，大家肯定会避免把自己老子的官衔搬出来垫背。

听说狼烟儿父亲年轻时家境贫穷，在国民党实行募兵制时为了讨生活进了国民党部队，吃苦耐劳当上连长。在一次女子慰问国军的节目上，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慰安女，开小差儿逃离国民党，没去台湾。娶了钟爱的女人后，便沦为北京的平民。他没能实现最初给那女人的许诺——嫁给我吧你会飞黄腾达，却生米已成熟饭，女

人的肚子已经大了。

如今，他大气儿不敢出，变成了老婆的出气筒。狼烟儿的母亲，一眼可以看出昔日的妩媚，对任何人她都和颜悦色，唯独老公的出现会使她立刻满脸阴云密布。

实际上夫妻俩都是善良人。这一家子都很爱独苗儿子狼烟儿，我也加入进去。

父亲的懦弱刺激出儿子的反叛，狼烟儿喜欢面对生死交关的险恶处境，这也许是他洗涤心理上对父辈的软弱感到耻辱的方式。

他母亲是回民，有回民证，每月可以买到牛肉。每个月的牛肉，他母亲都要付出好多爱心去烹调，然后切成两份，大份儿放在铁饭盒儿里留给儿子吃。小份儿的全家吃。他在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把肉揣口袋里，约会时给我带来，说："我都吃腻了！"我狼吞虎咽，吃完后纳闷肉食极其短缺的日子，居然有人能吃腻了五香牛肉。

爱谁就希望和谁常常在一起，并且准备接受对方所有的缺点。每天，我唯一的愿望是见到他的笑容。可是他差不多不在家，在的话，也聊上两句就找哥们儿去忙了，他竟然把我当作一朵家花拒绝我参与他的野外生活，美其名曰："外边太乱！你玩不转。"我这才知道什么是小巫见大巫。

章宜给我写了好儿封信，因为爱上狼烟儿，我缺乏爱情的心暂时被填满。章宜原来至高无上的形象渐渐枯萎，狼烟儿的形象在日益高大。是的，我不顾礼貌一封都不回，还暗暗喜欢这种小小的报复行为。

少年轻狂，吃着碗里的惦着锅外边儿的，到头来，嘴里的香尝不出味儿，锅里的涩吃不着不说还忘记品尝碗里的。

三角恋

我收到章宜要去当兵的信，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告诉我，他变了，成熟了许多，他选了一首唐诗作为告别信的结尾：

>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爽，在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去兰州的火车上。一到部队我就会把地址给你，希望在兰州部队可以见到你秀丽的钢笔字。"明显地，当他发现失去了什么的时刻，才忽然想要挽留。

一天，我从八一湖写生完骑车回来，一路欣赏着杨柳春风。突然，隔着青青柳条我听到一群男生在谈笑风生，狼烟儿的笑声尤其悦人。可我看见的一点都不悦人，他搂着一个女人的细腰，这还没完，那女人放肆地依偎着他，而且是紧紧地。一把烧着嫉火的箭已绷在弦上，我的心已像随时都有杀人嫌疑的疯子般危险。女人竟然不是什么陌路之人，她叫史金芳，是方圆数十里最著名的女流氓坏分子，大腕级的，被当地十几个中学联合批斗过。

我所有因被爱而感到提升了的自信，在顷刻间一败涂地。原来一个靠索取别人的爱来维持自尊的价值观是如此脆弱得不堪一击！

一气之下，我决定第二天回高丽营村儿。怎么那么巧，我在长途汽车站碰上了狼烟儿的对头，姓石，叫石翔方。

姓石的个子不高，瘦瘦的面相，方方的嘴棱角清晰，笔直的鼻子弯弯带沟，总穿一件军大衣，和一双擦得锃亮的三接头皮鞋。他从军垦团回来在家等分配，对我一直很好，老要求我叫他大哥，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玩闹”，我总是有点儿躲他，因为道听途说石翔方很“黑”。

我赶紧扭过头装没看见，他站在我后面，冲我的脖子吐烟，“别再装蒜啦！”

“我还要赶车呢！”他停在我面前猛地伸手到我的后脑勺板着我的头硬让我接近他的脸，我最厌恶男人强迫性的亲昵，马上用手推他的胸口，同时把脖子使劲往后梗，道：“石翔方你可保证过，只当大哥，看——那么多人等车！”他松开手，说：“邪了门儿了，你真那么怕老爷们儿吗？女的，全他妈特爱装处女。”看热闹的人，见我俩的腔调儿在步步升级，显得畏畏缩缩，不看心里痒痒，看多了又怕招来祸事儿。我说：“你使什么劲啊！有话好声儿说不行吗！”旁边的人害怕得闪出地方来，仿佛我们是恶贯满盈的土匪，路人的反应使我感到委屈，石翔方冲看热闹人愣头磕脑地叫：“你们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和我媳妇逗闷子，关你们啥事儿你大爷的！”“唰”地一下子人们把眼光挪开，头转向别处。车来了，一群人拥到窄窄的车门前，门还来不及打开就扒着车门，冲锋，抢座儿。石翔方前后堵住我，我没上去。他开心地笑道：“爽妹子，别老躲着你大哥，我还能吃了你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谁是你媳妇！”

“那不过是给咱俩开脱开脱，幽默点儿行不行，走，上我家喝一杯去。”

连拉带拽我随了他。

石翔方的父亲是个副部长级干部，已经被停职反省，住在百万庄申区高干区的一座两层小楼里。

我们谈了很久，我告诉他我在画画儿，自我感觉还好，我强烈抨击社会，他却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眯着本来已经很细小的眼睛在我脸上打转，那么专注使我不安。但我能感到他不会成为我的反对派，觉得我说得对，就越发胆大，说我仇恨这个制度，我什么都不相信了。

石翔方自己有个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他开始在屋里来回溜达，一趟又一趟，让人心慌。地板上有一条因绕开桌椅而自然形成的羊肠小道儿，羊肠小道已没有油漆、地板蜡，可以见到木头的肌肤。满地过滤嘴烟头儿，从羊肠小道左右分开。

“这么多烟，得花多少钱啊！怎么不叫阿姨扫扫？”我问。

“显阔气呗，人就这么档子事儿！”

我去开窗户，踩在过滤嘴烟头上如踩地毯，脚软，心里很恶心。

谁把这群老三届的人整治得像一群外星人？

相信未来

他的桌上有不少手抄诗，我拿起来见到一个题目为《相信未来》的诗，血热乎乎地往嗓子眼儿上冒，问：“你认识郭路生？”

“认识啊，他是我弟的同学，就住在百万庄。”

"能认识一下吗？"

"行啊！"

"呐——就谢谢石哥了！"

"你怎么谢？"

"说声谢谢，叫声哥还不够！你真坏。"

"行，行，哎，爽妹子你是爱上他啦？"

"够不上，很崇拜他的诗！"

"走，叫上郭路生咱们一起吃包子去。"

大堆的区里转来转去，一个门洞下，石翔方捡了几块小石头朝一扇窗户扔去，两三下后窗户开了："谁啊？"

"路生，今儿我请你吃包子，这是我干妹妹想认识认识你。"

"我已经吃过饭了。"

"那你丫也快点下来！"

郭路生魁梧的身材在昏暗的路灯下像一堵小墙，借着微光我看见他五官端正的面容非常和气。他目光遥远，在我与他讲话的那一刻，才好像顺人间的声音从天上落下来，只是为了寒暄回答。我们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他又飘上夜空。

我们谈诗、谈画、谈歌曲，他虽然笑着，眼神还是游荡在两个世界间，直到家里有人喊他。

"好，李爽下次来家坐坐，方哥我回去了。"我拉一下他的手，软软的，一下子他像烟儿被吸进没有灯的门洞里。我们刚要走，上边窗户又开了："哎，李爽给你，接着！请多指教。"郭路生探身扔下一卷纸，我赶紧冲上去接住。

十点对北京来说已经很晚了，没地方去了，我绝不能回家，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还待在北京。

"我从来没有在外边过过夜。"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那今儿就在你大哥这儿刷一次夜！我保管你死不了！"

"你得保管不碰我？"

"向毛主席保证。"他站起来笔直，滑稽地把三接头皮鞋后跟对磕了一下，行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无论我对军人的成见有多大，我承认军礼是很漂亮的动作。

谈判好了，在他家住一夜，他保证不动我一根毫毛，只当大哥。我们又坐在马路边儿上。我问："你在哪儿插队？"

"黑龙江。"

"插队以前呢？"

"当兵。"

"你插队的地儿好吗？"

"好——"他胡应着。

"你那儿远吗？"

"远——离北京一礼拜的火车，汽车到了再腿儿走，远没影儿了！"

他有上句没下句的，我想听听他的故事，但是好像把一个从鬼门关出来的人再推回去一样难。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去后，他上楼，居然拿来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和桶，他把烟头扫成堆，一簸箕又一簸箕倒桶里，他家保姆"掐掐姨"高兴地叫了起来："太阳从喜（西）边出来了！方儿把烟头起（请）出'渣滓洞'了！"石翔方疾步出去在楼道"嘘——"她。从小把他带大的"掐掐姨"是个朴实的女人，探进头儿，抱来褥子帮我在屋儿里弄了个

地铺，她像石翔方的第二个妈一笑出去了。

我和衣躺下，他问："你不脱衣服？"

"不脱。"我特累倒头就着了。

半夜有人推我，我问："干吗？几点了？"

"还早。"他就跪在我的铺前。

"我睡不着老想你，枪老顶着扳机。"等我清醒些，看见他那个"东西"挺立着横在我鼻头前，他冲动的样子很魔怔，和我见过的小男孩开裆裤里那可爱乖乖的小鸟儿相比，他那"东西"的比例真够吓人的，我恶心又生气，想："男人的诺言简直就是狗屁的失言。"我挣脱他的手，冲动使他发抖，压低声音地祈求道："不当大哥了，我喜欢你。"他把那"东西"生猛地推到我面颊上，烫烫的感觉和一股腥臭味儿，我急了，大声说："混蛋！哪儿有让人用嘴的，太糟践人啦！"我骂他，倒糟糕了！反而激发了男人原始的荷尔蒙。我俩博斗起来。"叮叮当当"折腾到有人从楼上下来，"咚、咚、咚"打门，老女人的声音："方儿，干什么呢？没事吧？"他松开钳制着我的手，应着外面："没事儿跳舞呢！"

"明儿白天再跳吧！怪闹哄的邻居该发现啦！"

我连呼哧带喘靠墙坐下，他也一屁股蹲下，慌忙找烟，摸火儿，点上，狠狠地抽，深深咽，长长吐，烟好像一个男人的救生圈。他盯着我，我瞪着他，我咬牙切齿，他假装心不在焉，皮笑肉不笑探过身递给我他的烟，我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一句话滑出脑海——烟是男人的小拐棍，不能满足大拐棍就用小拐棍来弥补大拐棍的孤独，但女人不是男人的烟灰缸。

我们的青春期对爱情的经验——没有公主、白马王子那番风花雪月，只是臭老九的女儿和牛棚里老革命的儿子们一起鬼混的事儿，

是我第一次像一个坏女人那样和一个坏男人在北京"刷夜"抽烟的事儿，是一些不是流氓的人被外界草草定性为流氓男女的事儿。

流氓——世上谁不是流氓呢。

只要有生活欲望的人，都是流氓，区别是明与暗，上流和下流之分。

我突然想对这个坏男人嘘寒问暖，蹦出这么句话来："你有心事？"

"心事谁没有，越想心越烂。"他懒懒地回答。烟雾弥漫他冷不丁儿问我："你想过杀人吗？"

"想过，没干过。你呢？"

"没想过，干过。"

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小我和我哥跟没爹妈的孤儿没什么两样，是"掐掐姨"给我们带大的，父母对干革命比教养自己孩子更有劲头。

"你爸干什么的？"

"副部长，别提我爸！"烟熏火燎中石翔方射出凶巴巴的一眼。我乖乖闭上嘴，看来里面一定有儿子叛逆父亲的辛酸。

好一会儿，他继续说："我家阿姨是我爸在陕西革命根据地时，救过他命的老乡家的女儿。我爸为了报答恩情，把老乡的女儿弄到城里工作。

她一直在我家当阿姨，她说，她的理想是，帮助我父母把我和翔华培养成国家栋梁！阿姨把大拇指指甲留得又硬又长，'掐掐姨'的教养方式是掐屁股。我妈回来见我们笔杆条直老那么乖，功课也全是五分儿，问我们，阿姨是怎么辅导的？我说，'掐掐姨'只认识一二三四五，一见作业本上出现二三四分，她就掐我们的屁股，一见

五分儿就给我们做肉菜吃。

我笑得前仰后合，他却因为回忆而满脸痛苦。

“一九七〇年底我爸受审查，我和我哥翔华，直接从部队撤到北大荒军垦。”他又停了，好像需要巨大的勇气才可以面对，“天寒地冻，肚子饿，手上拿着窝头，冻得跟石头似的咬一口能把牙崩下来。我哥太想家了，和几个哥们往回逃跑，被抓了回来，政委来了，把他们几个倒吊起来当着全体知青打，直打得晕菜，没声儿了为止。”石哥的烟抽得需要叫辆救火车来。“春节，我最他妈恨春节，春节的时候改善伙食有米饭炖肉，我的碗里全是肥的，我把我那份给了娟娟。”

“娟娟是谁？”

“建委的，她爸是局级干部。在离开男生宿舍的路上，娟娟被政委抓住了。”

“真倒霉，后来呢？”我跟着故事。

“叫她写揭发信，揭发我。她不写。”

“后来呢？”

“后来她老哭！”

“干吗哭？”

“政委强奸了娟娟。”

“娟娟是你的女朋友？”我问。

“我喜欢她。”

“哦。”

“政委老找她谈话，每回都强奸她。”

“现在娟娟在哪儿？”

“她怀孕以后自杀了。”

我恨自己为什么有一双耳朵，恨自己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何止一个。

石哥又说：“我有个要好的哥们杰贤，春节那天吃了太多米饭，第二天，怎么叫都不起来，米饭把他撑死了。军管队的王八蛋医务室，乱解剖尸体，从他胃里弄出一大脸盆米饭。”

石哥说：“我问过苍天，杰贤的灵魂今天在哪里？天说，可能还在他父母身边试着与他们告别，我问地，娟娟的灵魂今天在哪里？地说，也可能永远徘徊在外乡的冰天雪地上，而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石哥缓了缓又说：“有一天夜里我们好多知青一起，开了一个名叫智取威虎山的秘密会议。我们偷袭了军管队的宿舍，抹了两个军管干部的脖子，我用政委的刺刀割断了政委的喉管儿，还——”

“什么？”

“还切了这畜生的黑鸡巴！”翔方显得萎靡不振的脸，此刻放出光彩，瘦瘦的二郎腿“哒哒”地抖个不停，那双黑亮的三接头，也闪耀出冷冷的复仇之光，石哥已停不下来了，他要继续对我倾诉下去：“天蒙蒙亮时，我们站在长板凳上把三个死人吊起来。血从这畜生（政委）的脖子上哗哗往下流，看着他鼓突的金鱼眼，在场的知青全都眼红了，这畜生的眼珠子咕噜咕噜还能动呢，大家冲上去作践他，他的金鱼眼滚了几下就完蛋了！连女生都没怕！也没叫，她们都恨他。他利用领导找谈心的借口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女孩呢。”

“杀人以后怎么办？”

“我们集体大逃亡！我流浪到全国各地，要饭、打小工、偷东西、当倒爷，流浪了四年才回家。”

“你父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心事儿，拿起刚才郭路生的纸卷，“爽妹子，给大哥念念？”我虽然不自信，条件反射的想扭捏推辞，但一股爱护之情温泉般涌来，我接过稿纸大大方方念起来，声音也愈来愈放开：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我俩被郭路生的诗弄得甜酸苦辣百感交集，一首诗唤醒了梦中人，一首诗抬来了一面大镜子，使这帮恍惚失落的年轻人从混乱步伐中停下来，睁开眼睛寻找自己，这首诗在伤口上投下一抹疗愈的光，郭路生这首诗当时给我们带来了相信未来的勇气。

石哥面孔上苦硬的线条舒展了许多，我感觉坏男人并不坏，或说没有人只是为了坏而廉价地去坏！再有冰雪般命运的阳刚男人，也会被赏识的热情融化变得柔情。

我愈来愈悲悯的表情被他看出，他感激地在我脸上亲了好几下说：“你比娟娟胆子还大，你长得比娟娟还好看。”

我完全不爱听这句带比较性的话，不是妒忌，是深深感到如果我早生几年，完全可能与娟娟同命运。

他问：“爽妹子，你现在愿意和我那个了吗？”天啊！不知是我还是所有的女人都生来就会疼爱男人，甚至像疼爱小孩一样去疼爱这些大老爷们儿，而且愿意原谅他们。我放下了对他抵抗的僵硬身体，接近他，把他抱在怀里轻轻摇了摇，他立刻欢快而笨拙地抚摸我的全身。之后我们紧紧地拥挤在那张单人床上。

我仿佛对罪恶感说了声：请您出去凉快一会儿！还给我们那自发的、爱的本能吧。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在石哥家外面“叫差辈”（挑战），我俩从被窝儿里惊醒，都听出来叫板的人是狼烟儿，因为他有歌手般厚重、圆润的声音。石哥把手指放嘴上朝我长长地嘘了一下，他想听清楚外边在说些什么。“姓石的你他妈有本事把爽给我交出来！”黑暗中我脸红了，大有已婚女人当场被捉奸的心情。坏了，今儿要见血。

石哥血气方刚，“呼”地掀开被。轮到我用眼神阻止他不要出声。他问我：“你到底还跟不跟狼烟儿了？要跟他，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不跟了我就花了他！”

我想都不想地说：“你们俩要是叫份子（比高低）叉架（斗殴），我就谁都不跟了。”

石哥轻蔑的口气：“狼烟儿有什么份儿，爹妈都是市侩，他暗地里拿你当副食品，明着烂要史金芳。”石哥一提史金芳的名字，我那颗左掖右藏的嫉妒心跑出来了，我说：“史金芳一个身子给八个主儿使，挨耍的是狼烟儿。”我知道自己愤愤的面孔肯定特难看，但是这

口恶气逼得我非说不可！“再说了，没准儿，你也跟史金芳有一腿子呢！”这毫无根据的发泄，使我舒坦了不少。

“爽妹子，跟着我，明儿我就带你到有份的哥们那风光去。”他这话可伤了我的自尊，搅起我深藏不露的傲骨，我说：“你爸份儿大，跟你有啥关系，告诉你我用不着谁带！自己风光着呢！”

“我操，你丫整个一外星人卖的麻花儿，不吃不行，吃完了没货！”他“哼”了一下就没声儿了。

外面窗户下的狼烟儿，高大热血，屋里床上的翔方瘦小精明，对我来说只要他们不打架就好。

屋子静得能听到几只苍蝇在猛撞玻璃，好像敢死队，或者只是希望冲出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死也要死到清爽的蓝天下。窗外天空渐渐发白，看着天，翔方觉得自己和苍蝇一样需要冲出去深呼吸。

“看来男人不是无情的动物，狼烟儿和石哥对我都不是无所谓。”我胡思乱想着。“他俩是冤家，会不会石哥拿我当筹码来勾搭，目的是报复狼烟儿？”那种女性对被爱特有的需求困扰着我，用我负面的脑袋编造着负面的别人。最后一个独立自主的我跑出来想：“我用不着借男人的光，也不需要有个高干的爸爸，才能直起腰来。瞧，那些高干子弟全见着怂人压不住火，连自己的火都是借来的，真没出息，没劲！真他妈小儿科。”

我开始感到无聊。玩腻了的感觉，但我的精神并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依托。

迷　茫

在回村儿的长途汽车站上，石哥来送我，他的话本来就不多。见车人站，他抢过我的行李拦住盲目蜂拥的人群，等我上去以后递上，确认我坐在一个好位置上之后，才让出车门儿放别人上车。他在座位边的窗户上敲敲，把留恋的神情隐藏起来，装得漫不经心，“没事写信，没钱尽管要……”他从裤兜里抓出一把钱递上，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受不住诱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从中抽出几张，他一把把剩下的钱扔进车窗，车上有好多眼睛盯着地上的钱，无奈我尴尬地弯腰快快拾起落在地上的票子。车开了，我盯着还站在车屁股后面尘土里的石哥，想：“作男人真难，还累！当硬汉子就更是难上难。”我承认他是非常出色的男人，但不是我要的。爱时他的缺点都被你看成优点，不爱时他的优点都被你看成缺点。所以没有真理，只有你依仗自我经验而去看真理的角度。

回村到了宿舍，一头一脸的土，我的床上乱七八糟，堆着同屋知青红梅不常用的东西，她为了干净就把脸盆、鞋、小板凳这些放在我床上。我床头的木箱子上有一瓶炸酱，已经长满了白绿色的长毛儿，一个整窝头被耗子啃成一小疙瘩和一些沫沫儿。看看日历突然发觉，我春节走的，如今已开春儿。宿舍里我的床位没变化，只是结满蜘蛛网，落满尘土。邻居红梅扫地时仔细划清界限，我床边肮脏得不行，她的床边干干净净。

我把她的东西一股脑从罩单上撤下，红梅心疼得立马冲过来抢救。

我大扫除了一通，把被褥拿出去晒太阳。

当晚队长就差人传我到队长家开会，我到时屋里屋外已经挤满农民，满屋子乌烟瘴气，炕上糙老爷们、娘们毫不回避地咂吧嘴、放屁、吭吭咳嗽，啪啪地往地上吐浓痰。我心里揣着个小兔子，想：“这回准得挨批！”

“呦，李爽回来了？”炕上有人腾着地方。

“唉，大爷、大婶好。”我紧着点头儿问候。

“吃了吗？”

“吃了。”

“吃啥了。”

“菠菜汤。”

“怎么这么些日子不见回来？”

“我妈生病了，就在北京多住了些日子。”我扯了个大谎，心里小兔子倒不跳了。

“哎哟，不严重吧？好点儿了吗？”

“好了，好多了。”

“闺女，我们还以为你看不起我们，撇了俺！”高爷老伴儿半开玩笑说。

“大婶儿，哪儿啊，在城里时还怪想大家的！”

“这丫头嘴真甜。”

“还等着你给我画张像啦。”

“好，保证画，抽空我一定去，这回我还带油画箱了呢！”又有几个人跟我定了“合约”。队长从里边掀帘子进来：“开会了。”

我不请假就没影儿了的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农民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引起知青的妒忌，给公社管知青的副书记写揭发信。故此，知青办的人来了一趟，真是阴差阳错，他见我的

宿舍位置不错，朝南，记在心上。

繁忙的春耕开始了。虽然三年插队我一天好活儿没摊上——伙房、喂猪、磨房、看孩子、小学校、缝纫组、宣传队……可是在大田里只要有机会农民都会把轻省点的活儿让给我：种棉花派我泡棉花籽，不派我浇地。种玉米派我播种，不派我推粪。种菜派我选种子，不派我豁拢。种小米儿派我牵骡子，不派我扬粪。农民最恨被城里人歧视，一旦发现你对他们由衷的平等心，他们会把心掏出来放在与你平起平坐的天平上，热情地与你分享最普通的友情。尊重是一种进化了的美好情怀，装是装不像的。

公社副书记的女儿宝青，没过几天以知青身份搬进我的宿舍。这样她的农村户口可以转换成有待分配的知青户口，日后摇身一变，还能成为北京人。同屋女知青红梅被迫调到阴凉的北房去了，红梅撅着嘴收拾行李，甩着闲话，“也不知谁给使的坏，我倒成了那个倒霉蛋，给踢走了。真他妈邪了门儿了！”

干伙房是好活儿，书记女儿进了知青伙房。

宝青很有优越感，平时都拿眼角儿看我，脑瓜子仰着，后脑勺儿和脸一样平，鸳鸯一样的黑眼睛，矮个子，罗圈儿腿特有劲儿，动作麻利脚下生风。她长了一对很惹眼的丰乳，二十四岁已低垂得像喂过三个孩子的妈，大概从发育起就不带胸罩的缘故。她实在其貌不扬，我心想，噢，世界上还有比我难看的！她的长相给我的虚荣心带来了安慰。

我跟这个姑娘像陌生人一样住在一个屋儿里好几个月。她平时不跟知青说话，每个礼拜六都去公社她爸那儿。

有一次她晚上洗脚，懒得动，叫我把鞋给她递过去。我这个人要不就忍着，要不就过分，一脚就把她的鞋踢了过去。没想，她翻

了下白眼儿，低声道:“不递就不递呗，踢什么呀？”我心虚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催辈儿！”她闭嘴没话说。

我特高兴，第一次说“不”居然胜利了。

后来，宝青每个礼拜六回来样子都恍恍惚惚的。少有的一次，她想跟我聊天儿，探讨一些男女的事，我谎称：“不大懂，问结过婚的人去！”我在撒谎。

所有男女的事我们都把它混淆在不清白的范围里。别人一问这种事儿我马上装天真，打扮得像个有纯净处女之身的教徒。压抑青春生理欲望的困扰不说，还自愿扭曲它。我没法和她聊进去，但预感到宝青处在她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一定发生了什么。宝青铁青着小方脸，我偷看过去，她迷茫的眼神下，鼻子在“吸溜吸溜”发出一些声音，有点包牙的侧脸明显鼓起。我也被焦虑感染，想她一定需要帮助，但瞎猫能救死耗子吗？我因早已不是处女了的罪恶感作祟，即便我不是出于自私，我还是愿意给自己戴上正经女孩的帽子。无疑当我处于对自己都无法仁慈地施予解放的位置上时，当然就无法仁慈地援助别人。

我收到了章宜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通信，在字里行间我们都流露出羁绊之愁、怀念北京之愁，两个艺术情种的信忧郁而凄美。就此我们开始了延庆——兰州之间信的长征。篇篇废话，封封缠绵，山啊、水啊、歌啊、河啊、花啊。每封信中都夹一幅小小的风景画。我们相互嘲笑“少年无病呻吟”。但那呻吟并非无病无灾，我们只是用浪漫的方式，抱怨世界的扭曲。压抑着蠢蠢欲动的青春欲望，我们只能时刻审判自我——我是不是又在渴望低级趣味的错事儿。罪恶感——永远像长了天使面容的恶魔朝本然的欲望敲起警钟。所以人人需要研究如何把正人君子的画皮装饰得更高明。于是苟且偷安的文化，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章宜时常浮动的情绪，让我觉得好玩。过了很长一段儿时间，他突然又来封信说，“永别了，我再也不想你了，你给我带来的只有厚厚的像乌云般的思念，没有爱的倾盆大雨。我们部队里有好多比你漂亮比你更有才的姑娘……”紧跟着我又收到一封是他的笔迹，又不像他语气的信，他请我以后不要再往这个地址寄信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后来轮到我开始相思，我隐约为他感到担忧，果然这封信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五月底六月初开始浇地，大渠的水是由河上游开闸放出来，接力赛跑式的一村接一村的决开渠口，轮流灌溉各村的小麦田。

夜里从我的窗户上传来“当当当”敲打声，宝青喊：“干吗的，催死的！”

“水提前来了，快点出工了。”

我问：“哪儿啊？”

“长杆儿地！”外边是共青团书记栓子。

“宝青你也得顺便去准备菜汤了，七点拉地里去，今儿一天都没空打歇！”

“嗯。”

“李爽别弄错了是长杆儿地！别忘带锹！”

“听见啦。”

“一九二九伸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老远听见妇女们在唱，其中高爷的弟媳妇凤小纂的嗓音儿最美，

谁听了谁认识，一副唱河南曲牌大调儿的嗓子，凤小纂半老徐娘了，可仍然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儿，甚至比年轻姑娘还有魅力，那是一种内在的慷慨与乐观。据说自从她嫁到高丽营村来，教所有要出嫁的姑娘唱歌谣，是队里难得的女活宝。

长杆儿地紧靠着河边儿，深陷的河床满满的水，带着两岸的干草叶及杂物滚滚冲向下游。大渠上早已人声水声沸腾，天还没亮，儿只火把呼呼悠悠，油灯照着队长高凤全和男人们。五月底的夜还很凉，壮劳力们已大膀子光光，汗流浃背玩命开渠。铁锹翻飞脏话伴舞，却使人振奋地联想到火线上拼搏的勇士。

“快点！留住我们的水，就留住了我们的口粮！”

“四村儿管闸的不是好玩意儿，大半夜放汤儿放了快两小时，才打电话通知我们！”

“他大爷的，真不是鸡巴操的！”

“是他娘屁眼子里崩出来的屎渣儿！”队长很少发这么大的脾气，原来那个管闸门的人，是一村儿下游高丽营四村的人。规定管闸门的人应该在放水之前数小时通知各村，可是四村的人夜里忽然放水，还晚两小时通知一村儿的人，这样四村儿就可以白白偷走水，给一村儿的水源，少说有上千立方呢。

善恶同堂

我和凤小纂几个妇女负责往分渠里背氨水（化肥）。梁韵轩老

大爷是队上赶车的，他一趟趟拉着氨水桶尽可能停在沟沟沿沿上，离分渠最近的地方，妇女再把化肥背到渠边儿一点点放进水中，流到田里。

我们忙得一溜小跑，梁大爷却哼哼叽叽唱起来，我问："您唱什么呢？"

"你北京来的不知道《绿牡丹》？"

"《绿牡丹》是什么？"

"京东大鼓。"

我问："听你满嘴之乎者也的连名字都文绉绉的。你跟谁学的？"

"这话就长喽。"他抽起烟来，怀念的目光追逐着烟云飘渺而去。

"哎，氨水儿呢！"守渠的不耐烦了。梁大爷催我："快着，进水了。"我赶紧背起氨水跑过去。"这片地形拐弯抹角的且得浇一会儿呢。"

突然有人群骚动，看渠的和梁大爷都一起向水边跑去，梁韵轩大爷叫道："先捉娃娃！先捉娃娃！母的自己就回来了。"原来田鼠的家园被大水淹没，一群田鼠大逃亡，结果全部被捉获。

我看着农民残忍地对待田鼠，陷人一种伤感，我想起了大咪。

"李爽我们捡些柴火去。"

我麻木地跟着，拣了一根干棒结停下来，几个男人把半死不活的田鼠连大带小用泥裹起来。田埂上点起篝火，熊熊的火苗上有大有小裹着田鼠的泥蛋"吱吱"作响。队长派了个十来岁的"飞毛腿"跑到七姑爷家要盐和花椒。

高兴的农民你争我抢吃得香极了。"李爽你不来一口？没有鸽子肉味儿细，但比猪肉好吃多了！"

"来啊！尝口，吃不死人！"凤小纂好心劝我吃。

梁大爷幽默了一句说："资产阶级大小姐宁愿馋死，也不肯放下

架子，这儿没筷子拿手吃呗！"

搭腔儿的："她还以为乡巴佬在吃死耗子呢！"大伙哄堂大笑。我知道他们对我完全没有恶意，离开了火光，坐在黑处，传来一阵阵烤肉味儿，奇怪我总是馋肉，这回却一点儿闻不到香。那边大家不到半小时，就把逃难的田鼠家族全部装进了肚子。连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堆一堆准备带回去给狗吃。然后他们幸福地东倒西歪着抽烟。

刚才那群东藏西躲的鼠家族，又出现在我眼前，母鼠听到幼鼠的尖叫后，冲到人的面前，用乌黑豆亮的小圆眼睛望着人，仿佛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幼鼠的替身，"吃掉我！放开我的孩子。"也许我的想象力太丰富，我认为我可以读懂它们的心。人类有时让我害怕。

梁大爷招招手儿，我们几个人过去躺在大车下。老头儿讲起他祖辈上的故事来："我的曾祖父是河北那边的大盐商，据说，"他压低声音，"田产比俩高丽营儿加起来的地都多，钱多了，家里知书达理的人就多起来。可是我家却让我爹抽鸦片抽成穷光蛋了。我只好从私塾出来回家干活。唉！这叫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四九年我几个叔伯死的死，关的关，押的押，就我家存活的好。但好也没长久，六〇年灾害，我娘先饿死了，我媳妇呢，自从吃了儿子六毛儿，就疯癫了，她见路就走到黑。我没啥可惦记的人了，也跟上她走了。后来我媳妇半夜躺下就没起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这儿来的。"

听完他的故事，我问："大爷您多大岁数了？"

"瞧你闺女家的，没这么问爷们的，四十五啦！"我的天，他哪里像四十多的人，明明有一张六十岁的脸。

“姑娘，你不是也经历过吗？”

“是是，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吃儿滴鱼肝油。”

“鱼肝油、我小时候吃过炸鱼，鱼肝油是啥玩意儿？”梁大爷问。

“有鱼味儿的浓油。”我答。

“北京不是打麻雀吗？”

“全北京人都拿着锅碗瓢盆站街上、房顶上、树上狂敲，直到麻雀飞不动时自己累得掉下来，小孩都可以伸手活抓。我姥姥家院里就捡了一脸盆麻雀。很可怕，天上下麻雀雨……”说完，我打了个冷战，直起鸡皮疙瘩。

小路上，宝青推着饭车来了，大家都站起来，“哦，热汤来了！”早晨的阳光洒在宝青的头上背上，她显得臃肿，惆怅，眼神木然。面对张张欢迎首长似的笑脸，宝青不笑。我和大家一样只顾嘴，一个劲儿往嘴里扒拉汤里的南瓜和面疙瘩，好像害怕到了碗里的食儿能再飞走。眼看男劳力吃烫呼呼的汤比喝凉水还快，转眼两碗下肚儿，我只能眼馋。大家又相互嘲笑吃得最多的主儿，道：“公家的疙瘩汤比自己花钱来得香。”

宝青阴沉着脸收拾起碗筷，队长叫了声：“今儿谁吃得最多，我就把重活给谁！嘿嘿，干活了！”

凤小纂抹抹嘴，借弯腰起身的工夫在我耳边小声说：“没见小青一脸让人给糟蹋了的相儿？你和她同屋儿没发现她不展劲（不舒适），干闷气啥的？”

“没有。”

当天晚上，宝青睡得特早。我拿出画画的东西想画一幅有月亮的夜景，门开了，吓我一跳，一个个头不高，戴顶蓝帽子，身穿蓝制服的四十左右男人，大摇大摆地进来了，长得和宝青就像一个模

子刻出来的。我明白了，赶紧说：“哟，书记来了！”

“嗯，没事，我来看看宝青，你就是北京的李爽吧？”

“听说你表现不错嘛！干起活来顶俩小伙子！”他开的玩笑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笑得还算坦然吧。

“书记，您太过奖啦！”

“爸，你咋这晚还来？”宝青不满又撒娇。

书记坐女儿床头儿，他们俩叽叽咕咕了一会儿，我画我的夜景。突然我有一种在打搅他们的焦虑感，站起来假装上厕所去了。我在宿舍外面站了会儿，想：“这要等多久？还是去高爷家跟他们聊聊天吧，等宝青父女他们……”我惊慌失措赶紧关掉脑袋里的思想，恨自己这种无根据的多疑！我生自己的气了。

我边走边用脚踢石头、树枝，希望声音可以阻止自己的胡思乱想。

到高爷家，两扇木头门没有锁，夜里别上个闩子，要想进去，有一个秘密的洞，在大门的左上方，伸手进去从里面一拉门闩门就开了。可屋里鼾声此起彼伏，他们早已日入而息。我退出来漫步到河边。一个人看着星星，浮想联翩，把颗颗星星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想家、想姥姥、想父母、想姊妹、想朋友、想情人、想前途、想过去、想倒霉的事、想快乐的事，缓缓荡漾的水牵动着我的心去想天、想地、想北京、想世界……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英明决策，可是泥土用不着想就已经湿透了屁股。

我终于决定回去，一进屋子见宝青还在床上坐着，只穿一件乡下人的小肚兜。书记笑眯眯地说：“回来了？大姑娘半夜出门儿可小心点。”那玩笑开得绝对虚伪。我傻瓜一样无言以对。“李爽我给你个好活儿干！”

“什么活儿？”

"你们一队的菜园子缺根胶皮管子，公社没货了，你能不能到北京帮忙采购？"

"书记，我没干过，胶皮管子的家门儿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

"这事儿还用学？明儿我跟你们队长说一声，他把地址给你就齐活儿。"

"谢谢，我可以回家看看吗？""到北京了不让你看爹妈，我这当书记的多不人道啊。爱待就多待几天吧。"

果然第二天中饭以后，队长递给我一封介绍信，我飞跑回宿舍，和上次春节一样匆匆忙忙小收拾了一下，玩命去赶最后那趟去北京的长途汽车。

坐在车上，揣着一封介绍信："高丽营一村需要一百米胶皮管子特派李爽同志前来联系采购事项。"这次出差对我是天上掉馅饼，对书记大概是腾个空间吧。对宝青又将是什么呢？

高高兴兴地我想打个盹儿，可一闭眼就出现宝青几乎半裸着的下垂乳房，红晕弥漫在她脸上，书记的大架子早已倒塌在亲女儿的床前，他在痴迷和慈祥之间没有了界限。女儿红晕的面颊因为我在场而不由自主触电般地哆嗦，父亲眼神的波动，奇怪！为什么我无法用革命的清规戒律和道德去唾弃、讨厌他们。我感觉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那是什么，对人性的理解或者可以称作慈悲？搜遍了自己可怜的词汇仓库，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宝青和父亲一定有沉重的道德负担，可怜的宝青也可能根本无法拒绝什么，那是人在少年时期对父权的绝对屈服？那是对凌驾一切的安全源头强烈的心理需求？或许是爱情中最复杂、最隐秘的成分？无法摆脱的罪恶感和同情感交织地啃啮着我。

我多么渴望有个绝对善恶的准线啊，但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善

恶在心扉深处文争武斗，无可救药地相互夺权——人类真可怜，人真累。一直到车进了东直门，市区的喧闹抓住了我的视线，心才回到了我的北京。

梦青春

汽车停在展览路站，我没有下车回家，多坐了几站。在甘家口下来，跑上狼烟儿家的灰楼，走廊里很黑，他见到我时有些吃惊，我见到他时更是吃惊，因为他的傲气已无影无踪，他转过身往里屋走，他的家人过来一一寒暄。

我的出现仿佛对狼烟儿是一种支持，才不到俩月这儿发生过什么？我一遇大事就充当母亲，一遇小事就充当害怕小耗子的妹妹。我还没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对他充满爱怜，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狼烟儿，英俊的左面颊上有一条和中指一样长的紫红色大疤，沿疤两侧密密麻麻的红点还微微肿着，他说："刚拆线没几天。"

"谁干的？"我气愤地问。

"我们报警了，还没抓着呢！"他姐姐回答，

他母亲跟过来，抢到话茬急于表达："出事儿那天，都快十一点了，外边有人叫。我跟他说，别出去！别出去！非不听，这回老实了吧，唉！"狼烟儿冲他妈叫："出去！你又来了。""砰"地关上门，"嚓"地锁上门闩。

我恨不得替狼烟儿受痛，可脑子里白纸一张没有安慰的词儿，

只好默默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看着看着我们就变得脉脉含情。过去的愉快经历重又唤起，记忆悱恻缠绵。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大腿上，我伸出指头轻轻触摸他的伤疤，“疼么？”

他幽默地说：“这儿不疼，那儿不行了。”

“哪儿？”我装起傻来。

“这儿！”他用手作向导。

“哟！真大！你还真行？”我不好意思地缩回手。

“爽啊，别小看人，我脸被砍了那儿可不是太监。”他很在乎地用力拉着我的手往“那儿”引。眼睛里透出光，好像在说：“难道你看不见，我爱慕你而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硬汉子吗！”我按照他希望的做了。

他眼睛微闭忘掉了伤痛，寻找我的扣子，紧拥着我，忘形地用他和我曾经最开心的方式，又来了一次。

“好久都没这么撒过欢了！”瘫软后的他感叹回味，似乎要永远抓住和保留那个硬汉子的状态，可惜世事无常，硬男人更无常。

狼烟儿很少提他在外面干些什么，也许那是男人为了沾更多的腥儿，刻意为自己保留的秘密花园。也许是怕我轻视他的所为，因为他知道我看不起小偷儿流氓。也许根本就没拿我当真事儿，或拿我太当回事儿。

他出去，从厨房带回两杯热麦乳精，依偎着我谈起他脸上的疤：“出事儿那天半夜十一点了，一个小子在楼下叫，说要‘花’（刀伤）了我！我正坐阳台上抽烟，问你丫算老几跟我这儿叫板？那小子说你丫该挨花的事太多了，今儿非瓶了你不行，有种儿的！我保证你今儿不敢下来见我！我那天他妈也是喝多了点儿，真傻逼，他这一挤兑我，我挂不住就冲下楼。黑咕隆咚刚拐过楼角儿就挨了埋伏，

当面一击，我只觉好像挨了一棒子，藏在拐角的人撒腿就跑。黑灯瞎火里我也觉得那小子眼熟。”突然石哥的名字蹦出我的脑海，我几乎肯定是石翔方干的。但如今已经伤了一个，我不想再伤另一个，让石哥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所以我没跟狼烟儿提石翔方。狼烟儿继续，“我没追几步，觉得脖子和肩膀上特热，一摸黏的，是血，再往上摸到脸上时，我的手指头捅到牙床子里了，我才发现不对劲儿，这手怎么能从脸蛋摸着牙。半拉脸都豁开了，缝了二十多针，我都不想活了。”

狼烟儿一定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曾经幻想过自己为了挽救人类，是一位战场上的勇士——他被簇拥到凯旋圣地，众人为他庆功喝酒，所有美丽的女人都争先恐后要做他的情人，为他的一切洒泪和微笑。

我也曾经梦想，在世界还是一块古老的大陆时，我已经比任何女人都高贵艳丽了，所有男人都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哈哈，看来我那小女孩的梦，又能比小男孩的梦高明到哪儿去呢？

当人们什么都不需要了的时候，依然需要爱！那么就把过去和未来删掉吧，再删掉时间，这样世界就剩下了一件东西——爱，一件东西人人平分秋色，没有竞争。

“哟，太晚了，无论如何我也该回家了。”

“明儿见？”狼烟儿头一次用期待的目光对我说话。

“尽量吧！”我声音里带点推辞。

回家的路上，我没有走大马路，为了抄近道从有许多工棚的小黑道上穿行。越走越黑，我也越走越快，因为越来越害怕。等我回头，果然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跟在后面，人影越来越近，见不妙，我撒腿就跑。这时一个人已经从背后猛扑上来扯住我的衣服，我猫

腰挣脱了又跑，之后发现他们没有再追，庆幸脱险，后边人说："你歇菜了，摸摸少了什么。"一摸口袋里瘪瘪的，原来就几秒钟的工夫，第一个扑过来的人已经把我的钱包儿顺走了。"钱包儿倒是无所谓。"可又一想，不行，里边儿有封介绍信，让我办事儿，我就得好好儿办，介绍信绝对不能丢。

扭头儿我又回去了。高个儿拿着钱包儿晃了两下，放回自己口袋里。两人上来就动手脱我的衣服。他们粗鲁的手劲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冒失，那可是俩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呀！"但介绍信绝对不能丢。"我下定决心不仅要弄回介绍信，还不能让流氓给弄了。决心像一道神奇的命令，在我接受了现实的那一刻，忽然召回了魂不守舍的聪敏——我摆出一副不正经女人的嘴脸，大大咧咧地扒拉开高个儿和矮个儿那四只手，冲矮个儿挤了挤眼儿，说："你们俩先别这么急赤白脸的隔着袄乱摸，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急什么！没见过女的还没自己过过瘾是怎么的？"

"我操，妹子您还挺狂，你挤兑谁呢！"

"真他妈现眼！挤兑你们俩呢呗！"我说话声音之大足以吓人一跳，随即我胆子也越发大了，接着说："知道我是谁吗？"

"谁？"俩小伙子让我浑头浑脑的气势唬住了，我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们回答："不知道。"

"真他妈老冒儿！我是谁你们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资格玩呀！"他俩互相看看，真以为我是玩儿闹世界的后起之秀。

"这么着吧，旁边儿就有工人民兵指挥部。咱们明天找个暖和的地界儿，好好玩。"

"行！行！"他俩使劲点头儿，

我还用神秘的眼神瞟着他们嘱咐道："哎，你们可不能让我失望。

一块儿玩就别到时你俩扯缠不清身子骨轴了吧唧的让我不舒坦啊。"

"行，行！我们练练。"

"嗯，这还像个爷们样儿！你们把钱包儿里的钱拿走吧。明儿要干得好，钱有的是！钱包你们看着好也拿去吧，真皮的呢。把里边儿那张纸还给我。"他们一一照办了。把钱包拿出来，钱夹走，借远处幽暗的路灯数了数，分了。最后剩两张毛票，矮个儿一把抢去五毛的那张，高个儿不愉快地揣起一毛的，又把介绍信拿出来递给我，看了看钱包儿，把钱放回包里一起拿走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接过介绍信，松了口气。

"明天咱们上我家吧，不仅有地儿、还暖和。"

他俩一起急切地问："几点？"

"还在这儿，下午三点不见不散！"

"哎！哎！不见不散。"

分头各走各的路了，刚拐过一个弯一阵恶心，刚才我演过的角色，连自己都不知哪来的本事。人仿佛什么角色都可以适应，只是教养把人用复杂的绳索绑住后，束缚了本性。心悸使我疲惫不堪，既感到受害又感到害他，眼泪差点流出来。

回到家已很晚，父亲问："这么晚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母亲希望圆合大家，"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我们很担心，盘问你是为你好。"

"你可没让你爹妈少操心，刚刚晚饭还在叨叨你来着，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说话的人是父亲的妹妹，我的一个姑姑，正好今天她在。

"你真不是省油的灯。"姐姐是敲最后一下边鼓的。我就只有听的份儿，和家人我一向放低容忍底线，让他们说去吧。若他们知道

我刚从什么样的劣迹里逃出来，非吓坏不可。

我见桌上的剩饭，显得特香，就大口大口吃开了。“家里的饭就是香。”我对姐姐妹妹说：“你们天天过的是神仙日子。”我的吃相儿，不知怎么的使大家停止了责备，开始问寒问暖。大概他们见我跟饿狼一样，动了恻隐之心。姑姑今晚占了我的床位，我在地铺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儿我要出门。

“又哪去？”

“野去！”我生硬逆反地回嘴。

“野去，我不能跟着你，但你别跟家里人长脾气！”父亲严厉地抓住我的礼貌问题。我也的确不想欺负爱我的人，一向对窝里横的人嗤之以鼻。

我一溜烟儿飞跑去找狼烟儿，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他。狼烟儿懒懒地起身，说：“我已经收了（洗手不干了），不过这回为了你就再玩他一把。”快到点时他问我：“那俩小痞子在哪儿等你啊？”他叫我也跟着去，我坚决不肯：“我得去买胶皮管子。”

狼烟儿带着一帮子人，按我说的地点，赴约了。

傍晚，狼烟儿他们在楼下的小树林里大聊当天的趣闻：那两个小子还真来了，是西直门那片的胡同儿串子，那还不挨一顿臭揍！

狼烟儿掏出一把钱，问：“是你的？我把他们身上的钱都拿来了。”

“我不知道，钱都长一个样儿，没那么多。”我说。

“这钱，是你的精神损失费。”

旁边一个叫张什么的，兴致勃勃地重复下午他们折磨人的经历：“……然后，我让他们俩跨自行车大梁上，两腿悬空，硌他丫那俩鸡巴蛋，俩小子受不了颠，求爷爷告奶奶的，哥们儿带着他们在甘家口儿兜了一圈儿。”他眉飞色舞地报功，我听得直牙碜，说：“干吗老跟人家的生殖器过不去，真黑。”

“哎哟！爽姑奶奶那可是狼哥给你报仇雪耻啊！”

狼烟儿教主一样庄严地垫上了一句：“俩胡同串子，刚起来的小玩主，鸡巴痒痒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西直门城墙根上哪儿蹭痒痒去我都没意见，他妈蹭到我头上来了，那我可饶不了他们。”我受不了男人猥亵的调儿了，甚至可怜起那俩胡同串子太没运气。然而是我引起的事端，我看见了仁慈与残忍是人的两个共存面。

当一个男人因为爱希望把女人据为己有，并因此伤害别人，女人对他爱的品质和能力将打上问号。

女人不愿意成为男人欲望的工具，同理男人也不甘成为满足女人物质欲望的工具。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种重叠身份的爱对我来说已不叫爱！但怎样是爱，我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姥 姥

这个时候，只要我回北京城就去看姥姥。

文化大革命抄家物品从一九七七年开始，陆陆续续退还。街道“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还了姥姥家百分之一的幸存贵重文物，有上百件。姥姥一件儿都没有见到，她去问街道“落实政策办公室”，回答是：“老太太，不是您让儿子和孙子代理了吗？”

据传这些古董全部落到她的孙子们手中。这些承载了历史及个人情感记忆的东西已与姥姥无关。这仿佛也是一种解放。

同时姥姥把“落实政策办公室”退还回来的几万块钱一拿到手就说：“钱的使命是，使男人喜新厌旧，使女人奴媚势力，使家庭六亲不认，但是人没钱也六亲不认！”她把退还回来的钱分五份儿，四个儿女和她平分，在当时那是天文数字。

每回我去看姥姥，她都要求我向住对面儿的大舅问好。

因为大舅家对姥爷姥姥的虐待，我特别不愿意去对门儿问好。姥姥每次都坚持，我不愿意让她失望，每次趁大舅进出门口的机会赶紧去叫一声儿“大舅”。

大舅母不许婆婆使用院子里的厕所，姥姥只好去街上的公共厕所，人老尿频，老人步履蹒跚，大家建议在小屋放一个铁桶，充当马桶。父亲给铁桶做了一个坐便盖子，为了锯圆一些，父亲大老远买来一个职业木工的锯子。姥姥省得一趟趟过马路上公厕了。

我们去看她，第一件事就是帮她倒马桶。

姥姥快八十了，眼不行了还要看书、看报，耳朵不行了，还是要听小半导体收音机，她把收音机举到耳朵边儿上，学英文。这个小收音机是父亲的作品，小木匣子漆成天蓝色。我家的家具都漆成蓝色，父亲说，蓝颜色的特性是可以增加人的愉快感。

姥姥做不动饭了，每天到小铺子去买点儿包子、烙饼。母亲无数次要求姥姥住过去——姥姥就是不肯。母亲说：“你姥姥毕竟还有封建意识，跟着儿子才觉得顺理成章。”

去看姥姥不下象棋是过不了关的，我不会下，乱走，她不在乎，你乱走我也乱走，她最高兴的是跟她玩。

姥姥不诉苦，也不评论世态炎凉，更不说人坏话，无论是正

面、反面、拐弯抹角地、变相地、尖损的坏话。我有不顺心的事儿讲给她听。有时她回答，有时不说什么，通常她的回答我不能马上明白，总是过一段时间，甚至几年后发现姥姥简直是个大预言家。比如我急于求成时，她会说：“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当我狂爱上一个人时，她说：“爱情是打着不走赶着跟的戏，为了爱人把自己丢了，人家还爱你什么呀！”每次和她在一起，我都张开毛孔领悟她。

我爱她，祖籍喜马拉雅山的神奇老太太。

我做过这样一个好玩的梦：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姥姥在一朵白云上接我，她指着两个在云端下棋的人，说：“爽子，让我们下完最后一盘棋吧！”望过去的感觉好奇怪，我已经分不清她是我姥姥或我是她姥姥。梦为何意我当时并不明白。

如今揣摩一下，那会不会意味着死后我们将去的世界是没有时间没有年龄，今生我们人际关系里的某些习性，是前世习性的衍生。

姥姥也要画画，跟我要笔要颜料，她说，我也要学画，我最喜欢郁金香。姥姥告诉我，她小时候家住青岛，一次她见到啤酒厂大门口有一个金发洋女人牵了一条哈巴狗，女人还抱着一束像灯泡一样的花，无论是金发洋女人、哈巴狗，还是花，她都觉得很新奇，但花朵的美丽完全压倒了洋女人和哈巴狗，那郁金香的美，感动得她身上忽冷忽热，想道：“这花像神仙下凡。”她一直不忘。

我从王府井美术用品商店买来两盒水彩和一本《人民画报》，因为封面上有郁金香的照片。姥姥觉得照片很呆板，我们就一起去中山公园的花房看真花。这个花房我们太熟悉了——从小，姥姥经常带我来这儿赏花，赏花后她喝香喷喷的碧螺春茶，吃苏打葱香饼干，我喝甜酥酥的果冻，吃奶油蛋糕。如今，时过境迁，不是她拉着我

的小手而是我携着她的老手，但手手之间传递着昔日的记忆，今天醉人的馨香使我们更加心心相印。

我们一起又去中山公园里的茶楼，我无论如何都要请她，姥姥和我争了半天我胜利了。嗨！终于可以请姥姥了，兴奋加幸福地一趟茶一趟点心地小跑着，姥姥夸杯里的碧螺春是上品。茶后我们一起在柏树林间散步，姥姥心血来潮非要照相合影。的确她又先知先觉了，那是我们俩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合影。

和姥姥道别后，我骑车回家，等红绿灯时无意间手揣进兜里，咦？摸出几块钱来，眼前出现了姥姥胜利的微笑。我笑想，“姥姥呀，下次我会用您的钱给您买回去大堆好吃的。”

我做的那个云端梦，这时开始显露出了点点迹象，人与人的生命关系都可能是上一次的延续。

画神附身

画画是我不讲话的情侣，画画像个智者在我与大自然之间热情编织，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最美的写生点，紫竹院、玉渊潭、动物园、颐和园、香山，不辞辛苦地远征。我像个走火人魔的练功人。

有一天，我突然想道：“唉，怎么忘了月坛公园呢？”于是背上画箱子去了。月坛很小，就几个老头老太太推着小孩竹子车溜达，我选好景儿往地上铺块手绢开画。那段时间不知怎么跟带“坛”字的过不去，画完月坛又去画日坛，日坛画够了又跋涉到

天坛。我想：“还有地坛呢。”我吭哧吭哧骑车找到了坐落在北新桥附近的地坛，这里显得荒凉凄美，游客熙熙攘攘，我一下子就爱上这地方了。

在这古柏苍松间我张开直觉，发现每换一个角度，树的脸孔也在更换中变成典雅少女、神龙大佛或幽默的老叟。它们同样忽而阴险，忽而英明盖世，树一定有魂儿！我一口气画到下午，不思茶饭，好像画树可以解饱解渴。

四五点钟的夕阳里，突然一棵树说话了：“你画得很有诗意。”我来不及害怕，意外发现旁边儿一个人，很矮，再望过去，原来那人坐在轮椅上，因为没有脚步声儿，像是从树里蹦出来的树精。

他戴一副眼镜，眼镜后面的眼睛那么小，使眼镜显得太大。坐轮椅的男人对我是没有威胁的——尤其是坐轮椅还带一副眼镜儿的男人更不会有什么生理上的威胁。

我放心地回答：“怎么会湿呢，这是油画用油调色不用水呀！”

“噢，我说的是，你的画儿很有诗意，诗歌的诗。”我们笑了。

他肤色微黑，面孔让人看了忘不了，但使劲儿想又想不清具体什么样。

“你画的树和别人不一样。”

完全不自信的我，警觉地为自己开脱：“我刚画没多久。”

“哎，忽略掉学历行吗，画树就是在对树说话，跟学没学过关系不大。”

我皱皱眉头，他真是树精，怎么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不过他话说得太没时代感了，我说：“跟鸟还能对对话，跟树对话有些难度。”

“树用得着对话吗，感觉比对话省事儿。”

夕阳！我看见红色的天，赶集似的怕失去美景，拿出最后一小张

油画纸，着火似的沾上颜色快速抹来抹去，最后还大师一样，瞄准正中央点上了一堆橘黄颜色代表太阳……特想表现得很老练，结果注意力分散，画并不理想。太阳从重叠的老树后面不声不响，滑到别的国家去照耀了。我默默地擦着笔，那男人默默地看我擦笔，好像我们俩把魂儿都献给了刚才的太阳，并跟着到地球的另一边。昆虫叫醒我们时，我们又天南海北聊了一会儿，我说："我得回去了。"

"你住哪儿？"

"展览馆那边儿。"

"哎哟，挺远的，真是精神可嘉。"

"你夸我精神可嘉有什么用。"我出口随便，说完不好意思地冲他笑笑。

他说："是没用，我这儿不发学雷锋好榜样的奖状。"

"雷锋没准儿都是编出来的呢。"

他说："你肯定是那种硬要赶走阴暗的女孩儿。"

"哦——"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把"哦"拖得挺长显得若有所思，为了显摆聪明，我用假装明了的眼神看他。

"你贵姓？"他问，

"李，木子李。"他微微歪着头等下文。

"李爽，爽快的爽。"

"飒爽英姿五尺枪！这名儿起得好！"

"以后还来画吗？"

"肯定！你贵姓？"

轮到我歪头儿用眼神儿问他了，他笑得也挺爽，回答道："我姓史，史铁生。"

"哎哟，你也是那种拿命跟铁撞的人吧。"

"哈！"我的话，使他差点大声哈哈笑出来，扬头抿了一下嘴才忍住，史铁生好像吃了快要熟的甜柿子，但还是有点儿涩，对我的话他仿佛听在耳朵里收藏在心中的样子。我们约好了回头见。

可我一走就好几个月没再回地坛写生。

章宜来了封信，信里有张照片儿，照片儿上写着"将军章宜像爷们一样杀回来了！"约我去见他。我准时到了，在北海前门儿坐马路沿儿上等着，过了钟点儿才推车过去。

我回想着对他当年的印象，所以没有太打扮。见面发现我完全错了，章宜成熟了，不再是那个被我挤在墙根儿生怕被坏女人强奸的小男孩儿了。以前他还没我高呢，现在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儿，两撇小胡子。但自行车还是那辆一起画画时的车。

他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肩膀硬邦邦地端着，用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目光看着我——我纳闷，为什么他这个样子让人联想到演技很差的演员，在首长接见前必须练习幸福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大胜，我谈书比他棒，我谈诗比他棒，我知道的诗人比他多，但他认识的洋人画家比我多得多！我们唱起歌儿来，我俩会唱同样的外国歌曲，只是非常跑调儿，他和我都没在意自己五音不全的歌喉，还被感动得飘然。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唱着忧郁的歌，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

我唱的时候，章宜也清了清嗓子给我伴唱，他唱时我也清了清嗓子为他伴唱……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情人，
…………

我们陶醉地靠在护城河小围墙上，再慢慢挪到一片丁香丛里，避开五四大街上的路灯。他悄悄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我伸展腰肢希望靠得更近更紧。我很难把性欲和爱情分开，浪漫的精神与我女性深沉敏锐的原始涌动接火。护城河水的声音听起来清柔又急切，我的肌肤恢复了对生活的信任，丁香丛里，我准许了两个人之间亲密的爱抚。

我跟章宜的精神恋爱，终于从天上落入人间。我梦想着品尝一下我俩多年的爱情果实。

我早早买了啤酒和小泥肠罐头藏在床底下，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天，三杯啤酒下肚儿，晕晕乎乎，笨手笨脚的前戏几乎完美，尤为美妙的深吻之后，我怀着热烈忐忑的心情闭上眼睛，等待这个"爷们和将军"来抚慰满足我已期待良久的情，等了一会儿听见他弄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以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谁知他伏身

接近我问道："爽你干吗呢？我一直在等你，我们不是应该做爱吗？怎么做啊？"我生理的电闸，"吱吅"一声熄了火。

原来章宜从来没有做过爱，我非常失望，惊讶地问："你是处男啊？"我自己能感觉到自己不顾慈悲的表情，但是慈悲不能出于勉强，章宜的表情也失望委屈。我们角色颠倒，仿佛是我应该像男人一样把握性爱方向。

我们都不想放弃，我用尽浑身解数帮他重振雄威，可是他裤子都来不及脱就马上泄出。失落的他，缩在床上翻着白眼儿，精液流了一身。

我吓坏了，"啪啪"拍他的脸，去找他的黑眼珠儿在哪儿，摇晃他，叫他，他还是不动。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珠儿翻了下来，哭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笑了，我见到他嘴边儿一撮小胡子，半张的嘴里有颗细小、尖尖，还微微发黄的小虎牙，我忽然有种恶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结果使我对性爱完全失去了感觉。我们把自己收拾妥当后，他用一双水汪汪脉脉含情的眼睛看着我说："其实好舒服，爽，你把我变成了男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肯放下架子，托付给女人摆布的男人和一个处女的心态毫无区别。真的，为什么女人不想懂男人，男人也不想懂女人地互相抱怨。也可能男女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纸，双方轻轻来一个吻——那层纸老虎，绝对抵挡不住爱的绵绵雨。男女都会发现心从来都是同一个合体。

我问他为什么匆匆退伍，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被批准入党后的夏天，我们连里的赵班长在打扫卫生时翻出了我与你还有另一个女朋友的通信，连里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是北京来的少爷兵，我们的情书有伤风败俗男女奸情的嫌疑，是极其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

品质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一个月，我写了一大沓子的检讨书。后来我发高烧四十度，住进部队医院，有个小护士胖乎乎的，让人看着特眼馋的那种，她一来给我打针、试表，我‘这儿’就特硬特胀。后来每次一到打针、试表的点，我‘这儿’就胀，有一次我怕她发现，看着表计算好差不多她快来之前，我就用手使劲抓住‘它’，护士那天提前来了，她尖叫的声音跟冲锋号似的。我没有回连队就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没有被送上军纪处是便宜了我。”

听完，我的愤怒冒着烟，“真邪门，年轻人的发育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恶劣思想品质’，那无产阶级的小孩都是从百货大楼买来的塑料娃娃？”

章宜比我宽容，也没有愤愤不平。

他两手搓得通红，终于他凑近我说：“我希望你以后还和我做爱。”我支支吾吾。

我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倍感困惑，是谁界定了错与罪的戒律？我想知道，严苛处置、约束别人的人，对自己的欲望如何处理？章宜对性笨手笨脚的渴望如同饿坏了的小孩，从自己的饼干筒里拿出一块饼干尝了一下，而被判处偷窃罪。

我们旺盛的青春已被政治看管起来，青春期能量的搏动像龌龊的罪恶被紧紧捆绑在耻辱柱上。人人监控着别人腰带以下五寸那个小地方。

难怪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与性的关系变得完全不自然，教旨把我们的头脑和身体拦腰斩断。我们把渴望自然困惑地分为好的坏的。

爱本不应与政治有关，性乃是大自然赏给人的生存厚礼！找性的人，内心深处无非还是在找爱。

我从窗口眺望章宜渐渐远去的身影，他的自行车拐弯了，我还

盯着那个拐角儿。

我知道我们的友谊将继续充满活力，未来谁也不好预计，我最不喜欢的事莫过于预计，预计——是对未来所有美妙惊喜的东西施行限制和封杀。

我和他继续骑车去写生，最远骑到过十三陵，他成了我最好的知己。

好多年以后我又见到了章宜，他依然英俊，目光有点恍惚，我们俩随便地聊着过去和今天，谁都不想去碰触那片经历中最柔软、最纯净、却被最钝的东西弄伤了的处女地。几十年前的记忆是那么珍贵又那么恍惚，珍贵是因为乱世造就了我们，恍惚是因为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获得精神上的疗愈。

4

The fourth part | 第四部分

无业游民

突然间，传来一个消息，全国恢复高考而且没有年龄段的限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大的好消息。因为历来的高考都是推荐上大学，谁都知道大学的“建筑结构”是没门儿也没窗户的，只开着“后门”。

我骑车去姥姥家，经过故宫筒子河，听见有人吹号。号声一下昂扬悲壮又一下豁如竹破，很业余。

故宫的角楼云起灰蒙蒙，云去黄灿灿，太阳云前云后地在和故宫角楼上的琉璃瓦捉迷藏。一定有不着形迹的世界在静静神秘地跟随和保佑着我们，鬼使的计，我很想画故宫的角楼、神布的差，我出门前最后一秒带上了画箱。

在故宫选好景，世界小得只剩下故宫的西北角楼。我画技日益纯熟，心里感觉轻松，笔也自在飞舞，后边围着许多人，如今我已经不再怯场。画完了我慢慢擦笔，刚才的号手就在我旁边，说：“哎，你好，我叫盛年，我们在看你画画，真不错。”

第二个号手也过来说：“我叫杨清平，我们一直在看你画画，就是不知道你画的是哪儿。”

“行了，行了，清平你真老冒儿，人家画的是故宫西北角儿。”

“怎么画得那么不细致，琉璃瓦呢？盛年他爸的画儿可细了，连头发丝儿都画出来了。你怎么用那么多颜色，真够浪费的。”叫清平的紧着问东问西，叫盛年的紧着解释。

“我爸画的是水彩，这位姐姐画的是油彩画，哎，你贵姓？”

“我叫李爽。”

“人家李爽画的这种叫现代派，你懂什么。”

我们聊得很投缘。盛年告诉我，他父亲盛锡珊是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设计，为了考音乐学院，杨清平和盛年每天刻苦练习吹号。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这次巧遇，又寒暄了一会儿，我们一起骑车回家，俩小伙子送了我一程，还约好下次角楼见。

到姥姥家，我赶快把全国将恢复高考的事告诉她。

姥姥起来走到窗台，看了看小碗里那棵切开的水萝卜头，那是姥姥的花，水萝卜头的叶子顽强往上生长着寻找阳光。因为院墙挡着，清冷的午间阳光已经照不着这间小屋的窗台了。突然我对水萝卜叶子与姥姥做了一种联想，甚至联想到中国的年轻人，都像这棵顽强的水萝卜叶子。

姥姥其实太高兴了，不免流露出少许怨天尤人，“是好事儿呀，你们这一代人没吃过没见过的，靠不了天靠不了地，连靠自己的条件都没有，这下可好了！”

“姥姥，您看我复习什么好，数学？语文？还是外语？”

姥姥说：“周瑜为了打仗需要十万支箭，找诸葛亮出主意。周瑜以为需要十天工夫，诸葛亮说只需三天。十万支箭，三天怎么造得成呢？谁都不信，结果三天后不仅从曹操那儿得到五万支箭，还从周瑜那儿得到五万，共十万。”

“姥姥您嫌我朝三暮四？”

“你其实什么都具备只欠东风！你一天到晚背着个花里胡哨的画箱子干吗？卖糖葫芦呐！”

“我画得还不够好。”

“画得再不好，也比从头学数学语文好一百倍！”

“你赶明儿要成大画家了。”

我打断她。

“我能成大画家？您别逗了。”

“爽子，给我二十年时间，我一百多岁那年，咱俩再商量你画得好不好行吗？”

“姥姥，您真觉得我是画画的料儿吗？”

“除了画画，你干什么都屈才，你不是画画的料儿，你是画画的天才。”

“比如我画苹果，老想变形儿呀，注意光线呀，在着色上玩花活呀什么的，最后画个苹果都画不像。”

“画像一个苹果有什么意思，街上买俩真的越看越像，画就画个神态，神气都给画出来了，还怕不真吗！别骑着驴找驴啦。”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好吃的，姥姥像个天真的老小孩，选了一块稻香村的萨其马，慢慢嚼着，她细嚼慢咽着，我不仅体会到她嘴里的甜蜜，也体会到了她心里的甜蜜。

虽然姥姥是长辈，但我们的关系里包含了各种形式的友谊，仿佛我们三百年前就认识，大概缘分就是这种感觉吧。

姥姥的话，帮我找回了“北”，我决心考美院。画呀画，见什么画什么。一天到晚，睁眼闭眼想的说的全跟画画有关。画画像一个暗恋的情人，在情场上静悄悄地赢得了我的心。

也不能老在北京当无业游民吧，我的职业还是农民，该回村儿了。我想起高爷、高婶儿、高兔子，接着又蹦出队长高震来、凤小纂、会计翠芝、同屋宝青和好多好多人。我买了一书包甜食，带着画箱又回到农民身边儿了。我这家儿吃，那家儿画，在田里逛荡，不怎么干活儿。

我画画儿的技术突飞猛进。高婶儿逢人便说：“李爽来吃饭，连贴饼子都能染花了红的绿的，好么样儿的鸡蛋，她非给画上眼睛鼻子，还要画上点子曲流发（卷发），弄得俺看着怪好看的都舍不得吃。”

宝青并不是太顺利，她怀孕了，不用多问就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也是我回村儿后人人挂在嘴上的新闻。新闻像养分一样，使乏味劳累的农民可以多些茶余饭后的佐料。人们给越轨的性事以高度的警戒，又因为束绑得快被勒死，而变态、虚伪地从所有性新闻中咀嚼它在身体记忆中的快感。

宿舍门开了，宝青见我进来，说：“回啦。”

我刚要问候，一眼瞥见她的大肚子和她灰胖的面孔，无法逃避的道德观，使我站在一个思想分水岭上：去歧视一个歧视过你的人吗？一个自幼没有母爱与父亲相依为命，因为人性中本来就非常混淆的需求与恐惧而落井的女孩吗？

我怀过孕，打过胎，知道被人歧视的滋味。但我不能回避暗中那点滴的优越感，它就在那儿，仿佛不幸中遇到更不幸的人是一种衬托出你自己还好的镜子，生活在邀请你变得知足常乐，使你能站得高一点。但此刻不要忘记那些更不幸的人正是你的垫脚石。

我一直默默地忙活自己的琐事，要睡的时候，听到她在被窝里抽泣，我能做些什么呢，就说：“宝青别哭了，生米已煮成熟饭，把

孩子做了吧？”

“医生说太晚了。”

宝青哽咽着，“我喜欢我爹，他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佩服他。”

“你以后怎么办？”

“我倒没啥，我为我爹担心，他受到严重处分，可能会被判刑！”

“你爸被判刑了怎么办？”

“我不活了。”

“不能寻短见啊！”

“呜呜呜……”

我恨自己怎么笨嘴拙舌，该来话时无话可以安慰她。屋里安静得可怕，我爬起来把一包糖塞给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拉住她的手，握着，她僵硬如木乃伊般干巴巴的手慢慢放松，然后玩命抓住我放声大哭。我的手成了谴责巨浪中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任凭她的泪水鼻涕流淌在我的手上，恨不得再长出八只手来安抚她的脆弱。

第二天我收工回来，见宝青的铺位已空空的，秃板儿中间有一包糖，糖下，一张用手匆匆忙忙撕下的纸条儿上写着：“李爽，谢谢你！”

艺术的荒林中找果子充饥

在队部我无意间翻弄报纸，见到一则消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我浑身发热，自己都不明白，干吗对与艺术有关的事情都走火入魔。我跑到队长那儿求爷爷告奶奶要回北京。“李爽，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我应了你，明儿你成事儿了可别忘了俺！”

提着辨认不出原来模样的宝贝画箱，我小燕儿似的又飞回了北京，我们家人管我的画箱叫花瓜。姥姥的话：“你与画画恋爱省去打扮这件麻烦事儿。”我浑身上下拉里邋遢的衣裤真和花瓜差不多，指甲盖儿里满是红的绿的，拿小刷子都刷不净，头发老有调色油味道。从家中早年间没被抄走的画册中，我认识了徐悲鸿、关良、程抱一、林风眠。

我彻夜不眠地把那些画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制成画册，夜里拿着手电在被窝里细细品味，临摹了不知多少遍。后来我在章宜家见到了更多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油画家：詹建俊、靳尚谊、董希文、王式廓、吴冠中，当然还有罗工柳、吴作人，我又如饥似渴地临摹了一通这些我心目中的大师之作。

我还跑到吴冠中家附近，冲着所有出出进进的文绉绉的老头问：“请问您是不是吴冠中？我想当您的学徒！给您刷碗做饭都行！”冻得我透心儿凉，可一次都没遇上吴冠中本人，还招得一些不叫吴冠中的老头儿们异样的眼光，说：“怎么大姑娘家的这么疯疯癫癫不检点，讨厌！”

后来恢复了英文课，母亲的老本行儿被重新起用。第一届的学

生全是工农兵学员。在母亲班里有个空政文工团的女学生叫霍霄霞，她常来我家玩，跟我聊起天来，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说她丈夫是工艺美院的，还是吴冠中教出来的呐，《人民日报》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她丈夫画的。我惊喜得如同遇见上帝。就这样我认识了霍霄霞的丈夫王为政。他瘦瘦的，白白的，文质彬彬，戴一副白色的眼镜儿、笑容可掬，总穿一件蓝布中式罩衣。每个礼拜我去东大桥他家两次，每次去霍霄霞都派我到走廊尽头的集体厨房去给他们两口子做饭，吃完饭叫我去洗碗。我太想找个名师指点了，就坚持给他们做饭，抢着洗碗。一天，王为政觉得我炒的粉条肉末很可口，吃高兴了，就拿出几张白纸给我讲了点，近大远小的透视学，他问我："画素描要点是什么？"

"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还画画呢！"

"那请您给我讲讲吧？"

"你画画时想什么？"

"我不想什么，看见好景儿来不及想什么。"

"为什么不构思？"

"构思完了，红霞已经褪色，再画就不来劲了。"

"你的画法连业余都算不上，整个儿是一个野生动物园画派的野种儿，这么画下去非出事不可！"他推了推眼镜儿很严肃，但还算善意。

"野生动物园画派是什么画派？我只听说过野兽派。"

"真愚昧呀，哪儿还谈得上派呀，你画的是野路子。"

"那——怎么办？"我直挠头皮。

"看来我们要全部重新施教啦。"

"王叔叔，太谢谢了，哎哟，我真有福气！"

"小爽，时代不同了，绘画首先要摆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画画是一个上层意识形态的领域，若把握不好方向恐怕会走人歧途——"我的耳朵好像听到"吱——吱——"收音机失调时那种噪音，刺激得难受。仿佛艺术词汇在我脑袋是顺时针走向，政治词汇一进来就逆时针转动之后短路。

"王叔叔，画素描要点是什么？"

"你等我把最基本的艺术要素铺垫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素描要一条一条线地画，今天讲的是第一条线，就到这儿吧。"

"画素描要点到底是什么呢，王叔叔？"

"是你教我还是我教你呀！"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过几天我又去了，炒了第二个粉条肉末，然后是冗长的政治与艺术。之后我没得到画素描要点的任何秘密，我临走时，站在走廊里，走廊两边堆满东西，网兜、纸盒子，摇摇欲坠的包袱用草绳捆着，好像上面的鞋盒子、脸盆随时有砸在头上的危险。

窄窄的门口，使我们转不开身儿。他望着我，接近我的脸，慷慨决定告诉我一个秘密似的说："画素描的要点是，明暗交界线的运用。这里面学问多得很。小爽，下星期你霍阿姨出差，她不在时地方宽敞点，我可以手把手做点示范给你看。"他伸手把我面前一撮耷拉下来的头发掠到耳朵后面，顺便还捏了下我的脸蛋，三十几岁的王叔叔，却用长辈的口吻说："你希望学习的态度很可嘉，只要努力没有不成的事！下星期四晚上我等你，我来做饭好了，保证有肉。"我从东大桥乘无轨电车回家，颠簸中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去求教了。

高　考

美术馆的《第一届全国油画展》开展了，我和章宜每天泡在美术馆里。北京所有绘画爱好者天天涌到美术馆。生活在文化断层、塌方时期的我们，突然可以近距离观看遥远而赫赫有名的油画巨匠们的真品，艺术曾经突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失踪，突然跟跳大神儿似的霍然重现！一切都真真假假，明明暗暗，突如其来。幸而中国人早已有变色龙的本事，很实际地学会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生存方式，如在地道战里迂回穿梭。如今我走遍天下，发现还是中国人最有承受力和弹力，可以无限谦卑地降低生存底线，也可以无限自大地抬高奢侈标准。一切都是一窝蜂式的儿戏。

在美术馆里，我看到了很多画儿，觉得这些三十多岁的艺术家特有技术。站在陈逸飞《占领总统府》画前，我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笔触，兴奋和感叹，退远眯上眼睛，走近把鼻子贴在局部。汤小铭的《永不休战》中表现出的扎实的素描功底，使我望尘莫及。陈衍宁的《耕海》使我像看到了大海，虽然我二十岁了还没见过海。“我还可以闻到海风的腥味。”我陶醉地对章宜显摆说。章宜捅了我一下也显摆地说：“海风不腥，倒是有点海带味。”章宜见过大海。

有不少人用小本子在美术馆里临摹。有个小秃头最张扬，每天都去临摹陈衍宁的作品《耕海》。画箱、笔、纸摆摊儿似的，他盘腿儿坐在地上临摹，一个人画画儿却占领了大家的空间，后面人山人海围着他，他倒成了展览馆里的主角。我们也挤进去看秃头画画：一辆拖拉机在海滩上耕耘，后面有一群海鸟儿……章宜一笑俩酒窝儿，讽刺道：“这个小秃子临摹不了人物才临摹风景。”我不高兴地

说：“咱们连临摹风景都不敢，秃头比咱们勇敢。”章宜道：“咱们不临摹，咱们现在要创作了！”章宜的话不知动了我哪根儿神经，我居然想象着有一天是我们的作品挂在美术馆的墙上！我的想象使我难以启齿，怕被看成是野心，我把野心默默地温暖在心中，从未放弃。

全国油画展像一次文化小地震，美术馆变成一个社交场所，给了在悬崖峭壁上寻找养分和阳光的业余艺术一线希望，我相信当年北京艺坛的精英们，大概没有人错过这个展览，那是一个集体的记忆。

我们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画友儿：吕越、赵柏崴、艾未未、朱金石、朱海东、徐星……还有不少名字记不起来了。

小秃头终于被禁止，他被罚用拖把沾上汽油擦干净整个他占领过的场地。

最后一天在美术馆外小秃头主动跟我们搭讪。他叫唐平刚，我们交了朋友。他矮矮的个儿，鼓突的眼睛，鼓突的嘴巴，高鼻梁，白净皮肤，热情起来神经兮兮，是个人来疯，但他心地非常善良。

平刚的家变成了画画儿的据点儿，大家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梵高画室”。他家住全国总工会宿舍，房子大，他自己有一个房间。每回我们这些狗男狗女一来，平刚就把屋门反锁，墙上挂满了画儿，擦笔纸、颜色、油画儿笔扔一地，踩得一塌糊涂，平刚和我们一块儿在自己家造反。他母亲经常气愤地“咚咚咚咚”敲门儿，平刚在里面大叫：“妈——画画呢，别打搅！”平刚个儿矮，他母亲比他还矮，他母亲继续砸门，平刚过去把门开一条缝儿，低着头儿跟他母亲吵：“你管不着！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不着！”他母亲使劲往里推门，平刚使劲往外推门，推来推去。平刚的母亲成功地伸出一只脚卡住门，探进头来，我们就都拿着画笔异口同声叫“阿姨”，平

刚的母亲问："你们都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一天到晚泡在我家？你们不上班也不上学吗？"我是一帮人里唯一的女孩儿，平刚的母亲就特别盯着我看："你叫什么？"

"阿姨我叫李爽。"

"这名字特爽。哎李爽啊，我跟你说别跟糖糖（平刚小名）混，看他画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还流里流气的跟大人没礼貌，别耽误了你们。"

"阿姨您别生气，我们都在准备考艺术院校呢。"

"哧！考艺术院校，拿糖糖那种神经病的画去考，谁要啊！"

平刚急了，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他把母亲使劲儿往外推，道："我在外边儿一不坑蒙拐骗，二不吃喝嫖赌，你说谁流里流气呢？有我这么个儿子是你的福气！"说完"砰"地关上门。"糖糖，房子都快让你弄塌了！"可怜的母亲在走廊里声嘶力竭。

我有一个住在新街口北影宿舍的朋友池小青和她哥哥池小宁，小青带我去她家玩，进屋对面的书架子把我震住了，满目画册。那是她父亲——北影美术设计师池宁先生生前工作用的工具书，全套的苏联画册，还有两三本法国印象派简介画册和一本马蒂斯的画册。在艺术参照物极度匮乏的年代，我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当我伸手去摸，那些书是真的，连书上灰尘在我手上都是动人的，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本来约好和同院儿的绵绵及陈凯歌，还有几个北影的朋友一起玩牌，结果我寸步难行被死钉在书架前，人家那边玩了一天牌，小青睡着了好几次，我浑然不觉呆痴地在暗黑里把鼻子贴在画册上。小宁说："李爽你一天不吃不喝也不饿呀？"

"没事儿，没事儿！哟，这么晚啦，真不好意思！"这时我方惦记起这俩没爹没妈的孤儿。小青告诉过我，他们的父母在文化大革

命初就双双上吊了。我穿上自己的棉猴，看了一眼房梁，又环顾一下四周，家具全是上好的红木古董，屋子里又脏又乱，床上的被子已没有被面，小青的棉袄袖朝外开着棉花花。我伸手一摸兜里还有一把炒栗子，掏出来给了小青，留恋地瞥了最后一眼画册，走了。

我的朋友们特别崇拜法国印象派，暗中比赛谁知道的印象派画家最多，死记硬背那些长长的名字。而我更喜爱马蒂斯，看毕加索的作品没什么反应，可是我不敢说我不崇拜毕加索，怕别人说我不识时务，"什么都不懂，居然敢不崇拜毕加索！"

我不想追随谁，国家性的集体装假，还不够反胃吗？让我在画家圈里继续拾人牙慧我想吐，又爱自己的朋友们，只好沉默，甘愿冒傻气。

我买不起正式的亚麻画布，就拿家里的旧床单子、旧桌布，仔细选择边缘还结实的部位，买木工用的猪皮骨粒胶，用小锅慢慢熬化，一层层涂在画布上做底子。母亲开玩笑道："家里连找块抹布都要向爽子申请，连旧衣服的后背身儿她都给画上画儿了！"

我用的调色板是一块三合板，做梦都想有一个真正的画板。无奈几次骑车去王府井美术用品店看，调色板太贵。我请父亲借给我他做木工用的圆锯，自己在板上画一个拇指洞，一点点锯下小椭圆形，再用砂纸打平滑，结果我爱自己的调色板胜过了卖的调色板。

有一次，我们听说西城区文化馆要办一个绘画训练班，一帮子人都去报名了。报名以后，我发现那儿有大画板，新新的很漂亮，于是跟章宜、平刚商量："文化馆晚上也不锁，就一个看门的老头儿，咱们干脆偷吧。"

计划好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就骑车去了，犹豫半天谁也不敢进去。文化馆里还有舞蹈班、唱歌班、乐器班。幻想着看门老头儿肯

定记不住谁是哪个班的，我们一帮人就拥进去了。心虚，你挤我，我挤你，走不成直线不说还贼眉鼠眼的。

教室门大敞着！墙根儿上靠着一大摞画板，我们一人夹了一块就往外跑。平刚说：“别一人夹一块多显眼啊，给一个人夹着，别人来掩护。”章宜个儿大，就叫章宜全拿着。

真巧，刚走到门口，教我们画画的辛老师正好迎面过来，问：“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啦？”他瞧着我们的难堪相，一下子就发现章宜腋下夹着的画板，章宜的脸色已经是一面红旗。平刚赶紧圆滑地说：“辛阿姨，我们借画板儿用用，明天就还回来！”辛老师说：“谁是你们阿姨！你们在偷公家东西！”我们都参与解释：“借回去画素描。”老师说：“都给我放回去！”我们跑回教室把画板放下后撒丫子就逃，撞得桌椅板凳叮咣响，出去骑上车狂蹬。觉得没什么危险了，大家停下来，喘口气，路灯底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嘿嘿傻笑。

我准备做三个手工画册，并且决心把画册做得和机器做出来的印刷品一样。我练习憋气使用剪刀，要刀切般平直，我抱着一盆水几个小时地坐在画册上，不吃不喝，为了压平画册，

我美丽的自制画册的第一本儿，送到中央美院参加预考，当时参加预考的作品概不退还，第二本被工艺美院退回来了，第三本送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办，后来他们说弄丢了。

一时我怀疑自己想要当艺术家的热情是“不自量力”的奢望，上街都心虚，好像邻居投来的目光都是对我的评判：看这个涂了一身颜色，却终身不能当职业画家的疯子。

妹妹已经长到喜欢表现自己的年龄，看着我给她画的肖像，道：“一点都不像我。”姐姐过来说：“还行，比画我那幅好点儿，我那张画得跟男的似的。”母亲过来，想看清楚，用正在切洋葱头的手擦了

擦眼睛，说：“多好呀，我觉得挺好！”父亲也跟过来看看妹妹的画像说：“用切完洋葱的眼睛看，什么画都好看。”他们呵呵大笑起来，我受了嘲弄，没心思笑，可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堵不住，苦涩地暗下决心，“早晚我会成个画家！”后来家人拿“洋葱眼”作为李爽的画的代称。日子久了连我也这样称呼自己的画，每画完一幅画，我就左右吆喝，“哎！小心点儿啊，我的‘洋葱眼’还没干呢！别蹭一身！”

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手上摇晃着一封信，我乐坏了，“啊——电影学院的准考证！”晚饭，父亲给我夹了第一块肉片，母亲的表情像过节一样。

考试那天是大日子，我和章宜、吕越、朱海东、池小宁……还有几个人我记不起的都收到了准考证。北京这一年有百十万待业青年，无业知青，用了最短的时间复习——各门冬眠了的知识被早春复苏，年轻人一窝蜂涌入了各大院校的考场——那盛况在历史上大概是头一回。

早上五点，一帮人骑车前往坐落在清河的电影学院赴考，天气不好算得了什么，就是下刀子我们也不会在乎的。进了学校院子大家就自顾自地各奔前程了，报到、分配考场、找教室……忽然我头蒙了——没带画箱！

我冲出教室，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遇到的头一个人，正好就是负责我考场的美术老师。他急急忙忙地从走廊过来，我拦住他，讲了我的情况，他露出责备的眼神，我诚恳地看着他，心已提到喉咙口快要喷出血来，真是鬼神谋策，他说：“你用我的画箱吧。”他扭过头一溜小跑回办公室，出来时提着一个和我的画箱一模一样的画箱！他催着：“快点！快点！别的班都开始了。”冥冥中有什么

东西在保佑我。

我每天跑到父亲所在学院的传达室等电影学院的通知书。

狼烟儿派他姐姐来找我，说有事想和我见个面。这也是他头一次主动找我，我想："我们好过一场应该好合好散吧。"就去了。站在这个曾经让我朝思暮想，渴望给他作八辈子老婆的恋人面前，咦？那种渴望迎合他、投其所好的焦虑已无影无踪。这段时间令我兴奋的历险经历，已让我丢掉了只想取悦一个男人的狭隘，渐渐成长起来的自信取代了自卑。

向外索取燃料投奔别人光芒的人，早晚会被对方烧光，并且被当做烧剩下的灰清理掉。

当你向内索取天然资源时，你会像一块发光的磁铁吸引来更多的爱。

我决定给他画一张肖像，他不肯让我画他脸上有刀疤的一侧。

我画了很久，笔在画布上唰唰响，他母亲端进来一碗热腾腾的牛肉，用相亲一般的眼神看着我，看得出她将儿子视为一切。我那劣质的调色油味儿与炖牛肉味儿很不调和。真怪，从狼烟儿的眼神中我几乎找到了真他——怕失去曾经占有过的东西，因为站在囤积的物品或女人的爱情上会使男人有成就感。

屋里除了调色油味儿，没话。我把那幅肖像送给了他，说了句祝福的话后说："我该回去了。"

"我妈非留你吃饭。"他说。

"你呢？"我带着怀旧的温情看了他一眼，

"我——倒无所谓，随你的便。"

"不吃了，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呐！"

"非走？"他问，我点点头。

"过来！再给你一口。"他生硬颤抖地在我左脸上使劲吻了一下，我一动不动，知道他在闻我的头发，我怕自己不够香而轻轻挣脱。"我该走了。"

"走啦？"

"嗯。"

"再见狼烟儿。"他坐着不动，眼眶从红变成青，大男人的面具如乌云遮上明月，笼罩在面孔上。关上门，我在漆黑的楼道里，感到对他依然有爱。

名噪一时的"街头玩闹王"带着面伤撤退了，我希望他拥有下一次冒险，但也许他会抓住英雄的记忆未老先衰地永远纪念自己的过去。

地下文艺沙龙

我生活的圈子开始扩大，我认识了钢琴家刘诗昆、刘小梅，他们又带我结识了姜世伟，也就是诗人芒克。从一个地下沙龙到另一个。

芒克自我介绍："姜世伟。"他话说得太快，我晕乎乎地："嗯——陈世美？"

他伸出大长胳膊甩了两下，夸张地摇了摇头："我操，您是月亮上下来的还是从古代来的？"我满脸通红。

"对不起，我——我满嘴跑舌头了，别见怪啊。"

“没事，我大大咧咧，是什么都见过的豪客！”

“幸会啦！”

他说：“没事儿我写点儿东西，写诗。我的笔名儿叫芒克，英文的意思是猴子。哥们儿都叫我老猴儿，你也叫我老猴儿吧。”芒克眨眼时真像个机智的小猴子，肩膀和头扭动得很随性，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的全部经历告诉我。芒克是典型的情种，很爱和女人周旋。他总是热情洋溢。他有无可非议的艺术气质，还非常英俊。

芒克至今是我没有情人锁链羁绊的好朋友，所以我和这个不可多得的野秀才的相处一直轻松自如。

又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见地下沙龙的老前辈张郎郎。早在六十年代，张郎郎就因为组织诗会“太阳纵队”，被判了死刑缓期十年。当时刚放出来的诗人张郎郎中等个儿，眼睛里有着阅历和磨炼，在坐的还有郭路生，他厚厚的宽肩膀仿佛依然扛着整整一代人的勇气，还是那么帅，端庄淳朴。我握着他的手问好，看他的表情好像没认出我，他看着我问：“我们——在哪儿见过？”

“当然见过！”

“哪儿来着？”

“你不记得那天晚上，从你家窗户给我扔了一份诗稿儿？”

“喔——对，对，你和翔方在一起，对。”

为撇清自己，我说：“早就和他没来往了。”

他们在热烈地谈论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我在角落里悄悄感叹，“他们真有学问啊！”我崇拜得连暗恋的念头都不敢起。我仔细听这些前辈们侃诗，侃画，侃音乐，自然也捎带着侃侃政治，我生怕漏掉一个句子，句句像喝了上等茅台酒，在一边晕乎乎地品。

芒克热情地领着我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转悠到赵振开那儿，也就是诗人北岛。

北岛，瘦瘦高高，超级清秀的面相，眼睛不大却因为高高的眼眶，使我一直误认为北岛有一双大眼睛。但每次见他，都要推翻先前对他有大眼睛的概念，离开后闭眼再想起北岛，大眼睛的概念继续占据着记忆。多年后我们在巴黎华人区一起吃面，我谈到对他眼睛的记忆，他玩笑道：“那一定是你前世对我的记忆！”

这天，北岛家已经高朋满座，周湄英、多多、彭刚、黄锐……还有好多记不清了，他弟弟振先拉开门，一把拉我们进来后，赶紧把门关严实，怕引起邻居的嫌疑。芒克带了瓶二锅头。我和北岛一见如故，谈了一些父母家庭的境况，发现我们同病相怜，拥有类似的童年经历，更神奇的是他母亲在清华大学时还认识我父亲。

北岛喝了点儿酒，面颊马上红得让人想起“害臊的牧羊女”。大家轮流念诗，这是每次聚会必有的节目。气氛越来越热烈，北岛神秘地眨着眼睛：“今天我请客，你们猜猜看有什么？”大家七嘴八舌猜开了：

“桃酥？”

“汽水？”

“粉肠儿？”

“三五烟？”

芒克喊：“哎，中国的外国的？”

“那不行，那叫什么猜呀！”

“我他妈是一傻逼，猜不着怎么办？”芒克不耐烦地说。

“吃的还是喝的？”我问，

“喝的。”

“我操，老北岛，瞧，一见女的就酥了吧，得，得，你和李爽独闷儿去吧。”

“芒克，你真没劲，别以已之心度别人之腹。”

“啤酒。”老周搭腔，

“巧克力？”

“马尿。”芒克开始闹了，北岛拿出一个纸包儿，放芒克鼻子上，芒克大惊小怪叫道：“哎——哟！我操！上等咖啡，真他妈会过！”

北岛忙着去煮咖啡。芒克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看的新书《麦田守望者》。

“咖啡来喽！”我们压低声音快乐地欢呼。喝着热咖啡，香喷喷的热气使我想起小时候姥爷家的早餐。

最后咖啡被煮得一点味道都没了，喝起来已经像马尿了，一帮人还喝呢，一壶咖啡加了无数次热水，恨不得给北岛他家的厕所留下一吨尿。我们大唱：“所有的黑人都爱喝咖啡茶……”不知道二锅头掺着咖啡是不是有兴奋剂的作用，反正我们开始雄心勃勃地侃诗，侃画，侃文学，侃得臭味相投，侃得雄心壮志。想办杂志，想办展览，再办个诗歌朗诵会吧……出去玩吧……香山还是颐和园？玉渊潭还是圆明园？大家浑身有胆，满心是情。《今天》、《星星》已在相互吸引、给予、结合中孕育出了胚胎。

北岛每次念自己的诗时都会比平常严肃十倍，很少眉飞色舞。

我们是一群候鸟，
飞进冬天的牢笼，
在那寒冷的拂晓，

去天涯海角远征。
……

动人的故事往往发生在无任何使命感、无任何预感时的轻松自然中。要滚雪球，必须要有满天飞舞的雪花的缘，每一粒雪花都是一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的，我们都是更新万象、万物、万事的种子。

北京胡同的法国印象画派

唐平刚过来找我：“爽少爷，我要穿时髦点！一块儿去买布吧！”

“平刚，你有钱给我买油画布吧。”

“我掏钱求你给我做一条喇叭裤，怎么时髦儿怎么来。”

我说：“瞧你那德性，还没一米六高呢，两条小短腿，穿上喇叭裤像俩猪耳朵，你扫大街去呀？”

他说：“那不管，我要时髦嘛，再不怪点儿姑娘就更不看我了。”平刚自从没有得到准考证，就变得更加反传统绘画。他家的“梵高画室”也因为高考而冷冷清清，他口气如审判官，“真没骨气，我早知道你们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瞧！一个个儿全被官方的马屁艺术收买了吧！”

他还说：“少爷，等我穿上喇叭裤，我们一块去见一帮画画的，他们的大师叫赵文量。”我对认识新画家总是兴致勃勃。

我们俩选来选去买了一块线呢，天蓝色，平刚很着急，催我，“你还不快点儿裁？”我说：“我还没给你量呢！”平刚说：“别量了！就按你的裁吧！”他逼着我下了剪子，用了一个多钟头做好了。平刚试了试，穿不上，把毛裤脱了，还穿不上，大冬天儿的把棉毛裤也脱了，好歹叫他给拉上身了。穿上了可是前面的拉链拉不上，他憋着气拉上拉链以后说：“我不能蹲，一蹲就开啦！”

“那你干脆就永远罚站吧。”

平刚两腿绷着细腿儿裤，我们好不容易在鼓楼的胡同里，找到了纸条上写的地址。

赵文量的长方脸黑瘦，剃着短发。如果他坐在胡同街里你是不会从他脸上发现“纯艺术”的，然而后来的“无名画会”就是从这儿诞生的，“纯艺术”是他们的口号。

我俩畏畏缩缩地挤了进去，大家草草介绍了一下，杨雨澍、马克鲁、张伟等一帮人呢。说实在的我不明白，这些画家怎么能在这么黑乎乎的小地方，聚精会神地一起画画。画的是小板凳儿上摆着的一个酱油瓶，瓶里插着一支荷花！

主人赵文量坐在一张椅子上。猜不出他的年龄，我觉得有四十岁，可以感觉到他需要被大家尊重的气氛，赵文量笑容可掬像哄小孩似的说：“平刚找个地儿画吧，今天的光线很活跃，可以和梵高贫困潦倒时住的阁楼匹敌，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天呀，赵先生这么高深莫测的语境，我算老几呀！他又转向我：“你叫什么来着？”我都不敢正面直视他。当时屋里就一个灯泡，还给关了，一盏台灯正在营造着气氛——昏暗，有股谁放了屁的余臭。

“爽少爷，画呀！”平刚见我慢腾腾地犯呆，抢过话茬，帮我回答。赵文量让里面的人挤挤，张伟赶紧把自己的板凳递过来，冲

我笑了一下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

平刚也拿出工具，咋咋呼呼地张开左右手，把虎口上下对齐，用手指做取景框，在取景，他闭上一只眼，从手框子里看过去……挽起袖子准备画了。“嘶啦”一声！平刚的牛仔裤开缝了。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大家看赵文量笑了，便哄堂大笑。我忽然觉得很傻，替平刚难过，恨自己做裤子时没在屁股沟那儿多缝几道防线。我本来就觉得画画是很个人的表达。大家在这儿当学生，不如到亮亮堂堂的地方去画野画。

晚上回去时，平刚把书包带儿拖长，书包放在后边遮住屁股，好在天很黑，没有人追着他看屁股，只有我们俩心里知道。

我们继续和张伟、马克鲁、杨雨澍、石振宇等朋友一起去写生，他们更喜欢在什刹海、北海、白塔寺一带画。我从他们身上受到不少启发，比如我画北京的风景时兴趣投入在北京的魂魄这个主题上，画法则迂回在油画水墨之间。北京业余画画的圈子里几乎全是男性，为此大家叫我“爽少爷”，大概是一种与我平起平坐的尊称，也许这是在男人圈里接纳一个女人最顺理成章的办法，把我变成假小子，这样便多少可以平息异性相吸这种天然法则对男人的折磨。

赵文量、杨雨澍应该是北京胡同“法国印象派”的执著派。他们让我联想到中国的旧文人与西方堂·吉诃德的混合体。对庞然大物说“不”，为了维护一个没人跟他们抢的东西，也的确可爱而且了不起。

生活不是如意算盘

我一直在等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而姐姐却收到了邮电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那天在下雨，天真的很阴，有些雨天是为了洗涤人的记忆，有时却为了让人更加刻骨铭心。我家就两把雨伞，父亲有一把，他即便给我，我都不要打，太难看了。姐姐也有一把，宝贝一样谁都无权碰触，因为那是她用自己的工资，几经周折从一个女朋友的香港亲戚那儿买来的一把折叠雨伞，天蓝、青、淡紫色的底色搭配着橘红色的伊斯兰堡优雅图案，别提让人多眼馋了。

有什么东西挠着我的心，因为吕越说他收到了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已是正式学员了。赵伯崴也被美院录取了。艾未未、蒋晓珍、池小宁……我的朋友几乎都被电影学院录取，可我还什么都没收到呢！

我想在父亲下班前再去传达室看看。姐姐不在，时刻忘不了臭美的我偷出她藏在床底下的美丽雨伞去传达室了。路上的人被绚丽多彩的雨伞吸引，回头看我，细雨潇潇，我想象自己也是电影学院的学员，有点得意洋洋。

来到学院传达室门口，老头一见是我，还打了把张扬的伞，脸马上拉得像“正经人”，与持洋雨伞的我拉开了好坏的界限。我的家庭在建筑学院有名无势，人们很热衷监视李献文一家，而且面对面时是绝不会给我们好脸子看的。

在传达室前，我假笑着问：“王大爷，有我的信吗？”

他也假装听收音机入了神儿，不理我。“请问有我的信吗？王大爷！”我提高声音，他不想让人说他聋才转过身儿，眼往大钟表那滑来滑去，说：“你没看见还没到点儿呢？”

“您看看前几天的信里有我的吗？从电影学院来的。”

“你爸都拿走了，没——有！”

冒着雨，我不管不顾地去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传达室的人说：“应该在十五天以前就定局了，通知书我们早发了！”看门人还真挺好心，亲自带我去见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接待我的人见我跟落水狗似的，差不多不忍心告诉我真相。

“我被录取了吗？”我问。

“很抱歉李爽，你的颜色考得很不错，八十七分，素描五十九分也及格了，可是你政治得了三分。”

“喔，就因为政治我没考上啊？”

“政治课不是主课，但校领导很重视。电影是文化宣传品，最终还是要为政治服务的。”

“我递的预考小作品呢？请还给我吧。”她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我们在通知书上要求未录取的人在一周内取回预考作品，档案室的架子上已经空了。”

“可我没收到通知书呀！”

“不太可能，除非你填表时地址有误，即便是那样，我们也都打了戳要求退还电影学院，但退还的信里没有你的。”

回去的路，我不知是用手还是用脚走的。落汤鸡似的进家门就遭姐姐劈头大骂，“我的雨伞是不是你偷了？”这时我才发现，我早把美丽雨伞忘脑后了，现在美丽雨伞是忘在车上还是忘在电影学院了我都不清楚。姐姐痛哭雨伞，喊着让我赔，我痛哭没考上电影学院，我觉得自己是个丑小鸭。

我当时断定自己是庸才加倒霉蛋。我断定能考进大专院校的人都有“开后门儿”的钥匙，中国的高考没有变。我希望拿出一百个理由来支撑自己的艺术，但无奈还是灰溜溜地评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我想去找姥姥聊聊，天气晴朗，夕阳把我骑车时的影子投射在街道上，我开始鞭笞自己：“看你多难看，板砖似的，要什么没什么。”

骑到筒子河，“嘀嘀哒——哒哒哒嘀——”，清脆又鲜亮的小号声刺破故宫压抑的厚墙，给我沉重的心输入了些许氧气，忽然想起那两个吹号的小伙子。一种直觉督促着我，我立刻转过沙滩往故宫方向骑去。

杨清平见我过来喜出望外：“哟！你来啦！我还想呢，怎么李爽说回来画画一直没见人影儿啊？”

我问：“盛年呢？”

“我通知他。”清平把小号放嘴上“嘀嘀嘀——，哒哒嘀——”吹了几声，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信号，很快盛年闻声而来。我们三人坐护城河矮墙上聊天儿，我话少了许多，只听他们天南海北的聊。盛年觉得我和头一次见面时不太一样，问我的画画得怎么样了，我支支吾吾，盛年又问：“你到底考上电影学院没有？”我很丢脸地说出没考上大学。我诉说着考试和落榜的前后经历。

“他们跟你说为什么了吗？”

“我政治考三分。”

“嗨！因为这个没考上太冤了，政——治！大学生、小学生都是一个题，一个水平，最容易不过了。”

清平说：“哎，盛年你爸不是在青年艺术剧院做舞台美术吗，让你爸给李爽找找路子？”

“行呀，你有小作品吗？给我一些，明儿我拿给我爸看看。”

我不自信地说：“行吗？人家电影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分配都不一定能分到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盛年道：“还真是，而且舞美的美工活累，一般不要女的，我不保证什么。”

清平说：“李爽试试呗！你就当有一搭无一搭，总比待在乡下好，农村哪儿是你这种人待的地儿呀。”

第二天，我拿了两本插队时的小画给盛年了。“盛年你就当有一搭无一搭呗。”当时的作品尺寸在十到二十公分左右，三十公分已算大画了。

我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屡屡失意的生活经验，已经让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概念——即便有馅饼，也不会有眼无珠地掉到我头上来！所以我用不着怕馅饼砸破头。这是我自嘲时的口头禅。

一村的男人女人

带着对未来的忧心忡忡，带着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救命稻草的绘画工具，我回村了。蓝天白云下，远远望见潺潺的流水，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青黄不接的田野，一村还站在那儿等我。我步步接近一村，路边汉子们冲我笑，露出被烟熏黄了的门牙，土色的面孔、脏话、卷烟、敞怀喂奶的妇女、光着屁股吸溜大鼻涕的小崽子、打情骂俏的姑娘与小伙，这一切虽然与我的成长背景格格不入，但是一村儿不卑不亢的恬淡与平静，带给了我多少安慰呀。我回来了，

大家没有欢天喜地也没有责备嫌弃。这里的人，辈复一辈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没有为别人的真理过多地绞尽脑汁，也没有为挽救人类、为出人头地你争我抢地当英雄。

宿舍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宝青她爸被判刑，宝青也已经被遣送回老家。

一村一共九个知青，有三个考上了大学，两个回北京当售货员，两个病退回北京，一个和高爷的儿子——新上任的年轻书记结婚了，听说结婚前她肚里已经怀喜了，非嫁不可的事儿。我成了知青留守处的光杆司令，在空屋中我哭笑不得，倒头大睡到第二天下午。起来后呆呆地看着久违了的知青院，它衰老了许多。我点燃了人生中第一根自愿烟，呛呛的、辣辣的、难闻的、噎人胸口的烟，现在忽然成了我的新伴侣。但是，面对还没有演完的生活全剧，请别对小情节过早表态。

灵感来了，空屋空铺板，哇！女梵高的画室！我乐出声儿来，赶紧画画，画到天昏地暗，开灯后照画不耽误，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想起吃饭问题，我跑到伙房一看，里面黑咕隆咚。这时闻到旱烟味，来人正是队长高震来，我说："队长，我的伙食谁来安排？"

"谁？你自己呗！"

"我的炉子都被搬走了！"

"李爽，我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就你一人儿了，我给谁开饭呀？"他嘿嘿笑了，我饿苦了。

他说："家儿来，我知道你饿了自己会来找食儿的。"高家炕桌上坐着老娘高奶奶、媳妇玉莲、俩儿子大冬瓜、二冬瓜、女儿小不点菊子，一大家子稀里呼噜在喝粥，吃咸菜、烙饼什么的。高奶奶说："吃，李爽，填饱肚子有了精气神儿音不走调儿，人踏实了，再

说话也不晚。"我不客气地大吃起来，直到饱嗝堵嗓子眼儿上，才腆着肚子靠在被垛上。队长告诉我，全公社没几个知青了，据说你们已属于待业知青，北京市要统一分配。你就等着好活吧。"有几个邻居来串门，进来东家长西家短。高奶奶要求我给她画像，我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了。高奶奶坐炕上，可能刚洗完脚没穿小鞋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双裸露的缠足。过去听人无数次说到三寸金莲，什么老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是新中国长大的女孩，对小脚老太太多少有些歧视。高奶奶的脚比她的手还小，好几个脚趾都卧倒在脚心里，看上去好像有几个肉蛋违反自然规律，从脚心里歪歪扭扭地长出来。年复一年，这几个脚趾已被踩得扁平，趾头翘起，依稀可辨上面那些怪怪的趾甲。腿上没有曲线，如一根尖尖的竹竿儿，脚后跟儿是一个肉疙瘩。其他，我已经无法再看下去，一概呈现出可憎的混杂轮廓。那是美吗？那是纤小美足步步生莲花吗？残酷的畸形，震撼着我同属女人的心。高奶奶怕惊吓小孩似的到处寻找自己手缝的袜子，我说："高奶奶我又不是外人。"

"谁也没把你当外人，你不也姓高吗？"

"我怎么姓高啊？"

"你不是老念道什么，你是女'房高'的么，你还说外国人的名字和姓是反过来的！告诉你吧，震来他们背后都叫你高房子！"她露出秃牙床子哈哈大笑，笑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原来高奶奶他们如此专心地倾听我的胡言乱语，"房高"其实就是法国画家梵高。

"裹脚时您疼吗？"我还念念不忘缠足的事，又问她。

"闺女，眼神不济纳鞋底子时针扎着都得疼钻心，裹脚跟宰猪没什么两样儿。"高奶奶坦然地摆了摆手，但飘浮的眼神显然流露出可怕的记忆。

“不裹行吗？”

“不行，女孩快三岁了也就是小不点儿菊子的岁数，家人就必须张罗裹足了，菊子要生在旧社会，她也该裹脚啦！新社会旧社会的，反正女的都不如男的中用。”

“那把女的脚裹上就更不中用了。”我几乎愤怒地说。

“女的没裹脚一辈子嫁不出去，没有一个男人要娶大脚怪物。”

“要是我，一辈子不嫁也不裹！”我非常生气，生谁的气？我不清楚，社会？男人？世界？还是憎恨弱者受苦？

“我能再看看您的脚吗？高奶奶。”

“这丫头真逗，你要是不害怕就睁眼看吧，玉莲儿她们可害怕看，说像怪物，我都等他们出工以后才洗脚。”我伸手摸了摸那“怪物”，大活人的脚小得和三四岁孩子差不多，这只面目全非叫脚不是脚的器官，使我肩头发冷。想起在姐姐上班的同仁堂库房里，我见到过的一幅古代中医脚部穴位图的木匾，祖先对脚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性了如指掌，却要弄残女人的脚。为了显得比女人威武？那可不光是高奶奶的脚，是所有中国人的奶奶、妈妈、姐姐、妹妹和女儿的脚，残疾的中国女人能生出强健的男儿吗？男儿不强健在强健的外国男儿面前怎么办？我拿出画箱边想边画高奶奶。高奶奶摆好姿势，仿佛这是她一生中抛头露面的大事情，她微笑着，要把自己一生最好的状态留在画布上。那是一个极为美丽的老妇人，一笔笔，我画得什么都不存在了，除了高奶奶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高奶奶的一生在我的笔上熊熊燃烧。这次画像，我发现画画已经变得次要，画的过程可以萌发出自己与万物的真实联结，画画是我与世界沟通的工具。

我想下田就去，不想就画画。

我在村前村后，一棵树下，一座房子旁，一片田地和一堆麦草前发呆，我常常只是看，看的本身已经很享受，不是思考画面的结构，是借艺术的动力活在生活深处，不是想画单一的什么，而是画全部的土地、天、我。几只鸡“咕咕”叫着路过，它们走近我的画箱，圆溜溜的眼睛外圈，有淡淡的白色，红色的鸡冠子有点儿耷拉，“叽咕、叽咕”地晃着歪过头儿来看着我……这些鸡也成了我绘画内容的主角儿。

一块块暖红、冷紫，融融的橘黄，欣慰的蓝，和暖的灰色，颜色之间光线所折射出的另一种关系，给了我一种合一而纯真的印象。高奶奶更新了我对颜色的认识，我有些明白何为“印象画派”了。在北京时我总喜欢把“法国印象画派”的洋名字挂在嘴上，尽量表现出自己不是一个没有绘画知识的白痴，但没有灵魂的融入，没有与万物发生联结的艺术家就是白痴。

这种写生仿佛带有禅的味道，画者自己也是景中之物，描绘大地和树林的轮廓以及凝重的线条，对自然饱含敬畏，陶醉在昆虫鸣鸣，鸟儿啾啾里。云影天色，含情草木，为山川动容献意，画笔成为记录感觉的服务工具，每画一处自然风景，都像一次心灵的冥想与深造。我愈来愈迷恋绘画的过程。

有一次，队长带我们一班人马去最远的玉米地施肥，他见身边全是同姓亲信，就叫上我们一块儿到冤家——四队的菜园偷菜，“他们丫偷了咱们的水，才浇出那么好的园子，不行！今儿，咱们去收获咱们的果实！”

肥壮的黄瓜、大西红柿、香菜、韭菜、茄子……队长用麻袋兜着，我从来没有这么理直气壮当小偷过，觉得非常过瘾。其中的乐趣不是偷到的东西，而是在禁区冒险的狂野兴奋。放哨的人用草叶

尖锐地吹响了撤退信号，大家慌忙从两村交界的篱笆钻出来。在渠上，吃了一个肚歪，西红柿汤儿顺胳膊肘子乱流。

这时，老远颠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司机福子冲这边叫道："队长——李爽跟你下地了吗？"福子是外姓人，队长又吃得正香，道："讨厌，啥事急成那样，都不能等到收工呀？"

"一辆北京来的汽车找李爽，来人还挺体面的，非叫我来找。"

知青院，入口一条小土路，吉普硕大的车身有挤塌知青院墙的感觉，因为这条土路只见过马。我怎么也猜不出为什么有车来找我？"倒霉"的习惯又启动了我怕倒霉事的过敏神经。搜寻着近来自己是否有对社会主义造成威胁的坏行为，"没有啊？除了刚才成帮结伙偷菜来着"，我知道自己又在胡乱吓唬自己。一帮小孩围着吉普，见了我都争着抢话："李爽，李爽，找你的！找你的！北京来的！"小孩揪着我衣服的前后身和我的双手，我负重拖着一帮小崽子挪近吉普车，靠在车鼻子上抽烟的男人笑脸相迎。

"你准是李爽吧？"

"哎，是，是！你是——？"

"我是青艺派来的司机，你叫我小钱好了，我有封信带给你，顺便接你回去。"我一向告诉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你也别往天上看，冲天做媚眼儿也没用，人家老天爷不待见你，你也别下贱自己，好歹还剩下些自尊，乖乖干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儿得了。

我吃惊地问："去青艺？我还没考试呢？"

"派我来时盛老师说录取你了，听说，他们到处找不到你，都快放弃了，你的一个朋友跑了好几次北京知青办公室，愣把你插队的地址找到了。"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着着实实砸到了我的头上，哇！

我和村里人难舍难分，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他们了，堆在院里谁家需要什么就拿好了。我恨不得自己能变出更多东西来给他们，一村给我的好东西太多了。在这里的三年，我恢复了对人情的信任，这期间我发现了颜色，这段日子给我的生命启示——走进自然，发现飞向永远的力量，那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队长让我说点什么，我说不出来。大家都问："还回来吗？"

我说："小时候我的同学过年、放假，老快乐地喊'回老家啦，回老家啦，'我没有老家，现在我也有老家了，一村就是我的老家，瞧，现在我还没走呢就已经想一村了……"我哭了，高奶奶哭了，会计翠芝更是哽咽着过来拉我的手……高爷说："别哭呀，人家去北京当大画家了，可老家是一村，赶明儿咱们也进城沾光去。"

高秃子说："就是嘛！反正李爽现在姓高了。"他逗闷子地问大家："李爽叫什么来着？"大家一起说："高房——"女人们也全破涕为笑。我把最后一个裹着蓝毛线的小辫绳儿给了一个小丫头，她把自己的猴皮筋给我做交换，因为我的头发散在脸上，小丫头她妈帮我拢成一根马尾扎好。

车开了，我只有一件东西不能给任何人——画具。

离开了一村，潺潺的流水，翠绿的田野，连绵的燕山山脉，黄昏的阴影渐渐罩住一村，好像给它涂上一层蓝色的保护色。三年前来时，带着满脑袋对"落后农民"的歧视，我踏进一村。在这里，我度过了吊儿郎当的三年，我画天、画地、画树、画村儿里的男女老幼，没有谁对我严加管教，强迫接受再教育。为什么？

从车窗后望着他们，老男人的黄牙、土面、脏话、卷烟，开怀喂奶的妇女、光着屁股吸溜大鼻涕的小崽子、打情骂俏的姑娘小伙，一片目送手挥。"真没想到你和乡下人关系搞得这么好！"小钱感叹。

"嗯。"我不想回答小钱，摸着怀里的花画箱，颜色模模糊糊眼泪刷刷的。

望了一村最后一眼，那个"为什么"便豁然明朗：脑袋里的主观成见是无法阻止心灵自发之爱的。那是简朴的情感作用力的互动，爱不是书里的美丽辞藻，爱是每个独立的个人与生俱来的深层本能。

人很喜欢探讨生命的意义。插队使我对人生的看法简单化了，生命的意义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真正需要审视的不是社会，是自己。

人只有在不比较时才可能返璞归真。当你面对夕阳、湖光山色、小猫的眼睛、久违的朋友，你说："没时间，下次吧。"说明你不许自己与美立即发生关系，你追慕的只是未来梦。

我祝福一村永远贴近地球，不追随谁，永远躺在黄土的怀抱中过和土一样神圣的日子。

后来我三年五载的常回去。十五年以后又回了一次，我没有找着一村，一村已经淹没在水泥建筑中了。

5

The fifth part | 第五部分

回到北京

家里人，尤其是父母乐得合不拢嘴，提及孩子们的归宿时，也可以扬眉吐气地提一提爽子了。“常常为她担心，老二这下子可有出息了！真没想到啊。”

我在北京骑着车，满世界晃荡。心情好，看什么都美仑美奂。

西城区、西单西四、沙滩大街，一路到了故宫筒子河，我停下来听听，咦？怎么没有青平、盛年的小号声？又蹬车继续前进，中国美术馆，艺术的最高殿堂就在前方，我停下来半闭了一会儿眼睛，一个小小的大梦：有一天像陈衍宁、陈逸飞、汤小鸣那样，我李爽也可以登堂入室，在中国美术馆展览一回。一转念：“哦，还有陈丹青、罗中立……这么多的大师呢，什么时候才轮上我？我太业余了。”再想想：“也不能说自己太业余，不然人家青艺要我干吗！”一会雄心壮志、一会焦虑自卑。人真是劳累的蜜蜂，被思想噪音指挥着，永远嗡嗡嗡重复的唱着两首歌，跳着两个舞——无限自卑和无限自大、没有平衡。

离开美术馆，我蹬车继续前进。天安门、王府井，到了东单头条——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停下来看着门口的大牌子，我未来的单

位就在这儿啊！我没有进去，仿佛进了就将再度失去逍遥。无论是多么堂皇的地方，无论是哪一盘棋，一旦进入游戏的框框，你就是一枚棋子儿，失去自由的权利。

几句记不得从哪儿看来的诗，突然从我脑中跳出来：

…………

吃掉官僚主义，

我是狼，

证明文件，我看不起，

任何公文纸张，

全滚他妈去！

…………

不过有一点使我非常高兴：青艺离姥姥家很近！

芒克来找我，“走！有几个哥们带着几个美妞到香山玩，咱们也去。”

“好！”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去香山的汽车站上，来了不少人。我背着画箱，准备去写生。

人堆里最漂亮的小伙子过来和我搭讪，说：“我叫严力，早就认识了老猴子，也喜欢写诗。”严力身边跟着一个叫美美的美妞，他们刚认识几个星期，现在是情人，据说芒克是媒人。美丽女人用不客气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把我当临时掉进喷香浓汤上的一根脏头发。我的确穿戴寒酸，蓝衣蓝裤上东一条西一道的颜色。我也并不友好地想：“花里胡哨的怯丫头，穿得跟插在草剁上的糖葫芦似的，还嫌不够热闹，在头上插着红色的绒花儿。”

自命不凡的我，不耐烦中掺杂着醋味儿。女人犯起小心眼来，可了不得，相互可以容忍的缝隙小得可怜，最终肯定会把缝隙里男人的心挤烂。

晚上回城里等公共汽车时，严力松开美美拉得死死的手，过来问我："你跟谁学的画儿？"美美监控的眼睛近乎疯狂。

我没好气儿地胡说："我姥姥！"

"你姥姥是名画家吗？"

我觉得严力真是个风流漂亮的家伙，而美美在旁边像个会跳秧歌的糖葫芦，就没好气儿地说："我姥姥是胡同串子！"

严力脑袋也转得挺快，道："那今天就是星期八。"

我马上说："所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们爆发出一串大笑，美美见势不妙，再不使出浑身解数套牢情人，恐怕太阳真的会从西边跳出她的视线，而不再为她升起，就撒娇地搂着严力一通亲嘴。

一场没有准备的艳遇，没准是命中注定的真关系，关系的地久天长都不是想当然，也躲不了无常宇宙。所以不用在乎记忆美丽与否，旅途上每一个关系都为你的成熟立过功劳，关系是镜子，没有镜子来关照你，你不会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儿。

车到了北京动物园，大家准备各奔各家，严力、芒克又过来约我去玉渊潭看我写生。

第二天，我的心思不在写生上，画画的定力大减，颜色越抹越糊涂，画得很难看，幸而他俩心思也不在看画上。这两人在我背后转来转去，我假装认真，盼太阳下山，太阳下去就有借口不画了。

离湖不远，有片槐树林子，林子里稀稀拉拉几块大石头。气氛

紧张，三个人怎么弄啊！我们把近来能看到的新书评论一番，大家把本事亮出来，你看几本书，我看几本书，你写多少诗，我写多少诗。芒克是胜利者，因为他带来了真家伙，一本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我坐中间，严力坐左边儿，芒克右边儿，他用打火机照明，说："哎，听听这首诗。"

他朗诵起来，没想到男中音在黑暗中会变得如此好听，停顿时仿佛还有昆虫伴唱：

只留下梦影依稀，
就像对着遗忘的画布，
一位画家单单凭着他的记忆，
慢慢描绘出一幅草图。
躲在岩石后面、露出愤怒的眼光，
望着我们的焦急的狗，
它在等待机会，
要从尸骸的身上，
再攫取一块剩下的肉。
可是将来，
你也要像这臭货一样，
像这令人恐怖的腐尸，
我的眼睛的明星，
我心的太阳，

他的打火机灭了，严力赶紧接过诗，继续用自己的打火机照明，小小朗诵会得以继续下去：

你、我的激情，我的天使！
是的！优美之女王，
你也难以避免，
在领过临终圣事之后，
当你前去那野草繁花之下长眠，
在白骨之间归于腐朽。
那时，我的美人，
请你告诉它们，
那些吻你吃你的蛆子，
旧爱虽已分解，
可是，
我已保存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

严力的火机摇了摇就寿终正寝了。我不懂这些诗，但我喜欢这个晚上，我喜欢这两个非凡的朋友！那还留在石头上的太阳余温与晚风里阵阵凉气的拥抱，带来了植物的馨香。

“你什么时候给我画像啊？”严力说。

“明天吧。”我说。

“好啊，明天正好我休息。”

第二天，我提着那只老画箱到严力家去了，我画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他穿了一件色彩明亮、蓝色和黑色从肩膀到后腰斜条对织的毛衣，很洋气。他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这种风

度。风流倜傥的严力，使我激情迸发，我用画笔与他的气场交流。严力大概不情愿被画家忘记，为了夺回风头儿，他抱着吉他唱起来：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
美丽的眼睛人人赞美她。
姑娘你和我说句话，
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
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就走开啦。
你呀！你呀！你呀！
………………

哇！这个男人太风骚了——我多么需要听到男人的赞美啊，如今借唱歌赞美我的男人还是头一个。他一遍遍唱得眉飞色舞，我飘飘欲仙，俩人就这么情投意合了。

卧虎藏龙的文艺界

再不去青年艺术剧院报到，那将是对前途的自杀。父母急了，“你是不是火星上来的人啊？太不懂地球人的事啦！你再不去上班儿，就嫁人吧，给我搬出去住！”父亲对我发出最后通牒。

母亲唉声叹气，“别一天到晚弄理想，谈纯艺术了，时代不同了，

别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搞艺术的也得吃人饭啊。在青艺干不就是变相的吃艺术饭吗？”

父亲说：“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工作，人家都打破头上赶着抢！”

第二天我就上赶着去青艺报到，一切都很顺利，我签上名字，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枚棋子。

我每天从西城骑车到东单北极阁三条七十一号的“大庙”上班，这座建筑是清雍正年间的宁郡王府。院内很特殊的建筑风格，使我马上忘记对上班的反感。

那座建筑翘角飞檐，各殿屋顶在太阳光的折射下，微微泛着碎暗的天光，依稀可辨王府当年的气势。制作布景的车间就安排在正庙里，宁郡王的魂儿大概没有预料到自己祭祖的圣地会成为木匠们耍把式的车间！这座大宫殿改造的车间乱七八糟，堆满木头，只有进门处还可以看见原来的大青石地板，恐怕自打青艺入主，就没有清理过尘土、锯末和刨花。

盛锡珊见到我上班了，当着别人面没好意思发火，说：“哟！你就是李爽啊，可来了！”之后他一把把我拉到办公室里，半玩笑半认真地压低声音，道：“李爽你再不来我得把我儿子盛年送精神病院了。”

“盛老师，您什么意思？”我问。

“舞美队都等着我亲自录取的新美工上任呢，左等没人儿，右等也没影儿。我心说那个画画的女孩可能压根就不存在，准是盛年在故宫爱上鬼了，你说说我该不该送盛年去精神病院？”

“盛老师您千万别生气，我在乡下懒散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还特喜欢这儿，您就原谅我这回，我保证给您好好干！”我嘴甜了一下，盛老师才放了我。

舞美队在右侧一排古老的二层翼楼上，舞美队的头儿毛金刚和元老陆阳春、周正、盛锡珊等都按级别在里面的办公室，而我和王燕洁、小廖在楼梯入口的几间办公室。我的办公桌右边整面是玻璃窗，很亮堂，坐着可以观赏到一点点飞檐灰瓦，栋柱上已无任何油彩，地板很考究，宽厚、结实，却破旧不堪还脏兮兮的。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这地方！

据说一九四九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后，王府就交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使用了，往昔的歌台暖响，舞殿冷袖的繁华一去不复返。这使我想到姥爷那百十栋房，不也是一觉醒来就被充了公吗？无常才是世界的主人，人生显然如梦。而新主人——青艺舞台制作队的人都亲切地称宁郡王府为大庙。

青艺的舞美、化妆、装制、灯光音响、服装都在大庙里，食堂也在大庙，大家碰面只有吃饭的时候。

我在青艺度过了一段短短的时光，却非常快乐。

我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文艺舞台上的第一个洋戏《伽利略传》的舞美制作，四五个月紧张的连轴排练，上上下下从演员、舞美到装置、服装，整个青艺像集体抽了白面儿一样兴致勃勃。中国文艺界的大拿黄佐临也被导演陈颙邀请同台指导。舞美队长毛金刚告诉我们：“这出戏我们不能自己靠资料来设计，需要舞美界留过洋的大拿来撑着，所以请薛殿杰同志来指挥舞台设计。让我们新来的小棋子儿赶紧给薛殿杰腾屋子。”

周正把资料室找来的意大利浮雕照片交给装置队做假城门，装置队的说我们不会雕塑呀！后来盛锡珊、周正带上我一起到大庙装置组车间，用胶泥先雕出一个浮雕，再请装置队的人复制。我们在一起忙活了一个多月，为洋戏《伽利略传》的出品天天晚上加班。

由此我认识了几个装置队的朋友，安子朝、张震燕、张申健、曹和建等。张震燕中等个儿，看上去其貌不扬，干起活儿来像只小陀螺，转得你眼花缭乱，还没醒过闷儿来呢，他早把应该做的做完，还没谱的也被他理出头绪来了。他后来做了张艺谋的制片主任，“文化大革命”后为中国电影重整旗鼓立下了汗马功劳。张震燕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都是实的没有虚晃。当他脸上挂出明慧的浅笑时，让人更无法推测他还有多少潜能。小安子更逗，他有儿童般的面孔，工作时也像是在顽皮，但这些都只是他给人的一种错觉罢了。在制作洋戏《伽利略传》的个把月里，小安子变戏法似的用纸壳、塑料，木头等材料，按照片做出了一桌欧式大宴席，红是红绿是绿，肉像肉菜像菜，跟真的差不多，让人想冲上去大吃一顿，连最棒的老前辈都看傻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各种渠道涌入了许多香港的音乐磁带，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几乎在大街小巷的窗户后面，都可能藏着香港的靡靡之音。张震燕父母在香港工作，所以他偷偷带来了一台录音机，在当时这是极为罕见的宝贝级别的东西。另一个朋友带来了一盒磁带，录有靡靡之音的皇后邓丽君的几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美酒加咖啡》。晚上加班时大家精神头儿就来了，催促震燕拿出录音机来。他爬进木料堆，从里小心拿出宝贝录音机。外面已夜深人静，我们五六个年青人，回回被邓丽君甜蜜的歌喉引得五迷三道。正赶上《伽利略传》话剧中有一个宫廷舞会的过场，青艺就此开了西洋交际舞的大戒——好家伙，青艺上上下下，从党委到我们这帮舞台生产队的小棋子儿都到排练场去学舞。中午在食堂吃饭，有个很滑稽的演员站在食堂长板凳上敲打着饭盒：“大家请安静！你们知道现在新上任的音乐部长是谁吗？”大家异口同声道：“邓丽君！”大家举着馒头、饭盆跳个不停，正在洗碗的人也扭来扭去任龙头里的水哗哗四溅，仿佛中国人在交际舞中得以满足多年来的肌肤饥渴。

我也在每回晚上加班时和舞美、装置队的同事跳交际舞，可就我一个女的，大家都抢我，最后只好让小安子、张震燕也假装女的伴舞，才可以平衡一下这个缺少女伴的现实。我们热热闹闹一同欢乐：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别离后
何时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
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哎！
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别离后
何时君再来…………

邓丽君并不是世间唯一的好歌手，但她的甜蜜歌喉带来的绵绵温柔之雨，对我们久旱苦涩的心来说，是无比珍贵的甘霖。

一九七九年三月，话剧《伽利略传》终于公演了。演到第二场时，就已经空前轰动！以后每场爆满。“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外国戏剧的上演，在一个绝不是偶然的时期出现。它是渐渐融化了的文化冰川上的一棵嫩绿小草，带来点点春意。舞美队每场都要有两三个跟戏的，我有时被派跟夜班儿，一次夜班的加班费是四毛和一顿夜宵。我们连续演了近百场，场场满座，并且电视也向全国转播。

话剧《伽利略传》的历史意义，潜藏在它的台词之中，那句台词是这样的：“把人从对神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吧！”中国民众的心声很明确：破神的权威，立人的尊严。

一次跟夜班戏，我坐在剧场最后排困得不行打起盹儿来，台上演，我睡。忽听到旁边有“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声，接着是“喀嚓喀嚓！”的响声。我醒来，见座位边上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儿在忙着拍剧照。我赶紧坐好，拢拢头发，觉得自己像点样儿时冲他笑笑，他戴了顶羊剪绒国防绿帽子，我们之间马上自来熟，我问：“热不热？”他恍然发现工作时忘了摘帽子，他头发不多，已经汗湿贴在额顶，他推推眼镜压低声音，说：“哎，你是青艺舞美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也低声问他。

“我来帮青艺拍剧照，本来需要一个人帮忙拿器材，后台马志泉说，他的人马正在后排闲着，叫李爽。他强调：‘别老让大小姐吃滋润饭，找她干活去，就李爽一天到晚最轻省！’可我见你睡着了，就自己解决了。”

“现在你还需要人手吗？”

“完事儿了。”他掏出手绢擦擦镜头。

“你叫——？”

“李晓斌，实验话剧院的舞美兼摄影。”

“我叫李爽，木子李，爽快的爽。”

他往上推推眼镜：“咱俩是一家子！

“你的相机真牛！”

“我操，要是我的就好了！连镜头都是借的，150mm莱卡。”

散场后他等我，我取了车和他一起往天安门骑。我们在城门楼的汉白玉桥停下来，李晓斌变得非常健谈，机关枪扫射一样，指指点点：“四五天安门事件时因我家住旁边，天天去拍照。”我也谈起那天我骑车突围的故事。半夜三更我俩回顾当年的英雄事迹，自然躲不开年轻人的炫耀，并且把当年最害怕的时刻隐藏起来不提！好像四五天安门事件都是我们俩人儿干的，又都姓李，绝对臭味相投，直到巡逻大兵过来赶走我们。

后来他一有空儿就来找我聊天儿，一定要我去他家看照片。

在东交民巷二十七号旁门，一间平凡的房间里，晓斌藏有一抽屉照片、胶卷。形形色色的社会状态，所有的脸都是如此真实而震撼：上访者的人像，街头值班的工人民兵，跳舞的男女僵直而不敢过分摩擦身体的舞姿，被春风撩起的骑车女人长裙里的一瞥……

从晓斌那儿，我又认识了王志平等摄影界的朋友，他们都是后来“四月影会”的创始人。当时星星美展后，紧跟着摄影界的朋友就举办了《自然 · 社会 · 人》的展览。

他们的黑白照片所记录下的场面——那些表情！那些只有在特定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信仰下才会出现的脸、表情，不知现在的人看了作何感想。

李晓斌对我的倾心像个冒冒失失的野小子，也是天才们典型的

行为方式——不管不顾只要喜欢就急着一口吃掉。他说："我跟女朋友吹了，咱俩挺合适。"

"晓斌你轻点拉我，我有朋友了。"

"你说，他是谁？"

"你管得着吗？"

"偏管！"

执著的晓斌长着长圆的脸，胖嘟嘟的嘴拧成了一堆皱了的纸团，他不是个标准的俊男孩，但他很内秀，他像一只"艺术狼"，对真实的嗅觉异常敏锐。从他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拍照时的果断。同样他追求起女孩儿来，绝不拖泥带水的冲劲儿，我也是领教过的。

后来中国实验话剧院与青艺合并了一段时间，晓斌竟然被分配到我对面的办公桌，和我成了同事。他一直是我心中一个特可爱的"战地摄影师"，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

还有一个演员，叫李辉，我们是通过借碗、借饭票认识的。她来食堂吃完饭，午休时常常来我这聊天儿。一回生二回熟，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正兴喇叭裤，上紧下宽，加上掐腰大花衬衫，百分之百尼龙，再穿上高跟儿鞋，是最时髦的打扮，李辉在香港有个姨妈，给她弄来好多香港服装，我、李辉、严力经常一块儿臭美。

我帮严力做衣服，或是把外面买回来的肥裤子"咔嚓咔嚓"剪了，重新改制，紧得屁股沟子都勒出来了。坐街上乘凉的老头老太太眼睛追逐着我们，看够了之后再用指头戳后脊梁，"臭流氓！"

"星星"开始发光

我每天下班路过西单民主墙，在那儿我发现好多民间的刊物。《启蒙》上黄翔的爱情诗，《探索》上的"第五个现代化"。

诗刊《今天》，有北岛、芒克的诗，曲磊磊的插图，马德升的木刻。我没想到，也想不到我将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新文艺复兴的奠基人。

每天下班，我只有一个念头：画有创意的作品。我家里完全没有地方画画，青艺有地儿，可我不敢让青艺的老师们看见我的作品，那无疑是自找麻烦和被奚落的事。但什么叫有创意，我不清楚，有时和装置队的小安子、张震燕说说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他们喜欢听但帮不上忙，我很高兴地说因为这使我感到在青艺还有几个知己。

有一天在北岛家，黄锐问我："听说你是青艺搞舞台美术的，能看看你的画儿吗？我们想搞一个展览会。"

"来吧，我的画都在严力家。"

第二天黄锐就来了。

黄锐高个子偏分头，一副琇琅架黑边眼镜，镜片后面一双典型的好学生似的小眼睛，给人一种温厚感。实际上他很浪漫，他眼睛里跳跃着火星，转过头来，厚厚的嘴唇咧开一笑，"真不错，来吧，来参加我们的展览会，我们就缺个女的，回头我跟老马说一声儿。"

"老马？"

"见到你们就知道了，他是个偏执狂。"没过几天马德升和黄锐真的一起来了。马德升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后遗症，拄着双拐，可他

凛凛带风的行动让人吃惊。大大的嘴巴，深陷的眼窝里炯炯有神的双目，感人至深。

“《今天》上，‘卖冰棍的’木刻是你的吧？”我问他。

“没错！”

黄锐说：“老马，李爽的画儿很有想法、也很现代，让她参加展览会吧！”

老马：“挺好！就是她了，李爽你干吗不再大胆一些，有理想就冲上去！”老马的性格不是穿越峡谷的江河，是没有回旋余地的瀑布。那天我也被卷入了激流。

对画画我有数不清的主意，却感到因为没有坚实的素描基础而受阻，一幅又一幅地画草稿、画小图，都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又去画素描，不到半小时就烦死了。

现在我认为——天才与拼命努力和绞尽脑汁去思考，原本是两码事，天才是在轻松的状态下接收灵感，本身是没有目的的。真正的天才是那些在创作时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的家伙们!

但在七十年代，追求个性等于自杀行为，所以敢于无法无天地感受美的家伙实在不多！因为追求美本身就充满了冒险与挑战。

平刚和徐星来找我，问为什么老不来“梵高画室”画画了，我兴奋地告诉他，我认识了一个叫黄锐的，我准备参加一个“星星”展览会。他不高兴地说：

“爽少爷，你也终于被政治的糖衣炮弹击中了吧？”

“平刚，你一定要参加‘星星’！”

“不可能，连冲着你的面子我都不参加！”

“你别自命不凡！”

“我认识那个四眼儿，他也找过我，我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弄诗的人和搞民刊的人正在污染艺术，他们搞的那套东西，不纯！”

“你的梵高画室不也是个小山头儿嘛！”

“爽少爷，反正你跟他们弄一块去，没前途！”

他的话中掺杂着明显的醋意。一会又噘起嘴特难受的希望挽回僵局，“爽少爷，真的，梵高从来都没有依靠过团体，当年高更和塞尚来找他……”

“又是印象画派的一连串名字，烦死了！”我说。

“行了行了！那你看雷诺阿和莫奈……”

“又来了，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你又没有蓝眼睛金头发，干吗老想那些死老外。我已经答应了黄锐。”

平刚向来不愿意和我吵嘴，就说：“那我们去找赵文量、张伟、马克鲁，他们也在弄无名画会什么的，总比和颓废诗人为伍，沾染政治好得多吧？”

“反正我想参加‘星星’。”

张伟、马克鲁，我和他们在一起玩特开心，可是跟他们一起画画我觉得太累。他们特认真的白天去回味晚上的印象，特意在晚上去追求对夕阳光谱一瞬间的印象。那种画法儿我觉得太深沉，很累。

平刚就说：“那我们去看薛明德。”当时薛明德很狂，在街上拴起绳子办露天个展。他小小的身体蕴藏着极大精力，越有人就越来劲的那种性格，最后到疯狂的地步。当着众人，他用画刀往画布上猛甩颜色。老百姓有多少年都没见过惊险的耍把式了，尤其用画画的形式，绝对前卫新鲜，人山人海地看。平刚急得手足无措，真想跟着闹，可薛明德不想让别人抢他的光辉。

七十年代的我们、他们、你们，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们，物以类聚地活在一个了不起的时代里，谁都不想停下来做观望者。

有很多人美化当年，其实那是对生活的否定，当初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人无法逃避星球的昼夜旋转，活在速度中的我们不会眩晕，像坐在火车上的人，是不可以同时从外面观察车速的。生活使我们来不及预知明天。

严力喝酒后常来灵感，写诗，再喝酒，再写诗……结果胃穿孔了，我用自行车推他去医院。

有一天我下班儿，到了严力家，看墙上有一张画儿：一个绿头绿身子的人看着月亮。

他问："你看这画怎么样？"

我说："是平刚画的吧？"

"不是，是我拿你的颜色和笔画的。"

"哎！有点儿意思！来啊开始画画吧！"我要教他，但他的笔不听话，抛开基本功直奔主题。

我们的圆明园

嗨，圆明园！我这个年龄的人，尤其是那些与美结下不解之缘的人，没有不认识圆明园的。我的姥爷姥姥都是这座昔日世界上最美、最艺术的皇家花园的迷恋者，难怪他们有一座别墅在圆明园附近。圆明园用她的经历，对世人说："敢于拥抱美的都应该做好给予

的准备。圆明园是北京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艺术家的大本营。"

那时我们认识的圆明园还不收门票。

那是一座在荒凉中站了很久很久的古园，当我们走在荒草上，坐在倾斜的老石门上，她为我们吹来柔和的清风，给我们讲述她当年的辉煌……

七十年代的我们爱她，她也爱我们——许多个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圆明园开诗歌朗诵会，随吉他翩翩起舞。那时圆明园人烟稀少，大雕花石头在夕阳染红的天边屹立着，多少次，我神思恍惚地想起当年。

《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探索》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于一九七八年，是第一批带有政论性质的刊物。

芒克借住在刘青、刘念春哥儿俩的房子里，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他和女朋友大毛一起在浪漫的小屋里相爱，但这里也是一个公共的家。

屋子的床头放着《今天》、《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杂志，大摞大摞的印刷品及纸，还有油印机等印制用的工具。诗人画家与民运人士之间走得很近：多多、顾城、赵一凡、陆焕星、周郿英、王捷、史铁生、李南、北岛、老鄂（鄂复明）、徐晓、江河、赵振先、黑大春、阿城、于晓青、小英子（崔德英）、王力雄、赵南、徐勇、杨炼、郭路生，还有我们这些画画的，如果我列出所有踢过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门槛的脚，恐怕要填满整页了。我们用不着事后抱住那门槛崇拜纪念，十四条七十六号的门槛里没有我们足迹的记录，因为，我们已经各自用心带走了那段时光。

一个黄昏，天热得连最能抽烟的人也怕拿出火机点烟。十四条七十六号的屋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大家都在不停地喝水，还伴奏着

“呼啦啦、呼啦啦”的摇扇子声。我进去，看见有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一副眼镜。一段深刻的记忆。我笑了，他也笑了，我上去握住他的手，他说：“李爽你怎么也来了？”

“史铁生，你怎么认识这帮人？”

“这儿不是地坛我就不能来啦？再说我也不能老在地坛等你呀！”我红了脸。他爽朗的大笑冲刷了我没守诺言的全部惭愧，真是心地光明的人。

的确，这些人是“星星”中重要的支撑力量，七十年代的这种特殊组合是独一无二的，看上去显得偶然，其实是后来人的错觉。这些人的出身背景及个人经历，正是这个组合的真正元素和养分——物以类聚。

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沦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后可靠的工农干部也被下放牛棚；结果，必然使高干和臭老九子弟不期而遇，由于处在同一个生存处境而志同道合。

黄锐、马德升想办“星星画展”的计划已粗具规模。我这个老早就在北京一个又一个地下沙龙混的女侠，面对多种选择，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星星画会”。冥冥中我知道这儿有自己表达的余地，“星星”准许大家在理念、风格上各执己见。

黄锐叫我和严力拿新画去他家预展。我们用自行车把画驮到黄锐家，他看了我的画，说：“新画？真不错！”

又看严力的画儿，问：“这是谁的？”

“严力的。”

“很有想法。”

严力说：“刚跟李爽学画，没几天。”

黄锐说：“没关系。”

黄锐家里已经摆着不少人的画儿，东拼西凑，展览差不多成形了。

在场的还有曲磊磊，《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儿子，是高干子弟。

磊磊高高的颧骨，黝黑的肤色，彬彬有礼，小小的眼睛生气的时候都像在笑。他曾经为《今天》画钢笔插图，极其细腻的笔触，线条、结构样样完美。重要的是他笔下秀丽的人体中有一种对磅礴生命的崇敬。他着重歌颂女性、母亲，是有渊源的，回味起来至今我都动心。我和他住得很近，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谈天，关系密切。一次他提起一个难忘的经历：“我从小孤单，虽然家庭条件非常好，但父亲受审查后，学校不让我入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打人，我哥回家说，男红卫兵特别喜欢打女人，衣服都打烂了，她们在地上滚，打人的人竟然能勃起到射精。”

还有一次，我们为《今天》画插图，磊磊又讲了个经历：“我后来到东北插队，当了关系兵，忘不了！我怎么也忘不了！在支援乡村建设时，我看过许多人打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据说是地主婆，女的躺在血污里……”磊磊被记忆牢牢抓住，只顾瞧着他家立柜上堆积的行李袋，“那女的几乎裸体，脏得不行，用水给泼醒了，她求，‘大叔大哥大姐我没剥削过呀！没杀过人啊！’可她越求越打……第二天她一个人死在那儿，像屎一样。颜色，我头一次知道死亡的颜色，坏死的，变换的暗绿，黑褐色的血，蓝灰色的青筋……这情景在我眼前经常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走。”

不一定只有战争才让人见到痛苦，和平时期人照样会自找苦吃。苦强烈地证明我们活着。我们从中瞥见自己也有暴力的种子深藏内心，但我们最终会去粗取精向爱看齐。

磊磊又带来了新面孔李永存（大叔），他是工艺美院的，在《沃土》杂志做编辑加画封面。

大叔在“星星”里个子最高。他声音成熟，眉目立着，却怎么也找不到凶相。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大叔？因为老成持重？还是因为个子最高？我们一口一个大叔地叫着，都很喜欢他。

他不管到哪儿，最后都会郑重其事地亮出他的国画。我不懂国画，看的时候就不受限制。第一个感觉是雅，第二个感觉是孤独，孤独者深沉的静，又有缅怀古代诗魂的冲动。好像他在幻想未来某一天，现代人坐在鱼肚白的拂晓里，不再需要斗争。

大叔见大伙眉梢上都挑起了欣赏的信号，说：“哎哟！真好，现在我要为自己画画了。”他笑完有种明显的欣慰，憨厚的笑。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我孤独，但和你们绑在一起表达自己的孤独，是在有限里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我读李永存画时的心得，但我不敢告诉他，怕男人们觉得我的想法太怪，或者凡是出自女人之口的，都要归于头发长见识短，我最好不说，心里喜欢得了。

这个小团体是群星，一颗照亮另一颗。这个小团体是浪，后浪推前浪。这个小团体是项链，一环挽着一环结实美丽。

大叔又带来了阿城（钟阿城），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的儿子。

他瘦瘦的，像一片微弯的大搓板，五官上没有任何可以刺激视觉的地方，蓝制服也和街上的普通人一样。他戴眼镜，眼镜象征着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那是脑袋里的，不是胳膊腿上的。所以乍一看阿城，女人是不会心慌意乱的。但最好在他嘴上贴个封条，他说话太特别了，稳、准、狠，但又不是激进分子狭隘的申辩和审判，他的话像一面照妖镜——人本性臭美嘛，受到镜子的吸引，就往镜

子前凑，站不了几分钟，你会发现，已经被他扒光了。没点定力的人，还真得小心怕扛不住。

阿城和磊磊一样画钢笔画，东西很实际，无可挑剔的女人体，画得很逼真的周恩来头像。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来参加“星星”的活动，是身子在眼睛不在，因为他说出的话很抽离，仿佛他是从老远的地方在观察一个点上的骚动。他也是“星星”初创时期难得的活宝，老有故事讲。阿城自己画不画都无所谓似的，更喜欢看，有点贪婪，爱看好东西。

“星星”第二次展览时，我们夜里轮班，在阿城的办公室洗作品的照片，为了白天在展览会上卖，那时他还没结婚，就睡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白天卷起铺盖卷塞到旮旯里。

不知谁又带来了王克平，一个做木雕的人，据说他父母亲也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克平生于一九四九年，所以取名克平，攻克北平的意思。他生得非常有福相，宽阔的额头，鼻宽口方，眼睛看起来色迷迷的。他的雕刻作品的确很惊人，不仅有一次到位的大写意，还不缺少那种细微和尖锐。

“星星画会”有了小小的规模，北岛、芒克、严力、顾城、江河……许多诗人为我们的画配上诗歌。作品风格不限，有国画、油画、木刻、钢笔、木雕，地点选择在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日子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号。我二十六号下午跑到青艺大庙，冲上二楼办公室——目的是找李晓斌，拉他明天去拍照片。晓斌不在。我刚要走被队长抓住，说：“李爽你可好几天没上班儿了，下个话剧快公演了，明天我们开会安排跟戏日程……”

我胡乱应酬说：“毛老师我一定来！”

我急急忙忙骑上车，去东交民巷晓斌家，到那儿兴奋得大了舌头："快点快点，明天，明天我们在美术馆小花园里有个露天展览，叫星星美展，你一定得来拍照片！"

"都有谁？"他推推眼镜问。

"好多你都应该认识，黄锐、老马、阿城、克平、磊磊、严力……北岛他们诗人也参加配诗什么的。"

"行！我明天肯定去。"

第二天天刚亮，我骑车到严力那儿，又去磊磊家，一起和芒克骑一辆借来的平板三轮车，拉着画，从三里河往美术馆赶。

八点左右，大家都集合在小花园里，除了我们还有诗人以及民刊的朋友：刘青、徐文立、老鄂。二十几个人的作品，数了数差不多有一百多件，有油画、水墨、木刻版画以及木雕。我们把作品悬挂在铁栅栏上，大概有四十米长。

十点以后人开始多起来，渐渐地越来越多，最后到拥挤不堪。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商量着是否收点儿钱，又一想没门没窗户，怎么收钱呢？于是就在树上挂一个小箱子，写上"意见箱"，贴了一张纸，写着有钱出钱有意见出意见。

我美滋滋地东跑西颠儿忙活着，心想："晓斌怎么还不来？"正想着李晓斌他就来了，喘着气对我说："我操！这——么轰动！我都骑不进来！给我他妈急坏了，不过路上我拍着不少好东西。"

"你快点拍吧！话留着待会儿说。"

克平来叫我："李爽，北京市美协负责人刘迅来了，正看磊磊的画儿呢，一会儿就轮到你的了。"磊磊朝我们招手，领着刘迅到我的画前，曲磊磊小声儿对我说："爽，嘴甜点儿！讲讲你的创意。"

"哎！"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的画。刘迅和蔼地微笑着，我对作官的总是有成见，但刘迅主动问我："哪个单位的？"

"青艺的。"

"哦，工作之余还坚持创作呀，好！你画了几年了？"

"七二年就开始画了。"

晓斌赶过来"噼里啪啦"拍起照来。刘迅又转向磊磊和克平说："真挺好嘛，看看你们"星星"的一个女将。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就愁缺少女将咧，呵呵。"可以感到这位吃过苦的老干部心中那片依然青春的芳草地，在我们的青春热情中有些复苏。

我们发出了与"文革"时期不同的声音，它引发的轰动迅速传开：在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里有一个罕见的非官方的、非常业余的、又非常前卫的民间艺术展览，叫"星星美展"！人们惊奇地在一百四十几件作品前流连忘返。

空前盛况里自然也有插曲，一个穿灰制服蓝裤子、黑灯芯绒布鞋的妇女大声说："美展，什么美展？我看了就不觉得美！"

中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谈论"文化大革命"时不能谈论的事儿。画不能画的画，唱不能唱的歌。我们像一群新生的娃娃，没有刻意为历史准备什么，只不过是希望剪断自身的枷锁，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记得小时候父亲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爽子，我们可以看到的星星有些在银河系已经死去。"

"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是星光的记忆。"

"星星死在自己的记忆前面喽？"

"不，是地球离星星太远啦。"

“从地球走到星星有多远？”

“需要坐在‘灯泡的光里’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九万亿公里。”

我像上了发条的八音盒停不下来了，心每天都在唱在跳，仿佛我真的过上了不需要考虑利益的艺术生活。对自己的命运，我不再是个过客，至于前方和周遭会是什么样的，我不曾看见也不想看，因为我希望“星星”不会死去！

进入最高艺术殿堂

天已经冷了，我继续画画，与黄锐、老马他们也经常串门儿，交流艺术。这期间我画了《神台下的红孩》、《希望之光》、《绿梦》、《早出晚归》、《盲女》，和一幅描写张志新的作品《红白与黑》，这些画都参加了第二届“星星美展”。

突然刘迅冒出来通知我们，在北海画舫斋可以举办一个正式的“星星美展”，我们别提多高兴了！于是正式成立了“星星画会”，并在美术家协会注册。

展览很成功，连《人民日报》都登了广告。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接触外国人，克平如鱼得水，很会搞关系，我们亲切地叫他“星星外交部长”。

我又认识了好多朋友：邵飞——北岛的女朋友，邵飞苗条美丽，圆圆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很纯洁的目光，带着有教养的羞怯，我太高兴了，可有画画的女伴儿了。

大名鼎鼎的袁运生，高个儿白净脸，长头发，唇上留着点胡子，潇洒得不得了，我恭恭敬敬地上前，腼腆问好，差点爱上他。

还有毛栗子，虽然他不经常参加活动，但我对他印象很深。魁梧巨大的个头儿，像个温柔的熊，笑起来几颗大牙的个儿都很可观，与常人尺寸不同，憨厚得让人立刻放松警惕，大大的眼睛，嘿，又是个戴眼镜的主儿。他的画儿和他的外表完全相反，极其细腻、写真，画里那个掉地上的烟头，如果不是嫌脏我都有伸手捡起来的冲动。

第一天见面，我们就开起玩笑来，我说：“长这么高，准是高干子弟从小吃得太好太多。”

“吃什么多，饥荒的时候吃了就饿。”

阿城搭腔：“肚子里缺油水儿，就爱饿，长得高，是不知道下的什么种儿，饿不怕，有吃就好。”他们两是老朋友了。

“星星”一路顺风，一九八〇年，春暖花开。经过许多执著的努力及关系，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星星第二届绘画展览”。

全国美协主席江丰要审查作品，我们把作品集中到黄锐家，他看后同意了。车又把江丰拉到克平那儿，有一件白杨木雕，上面正好有两个黑斑，克平借木材的自然肌理雕成了两个乳房。江丰坐在沙发上用手摸了摸这木头乳房，说：“可以呀，你们可以展，但像这样的和那件就不要展了。”他指指手里的木头乳房，和一件酷似毛泽东头像的木雕说。

八月二十日展览开幕，轰动全京城，每天人流量平均五千人，天天早上排大队。老马精神抖擞，克平快乐地忙于交际，磊磊频频地讲解创意，大叔在自己的作品前认真接待参观者，黄锐总是最累、最负责任的，他照顾着全局。严力激情满怀，在几个展厅间窜来窜

去；阿城虽然表情泰然，但细听他的话除了比以前自信之外，更加幽默和出语惊人。哥们个个浑身放光，我夹在快乐的男人中间，爱惜着所有被我认为“意外”其实绝非意外的命运。

一天，我们的外交部长克平来找我说：“哎，你怎么不在自己画前守着！有几个法国使馆的老外，对你的作品特感兴趣，想认识你。”

克平冲我眨眨眼说：“醒醒吧你，还在月亮上呢？”（因为我的作品中有月亮）

他介绍道：“这位是白先生，中文名字叫白天祥。”叫白天祥的老外使劲儿笑，伸过长长的胳膊要握手。我以为他会特别有劲儿，结果他的手又软又厚，像温暖的白云。他说“你好——”“好”拉得特别长。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老外，心里紧张，可是一听他说中国话，还带点山东腔儿，就忘了他是老外。他的女友叫安娜，也说“你好。”她的“你好”可不太像中国话，听起来像说“捏猴”，安娜笑的时候脸挤成一团，白猫儿似的，看了非常舒服。原来人的相貌在实际接触的时刻是次要的，感染你的东西是对方与你气场交融的深度。

白天祥问了好多问题，尤其是我的油画《希望之光》。这幅作品的灵感来得突然，那日我坐立不安非画不可，又无画布，扯下自己的绿色床单一气呵成。画中一个女子站在一条悬空的路上，腿被荆棘缠绕，路尽头一排眼睛，仿佛先知又好像憧憬。

安娜却被我的木刻《荒野的知音》吸引，一只孤独的小狗在月下与月佬对话。还有一幅叫《别离》，沙滩上一个女人与海阔别，彼岸是天界而女子落入了命运殊异的人间。《拂面之风》是一幅黑白颠倒的作品，一位长发女子沐浴在风中。我喜欢风又恨风，风可以是最美好的问候，风也可以是最凛冽的消沉。第四幅《挣》，健壮的男

人在牢笼里，像“人猿泰山”的形象正在用力掰开铁栏杆，牢笼外巨阳当空。老外请我解释这些画儿，我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画时什么都没想，我要能像评论家一五一十说出一堆哲理来，我就甭画画儿去写文章算了。

白天祥半长的金发，大鼻子，一双灰不灰绿不绿的大眼睛，笑时有波浪在深深的眼窝里荡漾。听时从不打断人、想插话，还要道一堆对不起。他的眼神透着稳重的机警，我相信这人绝不是当艺术家的料，但绝对是懂政治的文化人。我觉得他有贵族风范，但又并不知道什么是贵族风范。后来应验，他的家族是欧洲一个颇为古老的贵族，家谱可以追溯到八百年以上。

女老外呢，特苗条，高跟儿鞋高得让人替她担心，身穿一件只挂着两根小带儿的背心，一条贴身小裙，裙子质地如丝绸，轻、薄。小脸孔上高耸的鼻子微微翘起，我走近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狐臭。中国男人的眼睛少不了要饱一饱长期以来对女性线条的饥渴，恢复一下对洋种女人身体结构的认识。我多余地替她害臊起来。但安娜一点不怕男人看，她毫无故意勾引的坦然，明亮的微笑使我们慢慢习惯另一种生活的开放方式。

几年后，老白说实际上是安娜对我的画非常有兴趣，当他们请克平去找艺术家时，并不知道我是个女艺术家。老白说：“安娜觉得你有很深的表达潜力，安娜被你感动。那天我和安娜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你这个人和你的作品。”不知他是借安娜捧我，还是真有这事儿。就这么着，我们熟起来了。时间久了，我觉得洋鬼子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他们在人堆儿里碰到人，很礼貌，会说对不起，而我们在人堆儿里碰了人听到的是：“长没长眼啊！”要么是：“瞎了？”客气点儿的人会说：“哎哟，硌着您脚丫子了吧！”

大家都和白天祥很亲热，他经常下班后来找黄锐、克平，大家也都给他好多资料，他带着整个法国使馆的人来参观。

展览最后一天，卖出门票九千多张。十六天展期，从中央到知识界，从知名人士到平民百姓，共有八万观众登门，这是中国美术馆一次破天荒的记录。

栗宪庭当年只是《美术》的青年编辑，但他天生慧眼马上写了文章——《关于"星星"美展》，该文乃当年唯一的官方美术评论。北岛在《新观察》月刊做编辑，李晓斌也调到《新观察》做摄影记者。北岛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刊上登了不少关于"星星画展"的文章及晓斌拍的照片，"星星"的影响一下子又扩大到了全国。后来中宣部把北岛的编辑职位撤了。

展览结束了，我们扛着画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美术馆。站在美术馆对面，我想起"插队"回来那天做的那个白日梦，现在那个小小的大梦实现了。

大家一起去喝庆功酒，用的是展览会上卖照片的钱，几杯酒浇下去，大伙傻乐、傻玩、傻吹，以为世界到今天为止，即将永恒。

黄锐、北岛几个人念起观众留言来。黄锐叫道："哎！哎！先生们，女士们！真没劲，让人家看见我们这帮人怎么那么没'起子'（北京方言）！现在咱们已经被世界承认，看看这儿有他妈上百条意见都他妈特支持我们的！"

"念念！"大伙说。

"有的字儿都他妈写飞了，小英你们抽空给抄一下！"

小英子（崔德英）是一个纺织厂的工人，没有谁后来更多提及她，然而民刊的杂活儿及大部分诗歌的抄写都出自她秀丽的钢笔字。

"有反对意见吗？"

"有！大部分是赞同的，也都没有签名，看，还有遇罗克的呢！哟，不对，是他妹妹写的，老芒克念吧？"

芒克："不行，我他妈喝得五迷三道的了。"

我说："念念就醒了。"

"念不好，我他妈是文盲！"

北岛接过意见本儿念起来：

星星！星星！在黑夜你就是光明。当世间来到了正直的光明，你就悄悄隐起了自己的身影。但即使是日头当空，人们也会深信：当黑夜再度降临，天空仍会出现星星。

——北京工人

聪明的画家，你勇敢地向封建开了枪，打死它！打死它！在你的手下我看到了胜利，我看到了光明！

——三个年轻观众

在腐草的废墟上生出一丛茁壮的新生力量！年轻的血液，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线条，啊！又活跃了我这衰老人的心！

——老者

我的学识短浅，看了这种臭画，感到丢了祖先的颜面，我的评语两个字："糟糕"。

——一个观者

哈哈哈我们大笑。

我们在前线流的是血，在这里流的是泪！

——红河三战士

稍晚，我迷迷瞪瞪地看着哥们儿们醉红的笑脸，晃来晃去，由于他们已经把我当“爽少爷”接受了，免不了操持起男人特有的性玩笑，并不把我当外人来回避。

通常，在女性少的男人团体里，像中国人这样文明或者说保守得并不多。真的，“星星”的哥们很有自持力，到今天我想起他们每个人来，依然充满钦佩和爱戴！但我不否认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大男子主义在作祟，我相信他们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最好——重男轻女至今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二十多年后，美国一位著名制片人洛伦左·席勒（Lawrence. Schiller），到巴黎我的画室来采访。他开口就说：“你与你的情人们都是中国自由民主的先驱！谈政治已是陈词滥调，西方国家的人已厌烦，请说说你们之间的浪漫史吧。”我不解，瞪着他。

他解释：“因为我采访过你们‘星星’的同伴，他们好像忌讳提到你，没有人告诉我李爽也在巴黎绘画。”

“那您是如何跑到我的画室来的呢？”

“一个中国的评论家，告诉我有一个‘星星’的亮点，女的。”

“是老栗（栗宪庭）告诉你的？”

“对，我想是，或者是他的太太。”

我笑了，加了一句，“又是一个谁的太太！人家有名字叫廖雯，我们用不着当了谁的太太，才可以是艺术家。”

他挤了挤眼睛，眼里有种暧昧，他继续：“你是‘星星’的核心之一，但你是唯一的女人，也是唯一的入狱者，聪敏的人马上会发现，那是‘星星’的一个亮点。”

“不，我是一个谁谁的女朋友。”我开玩笑地说。

他乐了，“你是‘星星’的太太。”

“我虽然在‘星星’里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但我很少多嘴。”

他认真地说：“世人只看你做了什么，不管你说了什么，我认为你是大家的女朋友！”

那次采访真的很糟糕，他打定主意要诱引我说出“星星画会”幕后的浪漫故事，而且非常不客气地询问我与每一个“星星画会”的男朋友是否有亲密性关系，我一再回答：“没有！”

“没有！”我有些生气。

“没有，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他说。

“我们中国不是美国。”我说。

他争辩起来说：“没有听说毛泽东把中国的年轻人都骗了？中国最有文化，中国人都异常聪明，中国以旺盛的欲望孕育了东方！请看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边说他边拍打自己的裤裆。

原来他对中国很无知，非要把当年中国年轻一代的作为，套入美国六十、七十年代之交时纽约黑豹组织（Black Panthers）的模式里，那是一种带有强烈暴力性质的争取自由运动。纽约的黑豹组织宣传黑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靠白人同情，不依赖美国政府，也不寄望于体制变革，由黑人拯救黑人的命运。他们想在美国中部建立自治的非洲共和国，通过暴力手段与美国政府对抗。黑豹组织总部被纽约警察捣毁，领导人

被FBI暗杀。其中就有位激进的唯一的女活动家阿萨塔·莎库尔(Assata Shakur)，她是个漂亮的黑人女侠。这个女人当然是所有男同事的情人。

真逗，洛伦左·席勒真的认为李爽和阿萨塔·莎库尔属同类女子，而且他断定，可以与男人共事业的女人必须做出双重贡献，才能在男人圈里发挥她们的智慧及魅力。但我没有顺他的杆爬上去，因为那不是事实，他很失望。连中国翻译刘小姐都生气地说："他不懂中国，不知道中国还很封建，还要假装中国通！"

我说："洋人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嘛！"送他们走后，我想："李爽是阿萨塔·莎库尔的同类，为什么不呢？可惜我已经徐娘半老了，下辈子吧。"给老马拨了个电话，我们笑得一塌糊涂。

第二次见老白和安娜是芒克过生日。到芒克家后，芒克正在煤气炉上煮菜花儿，老白和安娜在吃白饭，他们带了一瓶儿香槟酒，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酒。对看过洋小说的人来说，香槟酒太有名儿了，我们用搪瓷缸子，普通玻璃水杯，还不够就把刷牙缸子也拿来斟上。那天的香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留在记忆中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

吃 醋

再后来，老白经常在他家请“星星”和“今天”的人聚会。一次我生病，上吐下泻，头疼发烧，又不想错过去老外家玩的机会，

我就磨破嘴皮子，跟我姐姐借了一件藏蓝色大花朵尼龙衫，打扮好，硬撑着和严力骑车从甘家口往三里屯使馆区长征。没骑儿分钟我就不行了，只好回家卧着，满心遗憾，严力一个人继续长征。

后来我见到那天的照片，大家很开心。全是干杯！芒克、老白、马德升、法国大使沙耶（Claude Chayet）及儿子西凡（Sylvain Chayet），几个人手臂绕在一起，干杯！干杯！据说芒克和法国大使的儿子哥俩喝得酩酊大醉对吐一身。

去老外家聚会，我们都很高兴，在那儿吃新鲜的，喝过瘾的，可乐随便来。跳舞，听最时髦的国际歌星的音乐，摇滚乐大师汤姆·琼斯和雪莉·贝西，甲壳虫乐队，还能发泄不满情绪，对了，还能抽洋烟。

我是严力画画的老师，但他自己另有小歪才，非常高产，不停地画。每天我下班回来都能见到一张严力的新画。

我就找借口，说画画的地方都叫严力占了，我没法画，严力说："那你就回你们家画去！"

我说："我不愿意回家画，就愿意和你一块儿画！"我们之间开始吵嘴。

我解释："我要完美不要数量。我总是最喜欢最后一张画。"

"你好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他强调。

"创作的最高需求，是跟着直觉和灵感的激情走！最后一幅将永远最好！"我坚持。

"那是否定自己的行为！"他责备。

"敢于否定自己是谦虚智慧的初醒。"我自命不凡。

"你在犯懒惰的错误！女的都一个样儿。"男人永远是教导女人的口吻。

"谁？！"

"你！懒蛋！"

"啪！"我把水杯摔到他的画上，严力急了，起来把我往外推。理论已经控制不了情绪化的局势。是的，我们都在摸索，并且希望自己行为都是出于爱，但同一张嘴，可以海誓山盟和甜蜜接吻，也可以用来诅咒昨天的爱人，在爱和怨中人脸飞快变化，人不能自主的情绪化，仿佛是给"情绪"作跑龙套的演员。

"星星"的光，吸引了不少崇拜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女学生。严力认识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女生，她戴着白色的眼镜，整齐的黑短发捧出一张粉呼呼的圆脸孔，虽然称不上漂亮，但年纪轻轻的女子总是可以吊起胃口。她姓黄，黄什么不记得了，她见到严力像出土的春苗见到太阳，说："我一定要采访你！"

一天，我们和严力及老马，还有其他人决定一起去"老莫"吃饭，刚出门，姓黄的女孩冲过来截住严力。

严力过去又回来对我说："她非要跟着我们去老莫。"

我要求自己表现得有教养些，忍了忍，没有爆发。还告诫自己："嫉妒，是没素质的小人行为！相信严力。"

在"老莫"我们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黄姓女孩刚吃第一口，就把自己叉子上那半块肉，蘸些奶油又在西红柿汁儿里搅了几下往严力的嘴里送。严力碍着我的面子不敢张嘴接，往后仰身子，她咯咯笑着大喊大叫："严力！严力！快！求求了，看流得哪儿都是！"严力怕弄脏笔挺漂亮的衣服，赶紧张大嘴扑上去伸出舌头囫囵吞下，在场的人都笑了。

我女性的自尊受到了刺激，眼看被妒火煎熬着。我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在心中贬低他们俩，希望这样可以弱化、降温嫉火

的窒息，获得一点平衡。直到忍不住了为止，"嘿！姓黄的你知不知道严力是我的朋友！"我的爆发毫无尺寸。从小我学会的人生哲学是：你父辈一旦是右派，你就没有了任何权利。这导致在自己的私事上，也不懂得以基本常识来维护自己应得的尊重。处理爱情纠纷冲突时也毫无尺度。

从"老莫"出来，在动物园门口的汽车站，那女孩用最娇嫩的声儿说："严力，你必须送我回家，人大那儿太偏，我好害怕哟！"严力僵住——我是他仓中已囤积两年的陈粮，在今天秋夜篝火的新鲜面孔前，他用犹豫的目光看看我，水雾蒙蒙的眼睛像在争取理解。送吧，怕伤了老情人，不送吧，绝对心痒难熬。我酸了吧唧地玩了一个高姿态，说："严力那你就送她一程吧，快去快回啊。"严力别提多高兴了，为了安抚我，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手心，仓促与大家道别，仿佛用来说再见的三秒钟也是浪费。然后双双一溜烟儿消失在下班的人群中，朝着绿树荫荫的白石桥路，轻快地急蹬车轮。而我那副被醋淹没了的耳朵，竟然老远了还可以辨别出女孩儿如铃铛般尖锐的笑声。老马见这三角僵局，自知什么忙也帮不上，讪笑着告辞了。他在想什么，目睹了一场人生小戏？也许我们成了他日后爱情生活上值得借鉴的一面镜子，但也许每个人都无法借鉴别人，非得用自己的心去照亮自己的路。

我沉重的腿慢腾腾，虽然身着一件漂亮的花衬衫，路边也有十几岁的小男孩冲我口哨不断。沮丧使我妄想：这口哨肯定是因为自己非常难看。

回家之后我一晚上坐立不安。

那是一个初尝失落、失宠、失去自信的夜。爱情是没有具体称

呼的情感纠结，拥有的时间很短暂，短暂的狂喜使人记不住发生了什么！

这一夜我像热锅上的硬烙饼，翻来翻去，再翻就煳了。十二点时我像个糊烙饼从被窝儿里硬邦邦地爬出来，冒着烟，溜出家。

顶着月亮，我上严力家去了。我查看了楼上楼下，严力没回来，他的自行车不在！我一屁股坐在严力家门口儿台阶上等。等到夜里一点，他还不回来，两点了，我依然坐在漆黑的楼道里，焦头烂额地熬着，燃烧着……

嫉妒是所有坏情绪里最坏的一种，它让人堕落，它随心所欲地牵着人的傻牛鼻子，即便你是一个喜欢宁静与和平的人，它也可以当众宣告你那份愚蠢。

从这次以后我发誓不再吃醋，但那是需要点修行的功夫事儿，谈何容易。

听声儿我知道严力回来了！没有灯，黑的。他抬着自行车，快上到三楼时开始气喘吁吁，自行车不能放楼下，会丢的。

我纹丝不动，车轮子几乎顶到我鼻子上，他忽然发现有个人。想必他也吓出一身冷汗，“谁啊？干什么的？！”严力一愣，我还来不及张口，他赶紧把车放一边儿，紧挨着我坐下，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再不干了，再也不干了，真的。”他这么一说我倒软了，本来我惦记着跟他撒一回野，让他招得没脾气了，煳烙饼被油汤泡软了。

女人啊，有时真的很宽恕，但这种宽恕里似乎掺杂着怕失去，而怕失去也许与面前是谁无关，那是一个自亚当夏娃起就已根植于女人内心的恐惧，原罪？看看女人做爱吧，她们往往很难把肉体与精神分开使用。

严力悄声在找门上的钥匙眼儿，叫我用打火机照明、钥匙插进门锁，他灵巧得像电影《地道战》里取地雷的专家。进屋儿，在黑暗中我想哭，他希望和好，对我无比温柔，仿佛刚才的野餐使他发现解馋但不解爱。或因为不想伤我的心？或男人的确可以同时爱几个女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6

The sixth part — 第六部分

洋鬼子并不可怕

老外白天祥的出现，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至今回味起来依然一头雾水，醒不过闷儿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爱情是无法预谋的，是由天来支配的一种奖惩。爱情若混掺考量和计算，就像泡菜的水不够清澈，日后会发霉，而且酸得无法吞咽，但什么是纯爱，这很可能还只是人类一个没谱的曲子，不然，为何人口增长率日趋膨胀，世界上既不缺男也不缺女，却人人都忙着大海捞针只找一个人呢？

有朋友告诉我，那个经常和我们来往的法国外交官，老打听我的消息。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想："他明明和安娜在一起。"因此既不信也没往那儿想。

严力给我过生日，我们俩还没有彻底分手。十月七号，严力请来了老朋友们和老外，其中有老白，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一个法国汉学院知名的汉学家；博纳·依夫德（Bernars Yvetot），法国使馆商务参赞，现任法国国务院内参；西西丽·贝赫曼（Sylevi Bermann），法国使馆秘书，现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西西丽是一个有才华的犹太女人，优雅的眼睛，细软蓬松的浅色头发，

丰满娇小的身材透出无穷朝气，她手把手交我跳舞。天呀！老外在一个这样拥挤简陋的地方，毫无歧视和不适，照样放松自然玩得开心。

依夫德一脸深色浓密的络腮胡子，圆圆的大头上头发稀少，与大头相比眼睛显得那么小，里面闪着善意和聪颖的光。他是一个传统的做官的人，还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

贝罗贝、老白喜欢谈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共产主义的理念。这是世界上所有知识分子的通病，试图去挖掘人性存在的意义，他们要么是宗教狂，要么是想创造新型社会制度。中国深深地吸引了许多欧美政治家、汉学家、自觉热爱人文平等的人们。白天祥、贝罗贝等人也是一九六八年参与法国红卫兵运动的组织者。当时他的幻想是：共产主义是新型社会制度，一定比任何人类所经历过的制度都要公平。人类的希望就在中国！老白读完博士以后，本来要再深造古希腊文，结果他改学中文。

老白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进入外交部，调到中国那天，正好康生去世，这使他记忆犹新。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法国使馆的人都被邀请参加丧礼，老白说："到跟前，棺材盖儿是关着的，不知道里面是谁。"

毛泽东的追悼会，法国使馆的人都要到场致哀。他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我们本来希望见到一个高雅风韵的老电影明星，没想到江青那么难看，我们和江青，也和'四人帮'握了手，还和'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握了手。"

法国使馆也被外交部邀请到湖南韶山，参观毛泽东的故居，法国人都觉得那里风景优美，像法国外省小贵族的领地。

老白希望能接触到一般的中国人，常去小饭馆儿，可是只要一

去，服务员就把正在吃饭的中国人、连人带饭轰到别的桌儿上去。他见到中国人就过去说话，希望锻炼自己的中文，结果中国人一见老外都躲起来，使馆的人买来各式各样的中国衣服，灰中山装、蓝制服、绿军服，没用。

生日那天，我们喝着老外带来的红酒聊天儿，我们不会喝，大口大口跟喝汽水儿似的，一杯下去已经把眼前一个东西看成两个，脸蛋红红地话多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坐老白和贝罗贝旁边儿，就一张办公桌，画也好，吃也好，写也好，雕刻也好，全靠它。

老白记得一个细节是，在办公桌边我惊讶地说："呀，你们这么多毛儿啊，像个大毛猴子似的。"老白说我揪了揪他胳膊上的毛儿。依夫德和贝罗贝也伸出大毛胳膊——"我们的胳膊都生来就是这样，来摸摸我的！"我也在每只手臂上胡噜了两下。严力也伸手胡噜着西西丽的卷曲软头发。

白天祥告诉我："这种举动，在西方是明确邀请亲昵的举动，可是你们完全无知，不过是第一次见老外跟看猴儿一样，想摸摸。"

他们来时都穿着中国人的衣服戴着军帽，并且把汽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过来，时不时又回头注意是否被跟踪。老白他们一行人要走了，咱们得照顾一下吧，老外嘛。中国的楼道从来都没有灯，安装一个灯泡，很快，就会被人家摘回自己家。我说："楼道这么黑，怕你们看不见，我送你们下楼吧。"

我带路，老白和贝罗贝先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楼梯我太熟悉了，合着眼睛都认路。我扶他们下楼，老白记得我一扶他，他的心就咚咚直跳，紧紧抓住我的手没有再撒开。他已魂飞九霄，我却浑然不觉，还认真地想，若把人家老外大胳膊大腿摔在中国人的楼梯上，那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吧？责任使我不敢调情，与老外

恋爱在我眼中是妄念。

但王克平很有先知先觉地开始与老外调情，克平跟男女老外都特别热情，而且一定要找一个女老外。哪个女老外出现他都追，最后娶了原法国公司派到中国的代表，凯瑟琳娜·德莎丽（Catherine Dezaly），德莎丽并不漂亮，胖乎乎的红脸蛋，胖乎乎的身材，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朴素无华，心地善良。生活不会十全十美，美貌与贤德也很少同居一人身上，从某个视角上看，这是一种自然的平衡福分，总之我们都很喜欢她。

"星星画展"之后美术馆又连续举办了另外一些展览，四月影会的摄影展"自然·社会·人"及王怀庆、陈丹青、白敬周、张红年等艺术学院的年轻画家发起的"同代人画会"展览。我非常佩服王怀庆、陈丹青、张红年他们的画，仔细凑近，我发现无论是陈丹青、张红年还是艾轩、罗中立，他们连西藏人羊皮袄上油腻的质感都画出来了。而我虽然也想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即使画一个苹果，画前叮咛自己："爽，这回可要画像这只苹果啊！"动笔后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明明是那光线使它看上去很活，是我的眼睛和光线与苹果发生过关系以后苹果才甜得让人想吃，香得让人想闻……是好多因素在这时刻喷出的感受。我画的苹果不仅不像，还会走样儿成为橘色、驼色、粉色什么的。为此我指责自己太离谱，自问过无数次："画不出羊皮袄上油腻的质感的，是画家吗？"试想男画家会说什么："啊，女人还是女人，回到锅台去。"虽然我喜欢炒菜，缝纫上很出色，打扫卫生一丝不苟，但我的最爱是画画，画画时我没有参照物，没有目的，没有考量，只对那个过程很享受，画画可以使我松弛得一塌糊涂。作品完成后，回到条条框框的世界真的不容易，大概女艺术家与男艺术家的不同是：没有勃起的野心。

“同代人画会”里的一个成员钟鸣和老白挺熟，经常去老白那儿玩。钟鸣是个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开性玩笑司空见惯，认为这是自我解放，钟鸣对我说：“哎！老白对你特别感兴趣。”

我说：“是吗？但我有对象了。”我去问严力，我们可以考虑结婚吗？他说：“行，可以考虑。”

中外恋情不是天方夜谭

在赵南家给芒克过生日。和蔼可亲的笑容可以永驻赵南的脸上，虽然动作慢腾腾的，却总是在需要的地方泰然出现。那是一些难忘的快乐往事。

我和严力去得晚了。我俩到场时，饭桌上已经杯盘狼藉，烟雾腾腾中大家在跳舞。有新的老外面孔出现，何嘉琳·艾曼，法国驻中国商务中心代表；西赫莲·席凡、燕保罗，法国使馆秘书，现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芒克漂亮的女友毛毛（顾理权），北岛、邵飞，还有好多我一时记不清的朋友们。中国人、外国人中间没有利用，没有利益，没有比较，我们欢聚一堂，跳舞，喝酒，念诗。

我们正当年，老外也正当年，每颗心里都盛满友情，连最微妙的眼神传递后面都是两小无猜的那种纯洁。

芒克好像从五指山放出来的孙悟空，王克平与艳装的何嘉琳好

我觉得我们周围的一切植物、动物，或者无论什么都很奇妙，但人是唯一可以创造奇迹的生物。

白天祥也陶醉地摇晃着大头，在人群中太像一只不灵活的熊了，他是一个不会使用肢体语言的知识分子。我抬脚儿进来，他是第一个发现我们的人，我忽然感觉：老白不仅仅是有点喜欢我。他用一双大眼尊重地看我，进门之前这件事儿不存在，进门之后这件事却变成地久天长。可靠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他瞬间的神态感动了我。

法国大使沙耶要在自己家邀请中国艺术家作客，哇，这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头几天我就把最好的衣服翻出来，试了又试，但怎么看怎么觉得寒酸。

我在青艺食堂遇上那个叫李慧的演员，热情地追着我，到楼上陪我吃饭。我显摆地告诉她：“法国的大使邀请我们去使馆会餐。”

李慧嘲笑道：“那不叫会餐，叫赴晚宴！”

李慧很羡慕我，一定要帮我洗碗。

李慧中等个，圆圆的鼻子，红润性感的嘴唇，身材壮实，而且胸臀丰满，穿一条紧身牛仔裤，趴在我的办公桌上笑声无遮掩，弄得走廊里面舞美队的老前辈们都有事没事一趟又一趟往这屋里穿梭。

我们很快就熟悉得无话不谈，李慧向我倾诉了她与一个青艺男演员的艳情，以及与一个有妇之夫恋爱的伤感体会，悔恨不该再有那种喜欢一个人便像初中生一样的冲动。她说：“男人永远改不了猪脾气。”

“猪有什么脾气？”我问。

“多吃多占呗。”

“你问我？我哪儿知道怎么办？跟着你的心走呗！我最烦给人做这种事儿的参谋。”

“我已经打了一次胎了，”她眼圈红了，“我怕死了。”

“你又怀上啦？”我吃惊地问。

“嗯——，我怕死了，堕胎时的铁东西捅进肚子！冷冰冰的！”我眼前出现了宝青，还有自己堕胎的情景，不自觉地拉起她的手握握。她又接着说：“你知道，我‘那位’非要我打掉不可，还笑我胆小，说不就跟撒泡尿一样吗？”说到这儿她眼眶已经泪满，我又使劲握握她的手，我的手湿了，我掏出兜里一团儿脏手绢递过去。

“哎，你有病！百分之百的有病，和他作最后通牒！”话音落，我自己的肚子也隐隐作痛，因为我深知堕胎的痛苦，我和严力好上之后也做过两次流产。护士见未婚流产的姑娘，动作都很粗暴。加上放弃幼小生命的罪恶感，实在是难当。两个女人同病相怜。

李慧希望我可以给她也介绍一个外国人，那样她就和有妇之夫分手，远走高飞。不然她要拼搏到底！

最悲哀的爱情故事，莫过于火车与乘客。乘客不留神上错了方向，历尽艰辛返回站台，发现自己的火车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列车。再抬头看看月台上的生命钟，半生已经过去。于是有人后悔：当初不如将错就错地走下去，有人勇敢地重新登上下一辆车，之后勇敢的人发现这辆车才是自己真正的特别列车！

李慧邀请我去她家，选些香港的时髦衣服，我高兴地接受了。

终于盼到了大使请客的日子，我穿了一件绿色开衫毛衣，翠翠亮亮的绿，一条李慧的牛仔裤，我没有她丰满，所以屁股撑不出样

那是唯有属于我们的光荣，我们是值得的，你算老儿。但我这些哥们实在是一个比一个温和，一杯酒下肚就个个宽容大度地忘了这个小小不快。

大使家在我们眼里就是一座宫殿：大理石的地板，干净得可以照人，亮丽的淡黄色大窗帘，马上衬出了我们千篇一律的寒酸。旁边一幅巨大的艳蓝色油画，老白特意告诉我们，这位画家叫赵无极，是国际著名的旅法华人艺术家。这幅画对面，竟然有一幅莫奈的《印象·日出》，我们对华人画家不屑一顾，拥在印象派画家的画前，面带崇敬仰慕着。

老白穿一身浅驼色的西装，异常潇洒，红色小方格的丝绸领带，新颖高贵。大使克罗德·沙耶（Claude Chayet）精瘦矮小，非常幽默，说他是大使不如说他是个喜剧演员。他一身蓝色细线哔叽呢西装，黑牛皮鞋，橘黄色领带上有点点黑色的星星图案。为了不给我们找麻烦，大使让中国的厨师备齐食品，把服务员厨师都放了假。让儿子西凡、夫人和几个使馆职员下厨为我们准备吃喝。

好吃的法式美味下肚后，还未消化转换为新的力量，从腹中弥漫出醉意，使哥们又开上了素中掺荤的玩笑，这是最古老的、与男人形影不离的肾上腺素与荷尔蒙的动力。当然少不了念诗，献艺。轮到大使克罗德做诗，他用非常阴阳怪气的中文，朗诵：

我矮行行，
泥猛使黑谷的广，
招凉了钟国伍的信，

中国人、外国人谁也没听懂他说的“天语”，但他那张脸实在太滑稽了，逗得我们不得不笑。最后老白替他又作了一次翻译，说：大使为“星星”作了一首打油诗：

我爱星星，

你们是黑夜的光，

照亮了中国人的心，

也照亮了我这个法国流氓的心，

啊，我爱星星！

沙耶请教我们如何说脏话，“星星”的朋友教他几句骂人的话，沙耶大使一一学舌，之后像个快要憋死的老活宝，放肆得满屋子叫：“昏胆（浑蛋），往八胆（王八蛋），塔马得（他妈的）！”

音乐响起，优美至极的扩音音质。西西丽·贝赫曼第一个翩翩起舞，克平马上伴舞，大使沙耶也恭恭敬敬地邀请我步入舞池。他惊讶我的舞步标准，我告诉他，是在青艺学的。所有的人都步入舞池，灯光渐暗，“澎——喳喳、澎——喳喳”法兰西圆舞曲，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熟睡的北京三里屯使馆区，轻快荡漾。我们忘记了时代，忘记了身份，忘记了标签，忘记使馆区外面的隐患，忘记了无常，希望这个享受可以永恒，“澎——喳喳”。

老白邀请我和他跳舞，他不是个好舞伴，老踩我脚，整个舞曲在“抱歉，对不起”中结束。眼睛的窗户打开了，里面的心在传神。实际上我们既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也知道要发生什么。我们俩同时穿过欢笑跳舞的屋子，向走廊尽头奔去，没有说话。从走廊穿过厨房，有一个阳台，我们推开阳台门。

十一月的午夜使我轻轻“哎”了一声，哈气冒出点酒味儿。外面有树，修剪得高矮参差，完美得像外国电影。我靠着阳台的墙，动作有些拘谨，想装作平静，身子靠着墙，脚丫子蹬着阳台栏杆。又觉得这种动作不合适，越想安静自己越不知所措。肯定不像姑娘，是“爽少爷”特有的假小子相，

“我希望和你结婚。”

“什么？”

“我要回巴黎办理我的离婚手续，希望和你结婚。”

“啊——”

“我爱你。”

“哦——”

“我有个前妻，已离开我了。”

“我相信可以使你幸福，帮助你深造，好多中国人都希望出国。”

“肯定有好多女的追你。”

“我对她们没爱情。”他诚恳的声调，透着诚实。

“嗯。”

“你是我认识的中国女人里，最有贵族气质的。”

“哟，真的呀，可惜中国的贵族是出身好的高干，呵呵！”我说。

“统治者可以制作贵族特权但不能制造高贵的人。”他说。

“我连贵族都没见过，别逗了。”

“我说的是我看见的，可能你还没发现自己。”

“那谢谢了。”

在他说爱我时，我第一个感觉：这是负责任的君子；第二个感觉：他可以保护我；第三个感觉：他懂得尊重女人。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没有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种激情。

他说完了，差不多不敢看我，静静地等，这是终身大事。

我的腿从阳台栏杆上放下来，身子往前挪了一步，他已经等得度秒如时，我们四手相握，他吻我，我用余光瞥见树梢后的月亮。人生有多少次归宿，可能每天都会经历一次，这一次我的心无疑与归宿又一次交织，月亮仿佛变成日头，没有鸟鸣我却听见一片唧唧喳喳的鸟语，闻到阵阵花香，月影仿佛在勾勒着一个叫做幸福的轮廓……

有人来厨房，我们尴尬地赶忙分开。

对他，我充满幻想，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们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秘密约会。

白天祥受过最高学府的顶级教育，思想新颖、激进。自幼贵族之家根深蒂固、耳濡目染的熏陶，使他非常尊重女性，如果不被准许，他是不会动女人一根毫毛的。我们也谈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准备到他家去。他提醒我千万不要大意！

幽会时我如同侦探。八点黑天的时间，我从三里河科学院大门前那条小柏油路往南步行，这条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在中国除了首长、单位、部队、警察，就是老外有车。走完这条小路需要五分零四十几秒。我八点钟开始走，他的车八点零四分时开过，不熄火一档十迈的速度，我窜上去后车一溜烟往三里屯三街外交公寓开。外交公寓有大兵把门儿，通常大兵见到中国脸会过来阻拦，尤其是女孩。白天祥的车里准备了一件蓝大衣和一顶帽子，我上车后穿上戴好，直到进了他家门儿，才敢出大气儿。

偶然这东西不存在，若天地是偶然，春夏秋冬不会既有规律又永远异样。

女 人

我不知道男人是否和女人一样，做爱时想尽可能完美地献出自己。

一生中有多少个第一次啊，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洋人的阳物，与我领教过的相差甚远，几乎使人担心它是否属于正常生理状态。

因为不习惯被爱抚，尤其是这种不分等级被人从头至脚的爱抚。

女人第一次接受自己身体的时刻是重要的。我一直不喜欢做女人，感到做一个女人到处是弱点，甚至觉得性生活讨厌。生活经验告诉我：周期里你要来月经，工作上你要听指挥，事业上你被排在男人后面，性生活上你是一个被动者，做爱只是为了生儿育女。如果你喜欢一个男人渴望他的爱情，你所做的应该是牺牲，这就是女人的现在和未来吗？那我更喜欢做一个男人。矛盾的是我骨子里非常女人，而且我爱男人。

我跟好多中国女人讨论性生活，她们都说如果你要留住老公，这就是你的义务。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一块木头，与我的男朋友还是有过美好的初觉，但总觉得电影没演完，水没倒干净，感到悬在某个点上，然而过多地争取又怕被男人视为淫荡。

一次，我舒服地摘下男人的大棉帽子，脱掉蓝色的大衣倒在沙发上，缓缓地放出一口气，点上一根烟开始聊。老白一点点儿往我这儿移，我马上跳起来要去洗澡，他拦住我说：“我们待会一同洗鸳鸯浴吧。”自己没洗澡很脏的焦虑被欲火一把烧光。

我的身体在抚爱中敏感又舒展，水涨船高了我心如彩虹身似礼花，语言已经笨拙到无法表达什么，那是一份爱的礼物，随之一阵耳鸣我飘飘然。

"我怎么了？"

"你像小猫唱歌。"

"是吗？我可觉得我跟杀猪一样叫。"

这时我看见扔在地上的棉毛衫棉毛裤，皱成团团灰抹布似的，脸"唰"地红了，抱起"灰抹布"捂住羞处跑进洗澡间，他敲门我不开。发誓下次发工资，一定不买颜料去买件新内衣！

出来我问他："刚才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老白马上先说了一句法文，后说，"你等着。"光着大脚跑到客厅，抱来一本厚字典，翻找着，"啊，你看这个。"我见上面写着：

"高潮：gaochao1.〈地〉mar é ehaute2.（事物发展的最高阶段）essorm；

paroxysmem；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accueillirunnouvelessor

del é dificationsocialiste //掀起学习马列主义的新～imprimer

unnouvelessor à letudedumarxisme—leninisme //施工正在～阶段…………"

我似懂非懂。老白两手一摊，说这字典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汉词典》，最权威的了，可我还是不懂。他又去翻出一本著名美国性爱手册香港繁体字翻译版。我抱着书废寝忘食看了一晚上，明白了什么是性高潮。

我发现被爱是享受尊重，爱的眼睛提升了你的人格，你是活的！而欲望的眼睛扼杀了你的人格，你是可以被取代的死东西。

我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女人，告别了少女的懵懂。

我问："一到这儿我就洗澡你烦不烦？"

他说："文明古老的中国嘛！我相信这是中国女人的好习俗，因为我们西方人完了事以后再洗澡。你们在爱情上一定比欧洲人来得更尊重、更无私、更纯熟。"我心想："真是想当然，他满拧！"我没有告诉他，到他那洗澡是中国人家没有洗澡间。的确，这种贫困处境使我感到耻辱，但我爱外国人，也爱中国人。

法国人早晨上班前洗澡，洒香水儿，晚上回来，不管多脏就睡了。中国人是忙了一天，晚上洗得干干净净，舒筋活血。所以法国人是为别人洗澡，中国人是为自己洗澡。外国人认为自己的民族太自私，精神太落后；中国人以为自己民族太自私，物质太落后。人类不爱自己的思想制造了许多假设，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只从墙外匆匆一瞥就宣布了解本质。肤浅的结论，使我们相信这就是世界运作的全部方式。所以人与人之间再亲密也会感到说不出的虚空与孤独！因为在误解中我们关闭了内部真正的联结。人在高潮时刻，生命得以短暂联结，男男女女虽然对性很困惑，却对爱情梦寐以求，然而这就是对爱去粗取精的开始，也是向另一种爱之新纪元的渴望伸展。

一次在西单路口儿，他开车、尽量开得慢，我骑车，尽量骑得快。等红灯的时候，我们俩互相隔着车窗说话。红灯亮了，他已开过去，过马路的人拥向街心，有一个大汉用自己的车把我别了下来，他质问我："你为什么和外国人说话？！"我说："你管得着吗？外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说话？"他伸手揪住我拖在后背的长马尾辫，说："走，我管不了你们这些婊子，有人管得了！到派出所去说清楚！"我说："有话好说别动手儿啊！那个外国人是我的未婚夫。"旁边儿看热闹儿的人哄地笑了，有妇女在人群里借机骂道："臭不要

脸的！”

我像一个坏分子，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我无可奈何地推着车，左边儿一个大汉，右边俩工人民兵，开路先锋是戴红袖章的妇女，后边儿一大帮孩子尾随来到一个高门槛老式大院门口，门口挂着的牌子上有“西单派出所”字样。门槛太高，我就把车锁在外面了。

我被带到一间小耳房里站着，来了几个人，问些叫什么，住哪儿，什么单位之类的话以后，头儿拉长声儿：“是你和外国人说话来着吧？那车还是使馆的呢！”我说：“他是我未婚夫。”俩警察嘴角上挂着歧视的笑容，仿佛我们中国如此糟粕的民族是配不上洋人的。

这时候，外面乱哄哄的“乒乒乓乓”开门关门声，我听出老白的声音：“爽！爽你在哪儿？”外边声音嘈杂，审问我的人也坐不住了，把我扔那儿出去了。

原来，老白见我没跟过来，等了会儿，还不见影，估摸出事儿了，一分析唯一的可能是西单派出所。他闯进派出所里见门就推，在整个派出所里找我。警察们看是一个老外，也不敢动武怕引起国际纠纷，使劲叫喊：“你找谁呀？这里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地界。”老白说：“找李爽！”

“是谁呀？没有这个人，没有！”

“她就在这儿，我看见她的自行车了，门口小孩子都跟我说了。”几个警察用身体堵住那间小耳房的门儿，截住老白，说：“好好，你也别闹了，她在这儿呢，咱们可以谈谈，请到另外一间屋子去谈。”老白说他争辩了很久，才来了另外几个北京公安局二处专门处理国际问题的人。老白对他们说：“你们一定得放了我的未婚妻，如果你们不放她，我就不走！”他们说：“我们可以放她走，但你必须写一份声明，声明你私自闯入中国的派出所是一种错误行为。”

我被放出来了。

回去，抱着可口可乐的瓶子，我“咕咚咕咚”喝了两大瓶。我当时很天真，以为这桩婚姻不会再有坎坷了。老白反而更加担心，说：“到目前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过与外交官通婚的先例。”

卖　画

白天祥邀请一些使馆的朋友，买“星星”的作品，作为对艺术家的一种帮助和鼓励。

那是第一次外国人提出买我们的作品，大家凑一块商量价钱，大叔李永存很实在的口气：“三个月的工资我看差不多了。”黄锐：“我最喜欢的画三个月工资不行！六个月工资，六六顺。”

老马：“中国的毕加索和外国的一样，六个月？我看十六个月的都不多，不是为了钱，大师就要份儿大！”

有利就会有弊，这是物质世界躲避不了的必然。因为物质是辩证的，水涨船高。

在赵南家的另一次聚会，老白和严力在厕所里长谈了一次。老白问严力是不是能在他去法国完成离婚手续期间，维持与我的朋友关系假象，去外地旅行，这样对我是个保护。严力答应了，不过有个要求，“如果你想和李爽好，就要好到底。我呢也希望以后能得到国外艺术界的帮助。”

老白从严力手上买了一张我的画儿，四百元人民币，以便支付

我们避开北京去南方的费用。当时四百元人民币已是天文数字，相当于我三年“插队”的全部工钱，是我青艺一年的工资，可是我创作这幅画的时间前后花了不到两天。那时我并不知道画可以卖，我只是在为自己画画。

老白保证说：“你们去南方，我跟上海的领事保持联系，等我回到北京他通知你们，你们再回来。”

就这样，我和严力，还有芒克、黄锐一起出去旅游。我们先去参观云冈石窟。

我兴致勃勃，这是头一次出远门。晚上十点，四人一行到北京火车站。去山西的火车拥挤不堪，芒克不愧山西插过队的，扒着车厢窗户爬上去，抢占了一个地方，从窗口把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拉上来。

坐了一夜硬座，再转汽车，到云冈时我们都很疲惫，四个人就钻进石窟前面的小树丛里睡了一大觉。

这次旅行使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睁大眼睛看呀看——石窟直接依山凿开，气势雄浑，东西绵延足足一公里远，佛像的造型美极了，高鼻深目丰圆又浑厚，造像风格劲健，双肩齐挺，质朴非凡。

我这才发现自己以往在中国艺术上的高谈阔论，轻狂而不着边际。黄锐也很震惊，说：“自从‘星星’以来，我也开始思考我们的创作，怎样与中国国情更好地相融，看这些佛像，肯定他妈不比卢浮宫的东西差。”

我和严力转路去西安，黄锐、芒克去白洋淀，在火车站我们热情道别，祝愿一路平安。我们从西安一路转来转去，到了上海。沿路买了各种各样的“古董”，我们的箱子越来越重，装满了大小唐三

彩、瓦当、花瓶、茶碗，还特意一层层包上好多纸，给人看的时候小心翼翼，层层揭开，后来懂行的人说这些东西几乎一半都是假货。

上海，冬天又湿又冷，谁家都不生火。我原来的棉袄又舍不得扔，自己缝的，为了臭美显得苗条些，棉花絮得很薄。严力的表姐妹觉得，严力这个女朋友要双眼皮没有双眼皮儿，要白皮肤没有白皮肤……穿得真寒酸，道：“严力到北京变得这么土！你们都是艺术家，自己出个样子，我给你的女朋友缝个罩衣，遮遮她的破棉袄。”我画了一个中式斜襟的式样，严表姐叫了起来：“土啊，土啊，土死了！”可我坚持要中式的罩衣。我在淮海路丝绸店买了一块提花黑绢，大襟剔红边儿，大红手编扣儿。严表姐手出奇地巧，果然，我穿上后光彩了不少，衣服和我的相貌很配，但我那条牛仔裤，倒像给腿鸡装错了盒子。

我迟迟不去法国领事馆，严力很着急，因为他的表兄弟姐妹听说我们认识老外，都特想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我给法国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说，正好法国的电子音乐家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和妻子、著名英国影星莎赫罗特·偌普琳（Charlotte Rampling）到了上海，领事说请我们一块儿吃饭。我仔细打扮了一番，旧棉袄套上新罩衣，严力的表兄弟姐妹包围着我们一定要去，于是一帮子人乌泱泱地去了。

来到领事馆门口被守卫拦住。我要求见领事，领事出来了，他发现我后边还跟着一串儿，比他邀请的人数多出几倍，为难地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大伙进来了。哇！上海女人们前脚踩后脚，脖子伸得老长，就像刘姥姥们进了大观园，叽叽喳喳的高音，吴侬软语的评论，掩嘴滴滴轻笑。

领事馆里生着暖气，我们都很热，却不敢脱衣服，因为罩衣下

面是见不得人的破衣服。领事给我们介绍了英国影星莎赫罗特·偌普琳和法国的电子音乐家米歇尔·雅尔，由于中国的封闭，我们和国际上家喻户晓的艺术明星大腕共进午餐，却浑然不觉。几个严家表亲更是少调失教，玩命吃喝，弄得严力很不好意思。吃完午饭，严家表亲一定要去上海友谊商店，领事懂中国话，也懂上海话，严家表亲甩掉了我们，自己笑着上去拉着领事的西装袖子，说："我们要去友谊商店，没有外国人带进不去。"掏出大把的人民币说："给我们换些外汇券，多点利息也没关系……"我和严力恨不得钻地缝里，但法国领事简直是世间最温和的人，他让妻子带大伙去了上海友谊商店。

回到北京，我向父母宣布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父亲坚决反对，母亲不说什么，只要求看看再说。我告诉老白："我母亲想看看你。"

"好，你陪你母亲去美术馆，在'同代人'展览厅，我们可以见面。"我母亲准时到美术馆"相亲"，一脸严肃地顺着我的手指眺望，问："那个半长头发，穿一个中式棕棉袄的高个儿老外？你们俩决定结婚？"母亲说，"嗯，样子挺不错的，他要真的爱你，你自己做主，我不干涉。"

晚上父亲听完母亲的介绍，说："嫁一个外国人，还是外交官，外交部门儿是很复杂的部门儿。你到国外去，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离家那么远，出了问题手再长也帮不上你啊！"

我住进了外交公寓，因为不能出去瞎跑了，好像一个幸福的囚犯，每天画画。

那是一个发现物欲的时期，我酷爱买东西，仿佛饿过头的人，突然面对丰盛的餐桌，想一口全吞下。

我跟老白在一起时，女性们的目光既充满嫉妒，又隐藏着羡慕。家教的束缚，使我压下趾高气扬的愿望，但人性中的虚荣像一种外

部心理需求涨满我的情绪，不知不觉我还是把钱和老外当做"心理撑腰"，趾高气扬地站在柜台前挑来选去，售货员对老外们彬彬有礼，给我拿商品时恨不得扔到我的脸上。

物欲像一个专制的主人牵着我的鼻子。

昨天还掰着手指头为了买几管油画颜料几块几毛钱的算呀算，现在撑鼓的钱包像欢蹦乱跳的小肥猪跃跃欲试。购物的愿望刺激着所有欲望器官，我如同上了贼船，扬起金色富有的风帆，不知疲劳地在友谊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游来游去。每买完一样东西之后，都会更加饥渴，更大更多的欲望又从内心升起，我很快忘记了刚刚买到的快乐，又扑向另一种需要。口红、浅粉色发亮的指甲油儿、淡绿色柔软羊绒毛衣、金银耳环、性感闪亮的丝绸睡衣、高级饼干、可乐、咖啡、大块儿的牛肉……

一次，老白买了曲磊磊的画，磊磊不要钱，说他要结婚需要一台冰箱。老白带他到友谊商店选了一个冰箱，叫上了三个朋友抬到老白的汽车顶上，用麻绳捆好。朋友们从车窗伸出手臂左右扶着摇摇欲坠的大冰箱，骄傲又壮观地穿过长安街一直送到阜成门磊磊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上去。磊磊一家人欢天喜地，当时就把所有的食品放进去，刚插上电源——"喳"的一下整个单元都短路停电了，因为电负荷不够大。

我喜欢去东华门信托商店看古董，对旧东西另有一番情怀。还是什么都想买，但是我多了一个新添的毛病——在真古董前我的腿会微微发抖，大概古董像植入记忆的隐秘信息，一见古董我既喜爱又恐惧，它联结到我幼年的生活情怀，让我想起外祖父母在破碎的"古董"渣上挨打的情景。

友谊商店简直是人间最奇特的发明，百货大楼见不到的东西，

友谊商店全有。

朋友家人都不厌其烦地要求老外带他们进友谊商店。

当年在中国的老外多少都有过帮中国朋友买东西的经验。中国人被穷吓坏了。

今天我依然热爱丰盛，只是稍微换了个比较抽离的视角。人心里有个洞，洞里有个叫欲望的怪物，老饿，它逼着人去打猎，无论人带回来多少汽车、房子、艳遇、头衔、钱……都听不到满足和感谢，因为欲望只会说一句话：吃不饱。欲望这怪物把人累死的那天，人说："欲望，我永远满足不了你，永别了。"然后我们忽然发现人从来都不曾缺少过任何东西，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不测风云

我在西单被抓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月的时候我们准备登记结婚，我和老白都各自递交了结婚申请书，海淀区行政机关要求我拿出父母同意子女与外国人结婚的证明。我就请父母写这份同意书，父亲说："这派出所也真是的，不是说婚姻自主吗？李爽是超过十八岁的国家公民，怎么还要家长出证明啊，莫非将来出了什么事，是要我负责任吗？"白天祥通过大使克罗德·沙耶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申请书。大使乐观地说："中国官员已经收下了，回答是，中国法律上完全不禁止与外族通婚！但目前还没有与外交官通婚的先例，要向上级申报，请等待。"

李慧经常来电话，让我给她介绍外国人。有一天，法国使馆的军事参赞吉·博肃莱来串门。外国人无法与中国人接触，也没有随便旅游的自由，可娱乐的场所少之又少，所以洋人之间的来往就很频繁。我认识了博肃莱老头儿，他请我给他画像，我连续给老头儿画了两天肖像。他的中文马马虎虎，通过手脚并用和表情，我们还是可以沟通，他说："我请客，你们明天来我家吃晚饭，如果你有中国的好朋友也可以带来。"我告诉李慧，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快跳起来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去博肃莱家吃晚饭。他的公寓非常漂亮，有好多中国古董，使我这个在古董堆儿里长大的人触景生情。博肃莱喜欢搜集中国的壶，仅锡制的壶就有几十个，另外还有瓷的、铜的、陶的、竹子的、木头的，应有尽有。我原来以为中国好看的古董在"文化大革命"时已经砸光了，想不到一个法国军官用那么少的钱就可以买来这么多中国的宝贝，心中有点气愤，好像他们是"八国联军"中的法国鬼子，他这样说："其实我买第一把壶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对壶上瘾，使馆的中文老师交给了我们诗，中国知名诗人说，酒逢知己千壶少……"我们都笑了。

他殷勤地贴着李慧坐下，色迷迷地望着她，用手托起她的下颌道："我美丽的小鹿，你一定认识这首诗。"李慧因男人说她美，眼睛早已水汪汪的……看来法国不愧是情种之国，男人先伪装成催情的嫩草，让美丽的小鹿吃上几口，女人晕了，男人就变成了大灰狼。怪不得"星星"的哥们给老白也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叫大灰狼。

克平一向是消息灵通人士，一天，他突然带来一个坏消息，"李慧被公安局抓了。"李慧早就跟博肃莱武官搞得火热，我却根本不知道。

这时我才意识到政治形势又要变了，老马告诉我说："报上开始反精神污染，'星星'很可能会被公开提名！"我问："会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吃不准！"

十五天后，李慧突然来电话，说她出来了，要见我。见面后我们躲在阳台上小声儿说话，她非常紧张，说，你可能也要被抓，我问谁说的，她支支吾吾。从此我再也没见过李慧。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老白因公需要去香港，老白说："按国际法律公约，外交公寓如同外国领土，公安局无权抓人。我只走三天，这三天之内你绝对不许出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有些担忧，提了很多问题："结婚申请要是不批呢？"

他说："那你就住在使馆一直等到批。"

"那一个月不批呢？"

"等下个月。"

"两个月不批呢？"

"等三个月。"

"要是一年不批呢？"

他说："我们就坚持一年，早晚会批的。"

我这时才觉得有点儿从月亮上回到了人间，不安笼罩着我，在这公寓里待一年还不把我憋疯了？

那个早上，他准备好要走，我突然觉得好日子正在快速远去，恋恋不舍，似乎这恋恋不舍是对未来的预知。"你别急着走！再来一个……"

"吻，好，但飞机不肯为了吻改变起飞时间。"

"我怎么有点六神无主的？"

"爽，我吩咐了一个好朋友艾麦·芦索在这三天抽空来照顾你。"我勾着他的脖子不放，恋恋不舍拖延得有点儿像永别和埋葬仪式。

我爬上厨房的暖气，从这个小窗能看到公寓的出口。一会儿，见他从窗户下树梢间隙出来，把行李放车里，那辆蓝色日本三菱车吐出废气，车门"砰"地关上。启动，树挡住了视线，像个断了线的风筝。

我身边的一切都诡异起来，即便每一件家具都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家的家具阔绰。干净的厨房，老外沾"破四旧"的光廉价买来的红木古董柜，深蓝天鹅绒的沙发，地毯完全能和姥爷最喜欢的二十年代殖民地风格的地毯媲美，一个又一个大樟木箱子上堆着漂亮的饰物器皿。今天这些东西显得死气沉沉，仿佛它们只是些陌生的、毫无意义地被主人到处"淘换"来后硬摆放在一起的库房，好像它们正在瞪着我并且冷漠地说："你是谁？你在这儿干吗？"外交官的住宅真的像国际外交公约上写得那样安全吗？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中国的版图上，有北京，北京的版图上有个三里屯，三里屯的版图上有个外交公寓，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形只影单。

我赶紧打开画箱，免得失去这份灵感，并且自言自语安慰道："一切顺利，不就三天吗？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我开始画一幅大画，一米五的尺寸，那是我在中国时的第一幅大画。整整一天，画完了：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背冲观众，面对重重叠叠交错的亭廊楼阁，一层层高台，一座座屋宇密室中的眼睛在窥探着院庭中的女人。多么奇怪的气氛，一份伤感如风似云在心头搅拌，甚至带着某种磅礴的就义感。我哪里知道这是一件预言般的奇迹作品，画面展示了在中国未来改革开放中我的角色。一个名字映出脑海——

《黄昏的审视》。

第二天，从早晨到黄昏，一气呵成，我又画了一幅作品。当我开始观察，我惊异地发现整个绘画过程，既没有处心积虑的构思，也没有太多的意识，更没有具体目的。画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酷似一个陷阱，一些莫名其妙的有色怪物旋转着被吸入漆黑井心。我没有给这幅画起名字。

第三天清晨，我又发起画画的高烧，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一幅自画像，起名《孤独》，用的画布是厨房圆饭桌上的深蓝色小桌布。画面上，一个红衣女孩坐在几条红色的小金鱼旁边，外面下着濛濛小雨。今天再看这三幅作品，每一幅都是一个预言，因为这三件事日后一一应验！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宿命这种东西的。

艺术家的田野虽然要看耕耘的深度，但艺术种子的渊源依然是创造力的谜。

老白说的那位"好朋友"艾麦·芦索，刚从蒙古的乌兰巴托法国使馆调到北京，任二秘。

那天他突然登门拜访，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我们礼貌地互相介绍，他叫柏纳德·布希库，有一张红红的苹果脸，细长眼睛，鼻子像被父母过分随便地捏了个面团儿按上去的，头发很少但不是秃顶。"法国人也不都是金发碧眼，也有长得这么难看的人。"我想。

他们在客厅里坐下，我别别扭扭主人似的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可乐，招待两个男人。他们用阴阳怪气的中文跟我聊天儿，俩人一左一右叽哩咕噜了半天，艾麦·芦索嘻皮笑脸地说："泥和卧们摔跤吗？"我责怪着自己的耳朵，因为刚才连猜带蒙的还可以听懂几句，现在怎么突然什么也听不懂了呢？我摊开双手问道："我没懂？跟谁摔跤？"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又叽里咕噜起来，柏纳德·布希库的

中文比艾麦·芦索好点儿，柏纳德放慢速度一字一顿道："泥枕漂凉，卧们……"他用指头杵杵自己的胸膛，又媚态地指指我道："卧们向活泥摔跤。"然后，噘起难看的肉嘴巴做出亲嘴的动作，还"咂咂"地弄出些声音来，说："卧们向和泥摔跤！"我恍然大悟，他说的是："你真漂亮，我们想和你睡觉！"震惊、耻辱、厌恶交织转换成愤怒，从未打过人的我握起了拳头。怒气已经把眼珠子都快顶出来了，"混蛋！"我猛地站起来走到大门，大门后面有个古董小柜子，柜子上有一只青花瓷瓶，我使出全身力气拉开大门，"咚"地一声门撞在小柜上，"啪"地一下青花瓷瓶滚落，我闷喊了一声："滚出去！臭他妈法国流氓！""砰！"我粗暴地拿门撒完气，贴在门上一屁股滑坐到地板上。

本来我以为外国人比中国人有教养、守信用、诚实、尊重妇女。现在看来不管国情、文化、风俗如何，人就是人。人不是民族习俗、信仰、教育塑造的结果，人有与生俱来的心量容积差异，在民族风俗信仰及教育的参与下变成了有限的多元文化杂烩体。

据传柏纳德·布希库因为在中国的一段恋情而成为间谍。后来他的故事被英国人卓依思·沃递改写成小说《蝴蝶君》，描写他和一个中国男人石佩朴的爱情故事，他们秘密相恋十八年，石佩朴还生了一个孩子，而柏纳德·布希库竟然不知道石佩朴是男人。虽然小说夸张了点，但这是柏纳德·布希库和石佩朴之间的真故事。

一九九八年在我的一个画展开幕式上，见到了柏纳德·布希库和石佩朴，好奇心推动着我与他们聊起当年，我问柏纳德："你们那次'卧们向和泥摔跤！'是不是公安局派给你的任务？"

他笑着不肯直接回答："翻什么老皇历呀，反正我们没有'和泥摔跤'。"

我又问石佩朴："你怎么能坚持了十八年没露馅儿？"

他笑容中透着韧力，诚实地说："嗨，开始还不就是想出国么，但在十八年的'持久战'中我们俩建立了感情。"

"孩子呢？"我问。

"已上大学。"

"你怎么'生'的孩子？"我对人家这种事儿刨根问底儿，自己都觉得自己讨厌死了。

"我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收养了一个孤儿。"石佩朴居然平静地回答了我。那是一个曾经俊美的老男人，他自幼学昆曲，坎坷而戏剧性的生活，已经把他磨成了一个无棱的木雕，但里面一定增加了许多宽容智慧的东西。

7

The seventh part | 第七部分

宿　命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秋老虎，第三天眼看就要过去，虽已五点的黄昏，太阳还是死热。突然电话铃响起，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抓起了话筒，刚抓起就后悔了，里面传来声音："哎，我和二毛就在岗楼这儿呢，大兵说里面的人得下来接我们，才可以进去。"是姐姐打来的。可我能接谁？一个偷偷住进外交公寓的中国公民。是谁天真？我？还是姐姐？为什么几个以往聪明过人的人，今天突然幼稚到愚蠢不堪的地步？老白回来后再见不行吗？十几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吗？

我一直觉得"九"是很神秘的数字。这大概就叫宿命，如果宿命有意义，那它应该有另一个至高无上的作用，即把人引入艰辛的生活，并使人冲出局限在精神上获得了悟。不然，宿命将毫无意义。

我说："好吧，我去接你们。"出门前顺手拿了件浅蓝色夹克。开电梯的以前是一个女的，现在变成了两个，她们的扣子扣到嗓子眼儿上，蓝裤子，唯一可以看到肉的地方是塑料凉鞋。而我只穿了一个吊带背心，下面一条制服短裤，黑色的高跟儿皮拖鞋，这是法国的时髦衣服。电梯中已经有火药味了，在两个正统妇女的对比

下，我心虚地赶紧把浅蓝色夹克穿上，把拉链拉到嗓子眼儿。从电梯出来，站在公寓门口儿的玻璃门前，我突然感到不妙，停住就不肯往前挪步。

姐姐推着自行车和男朋友二毛在岗楼前，我冲他们招手。瞬间我的双臂已经被钳子般的力量抓住，许多人架着胳膊把我往外推，我本能地往地下出溜，想挣脱，从岗楼里冲出四五个警察，一辆飞驰而来的吉普车，"吱——"地猛踩刹车，停在外交公寓的门口儿。我被抬出公寓大门，我玩命挣扎，姐姐冲进来揪住我不放，姐姐男朋友揪着她的衣服不放，鬼哭狼嚎地折腾得一团混乱。突然有个外国人从窗户呼叫："外交领地警察不许抓人！违反国际公约！"警察司机说："快点，把她也一块儿带走！"姐姐松手了。她的手一松，我被顺利塞进吉普车。关门的时候，我的腿还在外头，美丽的高跟鞋早掉了，大腿不知道是怎么被拉进来的，划破了。

吉普车里，我背靠着车篷，蓬头乱发，光脚，腿上的划伤火辣辣地疼，旁边和对面有两个汉子。

现在喊叫绝对是多余，我旁边儿的警察还捏着我的胳膊，我轻轻甩开，我好面子从不会撒泼，我常常觉得撒泼是给别人看不花钱的戏。

我想起公寓的门还没锁，老白回来见我被抓走了该多难受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两天不说话，三天不说话，就过不去了？姐姐打电话，完全可以叫她等老白回来再说。我开始责备怪罪自己，觉得自己有太多缺点，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强。

一条短裤又紧又短，一个吊带的黄背心，在这些警察面前我就跟没穿衣裳似的。幸亏我下楼前穿了一件浅蓝色夹克，我的脸放松了，整整衣裳，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

车拐了几个弯儿就停下了，有俩人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记忆中一直没有人看重过我，但这回公安部门却非常看重。刚跳下吉普，那俩人马上抓住我的胳膊，怕我飞了似的，大门口儿，我一眼看见牌子上写着：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

来了三个人，一个长方脸儿，大圆眼睛，端正的五官。另一个灰白脸儿，戴白色琇琅眼镜儿，嘴尖尖得如吹气。还有一个是女的，一脸细密的小雀斑，两条辫子过肩，虽然完全称得上玲珑妩媚，却被难看的衣服掩盖了她应得的那份光彩，听口音是南方人。没有谁介绍自己的姓名，仿佛一旦进了衙门，就都不是人了。我与他们接触了整整两年，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三个人进来，白眼镜明显是领导，他走到桌子前，另外一男一女一左一右坐下来，屋子中央剩下一个矮矮的方凳，明显是为"犯罪分子"准备的。白眼镜扬扬下巴，呲出一句："坐吧！"

长方脸儿说："李爽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你比谁都清楚！"

"因为我要和外国人结婚？"我猜测，"国家哪条儿法律说不让跟外国人结婚了？"

白眼镜说："国家的法律是向百姓公开的。"

我说："那就是我不关心政治呗，没看到。"

白眼镜说："你声称不关心政治，却参与政治，不然你也不会到这儿来，你今儿不说清楚就别想走，先签字吧。"

我见一张纸上写着"拘传证"，怎么办？签还是不签？签我也是在这儿，不签也是在这儿，能想个办法出去吗？妄念是为幻想铺垫道理的第一步，进去将会更虚空。我定定神儿把名字写上，尽量显

得平静。签完字，他们三个人稀里哗啦收拾纸张，大功告成了似的站起来往外走。我问："我可以走了吗？"长方脸儿回头说："可你还什么都没说呐！"他摆出一脸遗憾的样子。白眼镜说："你先从头儿到尾好好儿想想，明天见。"一种上了当的感觉，使我的心充满自责。

坐着另一辆吉普车上，我从车窗望出去，万家灯火，街上有好多人骑着自行车，小饭铺的门口挂着手写的红字牌子：馄饨、小笼包、爆肚，味道飘进吉普车，我发现一天没吃饭了。

骑车，走路的人，谁会留意一辆军用吉普上所发生的事情？即便对我已是天塌地陷，但明天，太阳还会照样儿升起。

炮 局

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的收押处，是清乾隆时制造大炮的地方，也是民国时北平陆军监狱，抗日战争时是日本关押中国"要犯"的监狱。四周围墙修筑了七座碉堡。

戒备森严的房间，一只灯泡，无罩也无力照亮没有粉刷过的灰墙。一个女警察进来，手握一根超长电棒，打量着我那身狼狈而扎眼的衣着，明显地，女警察气儿不打一处来，鄙视的目光，吆喝着让我双手高高举起，"扶墙，叉开！叉开！"我叉开腿，她在身上搜摸了一遍，搜到女性柔软的地方，她粗暴地用电棒在两腿间敲。我赶紧再叉开些，然后她带上胶皮手套把手伸到我的短裤裆里，我

猛地夹起双腿抗拒，“你他妈浪的时候怎么没夹着点儿！”电棒又在腿肚子上来回敲。

人到这份儿上只有任凭摆布了，本应该委屈和仇恨警察的我，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想起鲁迅书里的话：“可怜的阿Q被赵老爷笞杖之后，却又去侮辱小尼姑。”

女警察见我态度平静，失去了整治的兴趣，收走我身上的金属制品，揪掉发卡、手表和一个珍贵银制如意，我的眼睛追着这件纳福的宝物，如意被扔进一个粗糙的牛皮纸口袋，命中的福分与非分开始了一次较量。

胖胖的警察腰上挂一大串钥匙，几十间牢房的铁钥匙都坠在他的腰上，加上他的体重更让人觉得步履艰难。我光脚跟在他沉重的步伐后，他说：“前边走！”

深深的走廊在晚上更有鬼魅般的感觉，两边每个门上有一个小方窗，我想起电影《红岩》中见过的渣滓洞，但我这身装束完全不像革命女英雄江姐。一个“号子”前面，警察把门上的小窗一掀，看了一眼，叮咣叮咣打开门。

“号子”里一股臭味，三个女的已经在被窝儿里了。大约四五平方米的“号子”，右边墙角上有个茅坑儿。犯人们排着睡，脚顶墙，头朝门，我进去的时候，三个人一齐抬头看，胖警察说：“少废话啊！”三个头马上放到枕头上。

门关上以后，一个三十多岁的瘦脸女人把头伸出来问：“哎，你叫什么？”

“李爽。”

“哎，有烟么？”

“没有。”

“几进宫？”

“什么宫？”我问。

另外一个生得眉墨眼秀的半老徐娘，也伸出头来挺和气地问：“抓现行对吗？姑娘。”无疑，我那一身打扮，谁都要往“那儿”想的！我不语，靠墙坐下，正好在茅坑边儿。这也是唯一剩下的地方。灯不准关，四十瓦不亮，但想睡觉时就觉得太亮了。

我没有被子，光着脚，肚里没食儿觉得冷。一会儿小窗打开，有人喊：“躺下！”还用钥匙敲敲铁门，夜使铁的铿锵声格外响亮。第三个姑娘想睡觉，不耐烦了，说：“行了行了，还不快躺下！在这儿还撒什么娇呀，省得他们丫老鸡巴乱敲。”我立马头朝墙歪下去，尽量避免顶着茅坑儿，铁钥匙又在铁门上发出垂死般的“当当”声。姑娘急了，骂我道：“你她妈别拿局子当你们家！”

姑娘小姗和我一回生二回熟，她已经“三进宫”，十五岁时被父亲强奸从家逃跑，为了生存她开始偷窃，如今技术高超得已经被同行称为“女爷”，她说：“我喜欢偷东西，不偷手痒痒，瞧！现在被关得都起小红泡儿了吧？”她伸出肉乎乎的小手，上面几个看不太出来的红点儿。

一天，提审回来，我沮丧地说：“受不了，真想胡招了了事儿！”

小姗说：“小心点儿，什么都别招，提审看守都孙子着呢。招了就是找死！我三进宫，头一回提审加看守阴了我三次，放我出去了，第二回我什么也没招判了两年劳教，这是第三回，够呛，我他妈底儿太潮。”

恐怖的经历，小姗用看似无所谓的表情道来，但深藏的伤痛还是从她轻咬嘴唇那神经质的动作里流露无疑。谁的童心不是一本童话，每人的第一页都是洁白的，幼小的我们充满天真地希望画出最

美的人生，我们努力握紧笔想画出最幸福的笑脸，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却是模糊而湿漉漉的？

一次我在撒尿，突然小姗冲小铁窗儿破口大骂："臭不要脸的！人面兽心的，谁比谁他妈流氓呀！看得见摸不着，憋死你丫的！"小铁窗儿就轻轻关上了。小姗笑了，胜利地说："上厕所的时候如果小铁窗后面的木窗忽悠忽悠动，准是男看守在偷看。你别怕，不骂白不骂。"

我是晚上进炮局的。从第一次审讯到最后，一直是那三个人，没换过。他们每天来提审，首先要求我写一封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且从未与他产生过任何感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我拒绝了，但这只是个开始。

我每天被连轴转的提审，越来越多地错过犯人的午饭、晚饭时辰，即便是窝头熬茄子，窝头煮青椒，窝头炖白菜，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也是珍珠翡翠白玉汤。我看着提审轮流去吃饭，坐在角落里被罚反省，数着肚子喊饿的辘辘之声，眼看着人的意志、信仰、对爱的正义感在饥渴面前摇摇欲坠。我要求上厕所，小辫子女提审站起来跟着，厕所里小辫子的脸由麻木转成有分寸的温和，道："李爽，何苦的呢，好好想想人家法国的外交官会看上你吗？"

这是一句多么下意识又充满民族自卑的话！

我不吭气。

"哎，你听见没有！"

"白天祥给我提鞋都乐意！"我如此轻狂自大的话，仿佛使整个民族都失去平衡。

"为你好！怎么不识好歹呀，拿着！"她给了我一块枣馒头，我玩命吞下的时候，谢了一声儿，干馒头卡在食道的半途，但我知道

它现在是我的力量源泉。果然，这块馒头使我坚持了整整一夜的照明灯，早上估摸五点左右提审撑不住，撤了。回到号里天已大亮，我已经无权睡觉。

几天之后，开始传讯新的内容——"星星"和"民刊"。

白眼镜拿出一张"星星"名单，不是别的正是我们那份手抄本名单的摄影件，以及我们在美术馆合影的照片儿。白眼镜显出一种对政治的兴趣，他像负有重任的人，像推动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摇晃着名单道："李爽你们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的颠覆性团体！"他看着摄影件，宣读罪证似的念道："组织负责人：黄锐、马德升，会务组：王克平、曲磊磊、钟阿城、杨益平。"他看了我一眼："曲磊磊是曲波的儿子吧，王克平父母在攻克北平时生下了他，才取名克平。杨益平的父亲，长征时的老干部；钟阿城父亲是革命的文艺家。看看父辈们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儿子辈不仅不珍惜还要颠覆，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受到再教育的原因，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陶醉在自己演讲里的他有些动情。

新的车轱辘审讯又来了。白眼镜说："全国都在清除精神污染，抵制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星星'是个典型，马上要被全国点名批判，'民刊'的人和'星星'的人都不能再逍遥法外。"

一个一个人的审，从克平与老外的关系，到我周围所有的关系，芒克、赵南、老马、北岛。我的确很紧张了，我的嘴里只剩下四句话："不清楚、不在场、不知道、没听说。"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坚强不屈的人，每一夜在亮亮的灯光里不能睡觉，我动摇过无数次，我一会儿责难自己，干吗为这些别人的事情扛着，一会儿又想起小姗的话，招了他们就有把柄了！一会儿又定下心来想："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顺着提审的意图提供给他们多抓几个哥们的机

会，而我能挣到的不过是早点回茅坑边睡觉去，或多吃几块窝头茄子，而失去的将是日后如何见‘星星’的朋友以及永远不安宁的良心！”平静就又悄悄降临了，使我可以继续重复那四句话——不清楚、不在场、不知道、没听说！“至于窝头茄子就算了吧，还他妈减肥呢！”我很会安慰自己。

其实“星星”“民刊”的事，公安局了如指掌，可是，要拘留人是需要法律手续的，拘留高干子弟是需要斟酌一番的，因为高干子弟一般都有点后门。而口供属于拘留传讯最方便的依据之一，要得到口供只需给犯人一些折磨、恐吓，这些通常都立竿见影。我的拘留通令依据的就是李慧的口供。

我和白眼镜之间驴唇不对马嘴，似乎是他思维时大脑从左至右，我思维时从右至左，用他习以为常的方式套我，不太生效。他尤其反感我谈论爱情，更不爱听我为与政治大对角的东西——感情辩护。白眼镜用钢笔点着桌子，“我们中国人，事业第一，没有老外那么低级趣味。你们之间谈爱情，有什么基础？白天祥不过是个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反革命，他能爱你吗？他在利用爱情的幌子玩弄中国女性！这样的人你能爱他吗？里外里谁傻呀？”我随口说：“爱情跟道理无关，是一种缘分！”

“你别废话连篇转移视线，看！这是什么？”他从书包里掏出几张照片儿，扔桌上，小辫子警察给我拿过来，评论道：“人家严力可跟你划清界线了。”心揪了一下，我见到严力正在和一个姑娘接吻。我是女人中的情种，潜意识里填满了爱情和艺术，与他三年卿卿我我，被警察手上热吻的照片浇得浑身冰凉！如果有爱就祝他幸福好了，我想着。

“李爽，现在你可以交代一些严力的事儿了吧？”

“有什么可说的？严力怎么不能找女朋友？”我说。

“说你傻还不信，现在你的哥们都跟你摘得干干净净！”

我用一百个不信任的眼神儿望过去，不信！就是不信！因为太像挑拨离间了。我友爱过我的每个哥们，没有人可以破坏我在“星星”时的美好记忆，没有谁可以破坏一个纯洁无瑕的志同道合的团体记忆。即便它点亮群星后终将消失在群星里。

那天我很恨警察。

他们无权抹黑曾经属于我们的当下。我打定主意用温柔的心固守美丽的“星星”，至于日后如何我不屑一顾。

十几天的提审，说实话我是糊涂了，我并不明白他们要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抓李慧是为了抓我而铺垫机会。

我不偷，不抢，只是未婚与男人做过爱打过胎，如果把这种人都关进监狱，恐怕需要多盖些房子。白眼镜要求我回答“药”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来“药”是什么意思。好多天就问我“药”，最后他们也憋不住了，拿来一个录音机，里面有我和李慧的电话录音。但是录音并不清楚，在反复重播中我记起，我想请李慧的父亲去香港探亲时帮我买点天麻丸，在电话里嘱咐了一句：“哎，你别忘了那药啊。”

“我们有证据你说的药是避孕药。”

“是天麻丸。”

“是避孕药！而且是你教唆李慧和外国人乱搞！李慧说她什么都不懂，在她见老外之前还是处女，你在电话里嘱咐她带上避孕药。”白眼镜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一板一眼地说。

“李慧胡说八道！”我已经气得牙齿咯咯发响。

白眼镜站起来做出发火的样子，拍桌子瞪眼，“坦白从宽！你赖是赖不掉的！”

我说："你们有什么证据？"

他说："我们有电话录音，有人证，需要的话还可以有物证！"

那个五官端正的警察递上一份东西，声音温和。

"在这上面签字。"

"我不签！"

"你才二十四岁，被搅在这些事里，说了就从宽，李爽你喜欢画画，我们可以让你进美院。"

"我不签。"

白眼镜："那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青藏高原去！"

"……"现在我开始害怕。

"你回去自己想想吧，签了字就放你回家！"

情　杀

我的牢房换了，这里墙是软的，里面有稻草，外边刷着绿油漆，预防犯人撞墙自杀。一个年轻女人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如睡着的火山。

抱着铺盖卷进去，我有轻微的舒适感，因为终于逃离了枕头顶茅坑的处境。这间牢房只有两个人，地方相对大了点。我奇怪，"干吗给我换号？"有小鸡忽然见黄鼠狼大摇大摆来拜年的疑惑，可能当过狗崽子的人都多长出了几根多疑的神经。

为了尽可能减少警察看守用钥匙敲铁门的刺耳声，我乖乖把行

李贴墙放好坐下。"叮叮当"尖锐的铁器声还是响起来，看守用大串钥匙比划着让我坐在小窗正对面儿，仿佛我是有危险的要犯，需要他们从小窗口时刻监视。

哇，可静下来了，小窗户给了我一些季节的信息。窗外一棵大榆树，树枝上最后几片叶子已摇摇欲坠，照在铁栏杆上的残阳只剩下一丝，蓝色的生铁被温暖渗透。隔着小窗户，我的双眼很满足地享受了残阳金色的凄美！初冬进来，三月了我还在炮局，不知何时能回到自由时光里，和我爱的朋友们一起画画、唱歌、念诗、骑车、喝啤酒、抽烟、散步，回家叫一声爸妈姐妹。人人唾手可得的事情，对我已是贪心的奢望。

同号的姑娘不美也不丑，黝黑的方脸孔，一双圆而大的眼睛睫毛长长的，窄小前额上几根刘海，头发齐肩，蓬乱干燥，草草绑成一根马尾辫。宽肩平板的肢体好似她硬邦邦命运的写照。

我们没有相互介绍，各自在自己的天地间游离，久久地沉默，互不干扰和平共处。

"今天几号？"姑娘打破了死寂问我。

"我还真不清楚。"

"几点了?"她又问，

"应该快七点了？"

"不可能，六点开饭！"她不满的口气。

"天短，黑得早。"

铁门、钥匙、铁饭桶，通道里飘来热而臭的洋葱味儿。

"哎，今儿没准儿有肉。"她显得快乐起来。轮到我们的牢房，我俩一人一碗洋葱糊糊汤，里面有点肉沫。"哇——"她见肉星叫了起来。"这样一点小事都激动成那样儿。"我心想。

夜里，她突然推醒我说话："你叫什么？""当当当"铁门响了，"知道规矩不！你不许碰人！"姑娘缩回手，有点歇斯底里冲门喊道："X你妈！没刀没武的我她妈能杀谁呀！"如此戒备森严，看来这女的有来历。

第二天姑娘被传讯，回来，本来坚硬的宽肩忽然窄小，歪瘫在墙上，过一会儿她哭了。见她会哭我放下心，眼泪永远与柔软形影不离。但眼泪一旦决口也会转换成灾难，她喊："忠强啊！忠强啊！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为了你，我什么都没了！"声嘶力竭叫得连看守都没辙了。

这个姑娘是丰台区人，叫淑琴，与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忠强一见钟情，热恋中的情人合伙把淑琴的丈夫和四岁女儿杀了。

昨天，他们违抗天忌的"钟情"壮举，今天，在她与忠强第一次面对面的对证中，突然褪色变质。因为忠强推卸了一切责任。她仿佛需要重温旧事，为了理清爱侣情路上的迷茫。

她向我娓娓道来，一个她与忠强的故事。

她说："我再也受不了老猪（她丈夫姓朱）的手，他打我，每次打完我，他的糟鸡巴就会硬起来，还总是当着莉莉的面……"

"干吗打你？"

"厂里受气了。"

"忠强呢？"我问完悔恨自己的窥探欲。

"忠强和我美啊，好舒服。忠强恨透了他，好几次要杀他。"淑琴的眼睛在向世界宣布，当一个女人爱上和恨上——都是同等激烈。男人漂泊，女人逐浪，人都是海上的溺水者，谁踩在谁的身上都不能叫做救赎，而且那将离博爱的彼岸更加遥远。

淑琴继续道："多巧，我老公星期四感冒了，连感冒时还想那事

儿，他又打了我，强迫我在厕所干。我嫌脏，他抽我嘴巴骂，你这个骚货比厕所还脏。"忠强看我半拉脸青了，决定干掉他。礼拜六我在感冒冲剂里放了半瓶安眠药，给老猪和莉莉喝了。"提到女儿，她口舌不如谈老公那么顺溜，内疚使她口吃。

"他俩睡死了过去以后，忠强上楼来，背了三把磨好的菜刀。"

"切老朱脖子时老朱睁开眼睛挣扎，我使劲按着，要死的人真他妈有劲。血从嗓子流出来，像水管，人怎么有那么多血？！等我的害怕劲儿过了就跟看杀猪差不多。忠强提起莉莉，问大手提包准备了没有，我后悔了，说留孩子一命吧，他搂着我亲，说，我要和你生我的孩子。"淑琴望着绿墙上一块脏斑，好像那里是个电影屏幕，的确，看得出她把忠强的话当作最动心的海誓山盟，女人是多么愚蠢又天生的情种，淑琴把她天地间的爱都浓缩在那块脏斑里，用她所能理解的全部心愿向往着爱情这种东西。

"忠强和我骑车到河边儿，在莉莉身上拴了一块大石头，扔到河里。回来我们把老公的肉切成小块儿，扔到厕所里，一点儿一点儿冲走。小肋条骨头好砍，大腿棒子可真叫硬呀！"我呆呆听着，她看了我一眼，证实我还在听。

"菜刀砍成锯齿儿了，手磨出了血泡，一沾血更痛。我把手指头切成小段儿，他再不能打我了。"淑琴冲茅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开心地笑了，老朱的手对她永远失去了威胁。

淑琴骄傲地碰碰我的胳膊说："哎！你不知道忠强玩命地把老朱的鸡巴给剁烂了！"我一身鸡皮疙瘩。

"忠强和我整整切了一夜，这辈子头一回这么累，还得洗刷屋子，真他妈累！"故事讲完了，淑琴右脸挂着复仇后的微笑，左脸燃着痛苦的抽搐。

此后几天，淑琴被密集提审，两个为对方赴汤蹈火的情侣，变成了仇人，互相掐，男的说是女的出的主意，女的说是男的出的主意。淑琴白天回来骂忠强，夜里爬起来哭女儿。我忘不了她的哭声："莉莉，莉莉呀！你白死了，你才四岁，莉莉！妈对不起你呀！""咕咚、咕咚"淑琴用头撞墙，我坐在角落里用眼睛跟随着她，我能做什么？我不希望阻止她发泄，这是生活留给她的唯一一件"快乐"，谁知道明天她会去哪儿。

有天下午，她回来了，看守仿佛带着感情，铁门的动静也柔和了许多。淑琴的脚上加了一副镣铐，她坐下，冷冷地说："我要离开你了。"

"换小号儿啦？"我问。

"判了！"

"有期徒刑？"

"……"淑琴没声儿。

"无期？"我还问，好像我已经与这个女人有一种无标签的生命关系了。

"死刑。"她答。

"……"我难过地闷在那儿。

莎士比亚说："爱和炭相同，烧起来了却得想办法叫它冷却，让它任意，那将把身心烧焦。"后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淑琴却平淡。我希望时光倒转。第三天她和我讨论枪毙之前想吃什么，喝什么的事儿，她在屋子里神经质地走动，看守也睁一眼闭一眼。我多么感激看守的仁慈，生活中到处是人性的表演，只需留意，记住这些小小不言的事，它们给了你窥见生活斑斓的机遇。

早上六点看守开了门，动作轻轻地像开一扇棉花门一样，问淑

琴，最后一顿饭有西餐和中餐，你要吃什么？淑琴大眼睛忽闪着道："李爽将来要出国，我先替她尝尝西餐吧，看，我还会跳迪斯科呢。"她尽可能柔软地扭着板硬的腰肢。

过了半小时左右，看守又把"棉花门"打开道："到点了，行李你家人会处理的。"淑琴从枕头套里拿出几件衣服，挑来挑去，选了一件夏天的白色无领的确良衬衫换上，她说："这是忠强给我买的，今天我们俩一块儿死。"她笑了，脸是扭曲的——几乎有刑场婚礼的劲头儿。她对我说："忠强把我那份儿子弹钱都交了！"看守催她，她看着我，我想说点什么，但嘴巴黏得把话沾住，怎么也吐不出，对一个去死的人说话是沉重的，我说："淑琴，如果今天你和他一起走，就原谅他。"

"我爱他。"

"淑琴，好好去吧，说不定有轮回呢！"

"真的？那我就还和忠强好。"拖着镣铐迈出铁门，淑琴回了一下头，还是刚才那种扭曲的笑，我回了一个，想必一定更扭曲。

谁听了这故事都会想到罪有应得，但我无法恨一个杀了人的人，谁是坏人？在我眼中，人不是专门为干坏事儿而出生的，坏事的后面有一本人情的隐秘病历。

我盯着她的铺盖，想起姥姥的话："人来世去世，拿不进来，带不回去！"

囚井里的蝉蜕

我一点儿老白的消息都没有。

又过了一些日子，终于提审我了，我的座位旁边多了个小桌儿，有好多吃的，巧克力点心什么的。我差点儿昏过去，馋得不行，恨不得一口全吞下去。他们让我吃，我说我不想吃，长方脸儿说："别客气，我们买这些因为今天是你生日。"

"哦，是吗？"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你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没日历没表怎么记？"

对我用暴力手段，或者别的什么手段都行就是别用这招儿，因为我吃软不吃硬。

小辫儿女警察陪我上厕所，跟我说："找不到你材料也难不倒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带有无限灵活性，简单得就像今天吃什么一样。你非常想出去，我们理解，你也要理解我们，你的案子比较特殊。你只要承认在李慧的事情上有错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怎么就不懂还死倔呢？"

犯人小便，提审从来不和犯人一起撒尿。这一回她居然也脱了裤子，蹲在我旁边儿"哗哗"撒尿，我还挺受感动。她一边儿撒一边儿说，还递给我一张草纸，"李爽你想想，横竖不能说是我们错了吧？你还年轻，世界上也不是就白天祥一个男人，他有老婆有家，他说为你离婚，法国大老远的你怎么能知道！以后还会有好多中国男人爱你的。"

话落，我嗓子眼儿里像噎着个东西，异常难受，动摇了。

我在提审室里的桌儿上写检查，写我不该把李慧介绍给法国武官博肃莱。白眼镜看完了说："你把我们当小孩儿耍呀？光写药不行，要写上避孕药！你想出去，又不写清楚！"我连着写了三次，一直到他们满意了。

之后白眼镜说："你给白天祥写一封信，说你不爱他与他断交！"

"不写！"

"为什么不写？"

"真爱，为什么要自毁？"

"这是你的态度问题，你所谓的真的假的，这件事已经没戏了。"

"对我来说它存在。"

"你在做梦！白天祥已经被驱逐出境了！"

"那我宁愿继续做梦。"这封信我没写。

写了一份儿检查，以为能出去了，每天盼着放我，可三个提审一去不回头整整一个月。小窗户上几个枯枝在冬天的风中摇头晃脑，好像争着往号子里看，号子里继续有来有放有判，小偷、流氓、贪污的女人。终于有一天突然传我，我特别高兴。

我被带到院子里，院子像一个没顶的水泥盒子，盒子上有电网、岗楼。三个月没有见太阳了，睁眼感到困难，警察在我脖子上挂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让我朝墙根走，我联想到无数次在电影里看到的枪毙镜头，紧张地走到墙根儿。"转过身来。"警察说。原来是要给我照相，正面照了一张，左侧右侧又各照了一张，摘掉牌子，回牢房。

被骗的心情，导致最窝囊的自责。本来我还以为要个小聪明，写一份儿检查就能出去了。从这天以后，我就不再幻想了。我告诉自己：现在你知道了蝴蝶是蛆蛹变的。

三个提审又出现了，长方脸儿说，“李爽怎么样？你瘦了。”

白眼镜儿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竖着耳朵听，以为要放我出去，“我们不是说过了嘛，政府不是不许中国人和外交官结婚。你认识克里斯汀吗？”

我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

“不认识？”

我摇头。

“就是那个法国使馆的卫兵。”

我想起来了，老白说过有个高干的女儿要和这个卫兵结婚，中国一直就没批准。

“告诉你，他们今天被批准结婚啦。世界会看到中国并不封建！”

按捺不住的眼泪在我眼眶里转悠，我恨命运的叵测而难以琢磨，还有更多更多理不清的迷蒙。眼前出现了被抓之前，我画的那幅《黄昏在审视》，我忽然发现，这幅画画的不正是我目前的真实处境吗？一个女人面对社会的“大家长”，正在受到审视。一幅画顶得上千言万语，揭示了复杂的未来隐喻。我通常回避超感官存在的事实。这天我隐约开始相信，迷信的背后可能有一种高领域觉知。

又一个早晨，提审像往常一样，三个人坐在那儿，我坐在三四米远的方凳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是要求。

实际上他们也在等待，等上面指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等了三个月。据说当时公安局非要判，外交部希望不要判。

他们说：“你还要抗拒到什么时候？写不写？”

“不写。”

“那可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没有过司法经验也没有法律概念的我，从不会问为什么，自幼年起任何可以属权力级别的——无论是力气比我大的同学，还是家长老师，或是班长、主席、书记都比我有权力，我唯一的权力是在接受中去悟人性。

“两条路，要么写这封信，要么就判你，后果自负。”回答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见我不语，长方脸拿出一张表，说：“李爽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啊。”表上面写着“流氓教唆犯”，劳动教养两年。还写着好多别的，我完全不想细看，迷散的视线像看一个与我无关的外文账本。

“好，信的事你去想想吧。”

押我的人带我到走廊尽头，一个很小的门儿，很小，我得低头进去，门顶着屁股关上，漆黑，摸不到顶，感觉像一根圆柱，挺高，蹲蹲不下，站没法儿站，歪着没法儿歪，摸摸墙麻麻棱棱恶臭无比，那股腥臭刺激出画家的想象力来，“这是什么？血？脑浆子？”恐惧使我在原地转了一小下，那是陈年的呕吐物吗？一阵恶心，赶紧又转了另一小步，这儿的味道仿佛尿池子……坚强的决心，被委屈的浪潮泡软了，粉碎了，无助感从天上地下团团包围着我，撑不住了。我的心对自己说：“敲敲门吧，说求求了让我写什么签什么都行。”另一个我在说：“乞求宽恕吗？你有什么要宽恕的？你没有咬‘星星’‘民刊’的任何人，你没有伤害任何人，你没有教唆任何人卖淫，难道求别人来宽恕你没有做过的事吗？爽你想退都没有理由，除非放弃做人的资格。”于是我得到了一次平息。平息中我想起被捕前的三幅画之一：陷阱和彩色怪物，一个名字飘出脑海——《欲望之井》。任何欲望，出于爱也好，出于恨也好，都是某种形式上的追求，有追求必然有坠落。如今我恰巧在陷阱中。

渐渐地我的身体吃不消了，一阵愤怒的原始生存的反应——我需要挣扎，我幻想着自己力大无比，推倒了墙壁。自由！自由！急需自由的我用尽气力踹墙，用手到处乱摸，乱敲，除了麻麻棱棱的坚硬的钢筋水泥，就是恶臭！啊——！开门儿呀——！

肚子饿了，饿过劲了，又饿了。时间已经失去了它的真实感，恐惧重新变成主宰，幻觉中有彩色怪物包围着我，这儿空间虽小，恐惧无边无际。“世界会把我忘掉吗？老白为什么不来救我？‘星星’的朋友为什么不帮我走些后门？如果有个万能的救世主开着一艘宇宙飞船从天而降，那该多好！人是多么自私！警察是人吗？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外国人一定比中国人文明。我是多么可怜，怪不得朋友叫我傻爽，家人说我没心没肺……”被抛弃的心情淹没了我，眼泪哗哗，带着雷鸣，我歪在墙上大哭，要把这个恶臭之井填满。我尿裤子了，温湿的尿顺着大腿内侧缓缓流淌，渐渐冷却……严重缺水，空空的大脑有要睡觉的感觉，漆黑一团里我看见姥爷死前浑黄的眼珠子。看见姥姥朦胧的面孔，又看见四岁的我，站在幼儿园的楼门口，被雷阿姨罚站，阿姨点着女孩儿的额头“呲儿”她：“大右派的孩子别老想继续作威作福，你什么时候穿上鞋，什么时候我让你进来。”

“雷阿姨，我的鞋变小了，穿不上。”女孩的脚冻肿了，手像五根小胡萝卜，阿姨说：“看你右派爸爸连双大一点儿的棉鞋都不肯给你买。”那是十二月零下十几度的北京。为什么这个记忆像影子尾随我到这里？不知哪来了一种力量，使我可以用接受的态度，看着那个小女孩，无名的力量给了我重温生命后的宁静——好的坏的评价都一下子不存在了。我不能解释是什么力量解放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包括现在，即便身在囚井中我除了平静还有无名的解脱感，绵延的心声说：“天堂并不是美丽东西的堆砌，而是一阵如风的清静

与深邃的自在。它可以发生在战场上，也可以发生在和平中，那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在炮局的一个小囚井里呢？”正想着门开了，眼睛被光刺激，好像有针扎一样，我用手遮着光紧闭双眼。

“出来！”有人说。我笑了，“啊，太好了，我可以喘气儿了。”我想看守一定认为我疯了。

还是那间屋子，提审已经换了衣服，也许我在囚井里过夜了。

有人问：“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是谁在问已经完全无关紧要。

“你签字吗？”

“签啊。”他们也许诧异，不信我要签字。

“信呢？”

“不写。”

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吃惊，弯下腰签了字。本来以为自己一定会腰痛疲惫，相反却精力充沛。

“你准备好了吗？

“马上就走吗？”我问。

“收拾东西去吧。”

刑事犯

坐在一辆上海牌汽车上，车开出了炮局的高墙电网和岗楼，在这儿我整整住了三个月。在这儿我品尝到了痛苦尽头的——蝉蜕超

脱。我依然无法明白为什么闯过痛苦，后面会有快乐？但炮局是我要纪念的地方。

小辫子女警察坐我右边，长方脸左边，白眼镜在司机旁边。

我深深地呼吸着。

你哪个季节被关起来，哪个季节就锁在记忆中。空气特冷，已不习惯。即便才三个月，已如隔世。

熟悉的街道从车窗外缓缓移动，商店、饭铺、自行车、居民楼窗户上晾着的衣服、红的蓝的公共汽车、小孩、老头、老太太、红灯绿灯，我的北京，今天看得见摸不着了。

夕阳西下，地平线越来越暗，一些没砍掉的玉米秆儿竖在田里。我迷恋美丽的黄昏。"插队"时常在此刻追画夕阳，前面又出现了高墙，电网，岗楼，我再也忍不住了，不能回去……长方脸儿用胳膊顶了我一下，歪过头来说："李爽，哭什么呀？到教养所表现好还能提早出来嘛，就看你的了。"

生活中有些地方真像陷阱，明明知道，还是会跳下去。当你感到受害而自怜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又在陷阱里了。有的人干脆萎谢在里面，他们对自己说："人太坏，认输吧。"于是他们放弃尊重生命的担子，卸下一切责任，怨天尤人，还告诉别人："认命吧，省得爬上来还会被推下去。"有的人继续攀登——人所有的努力都是面对自己内心的一次又一次挑战。

良乡劳教所俗称"二六八"。

大筒子楼，每间"号儿"里是大通铺，少说十五个人一间，中间有一米宽窄的过道，每个人铺底下有小板凳，一只脸盆，一个行李袋。

进炮局的时候我的头发就不短了，三个月过去已是大辫子。我一进去，姑娘们就围着我，问我叫什么？判了几年？叽叽喳喳。

女队长姓吕，她一进来，鸦雀无声。

她问："有剪子吗？"

"有，队长！"值班的犯人看守立刻应声。

"拿来。"

"队长，我们的剪子都是做针线活儿用的，太小。"

"那也拿来！"

"是！"

队长吃力地试着用小剪子剪我粗黑的头发，没剪几根儿就累了，吩咐一个叫翔子的犯人看守："去队部要把大剪刀。"

这里是犯人管犯人，翔子把我的辫子给剪了。我要求："辫子请还给我吧。"

吕队长问："干吗？"

"留个纪念。"

"好好想想接受思想改造的事，比留恋辫子重要。"

我从辫子上剪下一小绺儿头发。

我依然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老白怎么样了？"星星"的朋友是否有被抓的？我的家人承受得了吗？

良乡劳教所的劳改工厂专门生产军用大炮和坦克上的防雨罩。

每月一次，家属坐专车来良乡劳教所给犯人送东西和食品。探亲日我听到铃铛响，女犯们兴高采烈拿着小板凳坐到通道门口等着叫她们。

我一个人坐在十几张空荡荡的铺间，号脉，听自己的心跳声。

没有人明白为什么我的家属不能探亲，我想大概是封锁消息，但如果需要"封锁"就说明有"进攻"。

同屋有几个闯过江湖、性格凶猛的姑娘，第一个是小胖子，年

纪大概只有二十的样子；第二个瘦高挑儿，脸孔秀气；第三个是头儿，叫荣荣，三个人在厕所把新来的我逮住。

荣荣问："哎！新来的！我猜你丫是个政治犯？"我不理会她。秀气的瘦高挑儿问："你杀过人吗？"我还不吭声儿，荣荣觉得她们的荣誉受到威胁，道："你丫是哑巴？骚逼还他妈挺清高！"

"你嘴干净点儿行不行！"我忍不住了。

秀气的瘦高挑儿说："嘴干净管屁事儿，逼不干净怎么办，我看她准是洋妓！"我有些担心了，这种流氓叉架绝不是我的强项，看气势她们不准备轻易放过我这个新来的，厕所有五个茅坑儿，茅坑之间没有隔段，对面一槽长长的水池子五个龙头，筒道"大号"里是没有任何隐私的，睡觉都开着灯，门上有大玻璃。

我在小便，旁边有个女孩也在撒尿，她胆小地看了我一眼。江湖姑娘威胁这个女孩："哎！你丫别扎针儿！（告密）这边儿治不了你，外边儿花了你！"女孩赶紧逃跑了。我的确慌张，随后提起裤子要下台阶……高个儿姑娘拱了我一下，小胖子飞速下了一个绊儿。她们动作麻利，我摔在肮脏的茅坑边，不得不用手扶着沾满屎尿的茅坑沿爬起来。"这回谁比谁脏？你还嘴硬吗？把你的皮带给我！"她俩按住我，姑娘荣荣抽出我的皮带。那是一条法国真羊皮细皮带，皮带头上有精致的花纹。"哇！还是金色的呢！"小胖子感叹。

"又是你们几个，干什么呢！"看守队长突然站门口，盯着我那副肮脏的狼狈样儿，问我："谁把你推茅坑里的？你指给我。"我是懂得规矩的人，看着警察撒谎道："我自己不小心摔的。"队长挥手让几个姑娘走了，我坚持说："我自己摔的！"

"李爽随你的便，愿意扛你就扛，倒霉的是你！"

第二天，我在洗碗，又在厕所见到了她们，荣荣凑过来，又拱了

我一下，我挪个地方，她掀起衬衣露出系在自己腰上的法国皮带，示意胖姑娘去望风儿，说："哎！谢谢啦！你原来是哪儿的？还挺仗义，现在，在二六八不管有什么事尽管哼一声，你的事我包了！"

"我的事儿我自己包。"

"我早看出你有来头儿，别瞧你焉巴出溜的！"

另一个秀气的女孩说："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

"暂时没有。"

"不让你探亲？你肯定需要捎信。"

这话使我灵机一动，说："有！"

"啊！这还像个朋友的样儿，说吧！"

我把那绺儿头发和信缝在手套里，荣荣带给了她哥哥。过了一段时间，荣荣有消息给我："你姐到我家把手套取走啦，还送了好多礼呢！"几经周折，几个月以后我那绺儿头发到了法国，出现在老白书桌前的一个小镜框儿里。她用钦佩的样子看着我，贴在我耳朵上神秘地说："我哥说你不是一般的人儿，电视上都批判你了。"

"啊？不可能。"我狐疑地说。

"我操你大爷，我告诉你的事儿能是假的吗？"荣荣显出很重视自己名誉的样子。

我反击："嘿，我没有大爷给你操。"

"呵呵，别生我粗人的气。"坦诚从她心中流露，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外面的消息。

每天早上洗漱完毕，整理一下内务，如果工厂没活儿，大家要整齐地坐在铺脚前，学习政治材料，反省错误。天热可以有一个小时的午休。

有一天午休，犯人看守大翔子值班，在走廊上看报纸，看完之

后，她悄悄进屋把报纸递过来，小声儿问我："嘿，你不是也叫李爽吗？看看这报上说的是不是你啊？"接过《北京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登着一篇新华社记者述评，文章题为《小题大做——评白天祥等人在所谓"李爽事件"上的喧嚷》。

"是你不是？说呀！"

"是又怎么着。"我白了她一眼。

"真的啊？"她上下打量我，又侧过身儿从窗玻璃的影子里打量自己。

"哎，你啥本事啊，连大使都为你小题大做。"

"不是大使，一个普通外交官。"

"嘿——你还得了便宜卖上乖了，人家可是法国的外交官，你看看那边的电视、电台、报纸都为你大做文章！人家还要和你结婚……"

"你是值班呢？还是演讲呢？"警察听见大翔子的大嗓门。"队长，我正值班呐！是她来跟我要报纸。"我对满嘴说谎的人，一点办法没有。队长吩咐："大翔子，你赶紧趁午休，帮李爽把行李般到'小号'去！"

"是！队长。"

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以及电视台点名批判我这天起，我一直被关在"小号"里，虽然比别人多出一张桌子，但失去的却是全部自由。

我给队长写信，要求像其他人一样有工作的机会，我需要走路，呼吸空气，与人交流。

强烈的好奇心，使女人们冒着被罚站的危险，溜出来往我住的小窗探头，品头论足，我完全像一只猴儿，却不如猴儿，猴儿好歹不明白人话。

"我操！不就一个洋妓吗？国家干吗动那么大干戈？"

有的说："她要只是卖X的，老外不会死乞百赖地非要恼火不可。"

"准跟政治有关系呗。"

"李爽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呀？"

"还行，一般般。"

"五官端正吧。"

"哎哟——还不如我呢！"

"是，也不如我。"

"不难看也不好看，不明白老外看上她哪儿了。"

"老外傻逼！"

"谁他妈傻？有本事你给我弄一个外交官来看看！"

"骚逼你丫吃醋啦？"瘦高挑儿秀气的脸孔出现在我的窗口，冲我一笑，说道："我们给你解围来了。"她站在门口，直到上班铃响。

可苦了队长们的嗓子："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再看我罚你站！"通过《北京日报》带来的信息，证明荣荣她哥的话是真的。我暗自高兴——老白没有抛弃我，"星星""民刊"的哥们一定为营救我尽了不少力，不像提审说的"没戏""白坐""往外摘"，于是夜里我把能想起来的哥们、朋友的名字念叨了一大通儿，叨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天爷！"

我一出去上厕所，就被一群人跟上，荣荣她们几个姑娘马上自愿当起我的保镖来。小胖子背靠门上，一只脚蹬门框上，凡是来看李爽的都不让进，真有屎有尿，蹲那儿装假拉撒不出来，可就走不了喽，非放下几毛钱不行。一个女孩发誓憋不住尿了，一进来，她看着我说："你还认识我吗？"

我看着她干净漂亮的脸儿，的确似曾相识，"见过，在哪儿想不

起来了？”

秀气瘦高挑儿说：“你丫套什么鸡巴近乎？”

荣荣想在我面前整顿一下她手下的形象，说：“就你丫嘴不干净，你丫有真鸡巴就先掏出来看看，再骂别人，在国际案件面前你得刷刷牙再说话。”

女孩在荣荣教训秀气瘦高挑儿时趁机对我说：“在圆明园诗歌朗诵会上我们见过。”

“是吗？很可能！”

“我叫小红，是军事博物馆的。”

我问：“判了几年？”

“三年。”

“因为什么？”

小红犹豫了一下，“和你不一样……”她显然不想多谈，一定有未愈伤疤。而我又多了一个认识的人，很欣慰。小红体魄健壮，婉转流盼的眼神，高雅的鼻子，唇樱齿白，宽厚的背影有点小伙子的劲头儿。

后来荣荣、小胖子、秀气瘦高挑儿，大大方方地向小红问好，她们像男人结拜兄弟般拍着肩豪放大笑。

晚上，犯人看守来敲我的小窗户：“李爽，队长叫！”我去了，队长的脸很严肃：“报纸看了吗？”“看了。”

“瞧你干的丧失国格和人格的事儿！”

我压低声音道：“我代表不了国家，有什么国格可言？”

“你给我闭嘴！明天所长找你谈话！”

“吕队长我不想住‘小号’，能不能让我回‘大号’，并且下工厂劳动？”

“你的事闹到国际上去了，这是所里开会讨论的结果，这对你也是个保护。”

“我为什么没有探亲日？”

“有你问的份儿吗？我不是你的老师，是你的管教！你是一个犯人，来这儿是受惩罚和改造思想！”

“报上说对我的事不是判刑，所以我不是犯人是失足青年，连判大刑的都可以接见亲人。”

“你可以给公安二处你的提审写信，由他们决定你是否可以探亲。”

我写了一封又一封要求享有接见权的信，所长终于传我谈话。我拿着小板凳，穿过中庭，一进队长办公室一眼认出提审长方脸和小辫子，他们站了起来，很快又坐回去说：“李爽，我们听说你表现不错？”

我学着荣荣的调子懒洋洋地说：“是吗？怎么不错法儿啊？”

“你写的信，我们看了。”

“我为什么不可以接见？”

“我们来就是要和你讨论这事儿。”

“接见需要讨论吗？”

“李爽，你是不是听说过表现好的犯人，可以提前释放的？”

“嗯。”

“现在你已经学习了好几个月党的从宽政策，坦白是犯罪后对自己罪行认识过程的关键，如果你准备好了，写一封与那个法国人的断交信，别说探亲日，提前释放都有可能。还是那句话，你不是喜欢绘画吗？我们可以帮助你联系美院……”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美院等“好处”。我带着偏见去听这些，想起姥姥讲的故事：驴看见人拿着胡萝卜在眼前晃，大叫：“恩啊，恩啊！”之后人把胡萝卜吃了。

“我没准备写这封信。”我用一种识破了诡计的口气说完，并且

等着他们爆发。

“好吧，现在，你可以接见了。”

我完全不相信我的耳朵！

“什么？”

“写封让你家人带着东西来看你的信。”

“真的啊？”

“真的！”

“我能画画吗？特小油画棒的？”

“特小？”长方脸提审看看所长，点点头儿，大家通过了。

我后悔自己对警察抱有太多成见！任何人都是冰和太阳的混合体，人类多么需要沟通。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们也以笑回报。

“二处的人和所长来传讯李爽啦！李爽可以接见了！”消息很快在劳教所里传开。

人是多么顽强的物种，凭着一股精神，凭着一个期望，凭着一个信念，为了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像弹簧一样适应着环境。每个人都是一本了不起的小说，他们讲完自己的故事常常会说同一句话：“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与小红谈话的机会只限于洗漱、吃饭和礼拜日大家坐在中厅看电视的时候。我进来时小红已经待了六个月，我眼看着她的天真与淑雅一点点地被蚕食，走路的架势都流里流气的，满口脏话。

一天她道来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姐们儿叫齐京晶，是我们家楼下的邻居，她爸下放五七干校以后，她妈老跑外边跟人搞去，齐京晶没人照管，有时没饭吃就来我家吃一两顿。后来她认识了几个外国人，我那天……真他妈傻逼！”小红好像需要新鲜空气，大口呼

吸，她并不是为了讲得更加绘声绘色，是冤屈耻辱不堪回首。

“你别讲了。”我要求。

过了好一会儿，她继续讲：“我有一个男朋友瑞金，写诗的，我特喜欢他。我想买高跟鞋臭美，一天京晶说带我去老外家玩儿，还说你不是想要一双高跟鞋吗？我托老外给你带了，你去试试。晚上我们在军博附近的黑地里，来了一辆日本吉普车，我们钻进后备箱，是什么使馆我也不清楚。进屋儿一看仨老黑，上来就把我往另一间屋里推。”

“我发现上当了求京晶：‘我还是处女呢！我要留给瑞金。’京晶说：‘装什么嫩呀，给谁不是给。’我急了，‘给谁也不给老黑！’其中一个会说中文的老黑也急了说，‘我们都付过好多钱了！’愣把我拖了进去……”

小红把头扭开，我也挪开视线，不忍看那张凄美的脸。

我的耳朵已经难以承受，不知小红又是如何承受这个梦魇的，她以自己的美丽和单纯拥抱生活，生活把她打蒙了，也毁掉了她对所有的信任。

小红看着不洁净的天花板道：“半夜三更老黑把我们送出来，他们的车刚走，我们就被等在路边儿的警车抓走了。提审了一个月，京晶被放了，判我四年，当时我喊，判我死刑啊！死了倒轻省了！”小红几个月前还是盈盈秋水的美目，如今闪着对人性不共戴天之仇。

小红准备把自己处女之身献给瑞金——她的最爱，为了取悦最爱想要一双高跟鞋，却被最亲信的女朋友欺骗，天真和自尊受到最残酷的戏弄。

狱中琐碎

荣荣是个江湖女侠，混社会的女人自然要学男人的样子，烟瘾极大。我不是也为了学酷才抽起烟来的吗？好在抽的是"相"，没有变成心理上的拐棍。而荣荣她们没烟就跟男人阳痿了似的，"因为烟我非当头儿不可。"她说。教养所不让抽烟，四十几口子劳改犯都给她捡过烟头，只要有机会。打水、出工、放风，大家的眼珠子都死盯着地下，这个提鞋那个系鞋带儿，都是为了捡几个烟屁股。谁要是捡到一节二指长的烟屁股，说不定回来能换几块糖、点心什么的，哪怕一个馒头也不错。

有的时候可以和男犯的队伍相遇，女人们可以见到邻居，亲戚，情人，丈夫，或者只是为了看看男人、想必男劳改犯更是能够饱饱眼福。

犯人看守们捡到烟屁股，会偷偷窜到我的"小号"里来抽，在我这儿抽，就不能不给我抽几口。烟屁股里混搭着各种牌子的烟草，卷成"大炮"。我因长久不抽烟了，头晕，她们说："别说你啦，连我们这些烟筒都得靠着墙角抽。"

烟有了，火又是个问题。搓火，姑娘们从被子里抽出一小缕儿棉花，捻成捻儿，用鞋底搓，轮番大干，搓几百下闻着有味儿了，轻吹，"轰"的一下就着了。十次只有两三次成功，一次小胖子说："今天我问男看守，有火机吗？他说，没火机，有火鸡巴！我骂丫活该，他说，甜胖子你真让我馋得火急，给哥哥摸一下儿，要什么尽管说。我给他摸了一下，他告诉我，点火儿用的棉絮应该是干干的加点洗衣粉，洗衣粉里含磷，磷是化学原料易燃。你们猜猜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咱俩出去以后结婚吧？还自称是科学院的呢！"小胖子的脸从其貌不扬变得美丽起来。

劳教所里真是什么事儿都有。还有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儿，为了能出去，从楼上跳下去，把大腿骨摔断了。结果不但没出去，还加刑一年，罪名是抗拒改造。

有一个女犯住劳教所的医院病房，女病房和男病房的窗户挨得很近，晚上男犯爬过来和她做爱，结果男犯把白天开刀刚缝上的线挣开了。

"大号儿"里有人吞牙刷把儿，照透视有阴影，诊断为胃穿孔，就能办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出去后几天牙刷把儿就拉出来了。我可不敢，万一拉不出来，横在肚子里，说不定歪打正着真闹成穿孔了。

劳改所一个月一次洗澡日，男队女队，全在同一个犯人澡堂子里洗澡。洗澡日像节日，对我更是好日子，我可以走出"小号"和大家一起。我们排着队，端着脸盆，里面放着肥皂毛巾和换洗的衣服。

去洗澡房的路上，我睁大了眼睛看房子，看树，看天空、偶有男队与女队互相碰头的时候，还可以看看男人。男人在林阴道上遇到女人那种兴奋，好像连树叶子都恨不得沙沙叫起春来。男队女队接近了，男队警察命令道："停！向右转！稍息！"男人们定住身体，背向女人。警察喊："不许转头！等女队过去！"女人弄姿作态，嘻嘻扭怩着窃笑，步子拖泥带水，一会儿这边脸盆掉了，那边蹲下系鞋带儿，男警察吼着："不许乱说乱动！"女警察吆喝着："快走，快走！臭不要脸的！"

荷尔蒙弥漫在空气里，亏欠的阴阳荷尔蒙已经多少得到了象征性的补偿。男人和女人们会用好几天的时间谈论这次奇遇，并且盼望着下一次奇遇。

洗澡房只有八个喷头，要求几十个人一个小时内洗完。大家一进去，大门"啪啪"反锁，警察外边一坐，里边随便打去吧。喷头

少，时间短，这帮姑娘快速扒了衣服，一群人光屁股冲锋抢占淋浴喷头，我既抢不着也打不过。喷头旁边儿一个盛满热水的水泥池子，一池子水要洗四个队，两队男，两队女，如果赶上头一拨洗，水是干净的，最后一拨，水就是泥汤子了。我第一次洗澡就跟没洗一样，出来的时候比进去时还脏，别人蹭的，特别臭，一点儿办法没有。

有一次三队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说："男的也在里边儿洗过，我们会不会怀孕？"话音没落一片笑声，有人大喊，"哎！小心水里有小蚯蚓，钻你肚子里你就怀孕了！"又有人大喊："那他妈才好呢，咱们全部怀孕，集体解除……"一片狂笑。"哐哐哐！"外面看守在砸门。

荣荣和小红她们洗完出来，红光满面干净又畅快，见我光屁股抱着胳膊站那儿傻看。小红笑话我，"瞧你，落水狗似的！"荣荣、小红见秀气瘦高挑儿也小脸通红洗完出来了，她们冒着再次被蹭脏的危险，一起回去给我抢地方。

秀气瘦高挑儿仗着自己个子高，靠近淋浴喷头把盆儿往上一举接水，喷头底下的人好不容易挤到水下，正冲得痛快，水源突然被截，急得扒开眼前的湿头发，大骂："骚逼瘦干狼你丫……"秀气瘦高挑儿就一边在上面接水，一边在下面乱踢，接满一盆"胜利的水"笑着帮我搓背……小红再去接，又是一片骂声。干净的澡堂子里填满了污言秽语，我顾不了这许多，任骂声此起彼伏，反正有一盆又一盆的清水冲洗着浑身的肥皂泡。那种畅快加朋友的关怀使我至今充满感激，当时的肥皂香味至今留在记忆中，那是姥姥最喜欢的檀香皂，绿色的。

据说男人最好的铁朋友是部队战友，我的"流氓"女朋友们是我终身难忘的铁朋友，因为她们不是在你有宫殿时来和你欢聚的酒肉朋友——她们在你什么都没有和所有人都说你是流氓、你错了的

时候给你微笑。

如果你在人生中有幸遇到过这种人，千万要珍惜，并从天涯海角找回他们，可能他们目前正需要微笑呢。

厕所也是看热闹的地方，很多女人都有一个恋爱的对象，她们之间用爹、弟弟、哥哥、儿子等称呼亲切地叫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同性恋。经常的场景是：一个坐在洗碗池子上，另一个人站在对面，俩人温情拥抱，你摸摸我，我抠抠你。以此填补肌肤上的饥渴，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

犯人看守每五十分钟查一次房。从走廊的窗口往里看，如果抓住同性恋在一个被窝里动真的，队长不让她们穿衣服，赶到走廊里罚蹲。

小胖子就被抓到过一次，足足罚了她六个小时蹲。当她知道谁是"扎针"的人之后，洪亮的骂声让全通道的人都能听见告密者的名字。小胖子还没罚完蹲，小红来替她报仇，把"扎针"人的床单、枕套、内衣通通撕成烂抹布。"扎针"人的亲信揭发了小红。小红被罚，蹲在小胖子旁边。

荣荣冲向告密者的"情人"，抄起板凳，照脑袋就砸。"见血啦！"我听见筒道里的尖叫声，一场轰轰烈烈的群架开始了，十几个女人搅成一团儿撕、抓、咬、骂，鬼哭狼嚎，其余的女人立刻腾出战场，站到铺上起哄助威。我只能在"小号"里干着急，趴在窗户上脑袋像只拨浪鼓左右观望。当我可以上厕所时，发现走廊里已经蹲了五六个只穿裤衩的姑娘，荣荣却不在里面，后来知道她被关进小囚井了。

有个小偷儿跟我说她是北京最棒的，我问："你为什么是最棒？"她说："练的。"我问："怎么练？"她说："我每天在热水盆儿里用两个指头夹肥皂，从早夹到晚，我的手可是金钳子啊！"

我说："我不信。"她说："你光着穿上衬衫，你在胸前口袋里放三张纸。"女人乳房这里很敏感。"来，闭上眼睛，你过来。"我就从她跟前过去，任何感觉没有，但是三张纸不见了。我也在洗完脸后试着夹肥皂，夹不起来，凉水里也夹不起来。

探亲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入狱一年后，有一天，两三个犯人看守的脸贴在我窗口，她们显得那么高兴，"李爽！李爽你家来人了！"

"真的啊？"

十三日上午十一点，我第一次站在接见队伍里，第一次参与到姑娘们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中。我紧抓住板凳，轮到我时队长搜遍全身、看着我说："李爽，我告诉过你，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你看现在你可以接见了吧，说话要注意，不要做反面宣传员。"原来我是单独接见，从警察办公室的玻璃看着警察在搜查我父亲、姐姐、妹妹带来的东西。

一年来第一次见到我的家人。面对父亲、姐姐、妹妹，当着俩警察面谁都不便抒发太多感情，况且对中国人来说压抑感情已经成为第二个本能。"爸！"我叫了一声，对这个称呼已是陌生，姐姐对我和以前不同了，热情地掏出五颜六色的包裹，说："爽，有黄油酥饼，费了牛劲才买到。"妹妹长高了，刚考上北京大学，话里多出一些之乎者也的句子，正是狂和显摆的年龄。当着警察的面，她大大咧咧，头抬得老高，也因为社会突然重视我，而突然发现了近在眼

前的二姐很有意思，她告诉我："我们现在常去圆明园，据说你跟舒婷、芒克、顾城熟。"我仿佛已经离那些事情很远，眼中只有茶叶蛋和肉松、点心，顾不上外面时髦的诗歌朗诵会了。馋使我鼓起勇气问道："队长，能吃吗？"

"吃就吃点吧，反正今天没有中午饭。"看守的笑容充满理解。

妹妹说："哎！我们大老远六点就起来了，多说会儿话你回去再吃吧。"我手抖着剥开鸡蛋皮一下一个鸡蛋全塞嘴里。姐姐递过一个茶缸子，我没头没脑相信准是好喝的，果然出乎意料，比我想得还来劲——啤酒！我一气吃了十个鸡蛋，父亲难过地说："爽子，停下吧，吃多了有可能蛋白中毒。"我这才止住，之后问："爸，妈怎么没来？"

父亲声音放轻："你妈怕看见你伤心，没敢来！"

姐姐丰富的表情，使我明白外面对我的营救正是烈火见真金的时刻。由于警察和我们坐在一起，更具体的消息我只能心有灵犀地去猜测。姐姐递给我一块男人的大手表，挤眉弄眼的神色使我明白手表里有点东西。队长问："什么？拿过来看看！"姐姐到哪儿都有心眼儿，说："李爽眼神儿不好，要块大点儿的表。"姐姐拿出一盒油画棒和一个速写本来，这是今天所有东西中最来劲儿的。

晚上，躲在被窝儿里，用小手电照着，我摆弄这块表，怎么拆也拆不开，就乱拧表上的几个钮儿，拧来拧去，突然表上出现了一行字"I Love You"（我爱你），眼泪顿时止不住地流。

我画了不少小画，小板凳儿，窗户，窗户外的树枝、小铁栏杆，筒子道，筒道里面灰蒙蒙，远处有个窗户，好多这种小画。画完就收起来，看守不可能每分钟都看着你，偷偷画点东西她也不懂你干什么。这些画儿，我托里面的犯人给我往外带，后来被发现了，就不许画了。

不久，"大号儿"里的姑娘们开始描眉画眼，黑眉毛、蓝眼圈儿、

红嘴唇儿。

队长把我叫去，“李爽，看你干的好事！”

“什么好事儿？”我问。吕队长拉开抽屉拿出几根黑的红的油画棒头儿来，“教养所都成了大戏台啦！所有的人都描眉画眼儿。是不是你给的？”

“是。”即便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偷了我的彩笔头儿，但这是规矩，要永远站在犯人一边儿。

“让你带彩笔是优待和抬举你，回去把一盒笔都交出来！”我回去一看，油画棒儿只剩下灰的，白的，绿的，黄的，连橘黄的都叫姑娘们拿走了，恋恋不舍地交出了那盒宝贵的油画棒。

我不能画画儿了，就看书，外国翻译书不许进只好看中国书。以前没有看过，现在《中国通史》、《三国》、《水浒》……一本接一本看。我还请家里人带《红楼梦》，但在探亲日被扣住，看守还训了我一顿，“李爽你是不是还想看《金瓶梅》呀？别忘了你是来改造思想的！”我心里说，看《金瓶梅》根本不如在劳改所里学得多。

筒子道的尽头就是“大号儿”的厕所，看守睁一眼闭一眼。我和小红在厕所里交换饭盒儿，我的里面有家里带来的糖块儿、点心、肉松，她的是她家给她带的几块肉、水果。哪怕过节改善伙食有点儿肉小红也省下来给我留着。看守要是发现了，当然就一网打尽——全部都归看守。

有一天小红发明了一种吃法，把肥肉剔下来掺白糖夹到馒头里，偷着送给我，她装着没事儿，在筒子道里晃，往我的“小号儿”蹭。看守说：“干吗？”“找队长谈话。”趁看守不注意，她在我的窗口一探头儿，我把门开一条缝儿，她背靠着，从背后把盛着吃的缸子递给我，说：“哎！水晶包子，快吃！趁热！”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姥姥去世，那个星期，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仿佛什么都知道。我相信人比自己肉眼见到的更不可思议，大部分人认为，那些有过神秘经验的人，只限于极少数幸运儿，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品质。但我认为那种能力不是高居云端的东西，不过是人人皆有的本能，人所要做的只是敢于超越世俗的眼去看。

我不再想溜到大厕所找女朋友说话，看守要求到我的小屋儿里抽烟，我不耐烦地拒绝。连探亲信也不想写，每个周六必须写的思想汇报我不管不顾，最后是不想吃饭，把菜都倒了。看守说：“哎，你别倒啊！给我，给我。”由于想每天多吃一些我的饭菜，看守没有汇报给警察队部，直到我连床都不起时，才慌了神儿。

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你怎么啦？绝食就是抗拒改造！要从严！”

我说：“没胃口。”

“老掉牙的一套，回去好好儿吃饭！”

“没胃口。”

“我叫医生来看看你的胃口！”

医生说没事儿，报告上写着：“忧郁性内分泌失调。”药方上写着：“三天病号饭。”后来送来病号儿饭，一碗肉沫挂面飘着浮油，我不想吃。吕队长来了，大声说：“李爽你找死啊！一直挺顺，还剩下最后几个月，你捣什么乱！”她招来看守，“你看着她，把这碗面给我吃了！”

从姥姥去世的那个礼拜起我每天想念她，不是忧伤，是凡尘迷惑之外不慌不忙的细微感应。

夜深人静时，我不止一次听到姥姥对我这样说：“为了你的我的快乐，你现在应感到快乐。”祝福别人是人能做到的最高境界。我现在身陷囹圄，哪里有快乐一说？我从被子里伸头往房间最黑地方的

角落找姥姥，没有。“我疯了吗？”声音又回来了，真奇怪，是肉耳难以分辨却又异常清晰的声音，我放下理智分析，准许声音带来的平静漫漫如烟，一种不需要挣扎的平衡感。

远隔北京城，我与姥姥超越了生死分界在一个劳改犯聚集的地方亲密相处，这份联结伴随了我整整一星期。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她“死”了，身影远远飘逝，那份默默的情怀将与爱永驻。

一个月之后，我突然想吃饭了。

姥姥去世后的一次接见，妹妹说：“你怎么好像一个透明的人？”也是那一天我突然发现她也变成女人了。我急匆匆第一句话就问：“姥姥好吗？”

妹妹回避看着天儿，父亲支支吾吾干脆不语把谎留给别人去说，姐姐笨拙地接下话茬说：“喔，姥姥身体可棒了！”

“姥姥今年多少岁了？”我问。

“哦——八十七了。”

他们知道我爱姥姥，瞒着我。

后来家人也瞒不住了，告诉了我。姥姥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的，而我在她离开时已经奇迹般感应到了，至今我无法描述也无法用科学去分析这个经验，但那经历真的很美。

据他们后来告诉我，姥姥也老问我的消息。

“我们一直瞒着姥姥，没有告诉她你在监狱服刑。编些信念给姥姥听，说爽子在法国生活特好，特幸福，生了孩子，要回来看她老人家呐。”

我和姥姥互相寻找惦念，她像一个心灵保护者。我相信，每个在世的人，都在生命的旅途中遇到过一个心灵保护神般的老辈亲人。

8

The eighth part | 第八部分

谢 幕

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已再次编成辫子。

有人说人生像是一种弈棋，一步走错了，全盘皆输。我实在不同意。自然中有春夏秋冬，海浪有高潮低谷，人生怎能例外？一步不错的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传说，要么是压抑人性的热情，站在狭隘成功的概念里日夜博弈，对自己毫不仁慈。

聆听你的热情，在热情中你是你自己，一个能为自我开封的人是自由的，模仿别人的人，心会变得冰冷，你所犯的错误是拒绝智慧。

劳改所的规矩是选犯人中最厉害的犯人，当看守。荣荣从小囚井出来之后，队长和她的谈判是："你要么当犯人看守，要么给你加一年刑。"荣荣选择了当看守。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上午十点，队长冲荣荣传令："传李爽！"看守荣荣叫道："李爽！队长叫！"她跑到我"小号"的窗口，笑得很奇怪，我披上外衣在门口探风，问："哎，荣，好事儿坏事儿？"荣荣表情异常，说："爽，今天不是接见日，好像有外边儿的人来了，还有一个男的挺高挺壮，你还差两个星期就要解除了，说话可千万小心！"

"嗯，你放心。"我应着，往队部走。

我到办公室一看，好家伙！今天怎么这么郑重其事，三个提审都在，我有点装酷，一屁股坐小板凳上，犯人永远得比警察矮。白眼镜跟我说："李爽，这两年你表现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

"好什么好？你什么没干过？"

我已经是虱子多了不怕咬的人，知道又有什么戏要开场了。因为白眼镜的演技从来都不是一流的，训我的表情很别扭，他说："你看看谁在那儿？"我站起来，往旁边的房间里瞥了一眼，头"轰"的一下，我爸坐在那儿。

他说："你父亲是来接你出去的，不过，李爽，你这封信还没写呢。"

"老要我写那封信干吗？我不写。"

"你父亲大老远的，你能把他赶走么？"被人玩弄了的火儿不打一处来，我站起来端着板凳扭头儿出门，走了几步喷出一口恶气，"王八蛋！"荣荣一把捂住我的嘴，"别废话，你他妈给我忍住！"他们追出来说："谁让你走的！回来，回来！"

"李爽你要好好地重新做人，再也不要做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了。"

"完了吗？"我问。

"你要每个星期向当地公安局写汇报，签字吧。"

"签什么？"

"解除劳改。"

"啊——"我马上拿起圆珠笔歪歪斜斜地签上名。

"回去悄悄收拾东西，别张扬！"

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乱了。

推开昏暗的"小号门"，忽然感到人是多么有弹性，我无法相信这里是我住了两年的"家"。天天看着窗户上的铁栏杆，想从天空中

搜索到鸟儿的踪影，自由似乎总是羞怯地往后退，却在无意时我握住了它的手，自由悄悄地对我说，来吧！勇敢地拥抱我，向世界宣布你爱我！

姑娘们轰动了，跑出来趴在我的小窗户上，默默看我收拾东西，面孔中没有小红。我溜达到厕所，猜她可能在这儿。果然，在水池子边儿她脸朝着墙站着，假装洗碗。

“我要走了。”

“知道了。”她说。

“小红你还剩多久刑满？”

“一年零一个月二十四天。”

“我回去就给你写信。”

“行。”小红有气无力地。

小胖子和秀气瘦高挑儿跑来一把抱住我。

“爽，可别忘了咱姐们儿！”

“别，别哭！以后还见面儿呢。”我尽量安静地安慰她们。我不想看到她们哭鼻子，那样我也会掉眼泪的。

荣荣进“小号”帮我提行李，我回头儿，看见整个筒道里姑娘们朝大门口晃来晃去的脑袋，我冲大家招招手，“好好儿的等待解除啊——”我大声喊了一句，声音在胸腔里明显地发颤。

“李爽，你也好好儿的啊！”

“谢谢啦！”我扬起胳膊，像男人那样有劲儿地挥着，整个筒道里的脑袋变成了无数只胳膊挥着。

“再见——”

没有办法，和她们两年的交情，临别的友好使无论什么样的瓜葛都一笔勾销，这就是爱的力量，监狱里照样有爱，太阳照耀的时

候是不分好人坏人的。

跨出犯人通道，我看见荣荣。我总觉得，如果有前世，荣荣肯定是个男人，还应该是个梁山好汉，如今这现代梁山好汉已经身不由己，但她始终保持真实。荣荣把着门儿笑着说：“你不在了我看门还有什么意思，连烟都没地儿抽了。”

“荣，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谁照顾谁呀，还不是一根藤上的瓜，互相照应着点儿心里热乎呗，好好儿的啊，再见了爽。”

“我会给你们写信，再见——”我俩望着对方，眼睛里的友谊清澈见底。人走到哪儿都会留下情感上的印迹，到处都是无常的必经之路，每一条路都会通往一个叫做智慧的地方，那儿是人性的最高奖赏，只要接受再加上耐心。

父亲重新得到了自己的女儿，提起行李，高兴得早已忘记漫长焦虑的等待。带女儿回家，像个仪式，使他很享受地微笑着。

要下楼时，我忽然觉得需要和什么人说一声再见。吕队长站在楼梯口，对我微笑了一下儿，她主动说：“李爽再见啦，出去好好儿的啊。”奇怪怎么连警察也用“好好儿的”这句话，仿佛人生下来是为了玩一种叫做“好好儿的”游戏而去做“坏坏的”事儿。

我回了一句：“谢谢，吕队长，再见。”我相信吕队长也有一颗希望整个世界都变得“好好儿的”善良之心。

走出楼外，阳光耀眼，父亲比我熟悉良乡劳改所的地貌，迈出大门的第一步，我吐出关了两年的一口闷气。

七月的太阳火辣辣的，眼前一片玉米地，偶尔一阵小风吹过干枯了的玉米花，刷刷婆娑。父女俩不说话，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不知从哪儿开始。

我的步伐由沉重转轻松，而父亲忽然累了，“离长途汽车站还远着呢，我有点心跳。”父亲轻轻喘息着，他自从被关进学校土监狱以后来得了心脏病。他歇下来，我看着他已发白的头发。为人父母是个艰巨的角色，为了孩子，父母可以放下斤两计较，所以为人儿女也是个光荣的角色，使人不知不觉变得伟大。

“爽子，我带相机了，给你照张相。”我穿着一件大蓝花衬衫，队长说太洋气禁止我穿，这是两年来第一次穿上。

我的行李里有一个箱子，里面有家人和朋友两年来给我的一百零九封信。不知在我情绪允许的情况下，我是否还会一一重读，但也许永远不想被过去拖后腿。

在长途汽车上，父亲告诉我：“自从你被捕，法国方面很多艺术界及政界的人士都纷纷参与了营救，并且组织了一个营救李爽委员会。使馆和驻华记者站的记者和认识你的外国人都被卷了进去，有两三个记者定期来咱家带信儿。我看见一些照片上法国的市民和艺术明星们，好几百人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前游行抗议，每一个抗议者都举着一幅你的画像，真让人感动！对了，还有巨大的横幅标语，写着中文法文。——李爽无罪！”

“真的？”

“是！”

“中国人呢？”

“全国各大小单位，特别是学校，都开会批判‘李爽事件’。”

“是吗？我在‘二六八’没有人开我的批判会。”

“‘二六八’里有太多李爽，虱子多了不咬。”呵呵，终于幽默战胜了沉闷。

真的，刚出狱时在一辆破烂的长途汽车上，听到有法国人举着我

的画像游行，就像做了场妄梦。自幼没有受过人权法制教育的我，很难理解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异国女子与本国一个外交官的爱情走上街头，而且还去声援中国的业余艺术组织。而中国人如遇枪打出头鸟的事儿，不仅其余鸟儿会蜂拥指责，还有可能把开枪人奉为英雄。

到家，进门一眼见到母亲，含在嘴里两年的“妈”脱口而出。“爽子，回来了。”母亲扭头儿走开，到厨房独自掉眼泪去了，我们都明白她一向是个抑制自己喜怒哀乐的人。过了很久母亲才出来，给了我一杯最爱喝的洞庭碧螺春。

当晚，法国《世界报》的一帮记者就来了。老外的情感表达方式与中国人不同，安妮达和吕克贝尔进来，激动得像老鹰扑小鸡，那种鼻子眼睛同时跳跃在面孔上的欢喜样子，在两年前我会很欣赏，可是现在我不习惯。勉强寒暄后，我转身回屋子不再出来。我把灯关了，抱着膝盖缩在床上，监禁期间夜里也要开灯睡觉，现在我要享受黑暗，仿佛希望回到母体的安全中，在一个无欲的原点上不再被注目。

外面很热闹，似乎真的有过一场他们称为人权的国际“冷战”。两年来大家都为“李爽事件”做了许多事情，他们要为成果干杯，但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胜利中，忘记了戏的主角目前还蒙在鼓里呢。我并不知道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我身上都做了些什么文章。

我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拿自己最柔软的心无意中碰撞了最坚硬的权柄，引起轩然大波，但背后的力量乃是中国人无数颗柔软的没有喊出来的心声。

姥姥有话说：“爽子，你早晚是一只要挨枪的头鸟。”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马上下床穿鞋，装没事儿人。

大家进来，每个人都拿着一杯香槟，对我说些祝贺之类的话，我接过一只大杯子，活像个野村姑，没有经过舌头那道防线，就咕

噜咕噜干了，一个两年没经过油水的胃马上被浇晕了，我什么都听不见，只有一张张带着笑容的脸，很像同一个面具，所有的嘴都向上方弯弯如月，黄、白、黑大小不一的牙齿后面，有深不见底的黑色喉咙，渐渐模糊，多么像我画的《欲望之井》呀，人生的一切都是从欲望而生。

"快！快点！照片，照片！今天法国晚间新闻在等照片！"我像个木偶，被拖来拖去，闪光灯"噼里啪啦"闪个不停。"够了吧？"我问，记者冲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法文后，急着回去发新闻了。紧跟着"法新社"社长沙赫里·昂丹·朵尼夏（Charles Antoinne Denerciat）带着各种助手、摄影师后脚跟上来，我家的公寓太小，桌子椅子都被请到楼道里去了，不用想象就知道邻居和民警是如何严阵以待。

我们家住在楼中楼，周围所有楼里的人都知道李爽回来了。老妇女没事儿就搬个小板凳儿在外面坐着，脸冲着我们家楼门口儿，等我出来。男人们在花窗帘儿后面举着望远镜。

我属猴，现在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猴了，一只被自己的同胞品头论足的洋活猴。我自问："什么是真的自由？如果我们从外界寻求到一个自由，但依然没有解脱感，那也许它只是一个身体上像自由的东西，却还不是心的自由。"

外国人希望了解古老的东方之首中国，中国人渴望带着尊严走向世界。"李爽事件"之后中国已经有全套的涉外婚姻法了。

出狱后为了赴法结婚，我像一个皮球，从街道居民委员会，到街道派出所，皮球从一个部门，再被踢到另一个部门，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儿的部门单位。因为在中国没有与外交官结婚的先例，也就没有成文法律可依循。我用了六个月，以全力以赴的专注去办这件事，跟打仗差不多，回回都念经一样鼓励自己，还要套上防御罩，应对那些白眼儿、甩闲话、鄙视、指桑骂槐、刁难。公安部通过外交部向法国新任大使沙赫尔·马洛提出要求——法方出示白天祥亲笔写的保证书，保证李爽出国后他们不再作任何宣传、蛊惑，而且要求老白的父亲、母亲、兄弟、朋友也写来保证书，才发给我护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我交了十五块钱，从一个木头的小窗口里扔出一本儿我的护照。我把它紧紧攥在手中，回家了。"护照！护照！"我哈哈笑着，父亲呵呵乐着，母亲也笑眯眯要过来翻来覆去拿着看，姐姐说："行啦！行啦！别看了，不就一本护照嘛！"

父亲恢复了幽默，"哟，天玫，护照可能是假的吧？"

母亲说："对！肯定还缺两个单位的戳儿呢！"全家人一起捧腹大笑，举着护照合不拢嘴。

第二天，安妮达带我去见了法国大使，原来的大使克罗德·沙耶，因为"李爽事件"被撤职召回法国。继任大使沙赫尔·马洛（Charles．Malo）亲自作了签证。马洛大使是个老牌传统欧洲绅士，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告诉我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有关"李爽事件"

的内部细节："在法国公众舆论的推动下，政界也开始介入和关注由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家掀起的民主意识运动，中国是全世界都不能忽视的。在法国总统密特朗来华访问的第二天，所有的使馆官员都准备好和他一起去大会堂赴宴，我紧张地走近他，向他强调了你还没有被释放的事情，他好像很心不在焉地听。"

"出来后我对安妮达说，只有听天由命吧！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密特朗总统一见到邓小平就提及了此事，邓小平立即向部下询问，他以为这件事早就解决了。之后一个星期你就释放了，我们的确很吃惊。"

我无力绞尽脑汁去弄懂紫微、八卦、四柱这些古人的高深研究，但我相信老天爷肯定也有其独特的语言，它不仅仅是符号、图像、感觉什么的，也一定包含数字。因为迟迟拿不到护照，我的飞机票改签了三次，终于停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不再改签。那时我刚二十六岁生日。还有另一桩小事儿：我刚到法国不久，被老白的大款叔叔邀请到法国南部的戛纳电影节去玩儿，并且带我进了最大的赌场，想给我开开眼界。走到轮盘赌前，我忍不住想下个赌注"二十六"，小球摇来摇去不偏不倚落在二十六数字格上，我们高高兴兴地取了六千多法郎的赢额。离开时快十二点了，巨大的电子钟上有日历，出门时听见"咯嚓"一声响，我抬头一看，注意到日历换到二十六日。

我和老白分开已有两年多，我面临具体问题，他是谁？我是谁？又怕见，又急得不行。

女人，当她把灵肉缠上花束丝带成为美丽的礼物献给男人后，她梦想世界是一幅镶进框子的图画，那幅图画的题目为《永远的属于》，但那是爱吗？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家里突然没有了笑声，每个人擦肩而过，眼睛不再对视，好像一杯水满了，再加一滴就会溢出而不可收拾。

阿丽达、吕克贝尔和法国驻中国商务中心的安娜·玛丽（Anne Marie Chantegreil）开来两辆车。去飞机场的路上，只有法国人在谈笑风生，母亲为了礼貌，"啊"，"唉"，"是吗"地应酬着。

办好手续，要出关了，法航的机长来接我。

他是谁我不管，只是觉得法国人笑得好开心，我已经无意中成了所有浪漫法国人的未婚妻。

但与家人离别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在坎坷中谁也没有放开过谁的家庭，要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道别，更是难上难。我没有料到离别的滋味是如此凄凉，我也没有料到和这个国家道一声再见，也是需要拿出许多坚强的。

我想忍了，但又想我们为什么总要活在克制中？我张开双臂，拥抱了所有的人，一家子的女人哭成一团，父亲和姐夫却忍着。

我给父母添了那么多麻烦，他们一句怨言也没有，我虽然本性难移，但我爱他们！

我挥着手退着走，仿佛要用眼睛抓住亲人最后的美好印象，为延长千万缕阔别的祝福。到快要看不见时，我辨认出父亲宽大的肩膀，母亲笔直纤细的身材，仿佛在祈求善变的世界：让我们的女儿幸福。

我从此就要一个人去游荡天涯了。

我就要离开让我受了那么多苦的土地，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我的婚礼上将没有一个家里的亲人。

座舱长请我到驾驶舱去。驾驶舱像一个半圆透明的巨大玻璃窗，飞机正经过一座城市，我看到人间点点灯光，像星罗棋布的天空，再仰望天空，天空又如城市灯火点点。天空靛蓝，深处显得无际神秘。我感到飞机在向前方费力而受限地努力，我幻想着穿出玻璃独自飞翔的滋味。

我看着这块生我养我、使我哭过、苦过、笑过也甜过的祖国大地渐渐变远变小。什么是真实的自由？我们所能了解的太浅薄了，只要我们还不能超越生死，爱和怨将继续是一幅图画上的正反面。

从幼儿园，到学校，到插队。从青艺，到“星星”，从监狱到飞机……当年的人和事，我爱那些可怕又可爱的时刻，我爱我的哥们儿、姐们儿、朋友们。

中国人今天的丰盛不是天上的馅饼，也不是一两个著名人士独自撑起的青天，是所有中国人爱生活的必然结果。无论怎么回忆，那个时代都最终淡如浩渺烟波。它美丽是因为没有昨天也没有今天！所以那是深深印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时代！

如果我的亲人、哥们儿、姐们儿、朋友和与我共同分享过那个时代的人，看到这本书，我想对他们每一个人再叨叨一次“我爱你们”！如果你们问为什么？我会悄悄告诉你：在我的人生中交过许多朋友，有的擦肩而过，有的在我心里留下了签名。当他们曾经带给我的好运和噩运已不在嘴上喋喋不休的那一天，我看见生命像一幅奇妙的蓝图，一幅有意义的拼画。你以为你在混乱的招架、拼凑生活吗？不，那是一种玄机。生命的轮廓不受粗钝肉体的控制，它也不按人的时间排列，这幅蓝图的每块小局部，都是人生链锁关系的衔接，你的人格通过你对别人的褒贬态度被照见，你的人格不知不觉地在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中历经千锤百炼地被塑造了。

有一个早晨，我醒来，一句心悦诚服的话从心中升起：如果没有你们，我将什么都做不成，谢谢你们！

我在中国的故事讲完了，真爽。

李爽的名字让中国当代艺术界的许多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却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等一样，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风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先锋之一。

1981年11月，24岁的李爽由于和未婚夫、法国外交官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白天祥回法国后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督促释放李爽。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及此事。很快，在会谈之后，李爽获释，并获准去巴黎。

1983年李爽奔赴法国，次年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他们波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被法国电视台报导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上架建议：回忆录 · 畅销

ISBN 978-7-5133-1091

9 787513 310918

Un taoïste n'a pas d'ombre

Mémoires d'un ethnologue en Chine

Patrice Fava